太平洋战争史

第一卷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商 务 印 書 館

太平洋战爭史

第一卷　九·一八事变

編　者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譯　者
金　鋒　冷　明
孔知行　王炳达　馬君雷

商　务　印　書　館
1959 年·北京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太平洋战争史" I "滿洲事变"

1953年9月30日

东洋經济新报社出版

太平洋战争史

第一卷 九·一八事变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金鋒等譯

商务印書館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京华印書局印刷 紅旗装訂厂装訂

統一書号11017·89

1959年11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5千字

印張 7—13/16 印数 1—7,000

定价(9) 1.10元

出版説明

《太平洋战争史》是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的几位会員集体編写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是日本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編写本書的几位会員，都是日本当代知名的进步历史学家。

本書与許多資产阶級历史学家撰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根本不同，資产阶級历史学家在他們的著作中曲解战爭的起因和性質，向讀者隐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眞实历史过程，从而为壟断資本集团推卸战爭罪責。本書的作者为了肃清这班御用学者的著述在讀者中所起的十分有害的影响，收集了丰富的史料，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闡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地区战爭的性質和發生的根源。他們指出：侵略战爭的罪魁是一小撮日本壟断資本集团，而日本軍閥及其一整套的国家机器則是它們的意志的执行者。本書作者也指出，在这場战爭中，不仅被侵略的国家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日本国內的劳动人民也身受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数十年来的劳动成果被大財閥和軍国主义集团用于發动对中国和其他亞洲各国的侵略战爭中。

本書的題旨虽然是在叙述这一場战爭的主要禍首——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和發动太平洋战爭期間的国內状况和国际局势，但作者并沒有忽略叙述中国、朝鮮和东南亞国家人民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爭史实。作者站在国际主义立場，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叙述了这一段历史，作者对中国人民的斗爭，是抱着深厚的同情的，他們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所进行的抗日斗爭，是击潰日本法西斯的决定力量。

作者在分析日本准备太平洋战爭时期的国际局势中，严正地

揭露了美国的不体面的外交政策。書中举出大量事实証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对被侵略国家并沒有給予眞誠的援助，反而把軍火源源供应給日本侵略者，利用日本侵略为美国壟断資本服务。

本書不仅帮助广大的日本人民認清了过去这段时期的史实和眞相，而且对日本人民的当前斗爭起了鼓舞的作用。它的現实意义在于：通过这一段史实，昭示了深受战爭灾难的日本人民，必須起来坚决制止日本統治阶級企圖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的一切罪恶行徑，必須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反动政府企圖把日本拖入美国策划的侵略集团。日本人民已經愈来愈清楚地認識到，美国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目前，日本人民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殖民統治的斗爭，我們深信日本人民的正义斗爭一定会取得胜利。

本書共五卷。叙述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包括了从 1931 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起到 1951 年在旧金山签訂和約为止整整二十年的历史。

第一卷叙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前的国內历次事件和 1931 年至 1933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

第二卷叙述 1936 年至 1940 年間的中日战爭。

第三卷、第四卷叙述太平洋战爭爆發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准备和战爭的經过。

第五卷分析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日本的国內状况和国际局势和 1951 年签訂旧金山和約。

譯本是根据原書 1953 年版翻譯的。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59 年 9 月

目　次

代　　序

——日本軍国主义的性格——

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不断战争的历史。战争和侵略是天皇制和資本主义日本的生存和發展的最主要的手段。不仅一次战争与另一次战争的間隔非常之短，而且，这段間隔时間只是被用来处理前一次战争的善后和进行下一次战争的准备而已。正如經常用麻醉剂的人必須逐漸增加藥量那样，天皇制和資本主义的日本所發动的战争，一次比一次扩大，最后，終于和全世界人民为敌，其結果，遭到了惨重的失敗。但是，它并沒有因此而取得教訓，在遭到徹底失敗以后仅仅八年的今天，又在大肆复活軍国主义了。

日本人民为什么祖孙三代都这样地被迫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呢？难道这是由于日本人民的民族特性嗎？不，日本人民决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日本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一样，从来就是爱好和平要求和平的，而且今天仍然是要求和平的。近代日本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沒有得到人民內心的支持。人民一直是厭恶和反对侵略战争的，但是，这种要求一直被統治者压抑下去，因而在政治上得不到实現。

那么，日本走战争的道路是否命中注定的呢？我們常常听到这样的說法："日本国土狹窄、資源缺乏、人口过多。因此，日本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就必須發动战争来取得領土和資源。"这种說法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經出現了。但是，日本尽管由于甲午战争夺取了台灣，把朝鮮变成了事实上的殖民地，然而并未因此而不再發动战争；相反，却为發动更大規模战爭准备了条件。而且，随着日本

領土和势力范圍的扩張，就越發叫嚷“人口过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口过剩”的論調，几乎像常識一样地遍及于全国。当时首相原敬和元老山县有朋曾就人口过剩問題作过如下的交談：

“山县認为我国尙有容納人口的余地，并談到了奖励小农經济的必要；这与我（原敬自称）先前所說的相同，对此我是欣然同意的，向外国人宣傳‘我国因人口过剩而不得不向海外發展’，固然便于取得他們的諒解，但实际上在我国人口增加的比率上还存在疑問。我国可以容納人口的余地还很多，不必担憂人口过剩，这可以从不久以前工业稍微發展了一下就馬上感到人力不足一事得到証明。”（“原敬日記”大正九年——1920年10月21日。）

山县和原敬都是近代日本的第一流政治家。他們比誰都清楚日本的眞相，所以，在向日本和世界人民宣傳“人口过剩”的同时，他們本身却确認了人口过剩論只不过是便于对外侵略的宣傳。原敬和山县以后的人口过剩論，也是同样騙人的宣傳。

那么，为什么近代日本的历史成了战爭和侵略的历史呢？那是因为天皇政府和半封建的地主制度以及和这两者紧密結合的特权大資本家統治着日本的緣故，統治者为了他們的利益，把日本从一次战爭拖向另一次战爭。

一　从被压迫国家变为帝国主义

——甲午战爭、日俄战爭——

日本向近代国家和資本主义的过渡，是經过明治維新由天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

从十九世紀初叶起，农民、商人自發的反封建斗爭即暴动和社会改革等激烈化了。同时，社会各阶層对于欧美列强的严重压迫，

以及对于这种压迫未能采取有效对策的幕府感到憤慨。改良主义的武士、地主、商人們，利用以上情况推翻了德川幕府，接着又廢除了諸侯、武士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1868—1871)以天皇为專制君主的統一国家。

1873年，天皇政府实行了所謂"土地稅改革"这一农业改革，承認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将按产量繳納的实物地租改为按地价繳納貨币土地稅。然而，这并不是把土地發給农民，使他們从封建束縛中解放出来，虽然在形式上实物地租变成了土地稅，但实質上，却是由国家来榨取同等数量的封建地稅。同时，还把不屬于私有的原野、山林，甚至各村的公地也作为国有。这一改革还承認了使用农奴、压榨佃农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的处境絲毫沒有改变。佃农和从前一样，占全部收获量的50%以上的实物作为地租被地主夺去，他們根本沒有从农奴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中小自耕农也由于被殘酷地榨取着土地稅，不得不陆續将土地卖掉，至1890年前后，約有68%的农民成为完全的或部分的佃农。封建地主制度統治了农业和农村。地主成为天皇在农村統治的支柱。

資本主义企业，被作为天皇政府最重要的武力机关、軍队和警察施行近代装备的手段而首先受到天皇政府的扶植。当时三井、住友、三菱及其他少数新旧巨商与官僚勾結，成为"政商"，从政府手中取得了極大的特权和庇护。他們从一开始就与国家資本主义并駕齐驅，取得了对商业、运輸、金融、矿山等企业的支配地位。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后半起，这些"政商"就站在近代大工业的前列，在这方面也是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壟断地位。

扶植"政商"的資本主义的資金，主要是土地稅。同时，日本資本主义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从呻吟在地主制度下的农民中，能够雇佣到不得不忍受極端低廉的工資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大批劳动力，并对他們进行殘酷的剝削。

所以，无論从資本或劳动力来說，日本資本主义都是直接間接与半封建的地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天皇制是以这两者为支柱，同时又把它們結合起来。对于农民和工人不論是多末微小的反抗，天皇政府都要立刻进行无情的鎮压，来庇护地主和資本家。

人民的力量沒有从种种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使日本未能在民主的、革命的基础上实現民族独立。天皇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欧美屈从，而在另一方面，却又企圖借侵略朝鮮和中国来补償它在政治上、經済上和民族自尊心上的損失。

实际上，近代日本从一开始就必須排除欧美資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約而进行的严重压迫，这一点恰好被天皇政府作为集中全力来扩充軍队和警察以及鼓吹軍国主义思想的最好的借口而加以利用了。

他們在理論上也幷不是不知道国內实行民主是完成独立的先决問題。可是，他們害怕国內的民主甚于外国的压迫。为了鎮压要求民主革命的人民，建立了軍事力量和警察力量，同时又企圖用这支武装力量侵略弱邻来欺騙要求对外独立的人民和达到自我滿足。所以，軍国主义也就成了天皇政府的固有的本性（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征韓論，1874 年侵入台灣，1875 年侵犯朝鮮江华島，翌年强迫朝鮮签訂不平等条約、以后逐年加强对朝鮮內政的干涉，进行侵略）。

而且，这种侵略是在得到欧美列强的任何一国以上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以从每次侵略事件的具体經过得到証明。譬如，侵略台灣是在美国的积極帮助下才开始策划和进行的。江华島事件以后对朝鮮的侵略，也是受到英国的鼓励以后才开始的。尽管这样，英美却一直拒絕了日本关于修改条約的要求。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半起，英俄在远东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当英国决定采取将日本作为它在远东对付俄国的走卒加以扶植的方

針以后，日本在修改条約上才逐漸成功。

日本的紡織、鉄路建設等資本主义大企业剛剛成長不久，到1890年很快地就發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充分暴露了由于天皇政府的殘酷榨取、地主的剝削和为了扶植特权“政商”而造成的經济上显著的不均衡，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国內市場的狹隘。同时，又因連年米麦的歉收，更暴露了半封建的农业缺少足以供应向前發展的資本主义所需要的粮食的稳定的生产力。为了摆脫这种困境，天皇政府和大資产阶級加紧策划了对外侵略。

日本統治阶級的各阶層都把朝鮮当做了粮食供应地而加以注視了。同时，企圖享有西洋各国同样的特权侵入到富饒的中国市場上的野心也增强了。更由于日本对朝鮮的侵略逐漸加劇，就使得日本与朝鮮以及当时朝鮮的宗主国中国之間的对立，从1882年起日益尖銳化了。其結果，造成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爭。当时，日本的統治者所以敢于發动战爭，就是因为日本得到了英国的大力支持。这表現在英国答应了日本关于修訂不平等条約的要求，它同时还防止了帝俄过分干涉日本。英日修訂条約签字后的第九天，日本就对中国艦队进行了偷襲，这并不是偶然的。

日本由于甲午战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掠夺了巨額賠款和广大土地，把清朝的势力从朝鮮永远地逐出了。它强迫清朝政府签訂了不平等条約，由于这項条約，日本从中国夺取了比欧美各国所享受的更为有利的特权。以这次战爭为轉机，日本从被欧美列强压迫的民族，变成为与欧美列强同样地压迫其他国家的民族。天皇政府把要求摆脫欧美各国的压迫以实現完全独立的国民斗爭，引导到压迫邻近各民族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甲午战爭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的道路。

战胜的結果，日本資本主义得到飞跃的發展，奠定了輕工业的基础。但是，这只是意味着三井、住友、三菱、安田、大倉、古河、澁

澤等少数特权大資本家扩大和加强了他們对金融、商业、运輸、矿业、工业等各方面的直接或間接的支配，以及他們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已；它并沒有使国民生活富裕起来。而且，由于資本主义的發展，以前被認为只是"貧民問題"的城市劳动者問題，在甲午战爭以后就以"就业問題"的面貌出現，而劳資間的阶級矛盾已明显地成为国內的基本矛盾。罢工的不断發生、以片山潛为首的工会运动、1901年的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宣言等，表明了工人阶級作为一个阶級已經有了成長。

資本主义的發展，也給农业以深刻影响。可是，它并沒有破坏半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反而加强了寄生地主制度，經营地主也变成寄生地主。大地主买卖股票和公债，漸漸成为工商业的經营者。另一方面，大資本家也大量購买山林和耕地，兼作寄生地主。这样，就加深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关系。远离土地完全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增加了，并且，寄生地主与佃农之間的矛盾，作为仅次于劳資矛盾的日本的基本阶級矛盾而开始表面化。

1900年，对于城市和农村中新的阶級矛盾的發展，天皇政府和地主資产阶級的議会态度完全一致，在1900年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剝夺一切人权和自由，特别作出了有关鎭压工人运动和减租斗爭的規定。

对外关系方面也和国內一样，旧的矛盾有了緩和，新的矛盾产生了。日本把清朝势力赶出朝鮮以后，在那里又遇到更强勁的敌人帝俄。当时甲午战爭就成为列强开始瓜分中国的信号，三国（指俄、德、法。——譯者）对日干涉就是这一竞爭的最初的具体表現。对此日本虽然不得已屈服了，但是，它企圖在最近的将来寻找复仇的机会。

日本只要处在天皇制和侵略主义之下，在經济竞爭上是不可能战胜欧洲列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張須要具备以下三个条

件：一、在远东只有日本一国拥有强大的軍备；二、灵活运用远离欧美列强，而邻国又都軟弱这一政治和地理上的有利条件；三、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及其他因素，日本可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持。如果不具备以上这三个条件或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那末，日本的帝国主义的扩張，无論在这以前和这以后都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日本的統治者也知道。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鎭压义和团民族斗爭組織联軍时，日本强行参加进去，并借此炫耀了它是远东唯一能够最迅速出动大批軍队的国家。当时，日本还乘火打劫地鑽列强的空子从台灣派兵到对岸的厦門，企圖占領福建，但是遭到英国的干涉，只得罢手，日本的这次失敗就是由于它缺少上述第三个条件。

上述三个条件中，最基本的东西是自己拥有强大的軍事力量。因此，天皇政府和資产阶級，还在日本和清廷講和以前就为准备下一次战爭进行了积極的布置。从中国取得的三亿六千万日元賠款的90%以上都用于軍費方面。1903年陆海軍的預算是一亿五千万日元，比1896年的七千三百万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但是，因为国家財富被这样大批地投到非生产的軍事开支上，所以原已萎縮不堪的国内市場与不断發展的生产力相比，就更加狹窄。产业資金缺乏，又不能把朝鮮作为市場加以扶植，只有采取掠夺政策。这样，就使得朝鮮民族的抵抗进一步加强，使它倒向帝俄方面。因此，日本就不得不准备战爭和更加依靠軍备；其結果，削弱了經济基础。由于这种相互作用的結果，尽管扩大了一些領土，取得了一些賠款，可是，繁荣現象立卽衰退。1897年發生危机，三年以后又是蕭条，再过三年，又一次出現蕭条，在这期間，就沒有出現过全面的繁荣。这种情况使資产阶級急于寻求国外市場，并和天皇政府同样地發展了侵略野心。天皇制的軍国主义和資本家的侵略主义相互配合着向前發展了。

可是，使日本成为侵略性国家的經济上的脆弱性，使桂太郎首相也不得不承認“独当远东大局是很困难的”。因此，就需要和“欧洲的一国締結某种条約”，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現就是1902年的英日同盟。日本虽然成了远东的帝国主义，但是还必須从屬于某一帝国主义。

一面从屬一面侵略，也表現在經济上。尽管日本国內苦于資本的短絀，但为了軍事目的，还得壟断中国的大冶鉄矿，以及在朝鮮鋪設鉄路，勉强来輸出資本。这样一来，国內的資本更加缺乏，其唯一出路就是政府和資本家想尽办法輸入外国資本。因得到英美的財政援助，日本才敢發动日俄战爭。日俄战爭的軍費大約十七亿二千万日元，其中八亿日元是来自外債。

1904—1905年的日俄战爭，就是在資产阶級的帝国主义野心和天皇制的軍国主义成为一体、以及得到英美特別是英帝国主义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日本在这次战爭中，显露了近代帝国主义的面目，同时，站在工人阶級立場的反战斗爭，第一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現了。片山潛、幸德秋水、堺利彥等人就是这一斗爭的領导者。当时，日俄两国人民为了和平进行的合作，具有特別深远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者的积極的反战斗爭，鼓舞了內村鑒三与謝野晶子等許多要求和平、憎恨和厭恶战爭的人們。

二　帝国主义的确立

日本僥幸地在日俄战爭中获得了胜利。日本在沈阳战役以后，如果沒有英美的財政和軍需品的大力援助，是絕对无法繼續打下去的。但是英美，特別是美国，并不希望日本获得徹底胜利，在美国的压力下，日俄講和成功，日本达到了侵略朝鮮及东北南部的目的，并夺取了庫頁島的南半部。

日本資本主义以这次战争为跳板，进一步发展了。企业的投資总額在战前 1903 年底为八亿九千万日元左右，至 1910 年底竟达到十四亿八千万日元。日本向东北傾銷商品，从那里排挤了英美商品。重工业的建設也开始了，但是这并沒有消除日本資本主义的本質上的脆弱性。1907 年發生了严重的危机，以后經济蕭条一直存在着。在这期間，虽然有些企业得到發展，各种工矿业的生产也有了上升，但都被用来建立財閥壟断資本。同时，这种产业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大量英美資本的輸入。190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外資总額增加了六亿四千万日元，若将这个数目和同一时期企业資金增長額約十亿左右日元相比，就可以看出外資的意义有多末巨大。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同时加深了它在財政上对英美的从屬关系。

天皇政府和大資本家企圖靠掠夺台灣、朝鮮和中国东北来弥补这个弱点，它不仅断然拒絕美国关于共同經营南滿鉄路的要求，坚持了独自經营，而且还执行了从东北南部排斥所有外国势力的方針。日本从朝鮮赶走帝俄势力以后，到 1910 年終于击敗了朝鮮民族的坚强抵抗，吞并了这个国家。在台灣，无情地迫害土著居民和汉族的地主、資本家(手工业工場主)，掠夺他們的土地，建立制糖厂，并对居民进行奴隶式的剝削。

日本的这种政策，使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矛盾，特别是圍繞着中国东北的市場同美国之間的矛盾發展了。美国当时还沒有力量横越太平洋对日作战，只好和日本締結桂、塔虎特秘密协定(承認日本独占朝鮮，1905 年)和高平、路得协定(內容与前者大致相同，1908 年)，表示讓步，但它却企圖用“美元外交”在华北及东北扩展势力。由这里开始的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爭夺战，三十多年后終于發展为太平洋战爭。

在这时期，中国 1911 年推翻清朝的革命宣告成功，翌年二月

中华民国成立。但是，由于軍閥的野心，中国未能实現坚强的統一，繼續处于混乱状态。日本乘此机会，在1911年發动了“滿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援助”革命派，企圖在他們胜利后，索取重大酬报；在北方，反对亲美派的袁世凱。

由于这样同美帝国主义的对立，并为了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和鎮压朝鮮民族激烈的反日斗爭，日本統治阶級实行了漫无限制的軍备扩張。軍部强硬要求，陆軍增設四个师团，海軍建設八八艦队。由于这种要求和当时的經济实力过于悬殊，連一部分大資本家也表示反对，但是他們并未抛弃以軍事力量弥补經济弱点的基本政策。因此，經济上的困难愈严重，就愈益急于要侵略中国。

在这种政策下，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在日俄战爭中，被欺騙的群众不滿情緒爆發了，1905年9月东京發生了焚毀全市警察机关的暴动。群众已不怕从正面触犯統治势力（虽然是暴动式的）。特别是在危机以后，矿山、兵工厂發生了大規模的罢工，并且还和軍队相对峙。其他工厂也陆續發生罢工事件。农民的减租斗爭也在各地不断地展开。社会主义者活跃起来了。

为了鎮压这些运动，政府于1910年捏造了“大逆事件”，甚至連“社会”等字样也不許使用。由于这种殘酷的鎮压，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时期被窒息了，但工人阶級的經济斗爭并沒有中断。这时，眼明手快的大資本家澁澤荣一帮助鈴木文治組織劳資协调的“友爱会”。不管該会的宗旨以及它的領导者如何，先进的工人都要求組織起来，因此参加了友爱会，并使它作为工人阶級的全国性組織向前發展了一步。

工人阶級的奋起鼓舞了小資产阶級的进步派。他們代表在財閥压迫下的一般产业資本的要求，攻击天皇政府特别是軍部的專制，反对扩軍政策。他們主張政府不只是对天皇，而且也应該对議

会負責；要求廢除軍部大臣武官制和統帅权的独立，并和工人阶級一起要求实行普选。

在他們領导下，进行了 1911—1913 年的护宪运动。群众包圍議会，要求憑借天皇大权肆行專制的桂太郎軍閥官僚內閣下台，結果桂內閣終于垮台。这一斗爭的結果是，于 1913 年修改了官制，規定軍部大臣可以从預备役的大、中将中遴选。1914年海軍的貪污（西門子事件）被揭發，当时，数万群众在議会旁边的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推翻海軍軍閥巨头山本权兵衛內閣，虽然同大批警察發生了流血冲突，但群众并未示弱。

天皇政府和大資产阶級无論在經济上或政治上，对內或对外，都一年比一年困难。为了摆脫困境，他們总是千方百計地寻找借口，以便發动侵略中国的战爭。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了，这对日本的統治阶級来說，簡直是“天賜良机”。日本政府立即借口履行英日同盟的义务，而强行参加了战爭，尽管英国本身并不欢迎。

日本軍队迅速粉碎了在中国山东省境內的德軍，并占領了德租界和周圍屬于中国的領土，把大軍長期駐扎在那里不肯撤走。到 1915 年 1 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內容分五点：第一点，把中国山东省变为日本事实上的領土；第二点，把內蒙古东部及东北南部变为日本事实上的領土；第三点，由日本独占汉冶萍的鉄矿、煤矿資源；第四点，中国沿海地区及島屿不得割讓与其他国家；第五点，由中国政府招聘日本軍事、財政顧問；中国警察由中日两国合办或者招聘日本顧問；中国軍队所需的大部分武器由日本供应，或者将中国的軍事工业置于日本控制下。此外尙有七条，无非是要求把全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这些条件甚至使卖国的袁世凱政权也无法全部接受。他透露了日本的要求。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憤慨象怒潮一般高漲起来。

过去，中国人在那以前一直把日本当作模范的东方的先进国家和自己的朋友；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認清日本帝国主义才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慑于中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将第五点撤回了。但是反映在那上面的意圖一刻也沒有打消过，为此，它支持袁世凱称帝的阴謀，此外还进行了削弱和分裂中国的各种活动。

在大战中，日本兼收了战胜国和中立国的利益。日本除了和山东省境內少数德軍作战，以及占領了几乎未設防的在南洋的德屬各島屿以外，仅仅是在大战末期，为了护送联軍的商船，派出过一个小艦队到地中海（这还是在和英法約定日本所占領的德屬各島战后归日本所有以后，才派出的）。因此，日本几乎沒有担負战爭的开支，却从些微的交战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由于欧美各国商品来源断絕，中国市場当然不用說，就是整个东方和南洋的市場也都为日本商品所独占。另外，日本还向协約国出售了武器和軍需物質。

这样，日本資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大繁荣和惊人的發展。1914年底到1920年底，全国企业的投資总額从二十亿七千万日元增至八十二亿四千万日元，工厂从三万一千七百十四家增至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家，工厂工人由八十五万人左右增至一百五十五万人。在这期間，所有工矿业的产量都超过了五倍，其中机器制造业增至八倍，金屬工业增至六倍半。造船和鋼鉄工业的發展特别显著。日本的重工业已經建立起来。在对外貿易方面过去一直是入超，从1915年起轉为出超并継續到1918年，出超总額达到十四亿九千三百万日元。

在农业方面，蚕茧的产值从1914年的一亿七千万日元激增至1919年的約七亿七千万日元。經济作物的种植和畜产普遍地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長，从此有了富农經济的萌芽。

通过这次繁荣，財閥壟断資本确立了，日本走上了最新的帝国主义阶段。

三　总危机

但是，这种空前的景气和各种产业的飞跃發展，既沒有改变日本农业的半封建性質，也沒有改变半封建性的农业与資本主义产业的联系。因此，在未發生本質的变化的情况下，城市的各种产业异常迅速地發展起来，就使半封建性的农业与資本主义产业間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矛盾在 1918 年 8 月即空前的大繁荣中間爆發成为波及到全国范圍的日本历史上最大一次飢餓暴动——“米騷动”。

“米騷动”的主要原因是：一、資本主义的迅速發展使工业人口及城市人口激增，因而大米的消費量也相应地激增了。但是，由于寄生地主制度的束縛，大米的生产几乎沒有增加，又因为农民的大米消費量增長，以致产生了大米供不应求的現象；二、政府为保护地主利益，甚至未廢除外国大米的进口稅，并使三井、鈴木等特权政商壟断大米的进口，使他們得以提高米价，攫取暴利；三、当时政府为了干涉十月革命进行儲备軍粮，这就加剧了大米的缺乏，助長了米商的投机活动；四、由于米价暴漲和通貨膨脹，实际工資显著減少；五、自 1905 年焚毀东京警察机关以后，群众斗爭即不断發展起来；加之又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人民的斗爭情緒更为高漲了。

这些因素匯集在一起，就爆發了这次大騷动。它意味着日本資本主义的矛盾已經达到无法調和和难以克服的地步，同时也表明日本資本主义摆脫不开因俄国革命的胜利而爆發的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米騷动”是日本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一点，可从

"米騷动"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都陆續爆發开来，使得統治者一筹莫展这一事实得到証明。

"米騷动"象狂風一般席卷了全国，有六十个市鎮，由于出动了軍队好不容易才鎮压下去。但在有煤矿的市鎮里，除了矿工以外，市区居民的斗爭只坚持了几天。这是因为这次大暴动是自發的，沒有組織，在这一点上，它和从前的"搗毀"性質相同。但是，"米騷动"使日本人民的阶級覚悟大大提高了，由于"米騷动"和十月革命影响的加深，工人、农民的阶級斗爭飞跃地發展起来。在軍事工厂、造船、鋼鉄、机械和紡織等大工业及矿山的工人带头下，罢工的規模和次数，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各产业中开始有工会組織。1919年友爱会改为"日本工会总同盟友爱会"，两年后，取消了"友爱会"三字样，改为"日本劳动总同盟"，与社会主义者結合起来，开始走上阶級組織的道路。1920年在东京举行了日本首次的"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参加的工人达一万人。根据官厅統計，减租斗爭在1918年是二百五十六件，可是至1921年，竟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件(約七倍)。次年1922年开始組織日本农民协会。另外，为爭取受歧視的"部落民"的解放，在1922年3月还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这一运动極其迅速地在全国范圍內展开了。妇女运动也从小資产阶級的妇女小組發展成为群众运动，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也誕生了。一切受压迫被剝削的人民都起来了。1922年7月，被認为非法的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秘密地成立了，它作为工人阶級和全体人民的革命先鋒队，以廢除天皇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开始活动了。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人民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自觉斗爭。

与"米騷动"同时，天皇政府和壟断資产阶級为扼杀十月革命，派出了七万三千名西伯利亞远征軍。这固然是整个帝国主义国家

对苏俄进行共同干涉的一部分，而日本特别卖力。因为第一，充滿着矛盾的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害怕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存在，会使革命的影响傳播到和苏俄毗邻的朝鮮和中国东北的人民中間；第二，日本老早就渴望攫取西伯利亞和庫頁島北部的資源，因在經济竞爭上敌不过美国，因此企圖用武力占領这些地方，并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第三，日本还企圖利用这次远征霸占东北北部和外蒙。

可是，众所周知，日本这一企圖徹底失敗了。当其他国家已經承認失敗和撤兵以后，日本还不肯撤出，在西伯利亞一直賴到1922年10月，另一支占領庫頁島北部的軍队直到1925年5月才撤出。这次出兵，不仅遭到最慘重的失敗，沒有达到任何目的，而且还向世界暴露了自己的侵略本質。

这次战爭完全是天皇政府和大財閥發动的一場战爭，它受到了人民的强烈反对。象“东洋經济新报”等报刊始終反对干涉，要求立即承認工农俄国。大阪“朝日新聞”虽然不够明确，但也一直反对秘密外交和出兵。同时，日本的先进工人，例如佐藤三千夫还到了西伯利亞与苏俄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献身于保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爭。1922年，片山潛在西伯利亞鼓动日本士兵爭取早日归国。国內的工人也在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提出了从西伯利亞撤兵和承認工农俄国的要求。以后不久，工会和各进步团体响应了英国工人的号召，組織了“反对干涉苏俄同志会”。日本工人阶級的国际主义精神比日俄战爭时代进一步提高了。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于1919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鮮全境，發生了“独立万岁”的民族起义，与日本軍队、警察搏斗了三个月，在丧失主力以后，武裝斗爭还持續了好几个月。此后，朝鮮民族一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極端殘酷的統治堅持了斗爭。朝鮮的殖民地經济和日本本国經济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首

先，日本本国的財政每年必須为統治朝鮮支出巨額軍事警察費。其次，三•一起义后日本为了欺騙朝鮮的人民和解决本国的粮食問題，制訂了朝鮮增产大米的十五年計划；可是一旦有了些微增产，就与日本本国的地主利益發生矛盾。并且在朝鮮增产的大米也被掠夺了去运到日本国内，因此，朝鮮人越是种大米，就越吃不到大米，只讓吃从中国东北进口的杂粮。这种掠夺降低了朝鮮作为日本商品市場的意义。台灣的情况也是一样。

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爭也逐年高漲起来。1918 年日本为了把負担轉嫁給中国，把侵略苏俄的基地建立在中国境內，迫使段祺瑞政权接受"中日协定"，把中国軍队变为日本的走卒，因此，中国学生和商人抵制日貨和反日的斗爭进一步發展了。日本以二亿四千万日元貸款收买段祺瑞政权。又在上海、青島等地以紡織业为主建立起日本資本的工厂，虐待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剝削。这一系列行动迫使中国的广大群众走上反日斗爭的道路。1919 年，凡尔賽和約将原屬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全部給与日本，这更加激怒了中国人民，爆發了有名的五·四运动。从这时起中国的民族斗爭的領导权轉移到无产阶級手中，这一斗爭不可战胜地成長起来了。

战后，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和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进一步尖銳化了，开始了"日美战爭必然爆發"的宣傳。虽然美国曾在 1917 年同日本签訂了"藍辛•石井协定"承認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做过某些讓步，但是到大战結束以后美国也轉而采取攻势。1921 年的华盛頓会議就是这种攻势的第一步。在这次会議上，日本主力艦的吨位被限制为美国的 60%，这就动搖了日本在远东的軍事霸权，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天皇政府所賴以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这时，又締結了有关中国問題的九国公約，它限制了日本在大战中从中国掠夺的权益，并且取銷了美国过去所

作的讓步。美国以門戶开放为借口，将中国改为列强共管，为美帝国主义敞开了扩張势力的大門。这时，部分由于美国的压力，英日同盟也宣告廢除。日本失去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开始陷于孤立。

在上述“米騷动”以后，国內阶級矛盾的尖銳化、对苏干涉的失敗、朝鮮和中国反对日帝斗爭的發展、日美矛盾的尖銳化，这一切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再加上1920年开始的經济危机，使得这一危机更加严重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大發展起来的生产力，战后随着市場的縮小，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从1919年起，日本的貿易又轉为入超，市場已經急剧地在縮小，而生产仍然急剧地上升。不久在1920年3月，發生了由股票暴跌开始的危机。物价紛紛暴跌，棉紡織、毛織以及鋼鉄、砂糖、繅絲等业实行减产，銀行、公司陆續倒閉。由于生絲的暴跌（相当于高价时的四分之一）和米价的暴跌，农民受到致命的打击。

此后，日本的經济从根本上动摇了。1921年受到裁軍的影响，1922年又有二十九家銀行破产，1923年由于关东大地震，經济陷于大混乱，1924年进行了一些恢复工作，經济虽有了某些好轉，但还有銀行破产，1925年大貿易商行高田商会破产，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等也因有巨額貸款难以收回而發生动摇。政府对此采取了直接給予救济貸款和津貼、减免賦稅、發放补助金及自己兴办事业等一系列措施，極力防止經济崩潰。其結果，造成了公債的大量發行和通貨膨脹。另外在1917年9月，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实行了禁止黃金出口，但是这种禁令，美国在1919年6月就解除了，英国也在1925年4月解除了，可是日本却一直不能解除，因为担心解除这一禁令，必然造成通貨收縮，企业破产将会更加严重，同时还将給大米的販卖者地主阶級带来损失。这样，延緩經济崩潰——

沒有实行所謂“財界整理”——的作法，使得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經济稳定是毫无希望了。

四　崩潰

——重新淪为被压迫的国家——

經济破产的最大牺牲者是工人阶級。从1920年的危机以来，失业者激增，“失业問題”成为日本政治上的大問題。在此以前，城市的失业者可以重新回到农村，可是这时，农村本身还无法生活。工人和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团結起来，和資本家、地主及政府作斗爭。不向殘酷的鎮压屈服，工会和农民协会有了發展，无产阶級的政治斗爭猛烈展开了。他們要求实行普选、修改治安警察法、从西伯利亞撤兵和承認苏俄等等。同时从1921年起，也产生了成立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要求。

工农群众的这种要求，使小資产阶級民主主义者有可能出来，为实現普选而进行激烈的斗爭。在此情况下，壟断資产阶級認为只要普选能作为把群众关在議会里的工具，和在天皇政权机构中扩展自己势力的手段，可以同意普选。但是他們决不能讓普选变成工农提高政治覚悟和进行斗爭的武器。这时甚至發生了这样的事件，被宣傳为“普选之神”的尾崎行碓为了向“工人运动中灌輸勤王思想”，打算从宮內省（天皇）領取經費。（“原敬日記”1919年即大正8年2月20日。）

作为各阶級复杂斗爭的結果之一，于1924年标榜反对官僚內閣、保衛宪政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等三派（“护宪三派”）获得了联合执政；1925年初，在第五十届議会上除制定了男子普选法以外，还以鎮压共产主义为借口，制定了阴謀鎮压一切眞正民主斗爭的治安維持法。

有人根据护宪三派內閣出現以后，有了普选以及所謂政党內閣的慣例这一事实，就認为日本的国家政权已經变成資产阶級專政，其实不然。那只是意味着壟断資本、地主和天皇政府官僚的勾結更加密切和資产阶級的政治势力进一步扩張罢了，天皇制的特点并未消失。官僚的堡壘樞密院，和以軍部大臣武官制与統帅权的独立为护身符的軍部权力，絲毫也未受到普选的影响。內閣从来沒有因議会的不信任而垮台，但是只要得罪了樞密院或軍部，立即就会垮台，不管內閣得到議会多大的支持。再看看所謂的政党內閣絕对不可能从党內提出軍部大臣，而外务大臣也必須从外交官僚中遴选这些慣例，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眞正的政党內閣。而且，这些政党是由官僚、地主和資产阶級联合組成的，它的領导权一般是落在官僚势力的手里。

再看看"政党內閣"做了些什么。"护宪三派"联合执政的加藤高明內閣和加藤死后繼任的若槻礼次郎內閣，都是标榜"国际协調"，事实上在1925年承認了苏联，对于中国問題也打算和美英保持协調。但是这无非是伪装罢了。不应該忘記，加藤是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首謀者、当时的外相。这些內閣也曾在1925年派遣过軍艦到中国去鎭压过"五卅运动"，也曾把日本軍队混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队中，去和英美派的直系軍队作战，1926年3月还派遣过艦队到大沽口炮轟抗日軍队。不过，进行这种侵略时，尽量想和英美协調罢了。

在国內，治安維持法首先适用于鎭压学生运动。日本农民协会、工会評議会及其他各工农团体煞費苦心好容易才团結起来組成的單一的无产阶級性質的政党"农民劳动党"，在組成的当天就被政府殘暴地勒令解散了。而它对于財閥和地主的保护却是无微不至。

但是不久，統治者們就連在国际上避免和英美对立，在国內多

少要伪装一点民主的那种愼重的态度也保持不住了。因为前面所說的經济崩潰已經无可避免，到 1927 年的一开头，就爆發了金融大恐慌；另一方面，从 1926 年起，中国革命象暴風雨一般發展起来，这从根本上威胁了日本帝国主义。必須趁着中国尙未被新生力量統一起来的时候，在中国扶植起稳固的政治势力，以便确保市場，幷分裂和削弱中国。既要这样干，还与英美講什么协調？还向人民伪装什么立宪？

統治者們除了考虑当前怎样解决由于日益尖銳化的国內矛盾而产生的一系列問題以外，什么也顧不得了。他們自己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賴以成功的三个条件。例如，不但沒有利用英美的矛盾，反而加紧推行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致反对的公开侵略中国和压迫国內人民的政策。这就是若槻內閣垮台田中內閣上台，出兵济南，謀杀張作霖，三·一五事件，修改治安維持法，終于在 1931 年發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爭；又發生了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以至于發展为太平洋战爭。这一段历史将在本論中詳述。当統治者們不再是一面从屬一面侵略，而專事侵略的时候，他們就遭到了空前的失敗。

这种战敗的重担，全部落在人民大众的身上。日本民族又变成被压迫的民族了。而且这次压迫不是从前那样比較溫和的压迫，而是世界第一号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受的不是領事裁判的压迫，而是軍事裁判的压迫；不是限定的居留地以內的压迫，而是遍布全国的軍事基地的压迫；不是征收 5% 的从价税，而是对整个产业、金融和財政的完全控制。而發动侵略战爭使民族陷于悲惨境地的禍首們，甚至利用战敗还攫取了利益，他們一直充当美国占領制度的工具。而深深懂得必須一面侵略一面从屬这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特性的所謂美英派外交官們，被安插在占領制度下的日本政权里，一面作为奴才屈从于美国，同时又梦想着早日加紧

复活軍国主义，充当美国的急先鋒去进攻亞洲各国。只要腐朽的天皇制、地主制和財閥壟断資本仍然存在，他們固有的軍国主义本質就不会消灭。

但是世界已經变了，特别是东方完全变了。中国和朝鮮已經成为朝气勃勃的充满創造力的人民的国家。日本人民也变了。日本人民的革命的、和平的傳統无論在質的方面或量的方面都已获得了远非以往任何时期所能想象的飞跃發展。历史的希望就在这里。和平战胜战争，人民战胜卖国反动派，日本民族一定会争取到完全独立、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这是和六十年前修改条約的道路截然不同的革命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發展規律。

缺 页

第一篇　九·一八事变

第一章　世界面貌的改观

第一节　中国革命和列强

中国革命的意义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1923 年期間，繼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革命的風暴席卷了全世界，大大地动搖了資本主义体系。起先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日本(1918 年“米騷动”)等国，接着又在附屬国或殖民地的埃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蒙古、朝鮮(1919 年 3 月万岁事件)發生了革命，同时在中国也發生了五四运动。在大战中，中国的資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无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同时成長起来，工人运动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五四运动便是在这样情况下發生的。这是第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由于这次运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辟了反对国际資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作为典型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世界革命的有力一环。

1923 年至 1928 年，資本主义处在所謂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英国和美国相互間对于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圍和对中国的掠夺上，力求妥协。但是，这种稳定是靠大肆掠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才勉强保持下来的，因此，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加深，这

种稳定也就逐漸被破坏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翌年發生了香港海員罢工，1923年發生了京汉鉄路大罢工，帝国主义最害怕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增長了。以往，对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威力缺乏足够了解的資产阶級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也从这些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

反帝运动

这样，在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了統一战綫。这对中国革命的發展，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明确地提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实行了扶助工农和与苏联友好的政策。群众的革命运动开展了，在苏联的援助下成立了黄埔軍官学校（6月），加强了革命軍。对此，英国很快就利用广东的买办和土豪劣紳的武装組織商团进行了干涉。但是立刻就被广东政府鎮压了（1924年10月）。这时，在北方，直系軍閥曹錕收买議員当了大总統，这些軍閥是以农村封建制度为支柱的專制統治者，人民群众立即展开了反对曹錕的运动，孙中山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張作霖等奉系軍閥也發动了反直战争，結果曹錕失敗了。在北京，張作霖和馮玉祥抬出段祺瑞成立了执政府。当时，人民群众極力要求召开国民会議，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也認为有必要召开国民会議，解决人民的生活問題和廢除不平等条約，于1924年11月，孙中山到了北京。然而，当时段祺瑞却召开了仅仅包括当权派的善后会議，并与帝国主义勾結，發表了尊重不平等条約的声明。与善后会議相对抗，孙中山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議促进会。但这时，孙中山已經病危，竟于3月12日逝世。他在遺囑中指出："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打败直系軍閥后，群众組織急剧地發展起来，1925 年 5 月，工会的全国性組織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并立刻决議加入世界工联。农民組織也在几个月內从三万人增至二十万人，同年 9 月，召开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大会。

这时正是帝国主义各国暫时摆脫了国內革命的危机，企圖重新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来轉化国內矛盾的时候。在此以前，英国就把長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圍，又在各地經营紡織厂，还想把中国当作其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負的巨額債款的源泉，它最积極最直接地干涉了中国革命和民族产业的發展。因此，中国反帝运动的鋒芒当时主要是指向英国。战后一跃而变为債权国的美国，国內的产业突飞猛进地發达起来，对中国的投資和貿易也逐年增長。但是它并沒有特殊的势力范圍，因此就企圖利用"門戶开放"和"机会均等"一类口号打入中国市場。日本在战后为了摆脫国內政治和經济上的困难局面，也希望向中国扩張，但是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开始的中国反日斗爭的發展，以及在 1921 年华盛頓会議上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使日本感到：在与英美协調的情况下，采取逐漸滲透的办法侵入中国更为有利。所謂"幣原外交"（1924—1926 年）就是这种政策。另外，日本还利用英美在中国的威信扫地和抵制英国貨运动的發展（1922 年香港海員罢工以后），扩大了对中国的輸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彼此間有利害冲突，但是在反对中国革命上却是一致的，因此，一旦有事，它們总是联合起来进行干涉。

1925 年的"五卅"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發生的。

"五卅"慘案

在上海、香港等地，早就有很多日本人和英国人經营的紡織厂，这些工厂給工人的待遇是極端恶劣的，在工人的要求中常有"

提高工資"、"承認工会"和"不准捆縛和毆打职工"等条款。1925 年 2 月，上海的日商紡織厂爆發了罢工，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外商的工厂，有七万工人起来响应。同年 4 月，青島的日商紡織厂相繼爆發了大罢工。4 月 8 日，福州学生組織了反对殖民地教育的請願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学生遭到了屠杀。在这种形势下；5 月 15 日，又發生了日本紡織厂資本家槍杀工人事件，这一事件立即引起群众的激烈抗議。为支援这次运动而散發傳單的学生被拘捕了。于是，在 5 月 30 日，学生們进入公共租界，进行了"抗議槍杀工人""反对逮捕学生"等等的演講。奉命执行鎮压的英国巡捕到处逮捕演講的学生。在南京路巡捕房附近，集合了約有一万群众要求"釋放学生"，正与巡捕相持不下的时候，不料捕头命令开槍，杀伤了很多赤手空拳的工人和学生。这就是"五卅"慘案。

由于这次事件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6 月 1 日，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了大規模的罢工、罢課、罢市的三罢运动，連英租界的中国籍巡捕也实行了罢崗，同月 7 日，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最高領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同时在北京、青島、天津和其他許多地方也發生了激烈的反帝运动。6 月 18 日，香港海員工会决議和上海、汉口采取一致行动，投入罢工，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6 月 23 日，帝国主义者开炮轟击广州、香港七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被杀伤了二百多人，并宣布与广东政府絕交。于是，香港的中国工人有十余万人返回广州，發动抵制英国貨和日本貨的运动。这次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一直繼續到次年 10 月。这样由于"五卅"慘案，促成了以工人阶級为中心的各阶級的革命联合，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奠定了 1925 至 1927 年的革命的基础。特别是广东政府，通过这次事件加强了它的革命根据地。

"五卅"慘案在国际上也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斗爭也是正在

与本国帝国主义作斗爭的日本工人阶級自己的問題。当时，剛成立的日本工会評議会首先抓住了这个問題。一方面向社会宣傳"援助中国工人"，"抗議日本政府"来喚起輿論，一方面不顧殘暴的鎮压，派遣三田村四郎、山本县藏二人为代表前往上海。由于这次派遣代表，加强了中日两国工人阶級的合作，又同好几国的工人代表举行会議，作出了有关太平洋地区工会互相团結的决議。日本工人，从这次革命运动中通过实踐学習了丰富的經驗，并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加以运用。

帝国主义各国对"五卅"慘案前后發展起来的反帝运动，不仅使用了屠杀手段，而且还积極进行分裂革命力量的勾当。列强对于在工人阶級力量的增長面前感到威胁的上海中国中小資产阶級，一面提議召开关稅会議和法权会議等表示和解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以停止对租界內中国人經营的工厂的供电和供水等手段进行威胁。买办資本家总商会会長虞洽卿等人从中也有所活动。因此，总商会終于在6月26日决定結束罢市，走向破坏运动的道路。群众对此异常憤慨，罢工的浪潮扩展到中国人的企业，此后，資产阶級愈益倒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华盛頓会議以后，由于法国的策划使陷于停頓的关稅会議好不容易在这年10月复会了。帝国主义各国虽然原則上承認中国的关稅自主，但是要从1929年才开始，同时，还附有中国政府廢除厘金制度的交換条件。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的利害不一致，会議被拖延了。它們所支持的各派軍閥之間又爆發了混战，最后借口中国沒有負責进行交涉的政府而把会議解散了。

北伐的成功

广东統一以后，在革命群众之間，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軍閥和解放全中国，就成为現实的課題了。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

国劳动大会作出"反帝反軍閥、拥护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决議，国民政府进行了北伐的准备。当时，以蔣介石为首的右派正在和資产阶級一起企圖背叛革命，夺取左派的領导权。3月20日，他捏造"共产党企圖暴动"的借口，驅逐了黄埔軍官学校和第一軍內的共产党員，5月又制訂了限制共产党員活动的"党务整理案"。但是，当时，他还沒有具备公开反共的力量。1926年7月，国民革命軍开始了北伐。蔣介石充当了北伐軍总司令，集軍令和政令的大权于一身，实現了他的完全的軍事独裁。7月12日，共产党發表了"第五次时局宣言"，号召加强各阶級的革命联合陣綫和打倒軍閥、打倒帝国主义。这时，在北方，在日本支持下的張作霖扩大了势力范圍，英国則帮助吳佩孚在長江流域重整旗鼓，巩固反革命势力。北伐軍首先进攻湖南，毛澤东等人組織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自衛軍同国民革命軍匯合在一起，迅速北上，在湖北击潰了吳佩孚的主力，并于9月7日和10月10日先后占領了汉口和武昌。北伐軍在江西方面，与孙傳芳軍队作战，11月占領了南昌、九江。这样，就在那年年底革命軍光复了長江流域。在上海，为了配合这次北伐，在共产党領导下，于10月24日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孙傳芳軍队的攻击和准备不足而宣告失敗了。在北方，从苏联回国的馮玉祥于9月17日就任国民軍联軍总司令，宣布全軍加入国民党，并率师于这一年年底平定了陕西省。1927年1月革命政府迁都武汉。

四・一二政变

北伐战爭的节节胜利使群众革命运动迅速發展起来。全国的工人运动風起云涌，仅在武汉就有三十万工人組織起来了。以湖南、广东为中心，各地农民組織了农民协会，沒收地主的土地，在佃农之間进行分配，加强农民武装，甚至还自动地开展了禁止賭博和鴉片的运动。这种情况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为吃惊。它們

清楚地看到仅用鎮压政策已不能摧毁革命了。

1927年1月3日，在武汉召开了隆重的庆祝革命胜利大会。那时英国水兵竟敢襲击群众，造成了伤亡。群众万分憤慨立刻驅逐了租界內的英国警察，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的决議，接收了英租界。接着在6日，在九江的英国兵又槍杀了中国工人，因此群众就接收了九江的租界。在群众运动的压力面前，英国只能在形式上提出抗議而实际上却不得不退縮。这是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面临这种局势，列强愈益积極地致力于分裂国民党內部的工作。蔣介石首先派戴季陶去日本，又通过黃郛、張群、王正廷等与浙江財閥相勾結，并以六千万元的代价，答应了与列强有勾搭的上海总商会会長虞洽卿的"反共灭共"的等等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准备。当时，在上海为配合革命軍的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工人市民进行了三次起义。第一次起义(1926年10月24日)失敗后，1927年2月17日，当北伐軍占領杭州时，又举行了一次起义。这次有36万人参加大罢工，但是，由于准备工作的不充分和北伐軍的停止进攻上海，起义又告失敗。这两次失敗并沒有吓倒上海工人，他們进行了第三次起义的准备。这次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工作。工人們組織了糾察队，武装了自己。3月21日，絕大多数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接着，在共产党領导下坚决举行了武装起义，經过激烈的巷战之后，把軍閥的軍队赶进租界，第三次起义取得了胜利。22日，在工人占領了全上海几小时以后，北伐軍司令白崇禧的軍队开进上海。这时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但形势十分紧張，不是北伐軍和工人市民的統一战綫取得胜利，就是資产阶級和租界势力联合起来破坏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蔣介石看到了这一点，認为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經成熟。他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及虞洽卿等买办阶級进行政治交易，另一方面，又伪装革命派，利用当时在共产党內部处于領导地位的陈独秀

派的右傾机会主义，对革命力量进行压迫。他首先禁止了作为人民自治政权的上海市民会議，并抓住陈独秀派只顧和民族資产阶級謀求統一的弱点，将它摧毁。

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伐軍占領南京的那天（3月24日）即借口侨民受到损失而炮轟南京城，杀伤了兵士居民二千余人，打击了反帝运动的势力，促成了民族資产阶級右派的脫离革命。在南京事件以后又經过半个多月，發生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4月11日，白崇禧将部队秘密集結在上海，使用流氓和帮会分子伪装工人，与工人糾察队發生冲突，然后借口鎭压工人內訌，解除了糾察队的武装。尽管这样，工人們仍然沒有認清这些直到昨天还是朋友的人們的眞面目。12日，全上海工人召开市民大会，举行了向司令部請願的大游行。群众走到宝山路时，突然机关槍彈如雨点般飞来，轉瞬間，尸体堆积如山。同时，上海总工会也被流氓占領，各工会都被搗毁，工人运动領袖遭到逮捕，一切革命組織都被殘暴地破坏了。这次政变还在南京、无錫、宁波、杭州等地同时进行，4月15日，在广州也进行了大規模的屠杀。

蔣介石所代表的背叛革命的民族資产阶級上層与买办豪紳站在一起，向帝国主义表示屈服，丧失了它的民族立場。这样成了新軍閥的蔣介石集团成立了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相对抗。

武汉政府轉向反动

因为反革命政权——南京政府已經成立，所以，武汉国民政府便在1927年4月17日，把蔣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并向全国發出了討伐蔣介石的檄文。对此，蔣介石勾結統治上海一带市場的浙江財閥（浙江省出身的大金融、买办資本家集团），在他們的援助下，扩張了势力，控制了長江下游一带，并进而加强了对武汉的經济封鎖。同时列强也积極援助蔣介石，对武汉施加压力，很多挂着英国

旗、星条旗或太阳旗的炮艦在長江上巡邏，进行恐吓。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武汉，由于生活必需品缺乏和物价暴漲，在經济上逐漸感到困难，資本家和大商人开始动摇起来。其中有些人和南京勾結，有意識地关閉工厂或者在生产上实行怠工，停止貿易，这就越發加重了混乱局面。支持武汉的是工人和农民。刘少奇領导的工会为了应付反革命阴謀，加强了武装糾察队。在农村，以湖南省为中心，由毛澤东領导的农民运动有了飞跃的發展。这一省有三百余万农民組織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自衛队。农民們在农村中逮捕了軍閥的支柱大地主和土豪劣紳并开始沒收和分配他們的土地。这种农民革命的發展震动了武汉政府地方軍队中的高級軍官。他們是当地地主和豪紳的兒子，他們之所以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和这一新兴的强大政治势力結合起来，以便打倒北方的旧軍閥，扩大自己在政治上經济上的地盘；至于佃农們会成为乡村的和地方的主人翁这样的事，对于他們簡直是不堪設想的。同时一旦站立起来的农民也决不会寬恕他們的家屬。第三十五軍何鍵家乡的农民們捉住了他的双亲，和其他土豪劣紳一起，給戴上高帽子牵着游街。面对这种工农势力的急剧高漲，武汉国民党領袖汪精衛和孙科等，慑于資本家和軍閥的压力，責难“工农运动破坏国民革命”，要求糾正这种“偏向”。5月以后，各地連續發生了地方軍队的叛乱，在湖南省会長沙，有实力的地方軍队勾結国民党內右派分子，發动了“救党政变”。他們搗毁了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建筑物，槍杀了一百余名共产党員，要求武汉政府进行“清党”，与共产党断絕关系。看到这种动向，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即利用其“中間立場”出面为南京与武汉进行調解，他呼吁汪、孙辞退苏联顧問鮑罗廷，与共产党断絕关系，并同南京政府合流。到了6月初，汪、孙解除了鮑罗廷的顧問職务，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压迫，武汉政府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已經十分明显了。毛澤东、刘少奇等早就主張建立并加强工人、学

生的义勇軍以代替不可靠的地方軍队，在此危机临头的时候，他們又主張进一步加强工农运动，并武装工农来对付反革命的阴謀。当时，为了对付長沙政变，十万农民自衛队已經完成了对長沙的包圍，在城市中的工人們也正在迅速地准备武装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主張的实現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总書記陈独秀压制了毛澤东等人的主張，命令解除对長沙的包圍和解除一切工人武装，企圖用妥协和讓步来維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陣綫。值此千鈞一髮之际，軍閥势力利用陈独秀的动搖，更大肆加强恐怖手段。6、7月間，在国民党公开承認之下，武汉政府統治下的整个区域內对于左派进行了殘酷的鎮压，几千名工人、农民和学生“犹如秋天的稻禾一样都在利刃之下倒下来了”。

国共分裂

事态發展到这一步，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也終于决定退出武汉政府，接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發表了退出武汉政府的声明，声明中說：“中国的兒童应該有鞋穿，有米飯吃”。孙中山“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而“武汉的国民党領导者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叛徒”。郭沫若、邓演达等联苏、联共派也接着退出政府，国共合作从此結束了。不論在南京或是武汉，全中国到处都弥漫着狂暴的白色恐怖，城市或乡村都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員和同情者的鮮血染紅了。当时，魯迅曾对此慘状作了如下的控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顧惜。……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对过死刑。但是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应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迟，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后脑上么？結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

实。血的游戏已經开头……”。(魯迅:“而已集”見“魯迅全集”第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42—343頁)

8月,对抗这种白色恐怖的南昌工人和朱德等人領导的二万余革命官兵举行了起义,組織了国民革命委員会,但由于受到反革命軍队的攻击而失敗了。接着在12月,广东的工人和貧民約五、六万人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給工人以面包”“給农民以土地”和“一切权力归苏維埃”等口号下,举行了武裝起义,建立了第一个苏維埃政权,对反共势力和大資产阶級实行了“血的淸算”。但是,城市起义的这一最后反击也因为外国軍艦的炮轟和各派軍队的集中攻击而失敗了。这期間,在“赤色”威胁面前一致行动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其他各派逐漸与南京政府合流,建立了以蔣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并繼續施行了白色恐怖。据記載,“在1928年1月至8月期間,至少有四万工人农民被杀”。在这样的白色恐怖的風暴中,中国的革命力量逐漸轉入了低潮。

田中义一內閣的出兵山东事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發生的。

第二节　世界經济危机和国际政局的改观

“稳定”的崩潰

中国革命的發展动搖了世界資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这种發展使日本統治者必然要采取积極侵略中国的政策,也使日本与英美两国势力的竞爭和矛盾尖銳化,从而,形成新战爭的原因。誠然,在1925年的罗迦諾条約和1928年的非战公約訂立的当时,乍一看来,使人感到国际政局已趋稳定,一切战爭威胁已經消除。但是,中国革命的發展說明了这种国际关系的稳定是建筑在牺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而这种稳定也已經开始崩潰。到

了 1929 年，資本主义总危机卷入了除苏联以外的整个世界以后，一切稳定都破坏了。无止境的經济蕭条和失业者的增長，人民生活的下降和政治的反动化，扩張軍备和国际間矛盾的尖銳化，这些成为各国通有的現象，国际間的协調破裂了，各国选擇了各自的道路，世界大战的危机不断增長。东方的情况以及日本在东方的国际地位，也和这种世界局势互相联系在一起向前發展着。在此，讓我們来回顧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

1928 年 8 月，列强在巴黎締結了非战公約，它的第一条就是那有名的規定："各締約国以代表其本国人民名义庄严宣言：各国深覚用战爭以解決国际爭端，以为相互間国际政策之工具，应予以廢止。"不到一年，加盟国达到六十余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十年，到处都贊美着国际协調，認为現在"持久和平"已經不仅仅是人們的理想了。各国的通貨得到了稳定，信用也恢复了。貿易很兴隆，工业生产也正在增長。特别是处在資本主义世界領导地位的美国更取得惊人的發展，人們在贊美着"无止境的繁荣"和"永久繁荣"。例如：美国总統柯立芝于 1928 年底在議会里談到次年度的經济情况时，得意地宣称："有責任綜观合众国状况的这次議会，有着前所未有的美好的前景。……对我国目前情况感到滿意，对于将来也非常乐观"。有名的通用汽車公司經理也曾說："我对 1929 年的看法是建立在确信我国的經济状况和产业状况将是徹底健全的这一基础上的"。

在 1923、1924 年至 1928 年的所謂"資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資本主义各国依靠美国的經济援助和国內的产业合理化以及鎮压各国內部的革命运动，才暂时得到了稳定，并摆脫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經济破坏和战后的革命危机。

但是，这种資本主义世界政治經济的"稳定"为 1929 年 10 月开始的經济总危机所代替了。这就說明："稳定"实际上仅仅是"相

对的”，同时这也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的起点。

原来，“稳定时期”的資本主义世界，可以說在它的繁荣之中就包藏了必然陷入危机的各种因素。欧洲各国大多数是依靠美国的資本輸出得到复兴的。战后，日本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資本主义取得了显著的發展。因此就出現了这样一种諷刺的关系：欧洲各国的产业复兴使它們与美国、日本之間的竞爭日益加剧。各国的产业合理化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使人民群众日趋貧困，从而縮小了国內市場，出現了产品的滞銷現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了發展其資本主义，必須在剝削本国工人的同时，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其結果，必然会引起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亞、摩洛哥等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不能不遭到这些民族的强烈抵抗。从 1928 年起，在世界經济上，明显地开始出現生产过剩的征兆。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国开始出現了农业危机。到了 1929 年底，中欧、东欧各国也苦于工业危机。这样，資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日益加深，危机的爆發已势所难免，它不在别处，終于在美国爆發了。

經济危机的爆發

1929 年 10 月 24 日，在紐約的华尔街，股票行市开始暴跌，这一現象立刻蔓延到倫敦、阿姆斯特丹、布魯塞尔等地的股票交易所。危机立刻在工业和农业部門出現了。按照資本主义世界經济的結构和規律，加拿大、日本，其次是中国和殖民地各国都相繼被卷入了这次危机，并很快地蔓延到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門，危机的速度和深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这次危机的确是以空前未有的气势襲击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工业产量和貿易减少了一半。企业相繼破产，工資不断降低，不断發生解雇工人。失业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到 1932 年年底，据說欧洲的失业者达二千万人，全世界达到三千五百万到五千万人。物价暴跌，尤

其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特别显著。为了防止价格下跌，在巴西，一年內，有一千万包咖啡被燒毀和投入海中，或代替爐渣来鋪路。在倫敦，整船的橘子被扔在海里。一方面，农产品因滯銷而發生过剩，被糟蹋掉，而另一方面，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却处在悲惨的貧困状态。特别是殖民地农民的貧穷更达于極点，当时有过这样情况："在上海的郊外以及在陕西省延河两岸，設有販卖人口的'人市'，那里不滿十岁的女孩只值美金二元至三元。十岁以上的少女的价格也不过五元美金"（华南晨报）。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农民"如今把少得可怜的收获物的最后一点也都消費完了，他們把騾子牵至森林里，任其餓死。孩子們因为沒有衣服而不能上学。最后的希望就是紅十字会的救济。"（芝加哥論壇报）

德国的破产及其影响

德国的經济危机最为严重。1929年6月成立的楊格計划虽比以前的道威斯計划稍見緩和，可是，对德国来說仍然是沉重的負担。德国在經济上依附于列强，支付賠償本身也是依靠外国資本。由于危机的發生以及德国政局的不稳定所引起的法国和其他各国对德投資的回收，使德国經济陷于动蕩。1931年5月13日，控制整个奥地利金融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大銀行奥地利信用公司倒閉，金融危机的風暴襲击了德、奥两国，德国国內的产业衰退，財政赤字大增，失业者急剧增加。于是，面临德国經济崩潰的危机，6月6日，德国总理勃魯宁向英国傾訴了支付賠償的困难，但沒有得到結果。德国經济的破产对于在德国和其他中欧国家拥有很多投資的美国来說，将是重大的損失，面对这样情况，6月20日美国总統胡佛对德国發表了一項允許德国緩期一年支付賠償声明。因此将要特别受到損失的法国虽一度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在8月11日由英、法、日、意签署了一項允許德国緩期支付的协議。但是，德国

第二大銀行唐納德銀行已于7月13日歇业，德国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至1932年1月，德国竟發表了无力支付賠偿的宣言。这样，自6月召开的洛桑賠偿会議經过討論了危机下的国际債务問題以后，将德国賠款数額减少到楊格計划規定数額的10%，至此德国的賠偿問題实际上已告一段落。英法之所以同意这項协議，是打算以此来抵銷他們自己的对美战債。美国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后来，英法的对美債务也在曖昧之中不了了之了。至此，英法从德国索取賠款，用以偿还对美战債的这条国际經济上的循环鎖鏈也随之消灭了。

德国的金融危机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經济恢复比較緩慢的英国带来了危机。英国从美法借来短期資金，然后当作長期資金貸給德奥，自己处于从中取利的地位。特别是法国由于顧虑德奥的金融危机及其对英国的影响，从倫敦提回了資金。这样，在1931年夏天，外国資本的收回和黃金外流便达到龐大的数額，英鎊受到了严重打击，到9月21日，英国政府及英格兰銀行終于停止了金本位。英鎊的崩潰对各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印度、挪威、丹麦以及日本都相繼停止了金本位，至1933年4月，連美国也效法了上述国家的措施，于是，世界的幣制崩潰了。幣制的崩潰招致了外匯跌落和商品傾銷，这就促使各国采取对策提高关税，进而引起了各国竞爭的愈益尖銳化。各国为了保护其附屬国和殖民地，必須提高关税来对抗其他国家。所謂“集团經济”的道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1933年6月12日，66个国家在倫敦举行的世界經济会議由于各国在战債問題和外匯协定問題上的矛盾而宣告失敗。这种情况說明了危机的性質是何等深刻；同时，也加速了走向集团經济的傾向。1932年，英国曾在渥太华会議上决定加强英联邦內各地之間的合作和防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企圖加强大英帝国內部的联系。法国則以其拥有大量黃金和仍然保持金本位制为武器，力圖向中

欧、东欧各国建立它的金融統治。另外，美国也極力想办法把南北美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圍，日本和德国也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集团。这样，整个世界行将分为几个集团。同时，一个集团的确立势必須以排除其他集团势力的侵入为前提，而每个集团本身又都有向外扩張的冲动，因此，帝国主义列强間的利害矛盾势必更趋尖銳化了。

战爭危机的發生

进入 1933 年以后，欧美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有了部分的恢复。但是这种情况并沒有走向繁荣，却轉入了慢性的蕭条。列强各国在經济和政治上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了。同时，担負危机重担的各国工人阶級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的反抗也增强了。当时，未受到危机風暴的社会主义苏联正順利地执行着第一个五年計划，它的發展力量对于資本主义列强是一种无形的威胁。列强在要求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各种革命势力及苏联相对抗。于是，各国乃紛紛进行扩張軍备，發展軍事工业，提高了軍事預算的比重。这样，列强都有了在国內建立鎮压革命势力和进行战爭的政治体制的企圖，日、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企圖的露骨表現。在危机的風暴中，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在德国，納粹掌握了政权，并公开进行重整軍备；意大利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这些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希特勒

德国在这次世界經济危机中所遭受的灾难是非常慘重的。失业者在 1931 年达五百万人，至 1932 年据說超过了八百万人。就业者的劳动条件也逐漸恶化，工資减低了一半。这种情况当然要使群众趋向革命，在大选中共产党的得票数，1928 年是二百二十

六万票，1930年是四百六十万票，至1932年11月便增加到近六百万票。面对着这种革命的危机，德国金融資本家为維持其所統治的社会机构而选择的出路，就是使当时正在伸展势力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执政，以便建立反动的暴力政治——法西斯主义。1932年9月，德国資产阶級的报紙曾說：希特勒运动的使命，就在于挽救資本家的統治。1933年1月初，前总理巴本和希特勒在萊茵銀行家的住宅举行了会談，有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代表藏逊参加，会談得到成功，1月30日以希特勒为首的国社党和右翼国粹派的联合內閣成立了。对內高唱“全体主义”、对外标榜好战綱領的希特勒政权的建立，表明德国社会已經失去一切的民主自由，并且使人明显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

当然，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資本主义的發展本身已經培植了法西斯統治的因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导向停战的1918年的德国革命，虽然受到革命的工人阶級的全力支持，但是在并不希望徹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領导下，仅仅停留在資产阶級革命的阶段上。当时，以被宣傳为最民主的威瑪宪法为象征的新德意志共和国，一方面虽然建立了議会制度，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可是另一方面，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也維持了各种反动势力和半封建的“容克”（地主）土地所有制。德国的軍部虽然縮小了，但是它的首脑机构却为政府保存下来。这里应該注意的是，担心德国“赤化”的列强各国在这点上，显然表示了寬大，而这种情况恰好为德国反动势力所利用。凡尔賽和約規定了德国的战爭責任，并决定了剝夺殖民地和縮小領土等項措施。在1921年又决定向德国索取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馬克的賠款。于是，德国人民反对条約的呼声澎湃而起。这种賠款，对于在战敗以后面临着社会和經济的雕敝的德国确实是苛刻的条件，德国确已处于民族危机的边緣了。

1923年法国以德国不履行賠款为理由，占領了魯尔区。这次影响更为深刻，生产停滞，同时因为在战爭期中濫發紙幣和支付賠款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現象愈益严重，到同年11月，馬克紙幣的价值已暴跌为一万亿分之一。

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級陷于悲慘状态。由于紙幣的价值不断下跌，据說：工人的妻子到工厂門口等候拿到工資的丈夫，赶紧拥向面包房。当时有很多有趣的傳說，例如，为了打电报，須用車子載鈔票；孩子們用煤球代替鈔票去看电影，等等。中产阶級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化为烏有。左右两派在这种社会不安情况下，双方分别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活动。这一危机的深刻化，对于不希望德国革命化而相反地期待它成为防苏堡壘的英美等国是极为忧虑的，为此挽救頻于崩潰的德国就成为欧美諸国的迫切問題了。但是，为了挽救德国就需要資本。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沒有深入地参加到欧洲的国际关系里来，也沒有加入国际联盟。但是到这时，却不得不参加到对德救济的工作中来了。以美国副总統道威斯为首組織了賠償委員会，1924年5月，制定了所謂道威斯計划，規定了合理的德国賠款支付方法。为了恢复德国的財政，發行了巨額外債，其中半数以上是由美国資本承購。

道威斯計划的成立暫时稳定了德国的政治和經济。但是，这种看法是从德国的大資本家和政府的立場出發的，实际上，德国人民本身的牺牲却愈来愈大了。并且，以1923年的通貨膨脹为中心的德国經济危机对于大資本家来說，反而創造了有利条件。失业者的增加，工人的貧穷便于降低劳动条件；中小企业的沒落更为大資本开辟了壟断化的道路。以这种壟断資本的力量为后盾，政府一方面压制共产主义势力，同时在1925年，又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倒霉的敗将，而在国民中尙有声望的兴登堡拥为总統，繼續了它的統治。

这样，稳定时期的德国資本主义一方面依附于外国資本，在外交上取得国际协調，同时又企圖俟机恢复其自己的帝国主义；随着德国經济的逐漸恢复，就露出了向中欧、巴尔干、近东扩張以及与列强进行竞爭的动向，还进而秘密策划扩充国防軍。而在魏瑪共和国統治下，象納粹一类的国粹主义团体和右翼团体也并沒有受到多大限制。

納粹是德国国家社会党的簡称，它本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剛結束时誕生的許多規模很小的国粹主义团体之一。該党之所以逐漸壮大，并終于获得了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 1919 年 1 月入党的阴謀家和煽动家希特勒的手腕。在希特勒加入該党时，納粹党是微小无力的，从他的"我的奋斗"中以下的話可以得到說明，他說："現在我还記得，最初我曾經亲自分發过 80 張党的請柬，然后等待預定晚上来的群众。过了規定时間一小时，主席終于不得不致会議的开幕詞。但是只有七个人，就是那經常来的七个人"。1920 年 2 月 24 日，在国粹主义势力的中心地慕尼黑召开的該党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希特勒發表了所謂"二十五条綱領"，明确了該党的目标。其大意是反对凡尔賽和約、建設大德意志，求取殖民地，反对議会政治和排斥犹太人等，同时还主張沒收战时所發的横財，壟断企业国有化，大片私有土地的重新分配等等。这些要求的內容，固然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它一方面标榜着急进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針对着处在民族灾难中的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宣傳了極端的国家主义和对外强硬論，对人民进行欺騙性的誘惑。这种誘惑首先吸引了复員士兵、失业者，青年和妇女。納粹从国防軍、資本家和高級官僚手里接受活动資金，大力进行宣傳活动并扩大了党的声势。同年 12 月，以其从国防軍方面获得的六万馬克的資金，收买了"民族观察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1921 年 8 月，在鮑埃倫軍团参謀爱倫斯脫·莱姆大尉的領导下組成了希特

勒的 S.A 冲鋒队。納粹党即以这种秘密武裝組織为核心，在性格上逐漸成为暴力主义的政党。

"群众不能判断敌方的錯誤終于何处，我方的正确始于何处。群众在看到我們猛烈攻击敌人的时候，就認为这是我方正确的証据。""讓群众把几个实际上沒有任何关系的敌人看作是同一类的，这会使缺乏自信的人怀疑到他們自身的立場。"这些就是希特勒宣傳的信条。

希特勒在 1923 年 11 月与反动的鮑埃倫政府及部分国防軍相勾結，在慕尼黑举行暴动，但因失敗而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写成了有名的"我的奋斗"一書，这部記述了希特勒的思想和政見的書对于了解納粹的内外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义。1924 年 12 月，希特勒出獄时，德国已进入稳定时期，因之，納粹的活动也暫时轉入低潮。这时，納粹改变了活动方針，把重点放在党的群众化，組織青年和議会斗爭上，并吸收了許多小的右翼团体，逐漸扩大了党的势力，至 1928 年，在議会內获得了十二个議席，党員超过 10 万人。随着 1929 年世界經济危机的到来，德国群众特别是中产阶級、青年和保守的农民都既反对共产主义，而又对資本主义持有反感，同时又对懦弱无力的社会民主党感到絕望。这种情况使得納粹势力大为扩張，在 1930 年 9 月的大选中，納粹党竟取得一百零七个議席，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納粹势力在仅仅二年半时間內得以扩大到如此地步，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級因受到危机的打击而产生了絕望和憤怒情緒，他們在納粹的不合理的宣傳中，找到了他們这种情緒的發泄的方向。在格雷澤的小說"最后的市民"中，叙述了納粹分子在集会上發表的如下的演說："1918 年以来，你們信任了現在的世界和現在的欧洲。你們在那侮辱性的条約上签了字。只因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是正直的，所以名誉才遭到沾污。可是这次，連仅存的一件襯衣都将被剝去了。

你們是何等愚蠢！鑽进了一切国家政府中的犹太人正在設法勒你們的脖子。但是你們却被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等非德意志的字眼所蒙騙而昏睡着。来！这次可要把这些字眼一脚踢开！把現在的世界一脚踢开！我們沒有相信过現在世界的正直。世上的人們嘲笑我們已有十年了。可是，現在要反复向你們呼吁！当面向你們大声疾呼。德国必須强盛起来，必須重新拿起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受到尊敬。这一点，只要看看权力和恐怖在統治着世界所有的民族这种情况，就会明白了。”納粹的發展在东部和北部的农村地区特別显著。例如，在东普鲁士的得票数，1928年是0.8%，至1930年則增加到21.5%（全部有效投票数的百分比）。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也是如此，在汉堡，在这期間，它的得票数从2.6%增長到了19.2%。

但是，在同一时期共产党的發展也是非常显著的。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和对納粹抬头的威胁，巩固了工人阶級对共产党的支持，在德国中部、上詔林吉亞和柏林等工业地区，共产党凌駕其他一切政党之上而成为第一大党。在以后的历次大选中，納粹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总是不断增長，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一向成为魏瑪共和国的支柱的中間派政党逐漸变成了少数党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金融資本家夏哈特的活动，德国金融資本家逐漸表明了支持納粹的动向，国防軍容克地主等各种反动势力也越来越支持納粹。自从經济危机爆發以后，对納粹給以財政援助的人物中知名的有以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重工业資本为背景的萊比錫銀行总經理夏哈特，大鋼鉄資本家戴逊和鲁尔大煤矿資本家基尔道尔夫等人，他們都是为阻止工人阶級的革命化而对納粹的活跃寄与很大期待的資产阶級分子。基尔道尔夫在1929年曾說：“当爱国精神已被破坏无余的今天，能够这样地糾合和吸引国粹主义的同志的人，有資格抱有巨大的信心。荣幸地列席国社党大会的我，尽管

对貴党綱領上的某些条款持有反对意見，但不能不承認你所領导的运动能使我們祖国德意志得到复兴，也不能不祝賀你們运动的成功”。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当时情况。这样，納粹党員人数急剧地增長起来，1929年是十七万六千人，1930年是三十八万九千人，1931年是八十万六千人，至1932年便增加到一百万人了。

納粹德国的成立

經济危机下的德国，由中央党的勃魯宁維持着政权。这个得不到議会多数支持的政权，未經議会同意，就用总統的紧急命令，一意孤行地推行了專制的、反工人阶級的政治。这意味着魏瑪共和国的民主的一面已經丧失，而社会民主党却还支持勃魯宁內閣。这个內閣所表現的專制傾向，在1932年6月巴本成立內閣以后，进一步加强了。7月，巴本內閣搞了一樁所謂“普魯士的侮辱”事件，把社会民主党逐出普魯士的州政府，夺取了普魯士的警察权。德国人常說：“統治普魯士者就可以統治德意志”。巴本的行动显然是向整个魏瑪共和国挑战。正如当时評論界者所指出，社会民主党沒有进行抵抗，是給法西斯开辟了道路。然而，当时以工人阶級为首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在进行团結，在1932年10月的大选中，納粹一下子就失去了二百万票，而共产党却获得了将近六百万票。工人运动的攻势也激烈起来了。但是面临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發展，各种反动势力也进行了联合，在1933年1月29日柏林举行一万人的反納粹示威游行的次日即30日，兴登堡总統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使一貫高唱打倒魏瑪民主的納粹掌握了政权。当时如果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結成了反法西斯統一战綫，那么，希特勒內閣将可能成立不了。但是，社会民主党对于和共产党合作表示冷淡，一直在拒絕共产党所提倡的結成統一战綫。当希特勒內閣成立时，它又强調內閣成立的合法性，不肯采取反对希特勒的

实力行动。另一方面，据說共产党也有缺点，它未能将大企业的工人充分地組織起来，而对于人民反对凡尔賽体系的情緒也未能給予正确的指导。总之，当时反对希特勒內閣的各种力量未能联合起来，是后来給德国人民带来不幸的根源。

取得了政权的納粹立即解散了国会，为控制3月5日的大选，又开始采取了瘋狂的恐怖手段。2月27日的夜里，納粹党徒縱火燒毁了国会大厦，却誣賴是“共产党的阴謀”而大肆宣傳，次日，公布了所謂“保护人民免受共产禍害的法令”，而逮捕了共产党議員，同时，禁止了共产党言論、集会的自由，至3月1日便下令解散了共产党。在3月5日的选举中，納粹党只获得了总投票数的43%，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得了一千二百万票。于是，希特勒乃向議会提出“授权法”，要求授予独裁权，并迫使議会通过。这时，社会民主党反对了这一“授权法”，但为时已晚，至6月，社会民主党也被解散了，接着，国权党、中央党和其他政党也全都被解散了。这样，納粹建立了它的一党独裁，1934年夏在兴登堡总統死后，希特勒便就任了兼有总理权限的总統，至此，納粹的法西斯統治宣告完成。但是，納粹政权并未能解决經济危机所带給德国社会的危机，为了維持政权，它必須鎮压許多反納粹势力。这时，反納粹人士相繼被捕下獄，人民对政治的批評和言論自由完全被剝夺了。当时，希特勒向人民所作的諾言是什么呢？他所發表的危机对策只是依靠重建軍队、扩張軍需工业和土木事业，来吸收失业者而已。这些措施本身就意味着准备战爭。“大炮比黄油重要”就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林所說的話。

由于这样扩充軍备，德国的武力加强了，希特勒为了把人民的不滿引向国外，在整頓国內体系的同时，明目張胆地开始了对外侵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

世界經济危机把整个世界拖入了战争危机之中，但也有一个例外的地方，那就是苏联。在經济危机的三年內，苏联的工农业生产，与列强相反，得到了飞跃的發展。不过，苏联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受到危机所带来的各样影响。苏联对于由世界經济危机所引起的列强的战争危机，也要积極地采取对策。

列宁为了恢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后的內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苏联經济，采取了“新經济政策”。列宁不久就逝世了。1924年，斯大林繼承了他的事业。1927年，生产总値恢复到战前水平，具备了建設社会主义經济的各种前提条件。当然，当时的苏联因受帝俄时代的經济落后的影响，与列强各国相比較，还沒有达到令人滿意的状态。在工业生产中，消費品所占的比重很大，許多生产資料要靠从外国进口，技术水平也低于列强。这种状态必須尽快克服，于是，从1928年10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計划，其目标是实現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

由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賽，人民劳动积極性的高漲，第一个五年計划在1932年10月，提前九个月完成了。工业的跃进是惊人的，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国。第聶伯水力發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和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工厂等項建設是很有名的。机器、汽車、拖拉机工厂和飞机等制造工业在苏联虽然还是第一次出現，但这些部門却以飞快的速度發展起来了。鉄路的建設和苏联的亚洲部分的开發等在国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农业方面，机械化和集体农庄化的进展，基本上消灭了資本主义因素。随着这种社会主义經济的發展，劳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国民收入在1930年是三百五十亿盧布，至1933年已增長到五百亿盧布，职工人数从1930年的一千四百五

十三万人增加到 1933 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八万三千人，工資增加了50%以上，工作时間縮短为七小时。妇女們也积極地参加了生产。阴暗潮湿的洞穴式的貧民窟变成了漂亮明朗的工人住宅区，現在，工人住宅区比城市的中心区还要漂亮。以往的农村，教会占着最优越的地方，它的前面是村警察所長、僧侶和富农的漂亮住宅、后面是农民群众的快要倒塌的小屋；这样古老的农村現在已开始消灭，而代之以有着俱乐部、收音机、电影院、学校、圖書館和托兒所并使用拖拉机、康拜因、打谷机、汽車的新农村。当然，这种国內变革并不是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执行計划必須排除許多困难，人民的牺牲也不在少数。例如，对于农业集体化，不仅富农，具有保守思想的农民也頑强地反对，集体化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人民的耐心和努力終于結了果实，締造了社会主义国家，1937 年的苏联宪法就是这种成就的总結；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衛国战爭証明了已經建成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

对于苏联这种国力的增長，即使在資本主义国家的領导者中間也有人率直地表明过惊訝。1931 年，日本資产阶級的代表性的理論家之一、当时的商工大臣中島久万吉曾說：“我目前确实患着恐俄病，也許有人会把我說的話当作恐俄病患者的一片囈語而一笑置之。但最近，特别是考虑到俄国工农业的五年計划完成以后的情況，对于我国的产业前途就时而陷于一种病态的悲观之中。本来，我起初——去年（1930 年）年初——相信俄国工农业的五年計划会因以下三个因素而終将失敗。这三个因素是：俄国人民生活的穷困和物資缺乏、財政困难以及青年的觉醒。但是，回顧去年一年（1929—1930 年）的实际成績之后，終于相信俄国这一計划必定成功。当我想到这一計划成功以后，不仅对日本，同时对世界各国的产业将給予怎样的影响……”（中島久万吉：“俄国工农业五年計划”）。这种惊嘆不久便轉为憎恨和恐惧了。

苏联外交

但是，必須注意，苏联这种發展是处在資本主义列强的包圍中、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立即組織起来的国际联盟，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障集体安全的和平机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各国对革命后的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产生的，所以从苏联方面看来，它是为了攻击和孤立苏联而成立的机构。苏联在1922年和同样作为战敗国而处在孤立地位的德国締結了拉帕洛条約，規定互相放弃賠償要求和互相提供必需品，这时，它才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取得了外国的承認。不久，其他歐洲国家也認为有必要与苏联重新建立貿易关系，因此，在1924年从英国和意大利开始，面临經济困难的歐洲列强都不得不相繼承認了苏联。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当时情况还不严重的美国約在十年以后才承認苏联。

但是，这种情况也决沒有从根本改变苏联的孤立地位。早在1924年10月，当时的共产国际領导者致英国共产党的所謂"唆使叛乱文件"被公布了，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使承認苏联的工党內閣在五日后的大选中垮了台。这一"事件"是表明英国反苏政策的著名事例。以后在1926年英国發生有名的煤矿大罢工的时期，英国的保守党內閣更加反动，竟与苏联断絕了邦交。从国际上看，1925年的洛加諾条約确实是防御德国的安全保障体系，而比利时和法国的国境綫的安全也确是受到它的保障，但是在东方的苏德国境的安全問題，却根本沒有被考虑，因此，从苏联的角度看来，这一条約当然还是屬于反苏体系的。

本来，苏联政府在原則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的。因为实际上处在这种資本主义世界的包圍之中，所以它的外交政策必須始終一貫以維持和平为基本原則。为了保証自己的安全，苏

联政府先后与其邻国土耳其(1925年)、德国、阿富汗、立陶宛(均在1926年)、伊朗(1927年)等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或中立条約。1926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裁减軍备筹备委員会,这时,苏联首先申請参加并派遣李維諾夫出席会議,提出了"完全廢除軍备"的提案,对于凡尔賽体系和洛加諾体系的不徹底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此后,又积極参加了1928年的非战公約,至1929年,由于世界經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所引起的侵略战爭的危險已經迫近的时候,苏联特别致力于表明其和平政策,并由斯大林宣布了"苏联不侵略别国的一寸土地,但也不容許别国侵略苏联的一寸土地"的方針。苏联同别国締結的互不侵犯条約網进一步扩展到芬兰、波兰、拉脫維亞、爱沙尼亞、法国(1932年)和意大利(1933年)。1933年5月,在裁軍会議的安全保障委員会上通过了苏联的提案——"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約"。1934年苏联加入了日本和德国已退出的国际联盟,同时在法国的支持下还提出了由东欧七国,即拉脫維亞、爱沙尼亞、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苏联締結一項所謂"东欧洛加諾协定草案",这一提案因受到希特勒的德国和在其影响下的波兰的反对,未能实現。至1935年,德国破坏了凡尔賽条約的軍事条款而着手重整軍备,因此,苏联与法国締結了互助条約。从以上概述的情况,可見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上的集体安全保障問題,并不只是意味着建立抽象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是要把这种关系建立在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这一人民团結的基础上,这就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想在世界經济危机和战爭危險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單純依靠和平外交政策是不够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防止战爭危險以謀求苏联社会的發展,同时还需要具有具体的实力。因此,五年計划必須同时兼顧国防力量的充实,并且不得不以重工业为中心。其結果,使消費品的生产和国民生活的提高

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也是在所难免。苏联国防力量的充实，以飞机为例，1927 年是八十五个中队，拥有七百架飞机，1931 年增加为一百九十四个中队，拥有一千六百架飞机，至 1933 年便迅速增加为二千五百架；再以坦克为例，1928 年末是二百二十台，1931 年 6 月为五百台，至 1933 年 1 月便增加到一千五百台，在这样短期間內即增加了几倍。对苏联国防力量的这样增長，資本主义国家的軍人和軍事專家給予了很高的評价（例如英国里但尔哈脱的警告），同时，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又利用这种評价来宣傳“苏联的威胁”，把它当作了煽动反苏情緒和扩張本国軍备的借口。

罗斯福的“新政”

1929 年 10 月开始的美国經济危机随着时間的推移愈来愈严重了。胡佛总統在每次演講里总是說：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現实情况却远远超过了他的乐观，是極其严重的。各种产业部門的股票价格都在急剧地暴跌，至 1932 年，工业生产总値几乎降低到 1929 年的一半。破产和歇业的厂商不下几万家，因破产而自杀的业主也不在少数。失业者的人数，1930 年是三百万，1931 年增加到七百万，至 1933 年初竟达到一千二百万。农村的雕敝也非常严重，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三分之一。在街道上可以看到失业者叫卖着少数苹果，飢餓的人群在飯館門前爭夺殘羹剩飯。某一新聞記者曾就矿山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报道：“几千名矿工拥挤在山腰上。三家或四家同住在一間小屋里，依靠蒲公英和野草的根莖来維系生命”。

然而另一方面，在危机中經常發生的机器和过剩产品被破坏和被抛弃的現象是十分惊人的。据說，有一百万吨的船舶被破坏，数十万公升的牛奶被抛弃，六百四十万头生猪被宰杀了。胡佛总統設立复兴金融公司，試圖解救銀行界的金融困难，兴办土木事业企

圖吸收失业者，但是这种弥补的对策毫无效果，在这种日益深刻化的不景气中，胡佛被認为无法挽救困难局面，因而成了人民激烈非难的对象。（在城市失去住所而在郊外和空地架起茅棚的人們，把他們的茅棚称为胡佛别墅。）这样，美国人民对于当前的社会制度本身不能不加以重新考虑了。高唱依靠科学和效能来克服經济危机的技术万能的主張曾經風靡一时，但也无非是画餅充飢而已。这时，还曾出現了主張分配富豪財产的休伊·劳倫那样政治煽动家。工人的罢工事件此伏彼起，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至1932年7月，生产下降到最低水平。

1932年11月，在总統选举中，标榜"新政"的富兰克林·第·罗斯福当选总統，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任总統的威尔逊以后，經过十二年后重新执政的民主党的总統。次年3月4日罗斯福进入白宫，他在就职演說中强調了用坚强有力的領导来进行改革的必要，并主張迅速地采取行动。他說："我們唯一可怕的事情就是害怕这两个字的本身"。又說："目前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討論而是实行"。这些話都被立即实踐了。第二天，5日，他首先宣布了禁止金銀出口和全国銀行停业这样的金融紧急对策。接着在同一天召开临时議会，此后在三个月的会期中，先后通过了失事救济法、农业調整法（A.A.A）、田納西河谷事业局法（T.V.A）、銀行法、全国产业复兴法（N.R.A）等十五項屬于新政的重要立法。各項立法的內容，严格說来，相互間是有矛盾的，但这些措施是要以国家权力干涉一切产业部門和劳資关系，用統制經济来对付經济危机，用社会救济性的各項措施来防止革命的發生，总的精神在于挽救美国資本主义。同时，为了实行这些措施，在总統左右設立智囊团，以下設立了所謂超內閣的机构国家产业复兴委員会，并由議会赋与总統以广泛的立法权。这些情况，从坚持三权分立的美国民主主义的傳統立場看来，也好象是一次"革命"，总統高度地集中了权

力。但罗斯福本身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并且因考虑到在下屆选举中必須取得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在 1935 年 7 月通过了承認工会的集体交涉权和罢工权的华格納劳工关系法；而在 1936 年 1 月的咨文中，他甚至喊出了"打倒經济貴族"。当时，反动的美国最高法院也曾經判决"新政"的某些法律为違宪。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說罗斯福的立場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是有区别的。

美国資本主义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度和彈性，看来似乎依靠"新政"暫时恢复了元气，1936 年的工业生产比 1933 年上升了 30%。然而"新政"，畢竟是危机下的一种資本主义的复兴对策，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資本主义强国的对策幷无本質的区别，其解决危机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但如此，"新政"的結果却是带来了大資本的集中和資本利潤的上升，罗斯福所怀抱的以增加購买力来扩大生产的企圖幷未得到成功。就业工人数仍不及失业人数多，物价上漲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未見好轉，劳資糾紛还是陆續不絕，工会組織进一步加强了。因之，到 1937 年下半年美国再一次要發生經济危机时，罗斯福政权也采取了用經济的軍事化的政策来摆脫危机，这样，美国对于世界战爭的危机再也不能是毫无关系的了。

尽管如此，作为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危机对策的"新政"能够把主要目标首先放在国內市場的开發上，这一点总算在美国国內維持了民主主义的形式，同时在对外方面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非侵略性的面貌。罗斯福对南美的政策被称为"善邻政策"。这种政策虽然是排挤英国在中南美各国的势力和形成美洲集团的泛美政策，但是从撤銷美国在古巴、海地、巴拿馬等国的駐兵权，同意各国独立，締結互惠条約等措施来看，这一政策比过去还是有所緩和。其次，美国以往同苏联沒有建立邦交，由罗斯福政府在 1933 年开始承認苏联，1935 年締結了美苏通商协定。这种做法的目的，在經济上是要通过对苏貿易来扭轉对外貿易的萎縮局面，在政治上

是要在远东牵制日本。国务卿起用赫尔代替了胡佛时期的史汀生，还是在就任总統前的1933年1月罗斯福就已声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須保衛国际条約的神聖"，暗示他将承繼史汀生对日本的侵略所采取的不承認主义的原則。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罗斯福也并沒有象英国那样一貫地表示对日妥协。

总之，美国正在逐步地被卷入到世界战爭的危机中。罗斯福就任初期，因为以恢复国內經济为首要任务而采取的对欧洲不干涉主义，由于符合美国的傳統政策所以受到了輿論的支持，1935年制定的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軍需品，这条規定曾适用于埃塞俄比亞战爭。在1937年西班牙內战时，中立法案虽然被适用于內战，但当时美国采取了"現購自运"主义，企圖在本国不遭受危險的条件下，保护貿易的利益，这就产生了利害关系受战爭影响的可能性。对于同年中日战爭的爆發，美国以不利于中国为理由，沒有援用中立法。这样，新政下的美国，虽然是要站到反对最露骨的侵略的方面，但的确是沿着干預战爭的方向前进了。

第二章　經济危机下的日本

第一节　金融危机和出兵山东

中国革命的影响

日本資本主义和中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鉄、煤等主要資源的埋藏量本来就很貧乏的日本，中国是其原料的主要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場狹小的日本工业来說，邻邦中国又是它的主要市場，在日本整个对外出口中，有35%是运往中国各港口的。并且，作为資本輸出地，中国也有其重大意义，以在华紡織业和“南滿鉄路”为主的对华投資，对于日本的存在，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至1927年为止，日本仅对中国东北的投資，就达到二十五亿日圓。因此，中国革命的發展使日本資本主义的“稳定”遭到严重困难，使日本資本家直接受到致命的威胁。他們把中国革命势力和工农运动視为最危險的敌人，为了扼杀这种革命力量，不惜付出任何牺牲。

1925年2月，上海的日本內外棉紡織厂的罢工終于發展为暴动，至6月間这一运动波及到全上海的紡織厂，上海的中国商人也举行罢市，全市进入了戒严状态。由于日本派遣海軍陆战队登陆鎭压，并殘暴地向罢工的工人开槍，致使反抗的火焰不久就扩大到香港、汉口、青島和天津等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这种情况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在关税会議上所表現的复杂的对立关系，使得日本資本主义的稳定受到極大威胁。尽管在金融資本的首脑部，曾經作为使日本資本主义趋于稳定的第一个步驟，而醞釀要取消禁止黄金出口，但是由于上述事件所明确地反映出来的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使当时的濱口大藏相不得不在

1926年3月声明停止黄金出口，并宣称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为时尚早。

1926年的下半年，国民革命軍把驅逐中国南部的帝国主义势力，作为它的斗爭的主要目标。这样就使在华南拥有权益的英国資本主义受到了重大打击。这种情况，从国际关系上看，似乎会給予日本以一时的有利影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使日本經营华南的重要机关台灣銀行从交易关系方面發生了决定性的破綻，形成了下面所述的金融危机爆發的有力因素。

台灣銀行利用欧美列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暫时退出中国市場的"千載难逢的好机会，大力推行对华經济政策，挽救中国財政的貧穷，适应事业資金的需要，在对华扩展經济势力上作出很大貢献"（"台灣銀行四十六年史"）。1919年台灣銀行在全中国的貸款总額达二千五百七十六万日圓。以后由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迅速發展，使台灣銀行在中国的經营發生了困难，使其对华投資瀕于危險的境地，陷入了不得不放弃回收貸款的状态。1923年末，在中国中部的重要机构九江分行关了門，1925年6月，汕头分行也陷于半歇业状态，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其結果，台灣銀行的經营情况非常恶化，終于在1925年将資金减少了四分之一，而且以后台灣銀行的經营越来越不順利，到了最困难的1927年，該行对华的貸款总額已經減少到只有1919年的17%了。

这样，进入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北进，三四月間国民革命軍占領了上海一带，中国革命呈現了新的面貌。恰好在此前后，日本爆發了金融危机，使得日本資本主义的危机更加尖銳了。

昭和金融危机

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固然是偶然爆發的一件大惨事，但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中苦悶着的日本資本主义来說，实在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打击，从而又出現了"震灾危机"的局面。由于东京的恢复工作，使入超进一步增加，耗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期間的积蓄。

为了处理震灾危机的善后事宜，政府企圖以發行超过10亿日圓的震灾善后公債和公布震灾期票貼現損失补偿法来挽救信用不佳的銀行和一部分"政商"，并救济遭受打击的金融資本。所謂震灾期票是包括以震灾地为付款地的期票、当时在震灾地設有营业所的企业所开出的期票和由其承付的期票。这些，在震灾当天以前銀行已經貼現，但因震灾关系而无法結算，为了进行救济，日本銀行在这类期票上打上特别印記。根据上述法令，日本銀行对这些期票应給予貼現，其因此而受到的損失，由政府給予一亿日圓以內的补偿。这种对震灾期票的再貼現，曾規定以1925年9月底为限期，但这一整理工作沒有能够按照預定的期限进行，延長了两次，以最后規定整理期間到1927年9月底截止。到这一整理工作結束时，一亿日圓显然不够，这就使得金融界充滿了不安情緒。为了补偿日本銀行的損失，若槻礼次郎內閣又撥給該行一亿日圓的公債。同时，为了便于那些利用震灾期票而得到日本銀行通融資金的銀行整理它的期票，起草了旨在进一步給予为期十年的貸款(与前項合計为一亿零七百万日圓)的震灾期票善后处理法案和震灾期票損失补偿公債法案。在野党企圖把这件事作为政治問題而加以攻击。因之，在議会进行討論期中，对震灾期票的不信任逐漸發展为对于持有震灾期票的銀行的不信任，至1927年3月15日，东京渡边銀行和赤路儲蓄銀行竟因受到大藏相片岡直溫在前一天

議会里的失言的影响而宣告停业了。这样，先于世界危机二年有余，在1927年，日本就爆發了金融危机。

接着在19日，中井銀行宣告停业，由于它的影响，东京市内的各銀行發生了挤兌風潮，同一天，中野銀行也發生挤兌，因此，日本銀行和有实力的銀行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为防止挤兌，实行銀行間的短期貸款，并緩和銀行之間的貸款条件；据报导日本銀行的非常貸款已突破一亿日圓。尽管如此，东京的村井、中澤、八十四銀行和横濱的左右田銀行还是不得不于22日宣告停业，金融危机的發展已經无法防止了。片岡藏相和日本銀行总裁市来乙彦發表了关于稳定財界和突破危机的共同声明，但仍然沒有任何效果，危机并进而波及到各地：埼玉的久喜銀行、浦和商业銀行、京都的桑船銀行、神奈川的川崎銀行、岐阜的淺沼銀行、德島的德島銀行等先后在22日、23日，或者遭到挤兌或者竟自停业了。但是，震灾期票的处理法案由于政府和研究会之間的妥协才勉强在貴族院里获得通过，因此，一度显示了危机的紧張气氛暂时趋向緩和，市民的动摇情緒趋于稳定。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即将到来的大动蕩的一个序幕而已。

这是因为：片岡大藏相于3月11日在貴族院的發言中所暴露的鈴木商店和台灣銀行的問題构成了危机爆發的新的原因。4月2日，鈴木商店把自己的期票整理工作完全委托給台灣銀行，常务董事金子直吉辞了职。鈴木商店因一直經售台灣的砂糖、樟脑等商品而与台灣銀行有着特殊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該店趁着好景气逐漸将企业范圍扩大到海运、煉鋼、人造絲、制粉等行业，所屬企业單位达到六十余家之多。但是到了战后，其大部分企业都陷于不景气，以致發生了認为震灾期票專門是为了救济鈴木商店而制定的謠傳。在这期間，台灣銀行，由于台灣、中国南部、南洋方面的营业不振竟对一家鈴木商店通融了巨額的資金。由于这种原

故，两者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台灣銀行唯恐鈴木商店的破产招致自己的危机，所以接二連三地将大批資金貸給鈴木商店，眞可謂“貸者敢貸，借者敢借”，到这时为止，台灣銀行撥給該商店的难以收回的貸款竟达三亿五千万元之巨。这些情况再加上上述在华經营的失敗，使台灣銀行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

台灣銀行救济法案和若槻內閣的垮台

4月14日，若槻內閣为救济台灣銀行，准备了以二亿日圓为限額的“关于救济台灣銀行的紧急敕令案”，并提交到樞密院。樞密院在17日否决了这一提案，因此，若槻內閣便实行总辞职。这期間，政友会在15日的临时大会上，修改了党章，推举陆軍大将前陆相田中义一为新总裁。

若槻內閣的总辞职給台灣銀行的救济工作带来了暗淡的阴云，18日台灣銀行总行終于發生了挤兌，国內和海外的分行也同时停业了。这是因为該行的負債总額已达八亿九千万日圓，而其中紧急需要的二千八百万日圓的筹措工作又陷于絕望。而且，这件事又立刻影响到大阪的近江銀行，金融界的这种动搖使人預感到更加深刻的經济危机即将到来，在这种动蕩不安的气氛里，田中义一接受了組織繼任內閣的命令。

原来樞密院所以否决了这一“紧急敕令案”是根据“还有时間召集临时議会”和这种办法“違反宪法第七十八条”这样一种理由，但实际上并不是單純由于这种宪法程序上的問題。樞密院虽然也預料到如果无視国內危机，就必須付出極大的牺牲，但它还是認为当前迫切的問題是改变对华政策。这一点，可以从实际上控制樞密院的人物即反对这一敕令案的急先鋒、“紧急敕令案”审查委員会委員長伊东巳代治的發言中得到充分的証明。伊东在指摘了政府的措施不当以后，用暗示要推翻內閣的口吻，对政府进行了如下

的攻击，他說："并且，現內閣不仅在本法案上措施不当，而且在对华問題上也是措施不当，由于事事处理失当，以致造成国家的威信扫地，这是我国人民所不能置若罔聞的。对华外交失敗的結果，使現在留居中国的几千同胞陷于窘境，其生命財产受到威胁。与其拿出二亿日圓的巨款来救济一家特殊銀行，不如把这笔款項用于救济在华的日侨。据信，对这样極不徹底的法案表示贊成的只是以若槻首相为首的內閣閣員而已，而七千万国民則必然一致反对这种法案。虽然若槻首相在議会以及本院(樞密院)屢次表明并不規避責任，但是我們从未見到他把自己的責任加以明确。現在是明确責任的时候了。我希望若槻首相今天能够很好地考虑这个問題。"

这种攻击，不是譴責若槻內閣在危机面前沒有提出經济上的根本政策，而是譴責在对外方面，特别是在对华外交上表現的軟弱无能和損害了国家的威望。不难推测，当时在樞密院的幕后，还有与三井財閥互相勾結的政友会在进行倒閣运动。政友会的領袖鈴木喜三郎从担任司法省大臣时期起就和樞密院副議長平沼騏一郎結下了把兄弟般的关系，因此，他可能向控制樞密院的平沼和伊东进行了頻繁的幕后活动。同时，还有政友会干事長森恪也和軍部勾結进行制訂积極的对华政策，森恪和以后充任"南滿鉄路"总裁的山本条太郎当时正在中国作視察旅行，突然赶回来，并打电报召回山本。綜合这各种情况可以肯定：軍部、樞密院和政友会(三井)三者联成一气，为了"刷新对华外交"而进行了推翻若槻內閣的活动。危机一旦爆發，就繼續發展起来，在田中受命組閣的19日，滋賀的蒲生銀行、广島的蘆品銀行、大阪的泉湯銀行宣告歇业；新內閣成立的20日，广島的广島产业銀行、門司的門司銀行歇业了，东京的共荣儲蓄銀行破产了。至21日，东京的第十五銀行、泰昌銀行、武田貼現銀行和明石的明石商工銀行也宣告歇业，全国的銀

行、信托等金融机关决定在22日、23日两天一齐歇业，混乱状态达到了頂点，在第一流銀行的窗口也挤满了提款的人。

田中內閣对財界的救济

田中內閣將救济財界和改善对华外交作为它的使命，田中本身兼任了外务相，并得到在財界頗有声望的高桥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高桥的危机对策暫时收到了效果。他在4月22日公布并施行了一項名为"关于延期支付私法上的金錢債务和延期保留期票权利事項"規定將支付行为緩期三周的紧急勅令（付款延期令）。当天，日本銀行即放出了非常貸款二十一亿九千万日圓，使紙幣發行額达到了二十三亿一千八百万日圓的紀录。25日，全国銀行全部开业，財界逐漸恢复了平稳（此后，5月10日，日本銀行总裁市来乙彥辞职，井上准之助繼任）。5月3日召开的第五十三次临时議会，通过了五亿日圓的日本銀行特別通融及損失补偿法和二亿日圓的台灣銀行金融法，并追認了付款延期令。政府根据这項法令給予台灣銀行的补偿超过了上届內閣所預定的二亿日圓的救济款額，为了救济大資本，政府支出了从国民身上搜刮来的巨額稅款。高桥完成了犧牲人民来救济財閥的任务以后，即將大藏相的職位讓給三土忠造而退休了（6月2日）。

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起一直到事后处理的整个期間，小銀行和地方銀行迅速地为大銀行所吞并。用日本銀行貸出的特別通融資金来兑出的存款都从小銀行集中到第一流銀行，以至造成了所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第一的五大銀行的壟断。銀行破产使企业單位受到了重大打击。从台灣銀行和鈴木商店的关系上可以看到銀行与产业之間的密切結合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企业單位所受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例如川崎造船厂，也是依靠了海軍的救济才免于破产。特別是以紡織业为中心的中小企业在此期間相

繼遭到破产，失业者急剧增加，社会的不安日趋严重。而在另一方面，以五大銀行为中心的各財閥則將其支配的魔爪伸向各个产业部門，在它們的控制之下，对中小企业进行了整頓和集中。

很显然，在金融危机中，壟断資本如不借助国家权力是不可能存立的，同时，这种救济財閥的巨額資金几乎全是人民群众的零星存款和取自群众的賦稅，这样就引起了尖銳的阶級对立，使資本主义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田中內閣企圖在出兵山东的"冒險"中擺脫这次危机。这样，1926 年对华出口的減少和 1927 年 3—4 月的金融危机都被侵略成性的日本軍国主义集团利用来扩大势力了。

出兵山东和东方会議

在危机开始后的 1927 年 3 月 20 日，中国国民革命軍終于占領了上海，接着，各国的陆战队也在上海登陆。至 27 日，日本第一艦队也开始向上海集結，被称为"协調外交""軟弱外交"的幣原外交也"改变"了"不干涉主义"。繼之，在危机暫时收斂的 5 月 28 日，田中內閣看到国民革命軍北上，將到达华北和东北的形势以后，就积極着手来加以阻擋。它借口"为了預防再度發生不幸事件，不得已而用陆軍来保护在华日本人的生命財产"(出兵声明)，派兵侵入山东省，想借此来阻擋北上的国民革命軍(第一次出兵山东)。

田中內閣积極侵略中国的政策，在 6 月下旬召开的"东方会議"以及 8 月 13 日在大連召开的"第二次东方会議"上具体化了。

参加"东方会議"的有駐中国的外交官以及陆軍省、关东軍和参謀本部的首脑，通过会議，决定了"对华綱領"。駐沈阳总領事吉田茂也是参加者之一。在会議的公报中說，对于"滿蒙"特别是对于东三省，"我国不仅需要作特殊的考虑，而且为了維持該地的和平及其經济發展，使該地成为中外人士安居之地，与該地接壤的帝

国实負有特殊責任”,“万一波及滿蒙,造成治安的紊乱,致使我国在該地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受到侵害时，帝国認为不管这种动乱来自何方,必須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衛这一地区,使其繼續成为中外人士發展的地区”,这就是說,为了維护日本的特殊地位,确保其認为“生命綫”的“滿蒙”,日本有决心要来維持該地的“治安”,并采取“坚决自衛的措施”。九·一八事变后，东方会議事实上的主持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曾暴露了当时的意圖。他說,“現在談出来也无妨了”,为了对抗中国的赤化,“使滿蒙脫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預該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該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說，可能招致麻煩，所以給它包上了一層‘东方会議’的糖衣”(山浦貫一編“森恪”)。这段話表明了:他們阴謀建立一个脫离中国的伪組織和不管阻力来自何方,都要坚决“以国力反击”的狂妄企圖。

田中首相根据这次东方会議的决議写成了奏折，这就是被中国方面揭露出来的所謂“田中奏折”。它的开头一段是这样:“为了征服中国，我們須先征服滿蒙。为了征服世界，我們須先征服中国。如果我們征服了中国，其他一切亞洲国家和南洋各国将会惧怕我們而投降。那时,世界上将会理解东亞是我們的,并且不敢侵犯我們的权利。掌握了中国的資源以后,我們就将轉向征服印度、小亞細亞、中央亞細亞以至于欧洲。大和民族要想称雄于亞洲大陆,第一步是掌握滿洲及蒙古的統治权”。接着，奏折闡述了經营“滿蒙”的具体方針。这个奏折，作为証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文件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广泛地宣傳了。因为文件中的細节里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能完全置信，但是，如果与前面森恪的談話联系起来看,就会了解,这一文件作为說明“东方会議”决議的基本方向的資料时常被人引用,也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此后在东亞發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采取的行动都好似完全根据田中

奏折而来的，所以，要想解消对这一文件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昭和的动乱”)。

美国支持蔣介石政策

田中內閣的出兵山东是帝国主义列强积極侵略中国的先驅。当时，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反革命势力的加强和革命运动的低潮，为这次侵略提供了絕好的机会。主要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拥有特权的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尽管在爭夺中国市場上面有着深刻的矛盾，但在鎮压革命和保护并扩大其在华权益上却是步調一致的。这些国家以上述的南京事件为借口，迫使新政府“懲处所有与事件有关的軍队指揮人員”和“保証不采取任何形式，不侵犯和危害外国人的生命財产”。一方面，在暫时統一的政府內部，国民党各派的对立也日趋尖銳。他們各自拉攏地方軍队，把朋友和亲戚安插在統治地区的机关和軍队中担任要职，从而变成新軍閥，互相爭夺全中国的、或是更大地区的統治权。以蔣介石为中心的南京派，当时还沒有控制和統一这些势力的实力。四·一二政变以后，蔣介石对外表明，打倒帝国主义不采用暴力手段，而且也不是排外性質的，同时又發表了“等待适当时期，提議廢除不平等条約”的妥协性的新对外方針，企圖借此得到列强对其鎮压革命力量进行援助。为了压制可能和强大的外国势力进行勾結的反对派和軍閥势力从而統一全国，有必要在利用各列强的矛盾的同时，与提供最有利的交换条件的外国势力勾結起来，并接受其援助。当时被視为对象的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撇开英国迅速地向中国市場扩張，并加强了和上海一带的資产阶級的联系，还針对英国和日本所实行的露骨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提出了門户开放政策，从而它所受到中国人民的憎恨比較輕微。因此，蔣介石就認为，如果和美国勾結，在經过国民革命而迅速覚悟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被

罵为“卖国賊”的危险性会比較少。从四·一二政变前后开始，蔣介石就通过浙江財閥加强了和美国的联系，并任命亲美派伍朝樞为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日本在战略上处于最靠近中国的地位，能对中国施展最为强大的力量，因此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时，蔣介石就派遣其思想上的导师戴季陶到日本进行对日妥协的工作。美国方面对蔣介石的这种两面手法表示不滿。1927年9月，蔣介石以国民党内部不和为理由而突然下野，就是受到美国箝制的結果，也是失去外国积極支持的蔣介石集团的懦弱无力的表現。下野以后，蔣介石亲自訪問日本，会見了朝野有名的人物。蔣在日期間，他本人以及圍繞着他的日本統治阶級的活动情况，現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的动向来看，很显然，蔣介石的訪日目的是請求日本援助和談判这笔政治交易的条件。日本右翼巨头头山滿在与蔣介石会談后說：“蔣氏无論如何还是和日本一致的人”，似乎暗示蔣介石已全面承認日本向大陆扩張的政策。但是从他以后的談話：“我在日本期間虽然希望訪美，但由于日本友人們的劝告未能成行”，以及回国后很快就向美国一边倒的行动来判断，日本的統治阶級在控制蔣介石这一点上似乎是失败了。据說，当时美国似乎是通过駐日使节与蔣介石签訂了一个协定，內容是“美国支持蔣介石重新掌握政权，讓他会見日本天皇，承認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和西原借款。并以此作为日本不反对他获取政权的交换条件”（刘大年：“美国侵华史”）。这話的眞伪无法判断，但是很显然，标榜强硬外交、着手援助張作霖的田中內閣，当时已經失去籠絡蔣介石的灵活性了。

1927年11月重新登上首脑地位的蔣介石發表了关于改变对外方針的声明，借口苏联有“指揮顚复中国政府的阴謀”，取消了对各地苏联領事的承認，搜查苏联領事館，逮捕苏联籍共产党員，表明了附和美国反苏政策的态度。翌年3月，又向美国表示“希望在

中美两国外交上开一新紀元”。在尚未解决的南京事件上，他首先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要求，根据美国的指名，發布了对“暴行負責人”林伯渠的通緝令，同意对外国人的损失負全部賠償責任，并表示了“郑重的謝罪”。蔣介石在政府內部，除任命他的妻兄宋子文为财政部長外，并任用宋的一派人物即亲美派担任要职，他个人則集政治、軍事的大权于一身，加强了独裁体制。这样一来，美国也于1928年11月正式承認国民党政府，取消了关稅特权，并重新締結中美关稅协定等，通过这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政策，在中国資产阶級中間，扩大了对它的支持，巩固了它的立脚点。后来，有許多美国軍人、大財閥的代表被聘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軍事、財政、交通等部門的顧問，通过这些顧問，美国获得了最大的特权。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从原来的“門戶开放”逐漸轉变为支持中国統一，也就是把日、英两国支持下的一切新旧軍閥統一在中央——南京派控制的“国府”之下，以便借此阻止日、英的对华扩張。

济南事件

日本为了对抗美国，进一步对华北进行了露骨的軍事侵略。南京政府对日本的第一次出兵山东，提出抗議說：“已經坚决命令国民軍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財产，因此已与各国增进友好关系，只有日本蛮横地竟敢独自蹂躪国际公法”，并要求日本撤兵。但是，日本政府毫不理睬，在1928年初，又派遣久留米师团的五千名軍队，占領青島和胶济鉄路沿綫，另外还派駐在华北的駐軍两个中队，于3月間占領济南，向正在与張作霖作战的国民党軍队表示了强硬态度。这种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憤慨，反日、抗日运动在华北一带展开了。一方面，国民党軍队一面再三抗議日本軍队侵犯領土主权，一面繼續北上，于5月1日进入济南与日本軍队形成对峙状态。日本軍队高筑壁壘，阻碍国民党軍进攻張作霖的軍事行动。于

是，国民党軍队的指揮官一方面命令部下避免与日本軍队接触和冲突，另一方面在司令部接見日本領事，要求不干涉內战和拆除防御工作，日本領事接受了这种要求。

但是，对于不顧国內反对，动用了大部分軍費出兵中国的日本軍方来說，不得不借口“保护侨民”繼續向中国軍队寻衅。撤去壁壘以后，日本軍队乃任意扩大警戒区，于5月3日槍杀了一名通过境界綫的国民党軍队的士兵，并趁国民党軍队的动搖，發动了总攻击，击退了国民党軍队，然后發出最后通牒限在十二小时以內立即答复下列要求：(1)中国軍队撤离济南和胶济鉄路沿綫二十华里以外；(2)禁止中国軍队統治地区內的一切反日宣傳和抗日运动；(3)严懲与騷扰、暴行有关的高級軍官；(4)解除与日本軍交战部队的武裝。另外，日本軍队还槍杀了中国方面派去交涉的代表，接着又对代表“国府”訪問日本軍队的外交部長黃郛，不給飯食，加以近乎监禁的侮辱，并增派了一个师团(第三次出兵)，来威胁国民党軍队。因此，中国人民的反日、抗日运动在全国范圍內猛烈地展开了。但是，面对这种局面，蔣介石竟訓令其部下說：“保护日本侨民是为了国家，所以个人对任何情况，都要忍受”，“为了救护一个日本人宁可杀死十个中国人”，通过鎮压抗日运动，一味向日本討好，全部承認日本的要求，暫时收拾了这种局面。蔣介石在实行亲美反苏政策的同时，对日本又采取了妥协政策。

張作霖被炸死事件

由于济南事件，使中国反帝运动的焦点开始轉向日本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引証田中奏折向国际联盟控訴了日本的侵略意圖。当时，張作霖和蔣介石之間的“决定南北胜敗的战役”已迫于眉睫，張作霖軍队已經露出失敗的征象。5月18日，田中內閣發表声明說，一旦战乱波及“滿洲”，帝国政府为維持治安，将采

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同时，命令旅順的关东軍司令部进駐沈阳。另一方面还訓令駐北京的芳澤謙吉公使劝告張作霖为巩固"滿洲"撤回关外。張作霖不願退出北京。济南事件爆發时，他还声明实行南北合一，共御外侮，企圖同国民政府妥协，来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撤回关外就意味着完全淪为日本軍的傀儡，在民族运动的高潮面前，張作霖还是不甘心这样做的。在張作霖和日本之間曾进行了几次交涉。日本最后恐吓他說：如果不听劝告，同国民党軍队繼續冲突，失败后想退回"滿洲"时，日本軍队可能在山海关予以拦击。在这种情况下，張作霖終于下决心把北京交給閻錫山，返回沈阳，于6月3日凌晨一时，搭上了从北京开出的專車。关于当时的情景据"朝日新聞"北京电称，"当張氏回顧中南海时，竟异乎往常地在他的眼里閃耀着泪花。"

在东京，从5月20日起，連日召开了有外务、陆海軍、大藏等有关方面参加的东方会議。这次会議的中心內容是如何答复美国用警告式的口吻所提出的日本是否要对中国东北采取某种积極行动的照会，以及对于劍拔弩張候命出动的关东軍如何發出指令的問題。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事实上的外务相）对于从出兵山东到济南事件期間，时常發生动搖的田中首相不断进行鼓励，甚至还揚言說："田中如果不听話，就讓他辞去总裁职务"，森恪以及和他相勾結的軍部当时阴謀策划的是什么，具体情况虽不得而知，但是企圖使用軍事力量来使"滿洲"独立这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当时內閣受到了美国的压力。"王正廷首先求助于美国，使美国向日本發出了某种警告。美国的这种警告深深聳动了田中首相及其周圍的要人們。而这种聳动就是阻止和挫折了推行森恪所怀抱的大陆政策的直接因素"。（山浦貫一編："森恪"）

5月25日夜，田中首相断然决定"停止一切行动"。于是，进駐沈阳的关东軍也不得不迅速地恢复平时状态了。

6月4日凌晨五时半，在离沈阳車站約1公里的地方，張作霖乘坐的專車在前进中被突然發出轟然巨响的地雷炸毁了，張作霖的大元帅服被鲜血染紅，他本人被炸死了。陆軍省虽然声明說："毫无疑問，这是南方便衣队員搞的"，但是，元老西园寺公望接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怀疑說："眞奇怪！这可不好向人說，总覚得象是日本陆軍干的。"眞相是掩盖不住的，田中不得已向日皇奏称："关于張作霖被炸事件，我国的陆軍中的某些分子似乎有嫌疑，因此，現在正着陆軍大臣进行調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但是，政府和軍部却拖延調查，企圖把这个事件不了了之。当时，中国的抵制日貨运动威胁着对华貿易中心的大阪經济界（例如，对华的棉布輸出1928年5月約有十九万反，至同年8月便銳減至一万七千反①），因此引起了对田中內閣的非难，前任外务相幣原和民政党总裁濱口趁此机会在大阪發表了反对田中外交的演說。

"滿洲某重大事件"和田中內閣的垮台

在第五十六次議会开会前，政府下令禁止报道張作霖被炸事件，并向民政党提議不把这一問題提到議会上来。已經开始倒閣的濱口拒絕了这一提議，議会一开幕，就指使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剛質詢这事件的眞相，迫使政府加以处理。对此，田中只是重复答称："正在調查"，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議会的疑惑。然而內閣在勉强地把議会应付过去以后，紧接着就突然实行了总辞职。国民也大体覚察到这是"滿洲某重大事件"——張作霖被炸事件——严重化的結果，不过这个事件为何成为政界的重大問題以及政府在滑过議会以后为何又被迫宣告垮台，这一切，当时都是无从了解的。直到战后在东京的远东軍事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才判明白这一事件是

① "反"是日本量布帛的單位，每"反"約合9.84公尺×0.34公尺。——譯者

出于关东軍参謀河本大作大校等的阴謀。另外，“原田日記”(“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一卷)这样透露田中內閣垮台的秘密：政府和軍部中央調查的結果，都一致判明犯人是陆軍軍人。但是，田中却仅仅奏称，犯人不知是誰，只拟对在事件爆發当时負有警备責任者給予行政处分。实际上，只是将关东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編为預备役，勒令河本参謀退役，这件事就算結束了。因此，天皇曾向田中說：“这不是和你最初說的話不一致嗎？”天皇后来向侍从長鈴木貫太郎說：“田中首相說的話一点兒也听不懂。我也不願再往下問了。”田中从鈴木处听到这話，感到“惶恐”，才决定总辞职了。

派遣在外的軍人不顧軍部中央首脑和政府的意圖，挑起了从根本上动搖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而无論軍部或政府都不能对他們加以处分；不仅如此，甚至在陆軍方面还有人贊揚这一事件的首謀者，說他們本意还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誠，而終于把这件事不了了之，这就等于同意了以后軍人可以独断專行地执行其冒險政策。民政党从解除国民疑惑有利于国家这一点出發，对內閣进行了彈劾，但是他們仅仅提到关东軍沒有完滿执行警备任务，沒有保全在“滿蒙”的权益等等，而未能触及事件的核心。他們是故意把攻击的鋒芒避开了統帅权的外衣的。天皇的話造成政变的直接原因，这是天皇在政治上表示意見的一个特殊例子。据長时期担任駐宮內省記者的高宮太平的記載，事后天皇对此頗伤脑筋，从那时起，天皇对于追究政治責任采取了愼重态度(“天皇陛下”)。的确，从这次事件起，在政治史上又产生了新的特点，例如不允許国民知曉的宮廷势力有力地出現在政府和政党的背后。虽然如此，然而这一事件既非出于河本大校个人的偶然行为，而田中的垮台也不是由于天皇的一句話。实际上，把張作霖的存在当作絆脚石的这种对“滿洲”政策，是东方会議的必然的結論，而对于田中的所謂积極政策感覚不滿，要求改变政局，也是日本統治阶層全体的意向。

无产阶級政党的分裂

造成田中內閣垮台的原因里，还包括工人、农民斗爭的尖銳化和反战运动的高漲。站在这些斗爭的最前列的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担任工会干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改良主义立場和革命群众的战斗立場之間已經明显地發生了分裂和对立，这表現在 1925 年 3 月，劳动总同盟的第一次分裂和同年 5 月日本工会評議会的創立。由左派工会联合組成的工会評議会的活动，构成了 1925—1927 年工人运动展开斗爭的中坚力量。渡边政之輔領导的工会評議会不仅运用工厂委員会、工厂代表会議运动等富有創造性的战术，組織工人和指导罢工，同时还参加太平洋工会会議和赤色工会国际。借以加强了国际联系，并获得了飞跃的發展。但是，这种活动的据点大体上只限于中小工厂，而大工厂还是掌握在改良主义工会的手里。工人运动的这种形势还表現为无产阶級政党的分裂。1925 年，在普选法获得通过的同时，在工会团体参加下召开了一次組織无产阶級政党的筹备会，当时左翼提出的組織全国單一的无产阶級政党的倡議遭到右翼的总同盟干部的反对，总同盟退出筹备会后，这才举行了农民劳动党的成立大会，但又立即受到禁止結社的处分。接着，于 1926 年 3 月，在右翼的領导下，把評議会排除在外，成立了劳动农民党。后来群众要求为建立阶級的統一战綫而实行“門戶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漲，于是，在同年年末，右翼干部及其控制下的工会又脫离劳动农民党，另行組成了社会民众党。同时，中間派也組成了日本劳动农民党。这样，便形成了大山郁夫的劳农党(評議会、日本农民协会)、三輪寿壮的日劳党(日本工会同盟、日本工会总联合、全日本农民协会，接着在 1928 年發展为麻生久的日本大众党)、安部磯雄的社民党(总同盟、日本海員工会、海員协会、官业劳动总同盟)三派对立抗爭的局面，在这期

間，虽然有过几次成立統一战綫的呼声，但始終沒有实現。

福本主义

日本共产党在1924年春遭到政府的鎮压，屈服于鎮压的赤松克麿、山川均等人作出了取消党決議，但反对这种失敗主义方針的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从1925年1月起又着手重新建党。由渡边政之輔、德田球一等人排除堺利彥、山川、赤松等人，成立了重新建党的筹备机构，在1927年12月，举行了党的重建大会。当时，工人运动的高漲，正在迫切要求共产党的領导。在1926年的大規模劳資糾紛，例如共同印刷公司和濱松乐器公司的劳資糾紛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同时也因为，"五卅"慘案而爆發的中国革命中工人、农民的斗爭，給予了日本工人阶級以巨大影响。当时共产党的指导理論是代替山川主义的福本主义。福本和夫的理論可以說是一反山川的右傾机会主义的"左"傾机会主义，此二者都是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唯心的革命理論。福本批判了以往的社会运动是經济斗爭和以此为基础的"工会主义的政治斗爭主义"，而主張把这种斗爭發展为"整个无产阶級的政治斗爭主义"，为此，他强調在"联合"以前必須先"分立"，必須进行理論斗爭，企圖借此来建立革命的"主体"。其結果使党成为知識分子党員的集团，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也产生了把先鋒队与群众組織的不同作用混为一談的缺陷。这个福本主义，由于1927年因对內与危机的慘禍作斗爭、对外反对侵华战爭的工农运动有了發展，才得到了克服。

根据共产党的合法机关报"无产者新聞"的倡議，以"劳农党"为中心，展开了"解散議会的請願运动"。这一运动排除了官宪的严酷鎮压而發展为全国性的斗爭，提出了反对恶法、确立耕作权、进行失业者运动、不許干涉中国等口号，又和評議会号召的工厂委

員会、工厂代表会議的运动結合在一起，鼓动了許多工人和农民，甚至把社民党和日劳党的群众也吸引过来，不但扩大了組織，而且还使广大群众認識到"获得政治自由"的必要。

反对干涉中国同盟

勇敢地反对若槻、田中內閣侵略中国的也是这些劳动人民。应中国国民党駐日总支部的要求召开的日中恳談会曾經开过两次会(2月26日、4月13日)，討論了組織"反对干涉中国运动团体"的問題。"无产者新聞"在2月26日，針对若槻內閣派遣軍艦和陆战队一事，發表了題为"要求立即撤兵！組織反对干涉中国同盟！"的社論，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团結合作。接着在4月2日和9日，繼續發出了"开展反对干涉中国的全民运动"以及"中国革命和日本无产阶級……迅速組成反对干涉中国同盟"的呼吁。中国国民党駐日总支部在4月5日發表了"向全体日本无产阶級呼吁"的文告，为此，在14日，又召开了日中恳談会，并于26日成立了反对干涉中国同盟筹备会。同一天，劳农党和日劳党之間又結成了联合战綫，而在5月1日东京的"国际劳动节"的游行队伍中，竟出现了"反对干涉中国"的标語。5月6日，劳农、日劳两党联合举办了"反对干涉中国"的講演会，但因引起了官宪的恐慌而被解散。因遭到这种鎮压而退縮了的日劳党虽然拒絕了繼續与劳农党进行共同斗爭，但是在5月28日日本政府断然出兵山东以后，于同月31日即在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戶、青森、岩手、長野、靜崗、奈良、三重、岡山、福岡等县市的地方同盟的协助下和"反对出兵中国""撤退在华駐軍"的口号下，結成了"全国反对干涉中国同盟"。而日劳党和社民党却沒有参加这一同盟。社民党为了拉攏被帝国主义者所收买的蔣介石，派宮崎龙介和松岡駒吉前往南京，甚至还表示态度願意和参謀本部合作。日劳党在表面上虽然也标榜"反对干涉中

国”，然而却不去組織实际的斗争，也不想同中国无产阶級携手。由于工人阶級中的覚悟分子都热烈支持“反对干涉中国同盟”，在群众的压力下，屬于日劳党系統的关西联合会、京濱劳动技友会、总联合会等也率先参加了这一同盟。对于关西联合会的这种活动，日劳党給予了“开除处分”，但关西联合会并沒有屈服，还是繼續进行了斗爭。反对干涉中国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又發起了“派遣赴华視察团运动”。視察团代表在8月26日从东京車站出發，28日抵达福岡，一路上，不顧政府的压迫，在奈良、大阪、岡山、八幡、福岡召开了演講会。在到达福岡以前，全部代表被先后拘捕和解回原地，沒有达到去中国的目的。但这种活动已使“反对干涉中国”运动深入到日本西部的工农群众中間了。

1927年綱領和三·一五事件

1927年的“綱領”是在这样情况下产生的。1927年7月1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执行委員会会議，通过了“关于日本的綱領”。渡边政之輔和福本和夫代表日本共产党参加了这次会議。这一“綱領”同时徹底批判了两种偏向——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决定重新組織以工厂支部为基础的党的革命的实踐运动，科学地并且具体地确定了战略目标和战术口号。在这一綱領中，对日本的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明确了以下各点：日本資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但它的發展是受到限制的，其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化，已經开始威胁着資本主义；由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掌握的反动的国家机关的領导权已由地主阶級手里逐漸向資产阶級轉移；从而，即将来临的革命是以極快的速度向社会主义革命轉化成長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目前革命的客观条件已十分成熟，但是革命的主观条件尙未成熟，为此，首先应該扩大和加强共产党、發揮它的領导作用，使其在群众中获得政治領导权。根据这一綱領，产生了

新的党中央委員会，創刊了党的机关报“赤旗”，并从1927年年末起展开了积極的活动。

1928年2月实行的第一次普选性質的大选，使处在地下的共产党有了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公开出現在群众中間提出政綱的机会。共产党員作为劳农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并向群众提出了“打倒天皇制”、“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的口号。于是田中內閣的內务相鈴木喜三郎对于以劳农党为首的无产阶級政党进行了无情的鎭压和露骨的干涉，但选举結果，劳农党的得票数达十九万三千零二十八票，山本宣治和水谷長三郎二人当选，社会民众党的得票数是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六票，四人当选，其他无产阶級政党有二人当选，共計有八人当选（此外，旧有政党的政友会当选二百十九人，民政党二百十七人，革新党四人，实业同志会四人，中立派一人）。

共产党的出現和在选举中显示出来的工人阶級的組織和力量引起了政府的恐惧，政府为了执行其蓄意已久的用武力侵占“滿蒙”的計划作好准备，乃于3月15日拂曉，在全国各地同时逮捕了一千六百名共产党員及其同情者，这就是所謂“三•一五事件”。接着在4月10日，又解散了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劳农党、日本工会評議会和全日本无产阶級青年同盟三个团体。在“三•一五事件”中被起訴的人数达四百人。但是，在幸兗檢举的渡边政之輔、市川正一等同志的領导下进行了重建共产党的工作，并很快地在4月中就恢复了全国的联絡。上述三个团体被解散后，劳农党随即組織了“爭取政治自由工农联盟”（1928年12月），同月，革命性的工会——日本全国工会协議会也成立了。为反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兵山东，組成了全国反战同盟，提出“拥护中国革命”、“从中国撤出手来”的口号向人民和出动的部队进行了呼吁。此外，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还举行联席会議，發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宣言。

为了鎮压工人、农民的斗爭，在 1928 年 6 月，政府竟然在議会开会期間以紧急敕令修改了治安維持法(最高刑为死刑)；至 7 月，又以二百万日圓的預算建立了特别高等警察制度。当时，官宪的鎮压进一步采取了恐怖手段，10 月間，渡边政之輔在台灣基隆港被警察杀害了。次年 3 月，水谷長三郎慑于白色恐怖而脫离了革命陣营；劳农党議員山本宣治在第五十六次議会开会期間被七生义团团員暗杀了(3 月 5 日)，他在被杀以前曾說，“虽然我一个人在此坚守陣地，但我并不觉得寂寞，因为在我的背后有几百万工人群众”。此后，在 4 月 16 日，政府又对共产党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檢举。

“全集本”时期和无产阶級文学、戏剧

在上述阶級斗爭的發展的基础上，馬克思主义理論也被全面而系統地介紹和普及到思想界里来了。从 1927 年起开始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二卷(改造社版)。为了具体論証“1927 年綱領”，在 1928 年編輯出版了“馬克思主义講座”，其中包括野呂荣太郎的“日本資本主义發展史”和服部之总的“明治維新史”及其他优秀著作，这一講座的出現，为馬克思主义理論在日本的具体运用打下了基础；另外，产业劳动調查所出版的“无产者政治手册”为实际开展社会运动提供了必要的馬克思主义的知識。从这时起，在綜合性杂志上也出現了許多馬克思主义者的論文，以“夺还被特权阶級所独占的知識和美”为目的而發刊的岩波文庫也是这种潮流的一个反映。

当时“全集本”的流行最明显地反映了文化的大众化。这一傾向始于 1926 年前后，而以改造社的山本实彦所創始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为开端，該書售价普及本每册一日圓，精装本每册一元五角，因而大受欢迎，以后又出版了“大众文学全集”、“世界文

学全集”等数十种，不久甚至出版了“相声全集”、“評詞全集”等通俗讀物。这种大众化也产生了另一种傾向，即利用出版資本为反动統治服务。这种傾向的一个典型，就是拥有大量發行数字的大众娛乐杂志“国王”的大日本雄辯会講談社的野間清治的出版方針。他一面通过向大众提供通俗常識和低級趣味的艺术，来巩固作为封建权力之基础的家族道德，另一方面宣傳国家主义的教学，来实行“出版报国”。

在文学方面两种流派的对抗也非常明显。在1921年創刊的“播种人”里誕生出来的无产阶級文学，以后加强了与工人运动的結合，巩固了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基础，至1924年，由同人組織創刊了“文艺战綫”(文战)；創立了“日本无产者文艺联盟”，出現了叶山嘉树(“卖淫妇”的作者)、黑島傳治（“銅錢”、“豚郡”的作者)、林房雄、里村欣二、久板荣二郎等作家。次年，在文学之外又将戏剧、美术、音乐包括进来，同时，排除了反馬克思主义分子，發展成为“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当时因受到机械地搬用福本主义的影响，在文学上也展开了理論斗爭，并主張艺术在整个无产阶級的政治斗爭中应該是“被組織起来的群众的进軍号角”。这种急进傾向使得“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在1927年發生分裂，由大部分“文战”的同人創立了“工农艺术联盟”，于是，在文学中确立“政治領导权”和知識分子的作用等有关“政治和文学”的問題成了爭論的焦点。这样，“文艺战綫”改为“工农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而繼續刊行，而“无产者艺术联盟”則創刊了“无产者艺术”。至11月，“工农艺联”又因为刊載山川均的稿件問題而再次分裂，分裂出来的部分成立“前衛艺术家同盟”，創刊了机关刊物“前衛”(1928年1月)，从而形成了三派鼎立的形势。

为改变这种战綫分裂的状态，“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前衛艺术家同盟”在1927年的“关于日本的綱領”的指导下，于1928年

3 月合并为“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合”，在日本政府进行第二次出兵山东的 5 月，以“对于战爭的战爭”为題刊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爭創作集”。接着，“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合”在“三、一五”事件后，为了整頓陣容，并作为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統一战綫組織，組成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在 5 月間創刊了机关刊物“战旗”。这样，“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便与“工农艺术家同盟”（文战派）相对抗（这个文战派是和脫离共产党的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畑寒村等工农派理論家們保持紧密联系的），它无論在理論上或在作品上都使无产阶級文学开放出了美丽的花朵。当时屬于“文战派”的作家叶山嘉树發表了長篇小說“生活在海上的人們”（1926年），平林太子、黑島傳治等人也發表了作品；而屬于“战旗派”的小林多喜二發表了“1928年 3 月 15 日”（1928 年）、“蟹工船”（1929年）、德永直發表了“沒有太阳的街”（1929 年）等无产阶級現实主义的代表作品，这就表明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实际的正統性，接着又出現了洼川稻子的“从糖果工厂回来”和中野重治的“初春的風”、“鉄的故事”等作品。

尽管无产阶級文学有了上述的發展，但是构成文壇的主流的仍然是資产阶級文学。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使东京完全失去了江戶时代情調的最后殘余，代之而来的“复兴”则是对西洋文化的膚淺的模仿。“現代的”一詞成为当时的流行語，在“現代主义”盛行的潮流里，出現了被称为新感覚派的作家。这就是川端康成、片岡鉄兵、横光利一等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是由菊池寬的“文艺春秋”培养起来的。这一派反对无产阶級文学的“政治性”，采取艺术至上主义的立場，重視机械文明的物質性和基于享乐主义的感覚性，并吸取了战后欧洲文学的新的技巧（心理主义等）。然而不能忽視，在这种現代主义盛行期間，流露出来了在深刻的資本主义危机面前动摇不定的小資产阶級的不安和絕望的情緒。1927

年7月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就是作为在他遺書中所写的“莫明其妙的不安”的象征，在当时人們的心灵中引起了深刻的震动。

然而，和明治以来的自然主义和現实主义的發展相对抗的这种新感覚派的全部作家，并沒有朝着以解决这种現实不安为課題的方向及复活人性的方向前进。恰恰相反，以横光利一的描写五卅惨案的“上海”为頂点，新感覚派走上了解体和分化的道路。

在1928年时期，片岡鉄兵、高田保等人，以及后起的藤澤桓夫和武田麟太郎、高見順等人，从新感覚派文学中走出来而轉向“左傾”；詩壇上的壶井繁治等人以及細田源吉、細田民树（“眞理之春”、“生活綫ABC”的作者）等人开始以社会問題为題材进行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其次，野上弥生子的“眞知子”开始連載，中条（宮本）百合子的“伸子”的刊行也都是1928年的事。这种情况表示了一个鮮明的时代潮流，在这个时期，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的作品也能够立即在“改造”和“中央公論”上發表。

新感覚派的分化当然并沒有就此結束，其中出現了龙胆寺雄等現代主义作家，也产生了例如佐佐木味津三那种轉向大众文学的作家，并且紧接着又进入了“色情、怪誕、荒唐无稽”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广津和郎和山本有三也开始写作“同情者”的文学作品，明治大正以来成为文壇主流的專門描写个人思想轉变的“心境小說”亦即“自傳式小說”这时似乎已經絕迹。当然，作为个别的“自傳式小說”作家（作为过渡到下一个时期的桥梁人物），还有嘉村礒多等人。

1927至1928年間，在戏剧界也發生了重大事件。1927年11月小山內薰以国宾身分被邀出席了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大会；1928年，市川羽左衛門赴欧洲，市川左团次一剧团也去苏联，这些以往从未想到的事情相繼發生了。1928年将近年終的时候小山內薰突然逝世了。这件事特别是給予了新剧运动以莫大的震动。

在此以前，当关东大地震后不久，新剧运动是以筑地小剧院为中心开展起来的，这个小剧院作为建立現实主义演剧的“实驗室”，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剧的发展。正在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級文化运动中，曾有人批判过筑地的小山內熏等人的学究倾向。在群众性的戏剧方面，有千田是也和村山知义等人为中心所建立的“前卫座”，它作为实驗剧团参加过1926年1月共同印刷公司工人大罢工中所組織的“流动剧場”的演出，以后就改称为“无产者剧院”，并且有了发展。至1928年，这些剧院合并起来組織了“东京左翼剧院”。就在这个时候，小山內熏突然逝世，使“东京左翼剧院”在“八十四次”公演也是最后一次公演后发生了分裂，分裂为“剧团筑地小剧院”和“新筑地剧团”。留在“剧团筑地小剧院”的人們以北村喜八、青山杉作为中心，排演了“从早晨到半夜”、“磔茂左衛門”、“鴉片战争”、“怒吼吧，中国！”、“西綫无战事”。为了接近无产者的演剧而集合在新筑地剧团的是以土方与志为中心的久保荣、薄田研二、丸山定夫、山本安英等人。两个剧团之間展开了热烈的竞演。（“左翼剧院”的合并是在和文学方面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实現的，因此，筑地两剧团都受到了該联盟的影响。）

大阪（战旗剧团）、神戶（工人一夜剧团）、松本（青服剧場）、东京（前进剧团）等从无产阶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各地剧团以“东京左翼剧場”为主体，組織了“日本无产者剧院同盟”，之后，“新筑地剧团”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对于这种无产者剧团的公演，后来不久，无論在东京或其他各地，警察当局的干涉都不断地加强了。

第二节 井上财政和幣原外交

濱口內閣的性格

田中內閣垮台以后，繼任的濱口雄幸的民政党內閣于1929年

7月2日成立。新內閣上台發表了以整理財政、减少發行公債、解除对于黃金出口的禁令、国际协調等为內容的施政綱領。田中內閣的肆无忌憚的冒險的內外政策,不仅給人民带来了不安,就是統治阶級也深深感到为了日后“前进两步”今天必須“后退一步”,以便好好地站稳脚步。濱口內閣以所謂“幣原外交”和“井上財政”的新面目出現,改变了直接的武力行动,而采用了比較“愼重的”和“巧妙的”对外侵略政策。政友会和民政党从一开始就和壟断資本紧密地勾結在一起,并且是日本两大財閥三井和三菱的直接而且公开的政治代理人。但是,政友会还和那些在日本国家政权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地主势力、宮廷势力以及軍部势力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例如在金融危机时期,为了使用武力来推行对华政策,宮廷势力就联合軍部施加了强大压力,使若槻宪政会內閣垮台,而代之以由田中陆軍大将担任总裁的政友会內閣,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友会的性格。但是,民政党(若槻內閣倒台后,宪政会与床次竹二郎的政友本党合并,組成以濱口为总裁的立宪民政党)与宮廷、軍部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它是作为壟断資本利益的代表者而登場的,其主要目的也是利用国家权力加强其資本主义的剝削。这并不是說民政党比政友会更为“和平”,而是民政党企圖在更愼重的准备的前提下进行对外侵略而已,在反对日本国內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这一点上,两党之間并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区别。

归根結底,田中政友会內閣倒台,濱口民政党內閣成立,是上述对中国直接武装干涉失敗的結果,同时,也是由于金融危机使壟断資本在国內的势力更加增長,民政党就作为壟断資本家的代理人而获选了。

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和通貨紧縮政策

解除关于黃金出口的禁令,是民政党从宪政会时期起許多年

来一貫主張的主要政綱。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中国的直接軍事行动沒有成功，对于日本資本主义来說，必須进一步加强在国外市場从事經济活动的力量，为此，首先需要尽可能降低日本商品的价格，加强在国外市場的竞爭能力，同时，也加速資本积累，扩大向殖民地的投資，以便在和欧美資本主义国家爭夺殖民地的斗爭中占据有利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禁止黃金出口，使得日本的商品价格，不仅不能低于世界市場的国际水平，反而由于过去历任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而更加提高。其結果，日本商品价格比外国高出很多，在貿易上，形成出口困难，进口却显著增加，每年都有巨額入超，妨碍了資本的积累。因此，廢除对于黃金出口的禁令、实行通貨緊縮政策、降低日本商品价格的呼声在壟断資本之間高漲起来，与壟断資本密切結合的宪政会特別主張这样做，只是在第一次大战后的不稳定的經济情况下，驟然实行这种政策，势将促成物价急剧下跌和企业倒閉等經济界的混乱局面，并进而危及壟断資本的基础，因此，統治阶級才不得不一再延緩了这些政策的实行。

在金融危机中，已經通过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巩固了自己的壟断力量的大資本家們，終于要借濱口內閣之手来实行其多年未得解决的解除对黃金出口的禁令这一措施了。

大藏相井上准之助首先宣布“緊縮財政”，对1929年度預算坚决实行节約，由于对1930年度預算实行了一亿六千万日圓的緊縮，并全部取消了原来拟定發行的八千五百万日圓的公債，因而編成了日本財政史上从来沒有的“无亏空的預算”，着手实行通貨緊縮政策。1930年1月又宣布解除对黃金出口的禁令。

濱口內閣所以要解除对黃金出口的禁令，除了上述基本情况以外，特别指望借此来与美国資本取得密切联系和外国資本的援

助。这种做法也就意味着明治維新以来日本資本主义依附于英美，借以引入外国資本，同时还利用这些資本向殖民地进行侵略的一种“借刀杀人”的傳統方法，也是利用外資抵补自己資本积累的不足，以便增强对殖民地經济支配力量的一种巧妙策略。后述的对英美实行“协調”的幣原外交，所以被采用，也无非是为了这一目的的一种步驟。解除对黃金出口的禁令，是从1929年11月起，首先由英美借到了总額一亿日圓的信用貸款以后开始实行的。

关于解除对黃金出口的禁令，报紙上以“国力增長的时候到来了”为題，大吹大擂地进行了宣傳。1930年1月15日那天，为了兌换从清早就跑到日本銀行的人們，看見了闊別十三年之久的五元金幣和十元金幣，脑子里幻想着繁荣卽将到来。当时，留声机把以下这样的“解除黃金禁令小調”傳播到大街小巷，就是：“你許願戒盐，我許願戒茶，不是这样嗎？为了祈求解除对黃金的禁令，是嘛，当然……，”滿街貼着紧縮通貨的标語，实际上，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解除黃金禁令和通貨紧縮政策所給予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快地就显露出来了。1930年7月，为了陈述农村困苦情况而来到东京的埼玉县北足立郡的一个农民代表，关于他們自己的生活曾这样說：“实际上今天我們农民正徬徨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含着眼泪过着苦难的生活。經过辛勤劳动而收获的白菜，五十顆才能抵上一包敷島牌香烟，卖一百把蕪菁才能买一包蝙蝠牌香烟（敷島、蝙蝠都是最賤的紙烟）。三貫①蚕茧或三袋大麦只值十圓錢。这样，再扣除肥料錢，究竟能剩什么呢？”（日本經济年报第一輯）。当时被迫面临生死关头的并不限于农民。政府为紧縮財政开支而实行整

① 日本重量單位，每“貫”合3.75公斤。——譯者

編行政机构的結果，很多官吏、特別是下級官吏由于失业而流浪街头。由于不景气，企业的倒閉相繼發生，使失业者越来越多，想回原籍而沒有火車費只好步行的人群，造成了“东海道全綫意外的拥挤情况”。失业問題造成了就业的困难，曾經是“选女婿”的对象的大学畢业的“学士先生”也不得不降格去当保險公司的外勤职員和小学校的临时教員。每天报紙上的社会新聞版都充滿了搶劫、杀人、自杀、全家自杀一类的消息和暗淡不安的气氛。

由于解除黃金禁令而流出的硬币，最初估計为一亿至一亿四、五千万日圓，但实际上，截止到 1930 年 6 月已达到二亿三千万日圓，以后，仍在逐漸增加。因此，解除黃金禁令的准备阶段就已經开始下跌的物价，这时更显著地加快了下跌速度，1930 年 6 月的物价比 1929 年 6 月大約跌落了 22%。这种物价的不断跌落招致了經济的蕭条，而进一步加深这种蕭条的，却是資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到来。

产业合理化

世界經济危机給日本带来的影响，首先表現在生絲出口的銳減上，日本生絲业的繁荣，过去是完全依賴于美国的購买力。而且同样由于危机的影响而造成的白銀价格的慘跌，使对中国的出口也完全陷于停頓，这就使得壟断資本家对于解除黃金禁令所抱的物价稳定、出口增加的期待已經完全落空了。再加上国內購买力的下降，不景气就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不景气表現为严重的工业危机。从 1929 年 3 月到 1930 年 9 月之間的商品价格跌落情况，就其中八种重要商品来看，跌得最少的是洋紙，跌落 13%，八种商品平均跌落 37%；跌得最多的是水泥，跌落 56%，生絲跌 52%，棉紗跌 43%。由此造成的各种商品生产量的降低，以 1929 年 10 月份为标准，生产最低时的減产

率，生絲是60%，棉紗是28%，煤是30%。

在危机的發展过程中，壟断資本家很早就企圖把危机带来的損失完全轉嫁到工人身上，以便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譬如，鐘淵紡織公司在1930年虽然把工資降低了30%，而对于股东却仍然保持着28%的高額紅利。其所以能够这样，无非是由于壟断資本家利用减低工資、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把危机带来的損失轉嫁給工人，并以有組織的限制生产来維持其壟断价格，同时，国家也通过所謂"产业合理化"的政策对壟断資本进行了帮助。

在解除黃金禁令的一开始，壟断資本最担心的是，随着黃金的流出物价可能急剧下跌，一时会引起国内的經济蕭条和同外国的竞爭趋于激烈，以致造成国内外市場的同时縮小，因而生产和銷售之間的矛盾将要进一步尖銳化。因此，必須同时进行"降低生产費"和"限制生产"。濱口內閣在1929年11月成立产业合理化审議会，在1930年6月又設立临时产业合理局，其目的就是要用国家权力来为壟断資本强制执行降低生产費和限制生产的政策。

然而，这种工业危机再和农业危机結合起来就更加尖銳化了。危机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因直接受到美国市場不景气的打击，首先就表現在蚕茧的价格上。1930年5月曾經保持着一千一百日圓的生絲价格，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間卽下跌了36.8%，卽跌为七百九十五日圓。这种跌价恰恰是在春茧卽将大量上市的时候，所以蚕茧价格是更大地压低了，其下跌率比生絲大得多，1930年9月的价格比前一年同期下跌了65%。这就意味着生絲下跌的大部分損失都轉嫁到蚕农身上，給占全部农民40%的蚕农带来了严重的貧困。在長野县的蚕农地区农戶因为沒有現金收入，在参加亲友丧礼时只好拿写着"五分""一角"的紙片来暂时代替奠仪，以后有了收入再付給現金，同时这种情况竟然成了一般的習

慣。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10月政府發表了当年对米谷收成的估計，預告将有大丰收，于是，米价立刻暴跌，造成了所謂“丰年飢饉”。1930年1月米价是二十七日圓，到1931年1月猛跌到十六日圓，使农戶的生产簡直陷于絕境。1931年情况正相反，东北地方和北海道又發生了从来沒有的歉收，这些地方出現了非常悲慘的状况，农民受到飢餓的威胁，赶在降雪以前到野山上挖掘蕨菜根，把馬鈴薯和米糠摻和起来作为日常的食物，借以苟全性命。不論丰收或歉收，都要为“飢饉”的厄运而愁苦，这就是当年日本农民生活的写照。

在工业方面，由于壟断資本的限制生产，壟断价格仍旧維持着較高的水平，壟断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价逐漸增高，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的貧困。同时，大約占农民收入20%的“非农业收入”，也因工业的蕭条而銳減了。紡織女工、織布工人、繅絲工人的工資，由于縮短工作时間、降低工資、解雇等原因而大为減少，使农民所不可缺少的“非农业收入”的来源受到威胁。其次，农村的封建式大家庭还得担負起那些由于吃不飽而从城市回来的龐大的失业人群的生活。这样，工业恐慌的重压和农业危机的深刻化加在一起，显著地增加了农民的貧困。

危机带来的損失都被轉嫁到工人和农民的身上，而与此相反，大資本家为了摆脫危机，却广泛地推行了限制生产以及其他卡特尔(壟断資本相互間的协定)运动。在这次危机中，近五十个产业部門建立了卡特尔，特别是重工业部門建立得最多，实行了限制生产、分配生产任务、价格协定、統銷协定、分配生产数量等。

这种統制生产与銷售的卡特尔运动，由于濱口內閣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的推动而更加有力地向前發展了。政府有关产业統制的立法的主要內容，是对大工业的重要产业統制法、对中小工业

的工业組合法、和对輸出企业的輸出組合法，而其主要核心則是重要产业統制法。这些法令的目的是用国家权力帮助壟断資本加强其卡特尔的統制。因此，卡特尔几乎控制了日本产业的所有部門。

这样，在各产业部門进行卡特尔化的同时，控制这些卡特尔，从而控制日本所有产业部門的則是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資本。例如，在煤业中就产生了煤矿业联合会这样一个卡特尔組織，施行煤矿业的自主的統制，在其全部产量中，三井占 31%，三菱 19%，住友占 5%，与其他中等財閥加在一起，共达 83%。虽然各个产业部門多少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这些財閥資本虽然是被卡特尔糾合在一起，而財閥相互間以及大財閥和中小財閥之間的对立和竞爭，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是更加剧烈了。

其次必須注意的是，这种卡特尔是在大銀行指使下进行的，銀行控制产业，財閥銀行的主人控制所有产业部門的体系进一步巩固了。例如，在 1931 年大同电力、日本电力、东京电灯等大公司間的电力供給协定，就是在三井財閥的領导者池田成彬的指使下签訂的；同时，三井銀行又向东京电灯公司进行干涉，把它也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如上所述，濱口內閣通过解除黃金禁令来为他“大展宏图”創造条件的計划，徒使工人、农民的生活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而另一方面，壟断資本特别是大財閥，正如施行“产业合理化”政策那样，任意行使国家权力，在危机之中还拼命想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以这次危机为轉折点，国家权力逐漸从屬于大財閥的利益支配之下了。

倫敦裁軍会議

幣原喜重郎担任外相，是从 1924 年到 1931 年大約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間，他所提出的以所謂四原則作为对华政策骨干的"国际协調外交"，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所謂四原則就是：(1)不干涉中国內战；(2)通过經济合作来謀求共存共荣；(3)諒解与同情中国的現状；(4)合理地拥护合法权益。

但是国际、国內形势的發展，使这塊金字招牌难以坚持下去了。繼田中外交之后的濱口內閣的幣原外交，逐漸地不得不暴露其侵略的本質了。至少是它已失去了阻止軍国主义策划發动战爭的力量。幣原外交的最后产物，同时又使他險些跌跤的拌脚石，就是倫敦裁軍会議。

裁軍会議，一方面反映了战爭牺牲者的人民群众对于和平的要求，而在强国政府方面，也有通过削减軍費来节約財政开支的必要，另外，这里面还包含着强国之間都想假借裁軍来互相牵制，并使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的斗爭。

在 1921—1922 年的华盛頓会議上，五大海軍国之間签訂了关于战艦的协定，后来又在建造輔助艦艇方面开始了剧烈的竞爭。于是，于 1927 年在日內瓦又召开了第二次海軍裁軍会議，但是由于英美两国意見分歧，这次会議沒有达成任何协議，至 1930 年 1 月，在新就任的美国总統胡佛和新成立的英国工党內閣首相麦克唐納之間达成了协議，于是就召开了倫敦会議。

日本的全权代表是民政党的元老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軍大臣財部彪、駐英大使松平恒雄和駐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海軍方面一貫主張大型巡洋艦应保有美国的 70%，輔助艦应为美国的 70%，潛水艇为七万八千吨。但是政府并未公开表明坚持 70% 的比例，而仅仅提出"攻击不足，防御有余"的"无威胁的裁减"并采取

了"国际协調"的方針。所謂"无威胁的裁减"的实际內容，並不是象字面上那样和平的，日本的目的是在远东保持对英美的軍事优势，以及它向中国和南洋的扩張不致受到阻撓。日本面临国家財政的严重拮据，就中海軍軍費所占的比重几乎是英美的一倍，因此，它不得不避免在建艦竞爭上与英美發生决定性的对立。所以，一面作为保衛国防的最低限度的数字提出了对美70%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幣原又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說"尽量爭取70%，但因为对方也有意見和面子問題，並不能完全按照日本的主張"。

这次会議，因为英美之間已取得諒解，主要的矛盾是在日本和美国之間。在交涉过程中曾几次瀕于决裂，但結果，日美之間还是达成了协議，規定日本的大型巡洋艦为美国的60%，輕巡洋艦、驅逐艦为70%，潛水艇相同，各为五万二千七百吨。全权代表团关于协議內容的請示到达国內以后，海軍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但結果，在內閣会議上还是全体一致同意了这个协議，並于4月1日向全权代表發出了批示。翌日，軍令部長加藤寬治即上奏日皇表示反对，並發表声明說难以保証国防的安全。据悉海軍方面認为决定兵力屬于統帅事項，因而指責政府未經海軍軍令部同意即發出批示是"干犯統帅权"，于是就發生了統帅权問題。在明治宪法上規定着"天皇統帅陆海軍"(第十一条)，"天皇确定陆海軍的編制及常备兵数目"(第十二条)，但是，这些規定都是根据專制政府企圖在軍事方面逃避国会干涉的要求而設的。其中，关于前者，統帅权独立的原則已經获得广泛的承認。这就是說，在天皇之下掌管陆海軍用兵的是統帅府——参謀本部、軍令部，战时是大本营，国务大臣不得参与用兵。但是，关于后者，因为陆海軍的編制及常备兵額問題，一方面与用兵有密切关系，同时，对于政治、外交、財政的各方面也有很大影响，因此，陆海軍編制及常备兵額問題是否应該包括在"統帅权的独立"的范圍以內，还有爭論。倫敦条約中关

于兵力的决定，正是属于明治宪法第十二条的問題。后来因为主張天皇机关說而遭受迫害的美濃部达吉博士，支持了政府的立場，認为在締結裁軍条約上軍令部沒有任何决定权。

正在这时，第五十八次国会开幕了。濱口內閣認为倫敦条約是关于决定海軍兵力的条約，其决定权屬于政府，所以在决定批示上面，虽然軍令部持有不同意見，并不构成对于統帅的干犯。然而关于第十二条的所謂編制大权，因为怕引起陆海軍的一致反对，政府也未敢断言这点应屬于国务大臣的輔弼事項，統帅部不得干預，故意地采取了曖昧的立場。于是，在野党政友会和貴族院就抓住这一点向內閣进行了严厉的追問。

正在此时，曾以專門委員身分出席倫敦会議的軍令部參謀草刈少校自杀了，遺書写道"为了就倫敦条約問題，向国民表示歉意，願以死相报"。这样一来，在陆海軍青年将校和民間右翼团体中間，"不要忘記被自由主义者利益被迫牺牲的草刈少校的死"的呼声高漲起来，对政府的"协调外交"、"軟弱外交"的攻击激烈起来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倫敦海軍条約于4月22日签字了，7月4日条約提交樞密院諮詢。圍繞着統帅权問題和国防上有无缺陷問題，政府和樞密院展开論战，一直延續了将近三个月。在樞密院里也有一部分人主張否决，但是內閣的决心很大，終于在10月1日通过了。但軍部和右翼方面对于政府的攻击，并未因此就趋于緩和，11月14日早晨，将要西下的濱口首相在东京車站站台上，被一个青年用手槍打中了，負了重伤。凶手佐乡屋留雄是寄居在岩田爱之助的"爱国社"的一个右翼青年。

因討論倫敦条約而提出的統帅权問題，使民間右翼势力和軍部势力結合起来，国家至上主义运动开始公然出現到政界上来了。处于危机下的社会不安也是一个因素。对此，政府在議会中

答辯說:"不景气的原因是世界范圍的不景气",并未表示任何自疚。右翼势力就利用此点喊出了"打倒政党",打倒"財閥"的口号。尽管如此，政府这时所以对实行裁軍态度意外地坚决，是因为当年 2 月正在倫敦会議时期，民政党在大选中得到了絕对多数的选票,有了自信，而財閥也支持內閣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并且还直接受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的鼓励。同时也不能否認，当时自由主义气氛較强的輿論希望通过裁軍来維持和平，也是对于政府的一个有形或无形的支持。

幣原外交

倫敦条約被批准了,可是,当編制翌年——1931年度預算的时候,政府对于海軍当局所提出的为数三亿九千四百万日圓(其中第一年度为九千五百四十万日圓)的軍备补充計划,却不得不加以承認。为了緩和因倫敦条約問題而引起的海軍內部的不滿,这样做是必要的。濱口內閣虽然在倫敦会議时成功地駁斥了海軍部內的强硬派的要求,可是它沒有敢于拒絕这一补充計划,因为那样作将使海軍部內的妥协派也轉到反对派方面，以致政府在海軍部內完全失去其威望。这种危險局面具有动搖內閣本身的力量。日本的政党內閣,即使在其全盛时代也具有这种脆弱性。然而,必須注意,幣原的"协調外交"在本質上并不反对走向战爭。濱口內閣上台，国家預算中直接軍事費的比例也并沒有特别减少。 1929 年度預算,因实行"紧縮政策"在总数上减少了 6.89%,可是,陆海軍省的預算仅仅减少了 4.39%;和"田中軍閥反动內閣"时期相比,軍事費的比例不仅沒有减少,反而有了某些增加。 1930 年度，陆海軍省的預算实額比以前有所减少,但在总預算中所占的比例是 28.5%,是比上年度增加了。其次,軍需品进口額对全部貿易額的比例,在田中內閣任內，1927 年是 35%，1928 年是 39%，而到濱口內閣执政的

1929年和1930年都达到了41%，反而增加了。在国际上，軍費占整个国庫开支的比例，英国是14%，美国是21%，法国是22%，意大利是24%，而日本竟达到了29%，占世界第一位，比英国多一倍。

根据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濱口、幣原外交尽管在表面上标榜“协调主义”、“和平政策”，但整軍备战却仍在以同样速度繼續进行。只是慑于与列强針鋒相对，因而不采取露骨的冒險主义政策，而以“紧縮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来加强壟断資本，依靠壟断資本来充实軍需工业、建立总动員体制等等，也就是把做好这类基础工作当成了重点。例如，田中內閣設立的直屬內閣的“資源局”，是“在經济方面进行备战”的参謀本部，这个机关到了濱口內閣时就开始实际工作了。关于設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在該局發行的“資源的統制运用与資源局”(1930年5月)里作了如下闡述：“这次大战在表現为大規模而且長期的兵力战的同时，也显示了作为武器战、軍需战的实質……使人深切体会到战后經营要受到平时国防准备多末大的影响，目前，傾向于偏重兵力的国防观念受到修正，人們已充分認識到，国防已經不是軍队的專业，而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战爭已經不仅是兵力对兵力的斗爭，而是国力对国力的較量”。

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总体战和总动員的主張，資源局的任务也就是为此目的而对資源进行統制和运用。同时，关于产业动員进行了詳細而具体的調查和計划，为了准备一朝有事，甚至連山区僻地的公共汽車和馬車也列入了动員計划之內。从1929年12月1日起，在日本全国实行了資源調查法及有关命令，而于1929年在东京、大阪、神戶地区，为了作好国家总动員的准备，还实行了工厂生产演習、調撥演習和运輸演習。产业合理化政策是有着这样一种“軍事”目的，即企圖發展与軍需品生产直接有关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同时把这些工业改变成适应近代化战爭需要的經济

組織。例如：可能立即改为制造火藥、毒瓦斯的化学工业、人造肥料、染料工业（据說 99% 的大中型工厂在开战后二十四小时以內即可变为軍需品制造工厂）等，尽管在危机之中还是有了發展。直接的軍事工业的水平也提高了，在 1931 年 9 月侵略中国东北的战爭开始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第一次制成了本国产的重型轟炸机，当时，还逐漸能够生产战車、装甲車、高射炮以及其他近代化兵器了。此外，在陆軍大演習时，还动員了在乡軍人、青年訓練所的訓練生等都来参加，而在京阪神地区、京濱地区、横須賀、吳港、佐世保等軍港地区举行防空演習和灯火管制演習，也是从濱口內閣时开始的。

罢工浪潮

濱口內閣在开始实行紧縮政策时，为了表示以身作則，立即發表了对官吏減薪一成的方案。但是，这件事遭到了以司法官吏为首的全体官吏的一致反对，因此，政府終于不得不撤回原案。天皇的忠誠官吏、其中特别是官僚气十足的司法官，竟以总辞职的决心起来反对并提出了請願，这还是从来沒有过的事情，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紧張局势。紧縮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把危机带来的損失轉嫁給工人、农民，挫敗了这些政策的根本力量，当然还是工人和农民的斗爭。根据产业劳动調查所的調查，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在 1930 年約計三百万人，在这种貧困的 1929 年、1930 年中，劳資糾紛的件数和参加斗爭的人数都大大增加，农民的減租斗爭也同样地激烈起来了（参看后表）。

面临淪落危机的中小工业主和小市民，为了緩和生活的压迫也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抗爭，減低电灯費运动、減低煤气費运动、減低房租运动、消費合作社运动等維护生活的斗爭，在全国各地展开，无論在都市、农村、工厂或街头，到处都弥漫着不滿和

	劳資糾紛				减租斗爭			
年别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件数	1,021	1,420	2,289	2,456	1,866	2,434	2,478	2,689
参加人数	102,000	172,144	191,805	154,528	75,136	56,830	39,799	60,365

反抗的气氛。

在 1929 年末發生的关东的东京市电和关西的大阪通用汽車公司的工人斗爭，一直坚持到了 1930 年。东京市电的斗爭，由于以全协革命的反对派为中心的工会会員群众的頑强活动，12 月 5 日各路汽車全部罢工，电車在新宿、三田等七个地段实行了罢工。但是，因为屬于日本大众党的四名东交旧干部的叛变，罢工不得不暫时收兵。通用汽車公司的糾紛是由于反对解雇二百八十名职工而發生的，一千三百名工人在举行了大示威的同时，于 12 月 26 日开始了罢工，尽管是在正月里，工人們还是向公司当局进行了示威活动，斗爭一直坚持到 2 月 1 日。尽管如此，但由于新劳农党大阪联合会的干部們为了顧全本身安全和巩固自己地位的作法，使斗爭遭到了失敗。然而，通过这一事件，暴露了新劳农党的本質，造成了后述發起解散新劳农党运动的一个直接原因。接着，反对失业、反对解雇的斗爭在各地高漲起来，东京、大阪的三千名邮政从业員要求改善待遇、反对解雇；东京毛織厂工人也举行罢工，反对封鎖工厂。此外，一向以家庭的溫情主义而自豪的、开办以来从未發生过任何糾紛的鐘淵紡織公司，所屬各厂的三万五千名工人也在 4 月間，为了反对减低工資 40% 而展开了斗爭。为采取对策而成立的无产者党共同委員会，决議于 4 月 21 日举行反对鐘紡日，号召借此机会实行紡織工人大罢工。正当鐘紡职工的罢工在全国范圍內展开了的时候，东京市电从业員繼續前一年的春季斗

爭，又于4月20日全部路綫一齐实行了罢工。这个消息給予全国交通工人很大影响，东京公共汽車、东京郊外电車、神戶市电、大阪市电、横濱市电也都起而响应，提出要求，投入斗爭，整个日本卷入了工人的汹涌澎湃的斗爭浪潮之中。这些都是在工人运动史上划时代的大斗爭。

对此，資本家和官宪采取了解雇和鎮压。工人們坚持了斗爭，但是，随着斗爭的長期化，一些干部們开始妥协和叛变了。在东京市电工人开始罢工的第三天，曾在前一年年末叛变过的四名东交旧干部，又迫使其影响下的七百五十名芝浦工厂的工人停止了罢工，企圖借此进行分裂。这样一来，屬于右派的旧自治会現实同盟的一千七百名職工也于翌日（23日）停止罢工。然而一万五千名群众仍旧坚持罢工了两天；但是，到了25日午后終于不得不結束了罢工。因此，各地工人的斗爭也相繼失敗，鐘紡工人的斗爭也由于公司的鎮压和收买而失敗了。

但是，不久又掀起了第三次罢工風潮，革命的反对派势力較强的东京市电，在罢工停止后仍旧坚持斗爭，要求使被解雇者复职和补發罢工期間的工資，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一部分群众停止工作，采取了安全日、要求日、不服从日等一切手段进行了斗爭，最后，于5月25日不顧官宪的重重包圍，为了徹底实現要求，一齐拥到市电气局。对此，官宪竟發射了催泪彈，使多人負伤并解散了示威队伍。但是，这种鎮压并沒有使他們屈服，他們仍旧坚持了斗爭，結果，終于迫使这次糾紛的負責人东京市長堀切、电气局長筧辞职了。

在6月的东洋毛織龟戶工厂的斗爭中，二千六百名女工在全国工会的領导下坚持战斗了两个月，公司方面竟利用大日本正义团的暴徒們毆打罢工工人，因而發生了混乱，而女工們和官宪之間也發生了冲突，这是一場被称为“巷战”的激烈的搏斗。

佃农斗爭

危机在农村最为严重。报紙上也大談"农村的貧困"这一問題。因为地主企圖将危机带来的負担强加在佃农身上,所以,正如前表所示,佃农的斗爭就高漲起来了。以往,佃戶与地主的糾紛每年約有二千多件,在1930年以后便呈現直綫上升,过去是要求減免佃租和反对漲租占大部分,这时,延長租佃契約、确認租佃耕权和永佃权等屬于耕种权的斗爭却占了优势,这都表明了斗爭的急剧尖銳化。地主采取了禁入禁地、沒收青苗等高压手段,这种作法并且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保护(1931年2月28日最高法院对于"进入禁地的耕作者,因无視扣押标示而引起的刑事被告案件"所作的新判例,就是第一个例子)。对此,佃农們就以共同收割、共同耕种来相对抗,并屡次演成流血斗爭。在山梨县奥野田的糾紛中,地主带領流氓三十余人强行沒收土地,于是,十八个佃农就拿着鉄鍬、鐮刀起来斗爭并夺回了土地。因为警察把全部佃农拘押起来了,所以,全县农联就向全县發出动員号召,七百余农民赶去救援。这样一来,警察又在全县范圍內逮捕了二百多人,但斗爭仍然坚持下去,农会終于取得了胜利。还有,在"新瀉大蒲原糾紛"中,貧农用"实力"进行了保衛土地的斗爭。在这次斗爭中,佃农的孩子們也拿着紅旗参加了战斗,向地主投擲石塊。他們就是"劳农少年团"团員。他們在作文中这样写道:"地主混蛋們!我們的人多得很,我們唱大混蛋地主之歌,地主的婊子也唱起来了,我們就大声喝道,干嘛你們也唱这样歌?"(久保寺三郎:"农村的崩潰")。又以"农会"为題这样写道:"我們必須成立农会迫使地主家伙們大大減低地租,讓我們吃飽飯。今年景况又这样不好,假如再收租子的話,我們就要餓扁了。蔬菜不値錢,庄稼因为干旱也完蛋了,今后我們怎么活下去啊!眞讓人耽心。所以必須更多地成立农会"(久保寺

三郎:"农村的崩潰")。

統治阶級对于这种革命运动进行了鎭压,在这一点上,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濱口內閣,与"反动的田中內閣"并无区别,在日本国內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名义而被檢举和被起訴的人数,1929年为四千九百二十四人(被起訴者三百三十九人);1930年为六千一百二十四人(被起訴者四百六十一人);1931年为一万零四百二十二人(被起訴者三百零七人);1932年为一万三千九百三十八人(被起訴者六百四十六人);1933年为一万四千零六十四人(被起訴者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如上所述,工农运动显示了空前的高漲。但是,負責領导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政治势力,由于相繼受到"三·一五"和"四·一六"的鎭压而大为削弱,因而沒能充分地展开活动。由于这种原故,在1929年8月間成立的新劳农党的領导机构沒有和共产党建立組織上的联系,反而具有一种对立的傾向。因此,从党內产生了河上肇、上村进等的"战斗的取消"运动,使党陷于瘫瘓状态。同时,共产党的基層組織以及在1928年末繼評議会之后重新建成的日本工会协議会(全协),都在"把一切斗爭集中在政治性总罢工上"的口号下,采取了过左的方針,并使对此方針表示不滿的一派分化出去而成立了"刷新同盟"。这样,左翼势力的分裂状态,正如上述那样,很自然地使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叛变行为成为可能,阻碍了工农运动的發展。革命运动的重新轉向高潮还是从1930年的下半年开始的,当时共产党重新扩大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重建了共产青年同盟,日本工会协議会也把分裂出去的"刷新同盟"吸收回来,展开了"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运动",加强了力量,并掌握了东京交通工会(东交)的領导权。在这种形势下,合法的无产阶級政党方面也吸取了1930年第二次普选慘敗的經驗,产生了合并的动机,至1931年7月,全国大众党、劳农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即

所謂中間派，联合起来組成了全国劳农大众党。然而，为时已經大晚，两个月以后就爆發了“九·一八”事变，这就迫使工农运动又不得不退入低潮了。当时，有組織的工人有30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因处于左、中、右三派政治势力对立斗爭的漩渦中，以致陷于混乱状态，在他們統一步調的工作将要就緒的时候又受到了这番打击，所以也就沒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局势向战爭的方向發展，这也是很自然的。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

第一节　“滿蒙”問題的緊迫

被压榨下的朝鲜

由于發生了危机的結果，日本的国內市場日益縮小。因此，日本資本主义要想从危机中摆脱出来，除了保有和扩大国外市場以外，別无他途。但是，在这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經济危机的結果，所有国外市場都被严密地封鎖起来，国外貿易也日趋减少。1930年比1929年出口减少了32%，进口减少了30%，比同期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貿易額的銳减情况还要严重。在这种趋势下，日本的統治者和資本家們再一次选擇了进一步加强剝削殖民地和用武力夺取新殖民地的道路，以圖摆脫当前的困境。

在日本的最大殖民地朝鮮，人民在經济危机下遭受着三重压迫。那就是由危机的直接影响而来的农业危机的打击、日本工业危机的損失向殖民地农业的轉嫁，以及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剝削。1930年由于日本和朝鮮的丰收，米价跌落了44%强，使农民遭受很大痛苦；这种痛苦由于第二年的歉收更加严重了。占朝鮮全体农戶43%的佃农、占33%的自耕兼佃耕的貧农，平均要担負50%的实物佃租，有的地区甚至要担負60—70%。而且，每月还要受到月息10—20%的高利貸和商业資本的盘剝。此外，农民們所必需的消費物資，必須用昂貴的壟断价格購买日本的工业制品。相反，朝鮮农民的生产品却被强制地按低价收購，在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这一年当中，其平均价格下跌了28%，而进口商品(大多数是从日本来的)的价格不过下跌了12.8%。本来，朝鮮的大部分农民單靠农业就无法維持生計，所以有的到日本內地

去謀生，有的是自己的家屬受雇于城市的工厂或是土木工程，借此来勉强糊口。可是，由于危机还在持續，出外謀生已陷于不可能，同时家屬也被解雇回到农村，这就加剧了农民的貧困。

遭受苦难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全体朝鮮人民。根据官方資料，朝鮮的失业人数达到日本的两倍，本来就够低的朝鮮工人的工資进一步被压低了。根据有工人五十人以上的工厂的統計，日本人成年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資是日圓一圓九角六分，而朝鮮人成年工人仅仅是九角四分。这样低的工資还要被进一步降低，而雇农的工資竟被减低到了每天六角五分。因为工厂法不适用于朝鮮，所以在朝鮮的工厂里，那种殖民地性質的長时間的劳动(女工、童工也是十一小时)越来越被延長了。工人們在日本工头的皮鞭下被驅使着，而且，所掙的工資就連最低的生活也不能維持，甚至連这样职业也被逐漸剝夺掉，使农村中显著地增加了过剩人口，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悲惨情况。試举一例，根据在庆尙北道所作的調查，五口之家一年收入平均只有一百日圓，每月全家生活費只有八元多一点(日本的平均工資每月是三十日圓)。这是对一个三十六戶的村庄所作的調查，据說其中还有三戶六口之家一年收入只有五十日圓。每天一个人仅仅是二分多一点(合現在的日幣八日圓而已)，这眞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悲惨的生活状态。因为朝鮮人口的80%是农民，所以这也可以說是当时朝鮮人民的生活状况。

危机这样襲击了朝鮮，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日本資本主义的矛盾。首先，为了将危机的負担轉嫁給殖民地而实行的掠夺的加强，就把本已狹窄的朝鮮市場弄得更小。朝鮮农民的購买力已完全丧失，1931年从日本的进口額，比1930年减少了25%，比1929年减少了33%，結果使日本的工业危机更加深重。第二，朝鮮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米价下跌，更加加剧了日本的农业危机。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維持低工資政策以及保証軍事上的自給自足，曾大力奖励朝鮮增产大米，因此，朝鮮大米向日本的輸出，就占了全部輸出的一半，对决定日本的米价有举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朝鮮米价的下跌就直接影响了日本的米谷市場。第三，殖民地朝鮮的政治危机加深了。随着危机的加剧，佃农自不必說，就連自耕农兼佃农、自耕农、"半地主"① 也都穷困了，很多"半地主"、自耕农、自耕兼佃农降为佃农、而佃农則向火种农(經营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民，因收成極低，第二年又迁移到别的地方，他們是不定居的流动农民)轉变，很多甚至成为流浪者，流入中国东北和中国內地。佃农在1929年是一百二十八万三千戶，至1930年末增加到一百三十三万四千戶，純"火种农"从三百四十三万戶增加到三百七十五万戶。另一方面，地主也有一些增加，大土地所有者的增加与日本人地主的發展是很显著的。根据1927年的統計，在拥有土地一百"町步"以上的八百七十八个地主中，就有五百四十三个日本人，其中包括拥有九万"町步"土地的东洋拓殖公司。

由于这种貧富差别日益扩大和农民的極度貧困化，使农民的斗爭激烈地展开了，斗爭的內容不仅仅是佃耕权、租粮等問題，而且还提出了不納稅的問題，这样就和傳統的民族独立斗爭結合起来，带有高度的政治性，以至动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統治。1931年1月被檢举的咸鏡南道的定平农会表明，"几乎全郡都受到了左傾思想的洗礼，并且有了在农村里罕見的巩固的基層組織"。同年5月，在咸鏡南道洪原郡，二千余名农民拒絕繳納山林組合費、农会費及其他一切杂稅，要求延期繳納戶稅，利用这一天的集日，群众堵塞了由洪原邑通往东西南北的四条大路，扛着鋤、鍬举行了一次革命的大示威游行。阶級斗爭在工人当中也很激烈。1930年1

① 自耕一部分土地、出租一部分土地者。——譯者

月，二千名朝鮮紡織公司釜山工厂的女工，提出“反对民族的差别待遇、八小时工作、每日工資最低八角、提高計件工資30%”等十二条要求，举行了罢工。还有1929年11月，在光州，朝鮮中学生与日本中学生發生冲突，这次学生斗爭，在共产党的領导下，發展到全国，与上述釜山紡織工人的罢工結合起来了。接着又發生了仁川斋藤碾米厂、城津松下罐头工厂、汉城大昌紡織公司、咸鏡南道新浦罐头工厂、大丘全部碾米厂、元山德兴罐头工厂、汉城食品公司、龙山工程公司、鎮南浦加藤碾米厂等工人的罢工，成了1919年万岁事件以来的重大事件。在三百名咸兴煤矿的工人斗爭、平壤十二个橡胶工厂的二千名工人的同盟罢工以及四百余名元山工人为夺还被殘杀的朝鮮共产党員金佚山的尸体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工人和日本官宪展开了浴血斗爭。

在台灣，情况也大致相同。从1927年起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都高漲起来，1930年11月，台中州霧社的台灣本地人一千五百名掀起了暴动，总督府出动了陆軍和航空队进行鎮压。这次暴动的对象显然是日本人，中国人一个也沒有被杀。关于事件的根本原因，就連东京“朝日新聞”的社論也不能不这样說：对于台灣“旣不給予自治权、又不給予参政权”，“把本地人居住地区称做行政区域以外地区，經济、教育都任憑警察官办理，暴动就是这种警察專制所造成的恶果。”

在朝鮮、台灣的以工农运动为中心、并包括資产阶級民族主义运动的这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动搖了日本殖民地体系的基础。加强鎮压，只能激起民族反抗的进一步加强。

万宝山事件

大批不堪貧困的流民从朝鮮流入中国东北，构成了在“滿洲”引起政治危机的因素。早在日本开始統治的初期，就有很多朝鮮

农民不堪日本殘酷的殖民剝削而背井离乡移居到中国东北，在吉林省間島地方，这种移居者几占当地人口的大半，这时由于更多的农民流入，因而在土地問題上和中国农民引起了糾紛。1930 年 5 月，在間島地方，朝鮮农民在共产党領导下掀起了反抗中国軍閥与日本警察的双重压迫的暴动，但不久就被鎭压下去了。以后中国軍閥和警察的压迫更变本加厉，三百多名朝鮮农民被迫从間島移居到長春附近。他們打算在長春西北方五十华里的地方(位于万宝山和伊通河之間)把一千町步左右的荒地开垦成水田，和中国地主签訂了租佃契約，并开始挖掘沟渠。然而，在中国民族感情高漲、把朝鮮农民看做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当然难以順利进行，至 1931 年 5 月末，中国官宪要求朝鮮农民立即从这里退出，同时中国富裕农民也因为担心挖掘沟渠会引起水灾而掀起了反对运动。7 月 1 日，五百中国农民拥到現場，發射步槍和手槍，破坏了堤堰和沟渠。这就是盛傳一时的万宝山事件，日本方面利用这一問題作为解决"滿洲"問題的手段，大肆宣傳中国方面的非法，結果在朝鮮人之間引起了复仇暴动，7 月 2 日夜在仁川爆發的暴动立即波及到整个朝鮮，在朝鮮的中国人遭到了复仇性的暴行，以致死伤了中国人、朝鮮人以及警察数百人。本来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鮮农民，可以說是日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然而，这些人却正如"田中奏折"中所說的："如果住在东三省的朝鮮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使其进行軍事活动，就可以借口取締而进行援助他們的行动。同时，使东洋拓殖公司与南滿鉄路作为他們的后盾来支援他們的經济与財政，以便借朝鮮人之力开拓內外蒙古"云云，不自觉地被利用来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尖兵的角色。万宝山事件和报复性暴动的对象，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禍首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必須团結一致的中国人民，这就使得悲剧性更加扩大了。

“生命綫”——“滿蒙”

当危机更加深刻，殖民地朝鮮、台灣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以后，“滿蒙”問題便驟然被賦与了重大意义。“滿蒙”被称为是日本的“生命綫”，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滿洲”对于日本資本主义的重要性，从下面的例子也可以得到証明。在貿易上，1930年度，“滿洲”从日本輸入的商品占日本总出口額的8%，其中糖是14%，綿織品是12%，紙張是12%，机械、器具达37%，成为日本的重要商品市場。同时，“滿洲”又是日本原料資源的供应地，从“滿洲”进口的物資占日本整个进口的11%，日本进口的76%的豆类、64%的煤、46%的銑鉄、86%的豆餅，都由“滿洲”供应的。在“滿洲”的整个对外貿易中，日本所占的地位大大凌駕在其他国家之上，特别应該注意的是大部分煤、生鉄都被运往日本。“滿洲”不仅仅是日本的商品市場，而且是它的最大的資本輸出市場。在1930年1月，日本向“滿洲”投資的数額，屬于借款方面的是二亿三千八百零六万二千日圓，屬于法人企业方面的是十一亿三千五百三十五万二千日圓，屬于个人企业方面的是九千四百九十九万一千日圓，合計为十四亿六千八百四十万零五千日圓。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对台灣的投資三亿零五百万日圓，对朝鮮的投資八亿零四百万日圓和对中国本部的投資十一亿九千万日圓。这个数目相当于外国对中国东北投資总額的73%，除去苏联的23%（中东鉄路），几乎占了全部。在日本的全部投資中，运輸业占56%，矿业和农林业占8.4%，工业占9.7%，因为大部分都是投在生产上，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占有这样重要地位的“滿洲”的局势，从1930年起逐漸地發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就是：由于危机的影响，日本对于“滿洲”原料的吸收能力降低了；“滿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購买力减低，以致

日本的出口减少了；中国革命的發展及其給予"滿洲"的影响，使"滿洲"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爭加强了；由于以上的結果，日"滿"間的貿易額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这些事情，首先表現在"滿洲"的各种矛盾的發展上，"滿洲"的人口每年增加将近一百万人。其中，从中国本部移来的約占一半。这些来自中国关內的移民，在"滿洲"并不是自由的自耕农民，广大的荒地早已掌握在軍閥、官僚、大商人的手里，移居者只能成为他們的佃农。佃农的負担，除了50—60%的佃租以外，还要向軍閥繳納各种捐稅、向地主繳納沟渠捐，另外，每年还必須循例为地主服十天以上的劳役。土地經营的规模也是不平衡的，在"南滿"的很多县，有50%的农戶、"北滿"有80%的农戶是本身沒有耕地的雇农，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和軍閥手里，二、三个地主占有全县土地的例子也不稀罕。除了这种封建剥削以外，再加上滿鉄壟断运費，三井物产公司、三菱商事公司等大商人杀价收买大豆，高价推銷消費物資，这就使得东北的农民受到了更重的剝削。这样，在中国东北，由于手工业破产和农村阶級分化而产生的大批貧民，找不到可以收容他們的工厂，不得不作为劳工、雇农和貧农过着那种非人的生活。在南滿鉄路及其他外国資本所实行的部分工业化中形成的現代阶級和上述貧民一起团結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圍，形成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頑强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以逐年增加的中国农业人口为背景，中国民族資本在帝国主义壟断資本的縫隙里發展起来了。这个势力推动着代表原有封建地主势力的东北軍閥張学良，使他采取了加强統一东北政权、摆脫日本、靠攏国民政府的方針。"在帝俄和日本正忙于划定其各自在'南滿'和'北滿'的势力范圍的时候，中国农民占有了土地，'滿洲'就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能得到重新主張自己拥有主权的良好机会。"(李頓报告

書)。張学良在其父張作霖被日本軍暗杀了以后，就把日本帝国主义視为敌人，挂起"青天白日旗"，表示向国民党靠攏。当时正是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危机極为严重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为了扩大商品銷售市場，一面援助中国民族資本的这种反日活动，同时进行种种策謀，企圖动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壟断性，如其可能，还想把东北市場攫为己有。这些情况首先表現在土地商租权問題上。在1915年中日条約里曾这样規定："日本国臣民在'南滿'，为了建造各种工商业用建筑物或經营农业，可以商租其所必需的土地"。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土地商租权在实际执行当中，却一再为張学良政权所否認。前面提到的万宝山事件也就是"中国人的土地归中国"这一运动的一个表現。这种情况使得把租借地从1922年—1923年的八万英亩扩展到1931年的五十万英亩以上的日本大金融业者陷于極大不安。

在这种条件下，又發生了与南滿鉄路竞爭的鉄路綫問題。1930年7月，中国在荷兰筑港公司的借款帮助下，在能与大連港相对抗的不冻港葫蘆島开始了筑港工程，迈出了修筑和南滿鉄路竞爭鉄路綫計划的第一步。以此为起点并計划鋪設东大干綫和西大干綫。当然，这个計划的背后有中国的民族資本的活动和英美資本的援助。就在这个时期，由于1930年度东北的大豆滞銷、中国鉄路运費降低、以及白銀猛跌而造成的南滿鉄路运費的相对提高等等，使代表日本对中国本部投資的40%、对"滿洲"投資的63%(1931年)的滿鉄，收入减少了三千零八十万日圓，比前一年减少了1/3。中国本部和"滿洲"作为日本的产品銷售市場的地位也开始动搖了，特别是在中国本部，以1926年为頂点，从此以后作为日本的銷售市場的壟断性格已逐年降低，五年当中降低了5%。与此同时，向中国、"滿蒙"的出口，在日本总出口額中所占的比例反而上升了。同样情况也出現在日本的原料进口上面。在中国和

“滿蒙”的总出口額中，对日出口額所占的比例，在到1930年为止的五年当中約減少了1%左右，尽管这样，在日本的总进口額中，从中国、“滿蒙”地区进口的比例还是繼續上升。这种情况，使日本深深感到滿蒙問題是一个有关“生命綫”的迫切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深切地感到了，必須把“滿洲”的民族資本和反日运动压制下去，排除外国資本，即便动用武力也要維护它的权益而把“滿洲”作为殖民地来加以独占。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幣原外交，即使从資本的利益来說，也是不可避免地要加以修改了。

中国的內战和中共势力的發展

日本的侵略“滿洲”計划所以能够得逞，其条件之一就是中国本部的局势。蔣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大体上算是完成了中国的統一，但是人民群众却依然过着阴暗的日子。蔣介石在他的統一过程中，以列强的利害冲突为背景，与各个軍閥之間掀起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內战。从国民政府成立到1930年为止的四年中間，仅大規模的內战就發生过八次。所以，国民政府有关軍事的开支，平均約占每年总預算的90%，公債發行額在1927—1936年的九年之間达到了二百零二亿元。即使在这以前的、被称为終年內战和横征暴斂的典型——北洋軍閥时期，有关軍事的开支总共也只占每年总預算的70%，公債發行額在十五年間也沒有超过六亿元。在这期間，以蔣介石为首的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壟断了政府各部門的要职，一手包办發行公債、借外債和發行紙幣等工作，搜刮了全国的財富，掌握了全中国的銀行、产业、交通和商业的支配权。

另一方面，一般人民群众，除了正稅之外，还要被征收十倍到三十倍于正稅的附加稅，諸如嬰兒出生的“出生”稅，死人的“棺柩”稅，房屋的“烟囱”稅和田地的“糞窖”稅等等，以及其他由統治者随心所欲地制訂出来的“捐稅”。在这些捐稅之外，有錢有势者所献

給各派軍閥的"安全保障費",归根結底还是出自劳动人民的身上。每献給軍閥一笔款,就要把工人的工資降低一番,把佃农的地租提高或預收一番。而劳动人民所得到的,只是貫穿在一片荒凉的田野中的近代化軍用道路和在1927—1930年間被抓去当兵的約五十万亲人所遺留下来的白骨。

但是这种情况却給予了革命势力以新的發展的机会。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澤东和朱德所領导的井岡山紅軍根据地的斗爭带动下而开始了。如前所述,南昌起义失敗以后,又有叶挺、賀龙余部四百余人和东江的人民武装,在1927年10月間在广东省的海丰和陆丰建立了苏区。朱德率領的部队后来也轉入湖南,与占据着东南部山岳地区和地主、軍閥的白色恐怖进行着頑强斗爭的农民及矿工的游击队伍相会合,并在各地發动农民起义,把兵力扩大到六千人左右,一面迴避国民党軍主力的追击,一面进軍,于1928年春到达了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井岡山麓,和毛澤东的部队会合了。毛澤东于1927年7月率領脫离汪精衛政权的武汉警衛团,沿着湖南、江西两省的北部境界向南推进,联合农民游击队、鉄路工人和矿工展开游击战,在各地組織农民大暴动,建立了工农革命委員会(即后来的苏維埃)。他們受到国民党軍队的瘋狂的追击,紅軍士兵的身上生了虱子,鮮血淋漓地赤着脚轉战在峽谷和丘陵中,于同年秋天退却到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以前,由五座險峻的山峰所环抱的井岡山,为出沒在这一带的王、袁两土匪所盘据,他們当时拥有由飢民組成的六百名队伍和六十支破槍。毛澤东部队說服了这支土匪队伍,把标有鋤头和鐮刀的紅旗插在这座山上。以后又来了一批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汉口逃出来的工人、学生和在湖南南部秋收起义中失敗的四千名农民游击队。这支被命名为紅軍(工农紅軍)第四軍的、由四个团編成的一万二千名部队,就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衛者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当时可

以称为武器的，只有朱德队伍的两千枝步槍和手槍、六門炮、二十挺机槍以及游击队在各地从敌軍处夺来的若干步槍，此外，就只有游击队員們带在腰間的鉄棍、長刀、短刀、钁头、鋤头和矛槍而已。

剛剛停止了內战的华南地方軍閥，集中了八个到十八个团的大軍，从湖南、江西两省一起包圍了井岡山。紅軍奋战了八个月，不仅守住了这一根据地，而且还乘虛向四周出击，赶走了地主，在各处建立了农民政权。1929年1月，毛澤东、朱德率領的主力部队約四千人突破重圍，在江西省南部一带展开游击战，并且攻入广东和福建。在这种困难的战斗中練成了一支掌握着后来使日本侵略軍疲于奔命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駐我扰、敌疲我打”这种巧妙的游击战术，和“不取人民一針一綫”的严格的軍紀，以及被称为“不知恐惧的紅色野人”的極其勇敢的堅强队伍。他們針对着軍閥之間的分裂或統一的各个不同时期，实行集中或分散兵力，一天天地扩大了占領地区。在占領地区內动員貧农和工人驅逐地主，沒收一切土地分給貧农和中农，在他們的强力支持下，建立了不許地主和富农参加的工农兵苏維埃政权，扩大了紅軍和赤衛队。这样一来，連平原地区也在革命情緒高昂的人民群众的堅决保衛下，变成了巩固的根据地。到了蔣、閻、馮进行內战的1930年前半年，以江西和湖南为中心，在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和河南各省已經出現了每区包括一县到数县的十五个边区(苏維埃区)，只是正規紅軍就达到了十三个軍共六至七万人。1930年春，湖南全省發生灾荒，飢餓的农民群众在各地掀起暴动，一直受到压抑的大城市的工人斗爭也显著地活跃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由彭德怀率領的紅軍，趁着蔣、閻、馮打內战的空隙，在七月間占領了長沙，胜利的紅旗在这座湖南的第一个大城市上空迎風招展。革命的新高潮立即引起了英、美、法、日的共同干涉，在以美国炮艦巴罗士为先导的七艘外国炮艦的援助下，国民党軍夺回了長沙。由于列强的

干涉和当时中共領导者李立三的冒險主义的領导(号召工人在汉口等重要城市起义,幷命令紅軍向这些城市进攻),紅軍虽然又一次受到了挫折,但是由于毛澤东和朱德以江西为中心而进行的活动,使紅軍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31年已达到十万人以上。这种情况使在長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两国和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蔣介石一經結束他与閻、馮之間的內战,立即發布紧急治罪法,一面对于"紅色分子"及嫌疑者施行空前殘酷的白色恐怖,同时又集結了八个师十万人的兵力,圍攻江西中央苏区。这次"圍剿"很快被打敗了,在1931年5月,又动員了二十万人,接着在7月間,蔣介石亲自率領了三十万主力軍,試圖一举占据江西中央苏区。此后,到1933年10月为止,又进行了两次"圍剿"。在此內战过程中,苏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幷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級的革命領导权;同时,眞正民主的政权机关也产生了,作为人民武装的紅軍也愈益壮大起来,"密切結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政治方針和軍事政策"逐步制定出来,一句話,中国革命已經走上了通往胜利的軌道。

蓄謀侵略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对着中国革命的这种發展和对此无力加以阻止的南京政府的无能,早已感到无比的焦躁。不仅如此,从1928年1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給予了中国革命以无限鼓舞的事实,越發使侵略者感到不安。于是,他們就企圖强占"滿蒙",把它作为拦阻中国革命接受苏联影响的楔子、幷作为征服全中国的基地和反苏战爭的前哨据点。

三月事件

由于上述"滿蒙"情况,再加上日本国內的不景气和社会不安的加深,使日本的政客和軍人們感到了極度的焦虑。他們开始認

为，如果不依靠战爭和通貨膨漲，就不能摆脫这个危机，就不可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生存下去。他們开始認眞地考虑了在国內实行法西斯改革問題和武裝占領"滿洲"問題。在这一問題上，站在最前列的就是軍部。

本来，日本的陆海軍是天皇制的最重要的支柱，但是它的阶級基础，在明治时代曾經占压倒优势的封建士族的成分，已經逐漸減少，由于陆軍在1914—1916年廢除了幼年学校，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行了大扩展，干部中間滲入了大批的小資产阶級分子，在陆海軍的軍官中，农村出身的远远超过了城市出身的，他們的父兄大多数是屬于小地主、富农、官吏、教員和工商业者等小資产阶級的下層。日本資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开始以后，特別是發生危机以后小資产阶級的貧困化和沒落，使他們产生了对政治現状的不滿，对前途的不安和对阶級斗爭的恐惧心理。而陆海軍軍官也自然地感到了和中間阶級同样的苦悶与动搖。尤其是他們本身，因为遭到減薪，生活發生困难，因軍事預算受到限制，使他們迟迟不能晋級，由于几次裁軍曾被大量淘汰，这些情况使他們对現状的不滿和焦虑有增无已。特別是农业危机的發展使农村破产，农村出身的軍士和士兵，通过自己的体驗，更加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还有在倫敦会議上决定的裁減海軍、中国革命的發展和"滿蒙"問題的紧迫等等，这些国內外局势，表現出国防上的不安，强烈地刺激了他們。他們把自身的不滿和国防上的不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这种想法：通过对国內的改革卽实行法西斯武装政变来打开政治經济的难关。

1930年9月，陆軍中央机关的中坚軍官，以亲眼看到土耳其基馬尔的武力独裁而归国的桥本欣五郎中校为中心，暗中成立了叫作"樱会"的秘密結社。樱会的綱領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終目标，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它的目的在于：解决"滿蒙"問題，以及研究为此目的的国家改造方案。他們所說的国家改造方案包

括：扩大国营企业，由国家管理金融、貿易，解散議会活动，实行一国一党制和軍备第一主义，模仿法西斯和納粹，实現民族社会主义，并为此而建立强有力的軍部独裁政权。参謀本部第二部的内部文件"1930 年局势判断"的内容，以前是專以假想敌国为对象的，由于櫻会会員桥本中校(参謀本部第二部俄国班)、根本中校(参謀本部第二部中国班)等的活动，在参謀本部的文件"1930 年的局势判断"——这种文件以往專以假想敌国为对象——里加上一条"如欲积極解决'滿蒙'問題，必須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并且把它变成了参謀本部的正式意見。从大正年間以来即以国家主义者著称的大川周明，从 1929 年起，在参謀本部的支持下，到全国各地拼命鼓吹在"滿洲"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作为进行对苏侵略的基地的主張。大川之流的民間国家主义者和軍部紧密合作，进行制定"国家改造"計划，并策划成立軍部独裁内閣的政变。

1931 年 3 月間，大川和桥本等阴謀采取非常手段發动政变，成立以当时的陆軍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的内閣，实行侵略"滿洲"。据櫻会成員田中淸少校的"手記"，宇垣已同意这項計划，并决心出来組織内閣。1 月 13 日，杉山陆軍次官、二宫参謀次長、小磯軍务局長、建川参謀本部第二部長、山脇科長(当日由鈴木貞一中校代替)和桥本中校等举行集会，以后又有永田軍事科長、岡村补任課長和重藤中国科長参加，拟訂了下列計划：

首先举行社会民众党、全国大众党和新劳农党这三个无产阶級政党彈劾内閣的大演講会，掀起打倒内閣的气焰，向議会举行示威，并在事先作好偵察工作，当工会法被提出时，即动員一万名工人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公开的軍国主义者率領下，从四面八方向議会举行示威游行，进攻政友会和民政党的本部及首相官邸。此时，軍队实行紧急集合，借口保护議会而占領議会，由某中将带領

小磯少将或建川少将进入議会，宣称："国民現在已經不信任現內閣，而只信任以宇垣大将为首相的內閣，現在国家面临重要关头，应作妥善处理"，来迫使內閣实行总辞职，并成立以宇垣为首的軍部內閣。由社会民众党的干部龟井貫一郎承担动員工人的任务。

本来預定在3月22日起事，但在起事的前夕，宇垣已得到一項情报說即使不采取非常手段自己也可能当上首相，因而發生了动搖；同时又發現了动員一万名工人是大川的一个騙局，于是下令不要發动，因而使这一阴謀未能实現。这就是所謂"三月事件"。政府得悉这一阴謀事件以后，大为震惊，但是因有軍事首脑参加在內，又不便加以处分，一切情况都隐秘起来不了了之了。

三月事件大大地改变了此后的日本政治方向。作为摆脱危机的最后王牌，最初策划大規模地侵略"滿洲"的軍部核心分子們，此后便逐步地把計划付諸实施，同时也开始在国內政治上逐漸掌握了实权。事件發生后，軍部只把直接有关人員中的櫻会的核心分子从中央調往外地，而对于这次事件，則根本未进行处分。当时离开中央的大多数急进派分子，都被派遣到駐"滿洲"的关东軍里，这样，他們就在現場着手拟訂直接在"滿洲"开始軍事行动的計划了。

第二次若槻內閣和軍部

在前一年12月間遇刺的浜口首相，后来健康未能好轉，到了4月13日，浜口內閣即实行辞职，繼任的是以若槻礼次郎为首相的民政党內閣，在14日宣告成立。若槻內閣，把前任內閣的主要閣員幣原外相、井上藏相等都挽留下来；宇垣陆相則由于因三月事件而引起的陆軍內部的派系斗爭等原因而告退，由南次郎接任了陆相。比起和宮廷及政界联系較为密切的宇垣前陆相来，南陆相是望塵莫及的，他完全是在部內死硬分子操縱下进行活动的一

个傀儡，所以在新內閣中，政府和陆軍的分岐十分显著，关于"滿蒙"問題，陆軍也不考虑政府的意圖，而采取了过激的意見和行动。

若槻內閣从前任內閣繼承过来的大問題，就是官吏的减薪和軍制改革。其中，官吏减薪方案，如前章所述，由于引起了極大的反对运动，因而改变了它的內容实質，在同年5月公布了。关于軍制改革的問題，最初是因为世界輿論繼裁减海軍之后又要求裁减陆軍，而在国內这种要求也日益高漲，因此当局企圖以陆軍軍备合理化的形式来迴避这种要求，而对軍备进行近代化的改編。然而从軍部决心用武力解决"滿蒙"問題以后，軍制改革的內容逐漸起了变化，其主要目的是把落后的陆軍編制和装备改进到足以应付近代战爭的水平。从三月事件前后，这一軍制改革方案就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但是以扩充航空队、坦克以及加强駐朝鮮部队为內容的这一改革方案，需要增撥許多經費，因此很难取得正在憂虑不景气的政府的同意。但是在7月1日，陆軍未經政府同意，就擅自公布了軍制改革草案，因而进一步加剧了它和政府之間的分歧。8月4日，南陆相在师团長会議上的訓詞中更暗示了用武力解决"滿蒙"問題的必要。这一点引起了报紙以及各方面的極大重視。陆相的这个訓詞虽然成了很大的政治問題，但并不只是陆相，就是各地的团管区司令和配屬軍官等也是一遇机会就叫嚣要用实力解决"滿蒙"問題，这样，到了1931年夏天，陆軍要出兵"滿蒙"的謠言就傳遍了全国。于是，政府和重臣們为了防止陆軍在沒有立即开战信心的現状下采取过激行动，曾經进行了活动，然而陆軍对于"滿蒙"問題的态度却愈来愈强硬了。

同年8月間，在"滿洲"西北部的偏僻地区，發生了日本軍事偵探中村大尉及其同行者一名在乔装偵查中被地方軍閥的軍队杀死的事件。一直在寻找机会的陆軍，就把"中村大尉事件"当作最好的借口，除了在当地向張学良提出了强硬要求，同时还在国內展

开了大規模的宣傳。很明显，陆軍是把中村大尉事件作为导火綫，要在"滿洲"燃起战火。但是政府和政党对于軍部的强硬态度，却在袖手旁观。和具有相当强大政治力的浜口前首相比，若槻首相显然不如，他对于陆軍毫无办法；南陆相在內閣会議上也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見，陆軍已不再把政府放在眼里而一意孤行起来了。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

柳条沟的爆炸声

从1931年夏天起，在日本国內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間就开始了秘密地交談着这样話头："'滿洲'最近将会發生事情"、"关东軍一定要搞一下"。到了9月，关东軍的兵力調动和演習愈益活跃起来，而中央和現地之間，人員和电报的往返也十分頻繁。南滿鉄路沿綫地带籠罩着恐怖的气氛，附近的居民都預感到将要發生战爭而惶恐不安，日本右翼浪人和鑽营牟利之輩相繼涌向"滿洲"。9月14日，参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少将，为了向关东軍傳达陆軍大臣的密令，从东京出發前往滿洲。他的使命据傳說是制止已經半公开的陆軍"滿洲"的策謀。但是建川少将本人和参謀次長二宫治重中将、陆軍省軍务局長小磯国昭中将等都是被目为在"滿洲"制造事件的中心人物。果然，于9月18日到达沈阳的建川少将，根本也不打算向关东軍司令部傳达紧急命令，却徑自到市內的酒楼里吃喝玩乐了一夜，而在这天晚上，事件就發生了。

9月18日夜里十点，在沈阳北郊柳条沟發生了一連串的低微的爆炸声。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种音响，注意到的人也只認为是連日进行的軍事演習而已。然而，这次槍声竟成了后来持續了十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然而在当时又有什么人預料及此呢？

的确，这次事件，比起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綫的薩腊耶沃事件，只不过是规模更小的偶然事件而已。正如后来李顿报告書所說的："9 月 18 日下午十时至十时半之間，在鉄路綫上或其附近，曾發生过爆炸一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卽使这对鉄路稍有所損伤，也并未妨碍从長春开出的南下列車的正点到达。仅仅这件事并不能构成軍事行动的正当理由"。这次爆炸对于南滿鉄路綫并未給予任何实际的損害。什么人，为什么搞了这次爆炸，一切都不了然，卽使明了，也决不是足以产生"滿洲"事变这样严重后果的事件。尽管如此，这次爆炸竟使在"滿洲"的日本軍队，用比較經过充分准备的非常演習更快的速度一齐开始了行动。爆炸事件發生后一小时，駐沈阳的日本軍守备队就开始进攻現場附近的北大营兵营，当晚，駐扎"滿洲"的所有陆軍部队向沈阳、長春、四平街和公主岭等地的中国兵营进行了集中攻击。19 日清晨，就已經在沈阳城头上悬起了日本国旗，就在当日內，日軍全部控制了南滿鉄路沿綫，至 23 日已占領了較远的吉林。至 21 日，駐朝鮮軍的一个旅团并未接到敕令，仅凴駐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将擅自下的命令，就越过鴨綠江，来到了"滿洲"。事件發生后 5 日以內，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部分已被日本軍队占領。事件爆發的当时，在"滿洲"的日本兵力是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共一万四千人，事件爆發后，加上从朝鮮越境而来的一个旅团也不过一万五千人，但是由于事先进行了徹底的攻击訓練和奇襲的完全成功，因而一举粉碎了几乎沒有抵抗的十万人的張学良軍队。

事件發生的消息，尤其是日本軍队迅速地占領了"南滿"的消息，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日本政府在 19 日匆匆召开內閣会議，暫时决定了不扩大事件的方針，对前綫及在外机关發出了內部指示說："应尽量不使局面扩大，根据在我軍保持优势的战綫上停止行动的方針进行处理"。但是，在現地軍事行动迅速發展的事实前

面，若槻首相和幣原外相等的政府，茫然若失，虽然連日召开紧急內閣会議，但对于解决这一事件却未能采取任何积極措施。在21日的內閣会議上，南陆相提議向“滿洲”增兵，但是遭到了幣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然而，駐朝鮮日軍却不等政府的决定就擅自越过国境进入了“滿洲”。22日，陆相在內閣会議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內閣不得已只得予以事后承認。直到24日，政府才發表一項声明，表明了初步的态度，并决定了就地解决这一事件的不扩大方針。但是政府的决定，对于軍部和現地軍人并沒有任何权威。关东軍更加活跃地扩大了行动范圍，在10月8日轟炸了錦州，并进而把兵力向“北滿”推进，而于11月19日占領了齐齐哈尔。由政府內定的“不扩大”的界綫，逐日受到修改。軍事局势的發展，对国內外完全暴露了外交与軍事的不統一以及政府政治力量的薄弱。政府只有追随軍部，軍部中央又只有追随关东軍而已。

各国的反应

9月18日的事件在次日傳遍了全世界。这一天，在日內瓦召开的第十二次国际联盟大会正要閉幕，下午召开了第六十五次理事会。日本和中国的代表先就这一事件向理事会作了第一次报告。接着在21日，中国代表把这一事件作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正式向国联提出控訴。22日，国联向两国發出同样內容的通牒，劝告两国要努力不扩大事件和立即撤退双方軍队。对此，日本政府在23日發表声明說：“它对‘滿洲’并无任何領土野心，并将尽快地把軍队撤至鉄路附屬地区。”这一表示初步地得到了国际联盟的諒解。接着在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包括日本在內，一致通过了关于不扩大事件的决議。日本政府用自己的声明和自己签了字的决議向世界保証了不扩大事件和迅速撤兵。然而，事态却超越了日本的外交而向前發展了。10月8日，日軍对錦州的轟炸，使国联的空

气紧張起来;在10月15日通过邀請美国代表参加国联的决議时,日本开始陷于孤立了。接着在11月16日,国联以十三比一通过了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决議。但是,国际联盟所以对日本采取了这种强硬态度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背信弃义在小国之間引起了强烈的憤怒,如果在"滿洲"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美国和英国不参加,它就沒有实力可以作为后盾。因此,国联很重視美国的态度,首先作出了邀請美国以观察員的資格参加的决定。

事件發生后的9月22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駐美国大使出淵提出了照会,但是由于美国方面把事件看作是現地軍人的过激行动,并相信日本政府将会尽力收拾局面,这个照会本身是極其无力的。尤其是史汀生本人把事件看作是日本两派势力的冲突,他甚至說:"我們相信把事件交給日本外务省和幣原外相去自由处理是适当的",基本上相信了日本政府不扩大事件的方針。然而,日本軍事行动的进展,特别是10月8日对錦州的轟炸,使美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以九国公約及凱洛格非战公約的保衛者自居的美国,对于日本利用軍事行动破坏势力均衡的行徑,表示了强硬态度。尤其是当它看到从对于危机以后的美国更加重要了的"滿洲"市場上被驅逐出来的危險已經非常明显以后,它的态度就越發强硬了。于是,在1月7日,美国以国务卿的声明宣布了对于日本在"滿洲"的行动采取"不承認主义"的原則。但是以史汀生主义著称的这个声明,由于危机爆發以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占了优势的影响,这一"不承認主义"的原則也只是停留在一紙宣言上面,而并未变成积極干涉日本行动的具体措施。

英国的态度則更为消極。从1927年起就在远东政策上显然采取了和美国对立立場的英国,对于"滿洲"問題,也未采取一致的步調。在中国本部拥有巨大利权的英国,并不和美国那样地坚持条約的規定。它对于利害关系的态度是更加現实的。英国認为可以

容忍"滿洲"作为銷納威脅自己利权的日本武力的地区。因此，只要日本把它的行动限制在"滿洲"地区內，英国就准备加以默認。对于史汀生的声明，英国政府在1月11日發表了一項声明說：日本政府既已声明坚决执行門戶开放政策，并欢迎各国参加和协助"滿洲"的各項事业，那么，"就沒有必要再向日本政府提出某种形式的照会"。因此，英国勿宁說是采取了庇护日本的态度，它和美国的对立也就越發加深了。

国际联盟只是反复地举行会議和發表声明而无能为力，英国和美国的步調又不一致，因此，日本占領"滿洲"的行动，在国际上沒有遇到强有力的阻碍。占領了齐齐哈尔并从而控制了"北滿"黑龙江省一带的日軍，更得到了从日本国內和駐朝鮮部队的增援，于12月22日，由关东軍發表了"討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开始了辽西战役，并于1932年1月3日占領了中国在"滿洲"的最后据点錦州。仅仅用三个多月的軍事行动，日軍就完全控制了东三省。日本能够迅速地占領了东北全境，固然是由于它利用了英美两国在远东政策上互相对立的有利形势，但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更加重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国內的情况。如前所述，武汉政府崩潰后，进入了和国民党政府公开斗爭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紅軍和苏区的壮大發展，建立了以江西为中心的广大中央苏区，这是拥有三百余县和数千万人口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說，苏区的發展，是比日本侵占"滿洲"更为严重的威脅。因此，蔣介石从1930年12月起开始了全面的武装"討伐"，从1931年5月至9月之間，出动了三十万以上的軍队进行了大規模的包圍战，但結果却被徹底粉碎了。"九•一八"事变爆發后，尽管經过張学良的請求，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日本發出一兵，反而对共产党展开了第五次大"圍剿"战役。中国方面的这种政治分裂和軍事軟弱，使得日本軍队的行动輕松容易，如入无人之境，东北軍閥，据說是由

于国民党政府的收拾軍閥的政策而被遺弃在日軍的面前。

第二个条件是苏联的發展和列强对于这种發展的恐惧。帝国主义各国对于順利地实現着第一个五年計划、把世界經济危机拋在一边不断壮大發展的苏联的实力，已經开始感到了恐惧。特別是中国革命在苏联的影响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使得帝国主义各国，为了确保中国这塊殖民地，对于如何杜絕苏联的影响和威胁的問題，开始加以最大的关注。日本占領“滿洲”，固然意味着縮減各国的市場；然而在其筑成帝国主义各国对付苏联的桥头堡这一点上，它們發現有更大的意义。日本的行动所以能够未受各国的干涉而取得成功，就是由于这許許多多的国际条件起了巨大作用。

重新禁止黃金出口和犬养內閣的成立

侵占滿洲，是日本的政治家和資本家为了夺取国外壟断市場，以便摆脫已經發展到崩潰边緣的資本主义危机，为了用武裝占領来打开經营“滿洲”的絕路，为了把危机和随着危机而来的合理化政策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貧困和不滿轉向对外战爭，为了这一切而必然选擇的道路。虽然他們对于軍部在侵占的时間和手段上的独断專行不能不感到很大憂虑，然而在其根本方針上，对于侵占“滿洲”，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政府在事变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某些异議，但最后还是追随了軍部，把确保“滿洲”当作了国策来加以执行。不仅如此，对外必須强占“滿洲”的日本資本主义，在国內也不得不准备改变政策，采取作为新的剝削方式的通貨膨脹政策。他們在这以前采取了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和通貨收縮政策，作为摆脫金融危机的对策，但是，同样为了資本家的利益，又需要重新禁止黃金輸出和实行通貨膨脹政策了。促使这种轉变的原因，就是由英国带头实行的各国停止金本位制和“九·一八”事变的爆發。

1931年7月，使德国遭到破产的金融危机愈来愈趋于深刻；为防止破产而作拼命掙扎的英国，在工党内閣总辞职以后成立了举国一致的內閣，新內閣于1931年9月21日向全世界宣布了停止金本位制。这是在柳条沟爆炸事件發生后的第三天。这一消息使世界的金融市場陷于混乱，許多国家相繼放弃了金本位，这件事也給予了日本以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說，已經有人預料到，日本迟早也要重新实行禁止黄金的輸出，大財閥的銀行預計到重行禁止黄金出口可能带来的莫大利益而瘋狂地进行搶購美元証券。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謂財閥的"搶購美元"。这种"搶購美元"是在財閥和政府互相勾結之下进行的。屬于財閥的各大銀行、公司，不顧国民的貧困，从中攫取了極大的暴利。1930年7月，倫敦条約批准問題發生以后，正金銀行的美元統制銷售額，如下表所示，共达七万六千万日圓之多，其中，仅在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屬于各財閥系統的銀行、公司就一共購买了价値一亿三千万日圓以上的美元，包括：住友銀行的四千万日圓、三井銀行的四千五百万日圓，三菱銀行二千万日圓，三井物产公司的三千万日圓。

正金銀行的美元統制銷售額及其內容

購买者	購入金額(百万日圓)
外国銀行	313 (41%)
財閥系統銀行公司	226 (30%)
住友銀行	64
三井銀行	56
三菱銀行	53
三井物产	40
三井信托	13
朝鮮銀行	34 (4%)
其他	187 (25%)
总計	760(100%)

这种"搶購美元"在国民各阶層之間引起了極大的憤怒。軍部、右翼团体就巧妙地利用国民的这种憤怒来扩張自己的势力。

这种"搶購美元"所引起的黄金出口，在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更加严重起来，以致日本国內的金融

情况日趋紧張，这就使得在深刻的不景气中挣扎着的产业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种經济危机造成了極大的政治危机，为了突破危机，壟断資本也感到需要禁止黃金出口而重新采取通貨膨脹的政策。同时，由于世界經济危机，特别是由于中国的銀价暴落而受到重大打击的日本的主要輸出业紡織业，又因英国放弃金本位以后英国棉制品大量涌向远东市場，而受到了最严重的損失。因此，他們就拼命要求断然实行重新禁止黃金出口来降低外匯率和大力进行商品傾銷，以便打开一条出路。前面已經說过，浜口內閣当初的計划，在严重危机中已經推行不动它的头一个招牌"紧縮財政"，由于"对官吏的减薪"所引起的下級官吏的抵抗、倫敦条約問題所引起的軍部增加軍費的要求和应付不景气的开支等等，实际上，財政开支已在逐年膨脹，通貨紧縮政策已經不能不由政府自己来加以廢弃了。侵占"滿洲"以后，軍部所提出的龐大的軍費要求，使得通过重新禁止黃金出口来改行通貨膨脹政策已經成了必然的趋势。

資本家的这种强烈要求，表現为同年 11 月 10 日在野党政友会的"要求重新禁止黃金輸出"的声明。两任民政党內閣为了擺脫經济危机而采取的合理化——通貨紧縮政策，已經到达了極限；資产阶級在新的局面下，又在要求新的政策了。

此外，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的發展和幣原外交之間的矛盾、井上財政的碰壁、国民对于政府的不景气对策的不信任，使若槻內閣發生了动搖。九·一八事变以后內閣的施政，一再地表現了政治力量的薄弱。不滿这种傾向的一部分政党人士，受到英国成立举国一致內閣的影响，提出了成立"适应非常事态的联合內閣"的主張。提出这种主張的是代表新兴的康采恩日产的鮎川义介的姻兄——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和民政党的內务相安达謙藏等人。尤其是若槻內閣的重要閣員安达謙藏內务相，对于以若槻首相、井

上藏相、幣原外相等为代表的这个內閣的施政方向，心怀不滿，他与荒木中将等陆軍革新派以及在野党的干部床次竹二郎、久原房之助等人相呼应，極力主張成立联合內閣。安达派的企圖是要把快要寿終正寢的以若槻为首的民政党內閣加以結束，而和政友会携起手来掌握政局的主导权，如其可能，即担任下届內閣。然而，在政友会內部，森恪、鈴木喜三郎等人却坚持主張要由政友会独自担当下届內閣，并得到了犬养总裁的賛同，因而联合內閣运动未能成功。不管怎样，由于安达內务相的活动，使內閣發生了不統一的現象，从而給民政党內閣带来了从內部瓦解的結果，它終于在12月11日实行了总辞职。其結果，直接促成这次政变的民政党內的联合內閣主張者安达謙藏、中野正剛等人退出了民政党，而另行組織了头一个持有法西斯主义主張的政党——国民同盟。但是，政友会对此并未理睬，而于第三天的13日，組成了由政友会單独执政的犬养內閣。犬养內閣終于成了最后的一个政党內閣，这个內閣早在組閣时，就不能不起用軍部革新派的代表人物荒木貞夫中将为陆相，不能不起用积極主張向大陆扩張的森恪为書記官長等，来討好軍部和右翼势力，从而暴露了它的軟弱无力。

果然不出所料，新內閣在組閣的当天就宣布了禁止黃金輸出，迈出了改变政策的第一步，接着又下令停止兌現，轉向实行通貨膨脹政策。在合理化政策已經行不通，侵略"滿洲"有了新的开展等情况下，为了适应資产阶級改变政策的要求应运而生的犬养內閣，虽然和以軍部为首的急进势力之間，还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但是它全面地修改了民政党的政策，并采取了支持和推进九·一八事变的方針。原来是少数党的政友会，在第六十届議会一开始就宣布解散議会，在竞选中提出克服不景气的口号，获得了多数选票，議席由一百七十一席一跃而增加到三百零三席；而民政党則由二百四十七席銳減为一百四十六席。这样，犬养內閣就在議会中

拥有了絕对多数而推行了通貨膨脹政策，其中包括由于九·一八事变而引起的龐大的临时軍費的开支在內。

一·二八事件

日本輕易地占領了"滿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別是日本陆軍在"滿洲"的"輝煌"成功，及其取得了龐大的临时軍費，深深地刺激了經常与陆軍对立的日本海軍，使得海軍也企圖在"屬于它的势力范圍以內"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張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軍的这种野心。九·一八事变当时，在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覚悟程度較高的工人和学生的上海，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况最为激烈。上海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9月22日，就召开了大規模的抗日大会，組織了抗日救国会，从此以后，抗日示威运动和集会活动，日益高漲起来。这种趋向使日本的侨民、駐华外交机关以及海軍陆战队等陷于神經过敏。1932年1月18日，發生了伤害日本僧侶事件，同月20日，日本侨民召开大会，以这一事件为借口作出決議，要求日本派遣陆軍来上海保护侨民。在此以前，日本海軍駐在長江沿岸各地的，是以炮艦为主力的第一派遣艦队，在21日，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决定增派巡洋艦大井号及第十五驅逐队(驅逐艦四艘)，这支艦队于23日开到上海，并使特别陆战队登陆。接着又于1月28日派出第二批陆战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里一共集中了陆战队二千八百名。日方就以这支武力为背景，借口伤害僧侶事件，向上海市当局提出了撤退軍队及其他要求。另外，日本方面当天还片面地發出通告，要把陆战队的警备区域扩大到日本租界以外，并从29日上午零时起进行布署，并且还沒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答复就执行了这一决定。由于这种原故，在当天夜里担任警备北四川路附近地段的中国軍队和侵入到这里来的日本陆战队之間發生了冲突，双方的战斗开始

了。

战斗是以巷战开始的，到了拂曉，日本方面从航空母艦上出动飞机，开始轟炸市区。但是，日本海軍陆战队却立即陷入恶战苦斗的状态。当时防守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軍，不同于从中国东北敗退的地方軍閥的軍队，这支軍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識，而且在战斗中还得到了上海的工人和市民的热烈支援；因此，日本在估計上犯了很大的錯誤。而且，当时上海还存在着各国的許多权益，在各国外交团出面調停下，双方签訂了临时停战协定。然而停战并非是日方的本意。当时駐上海的日本海軍最高指揮官野村中将在报告中說："对于停战談判暫时采取敷衍态度，以避免刺激英美的神經。等待陆軍开到以后，再發揮我軍的威力，把禍根徹底鏟除，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总之，等待陆軍开到后，給中国軍队以沉重打击，乃是必要的。"（"原田日記"第二卷）果然不錯，在2月3日的日本內閣会議上，决定了出兵，到了7日，很快地就派出一个混成旅团的陆軍在上海吳淞附近登陆，从背后向十九路軍展开了攻击。接着在2月13日，主力部队的第九师团也开到上海，并开始了总攻击。但是，尽管陆軍开到了上海，却并未能給予中国軍队以沉重打击。中国軍队的抵抗意外地坚强，迫使日本軍队停留在海岸沟渠地带，不得前进一步。于是，日本方面又編成了大規模的派遣軍，以白川义則大将为司令官，率領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团开到上海，并使用了飞机和艦炮等新式武器的全部力量繼續向中国軍队进行攻击，这样，至3月1日才勉强攻占了上海的北郊一带。

犬养內閣和芳澤外务相对一·二八事件的态度，比九·一八事变爆發时感到狼狽的若槻內閣和幣原外务相更为积極。派遣到上海的陆軍有三个半师团、海軍軍艦十几艘，超过了在占領中国东北时的兵力一倍以上。然而战局的發展，却完全与侵占中国东北时相反，日軍一直处于恶战苦斗中，他們不仅受到中国軍队的

頑强抵抗，而且还受到了全上海民众的頑强抵抗，取得其所預期的侵略成果的希望被徹底粉碎了。而且在上海存在着列强不允許日本的独占性軍事行动的許多客观原因。各国的輿論譴責了日本的行动，英美两国也都强烈地反对日本向它們許多权益所在的長江流域进行軍事扩張。2月2日，英、美、法三国的駐华大使，提出了共同調停方案，之后又累次劝告停战，提議設置緩冲地带等等，并反复地对日本的行动提出抗議。2月24日，如前所述，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發表了对日声明，3月3日在日內瓦召开了国际联盟会議，就中日糾紛問題进行了討論。国际形势的不利和战局的胶着，挫折了日本継續战斗的意志。3月3日，战局基本上出現了可以不失体面地实行停战的状态，日本上海派遣軍就利用这个机会發表了停战声明，重新开始了以各国外交团为調停者的停战談判。以后，关于两軍停战的談判，一直不能順利进展，并曾多次地發生了中断情况，但是沒有完全决裂，至5月5日終于正式簽訂了中日停战协定，日本从上海撤兵，結束了淞沪战役。

在淞沪战役中日本所以失敗，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抵抗，特别是站在最前綫的十九路軍的英勇善战。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政府仍然抱着不抵抗主义，不仅沒有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反而采取了利用日軍来消灭受共产党影响較深的十九路軍的方針，对前綫部队沒有給予任何支援。然而，与国民党政府恰恰相反，各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們，热烈地支援了十九路軍，不仅贈送慰問品和給予鼓励，也有很多人当了义勇軍；在这种鼓励下，前綫部队也愈战愈勇，把具有远为优越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日本軍队，拦阻在海岸一带，不得越雷池一步。軍事上的失敗使軍部丧失信心，这就使得它此后暫时放弃了侵略中国本部的念头而專心从事經营"滿洲"和华北。列强的强硬干涉，也是促成日本失敗的原因之一。当时，日本的統治阶級还沒有甘冒战爭的危險来同英、美对抗的信心。随着战爭

的进展，国内的元老、重臣等宫廷势力和財閥的代表等，为了阻止使国际关系陷于危局的軍事行动，一再对軍部采取了箝制的态度。日本人民也决不贊成这种无法无天的侵略战爭。觉悟了的工人阶級虽然处于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鎮压下，还是勇敢地坚持了反战斗爭，在一·二八事件中，他們还同中国的反侵略斗爭携起手来，結成共同战綫，进行了斗爭。一般群众也怀疑出兵的目的，就連曾經歌頌过九·一八事变的大报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意上海事件。由于內外形势的不利和軍事上的失敗，使得野心勃勃的軍部也不得不暫时停止进行侵略战爭了。

“滿洲国”的建立

1932年1月3日占領了錦州，从而初步完成了对东北全境的軍事占領的关东軍，为了进一步建立其完全的統治，开始推行了在“滿洲”建立一个“独立国”的計划。关于实現“滿洲独立”的构想，早在事变爆發前已为軍部和一部分右翼分子所倡导，而在現地的关东軍参謀部和特务机关以及滿鉄的情报机关等組織，也一直为此进行了策划。事变爆發以后，这些机关和日本浪人、阴謀家等，便立即一齐开始活动，在特务机关長土肥原賢二大校的操縱下，首先在沈阳成立了“自治政府”，之后，随着日本軍事行动的进展，在辽宁、吉林各省相繼成立了“自治政权”。这些“政权”的名义上的領袖，大多数是为了保持其地盘而和日本軍部勾結的地方軍閥和失意的前清的旧官僚等等，都是一些完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家伙。同时，在各地相繼成立的这些“自治机关”，虽說都是完全受日本政府的支配，但关东軍、特务机关、滿鉄等都各按照自己的打算，根据各自不同的計划来行事，而右翼浪人也利用这种局面，从中漁利，結果形成了沒有統一对策的混乱状态。但随着事变的發展，支配权逐漸集中于关东軍，由于軍事行动的成功而增强了信心的

軍部，根本不理会政府的态度如何，而独断專行地开始推行其实現"滿洲独立"的計划了。

早在1931年10月前后，国內外就已經知道关东軍在筹划"滿洲独立"。最初，日本政府对于处理"滿洲"問題并无成算，既然向世界声明了"无領土野心"因此也不能不对国际关系有所顧慮，从而，对現地局势的發展保持了警惕。但是，政府并沒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制止乘势前进的現地軍事机关的計划，对于"建国"工作的推行，也只有袖手旁观而已。犬养內閣成立后，政府本身对軍部的行动，显然有了贊同的迹象，对关东軍的計划，完全采取了默許的态度。

就在这个时候劫持前清朝皇帝溥仪的計划搞成功了，加之李頓調查团的前来，促使了駐在当地的关东軍决心建立一个"独立国"。当时軍部感到只是利用旧軍閥的殘余和早已被人遺忘了的前清朝官員，还不足以构成建立"独立国"的理由，于是，便注意到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清朝皇帝溥仪，而不顧一切地把他弄到"滿洲"。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在1932年初，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日本所强調的"滿洲"的特殊情况，决定在作出結論之前，派遣調查团前往"滿洲"，并組織了一个李頓調查团。而为了在李頓調查团預定到来的4月以前，在"滿洲"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便为日本駐兵提供理由，軍部也認为有必要使"滿洲"脫离中国。

这种由关东軍主持的成立"独立国"的計划进行得很快，而于3月1日，以"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一类的漂亮字样为綱領，成立了"滿洲国"。溥仪以执政的名义登上了元首地位，前清朝官員郑孝胥、地方軍閥头子張景惠、張海鵬等，都被安置在主要地位。然而，所謂"独立国"，只是有名无实的伪組織而已。

第三节　五·一五事件

日本的右翼

九·一八事变助长了日本的右翼运动。軍部中的革新派和国家主义者，趁着因事变的發展而高漲起来的軍国主义的浪潮，开始活跃起来，而国家主义运动的發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从明治初年以来就有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团体，这些团体在明治和大正时代，仅是在政界的內部进行活动的幕后势力，并沒有直接影响社会的力量。到了大正年間，由于資本主义矛盾的加深，社会运动蓬勃地發展起来，于是，就出現了以对抗社会运动为宗旨的防止赤化团、国粹会等反动組織。然而这些組織也无非是一些为了謀取利权和生活費的賭徒和暴徒帮会組織。近代的国家主义运动的萌芽，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資本主义發生了全面的危机以后才出現。在1918年的米騷动事件發生后，紧接着組織起来的老壮会，反映了这种时代的动向；它是由堺利彥、高畠素之等左翼变节者，北一輝、大川周明等旧右翼中的进步分子以及大井宪太郎、中野正剛等政党的右派，再加上其他資本家和軍人等共同組成的新的右翼势力的一个組織，也是以后国家主义运动中各种派系的起点。然而，这个老壮会仅仅是一个缺乏实踐性的社交性的团体，因此不久便解散了。但是以它为母体产生了北一輝的犹存社、大川周明的行地社、高畠素之的經倫学盟、赤尾敏的建国会等。这些团体，也是以个人的結合为中心，在社会上沒有基础，其活动范圍也仅限于街头，除了对政界的上層人物进行一些幕后活动以外，还不可能成長为較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国家主义运动，是在以危机后阶級斗爭的尖銳化和革命的高潮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因危机而走向沒落的小資产

阶級的拥护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的。法西斯党徒眼看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夺取了政权和德国納粹党的抬头，并且对現有的一些"爱国"团体仅仅是些封建奴才性質的暴徒組織表示不滿，于是便利用三·一五、四·一六等政府对革命实行大規模鎮压的机会，立即着手組織国家主义的群众性組織。1929 年，高畠素之、津久井龙雄等組成了急进爱国党，其綱領是："一、在天皇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忠实地代表全日本广大群众，为拥护和發展这种思想而努力；二、認清作为国际无产者的日本的地位，在消除国內的阶級对立的同时，在国际上力求大發展"；为了夺取工会，他們还組織了一个下層組織——急进爱国工人联盟。次年春季，天野辰夫、大川周明等所組織的爱国劳动党和它的前哨組織——爱国无产青年同盟也成立了。至 1931 年，为了把各自分散的国家主义各团体統一起来，行地社、急进爱国党、建国会等組織合并起来組成了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爭协議会(日协)；同时，黑龙会、日本国民党、大日本青年党以及大阪、京都等地的右翼工会等也統一起来，組成了大日本生产党。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爭协議会提出了"一、消灭議会政治，二、打倒資本主义，三、克服国內的阶級对立和發揚国威"等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的口号，而实际上采取了一套法西斯的作法；大日本生产党则以"君民一致、实現自給自足經济"为政治綱領，表現出濃厚的日本主义的色彩。此二者不論哪一方，旣然是具有这样組織、提出这样綱領的国家主义运动，实际上就不可能把工人群众組織起来，最多不过拉攏几个腐敗的工人貴族或御用工会的干部，以及扮演破坏罢工运动的暴徒組織的角色而已。在 1932 年在犬养內閣下举行的第二次普选中，国家主义者为了与广大群众建立联系并大事發展，曾提出了多数候选人参加竞选，但結果遭到了慘敗，这就充分說明了上述情况。

这样，向广大劳动群众中推行国家主义运动的企圖，只是倚在

口头宣傳上，而未能收到任何成果，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爭协議会和大日本生产党等組織，絲毫未能發展。这一运动的实际作用，勿宁說是通过犹存社、行地社系統的活动，对政界、財界和官僚、軍部的內部給予了影响，为官方法西斯主义培养了馬前卒而已。特别是北一輝通过西田税等人的关系，在陆海軍的中坚層軍官中，为他的著作“日本改造法大綱”得到了狂热的信徒；而大川周明則通过他的社会关系与政界、財界、軍部等上層进行了联系。

十月事件

当时，在軍部中，这种具有新的意义的国家主义思想抬头了。关于櫻会的成立和三月事件，前面已經說过，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發生，越發使軍部的革新派走向了阴謀和冒險的道路。在三月事件中失敗了的櫻会的桥本中校、長少校和大川周明等人，立即开始策划卷土重来。作为三月事件的繼續而發生的事件，一个是同年9月以关东軍参謀将校为中心而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另一个是同年10月企圖对国內进行改造的所謂十月事件。他們在主張民族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提出对外强硬論也是势所必然，因而在国防上經常强調占領“滿洲”的必要，同时，为使国內一新耳目而策划对外使用武力，也是很自然的。根据远东国际軍事法庭的徹底揭露，九·一八事变是以关东軍参謀部为中心，由沈阳特务机关長土肥原賢二和桥本、長等人进行了周密的計划安排，象首先于9月18日制造鉄道爆破事件，然后于次日占領沈阳、長春的一出按照脚本演出的戏剧。由于前章所述的客观条件具备，使这一事变能够完全按照他們的意圖进行了。

8月初，櫻会在东京召开了有关“滿洲問題”的集会，为适应必然發生事变的情况作好准备，进一步策划立即利用事变来發动政变。駐在北京的長勇，在事变一爆發立即偷偷地回到东京，隐藏在

筑地的花酒館金龙亭里，并以此为本部，开始进行准备，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根本博、影佐禎昭等校官級的許多会員以及以大川周明为中心的屬于行地社系統的民間人士参加了这一工作。他們制訂了政变的具体計划：企圖以事变爆發后一个月的10月18日为期，暗杀若槻首相、幣原外相、牧野內大臣等，同时使东京陷于混乱，然后出动軍队，發布戒严令，組織新內閣，实現民族社会主义政策，并預定以荒木貞夫为內閣首相，大川、桥本、建川、長等人为閣員。据說在准备政变期間，他們始終住在花酒館里，連日倚偎美妓，举行盛宴，儼然以維新志士自居，这引起了純眞的尉官級青年軍官的憤慨，他們全部退出而另外組織了皇道派，开始了独自的活动。他們的活动資金几乎全部是与財界上層有联系的大川筹措的。政变計划在即将实行以前泄漏了，通过参謀本部作战科長今村上校，为陆相以下軍部首脑所获悉，三月事件后暫时采取了現实路綫的軍首脑部乃下令逮捕桥本、長等人，防止了这次政变的發生。但是，对于和事件有关的人員却絲毫沒有进行处分，与三月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只是将中心人物左迁至外地而已。

由于这次十月事件的失敗樱会是瓦解了，但正如若槻礼次郎在远东国际軍事法庭上作証时所說的，这次事件对于在若槻內閣总辞职前后所实行的政策的巨大轉变，起了極大的影响；在标榜着积極政策而上台的犬养內閣中，荒木新陆相即以这次事件的压力为背景，他的发言权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都說明了十月事件的重要意义。

由于十月事件的失敗，在軍部內發生了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对立。成为三月、十月两次事件的核心分子的陆軍参謀本部等中央机关的校官級軍官，大部分放弃了实現可能性不大的通过政变来改造国家的計划。因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內局势已使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权驟然增强，从而加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不發

动危险的政变，也可能逐漸达到扩充軍备和实現“国防国家”的目的。因此，他們即开始与中央各机关中新近抬头的革新派官僚、代表新兴康采恩势力的鮎川义介、森矗昶以及宮庭里的革新分子近衛文麿、木戶幸一等青年貴族加强了联系，并通过金鷄学院、国維会以及近衛的早餐会等集会进行研究具体的改造計划。和这一派相反，以尉官为主的青年軍官，由于他們的純眞和單純，激烈地反对与財閥官僚的联系，并由于他們那种更加缺乏理性的观念主义作祟，仍然沒有放弃采取武力行动的計划。因此，他們与北一輝等人的关系愈益加深，从他們的精神主义傾向出發，拥戴荒木貞夫、眞崎甚三郎两大将为首領。这后一派根据它的理念被称为皇道派，而前一派則为了鎮压皇道派，經常主張在陆軍中保持統制，所以被称为統制派。但是，这两派的对立，使右翼陣营中策划武裝政变的核心——軍部革新派的行动一时陷于停滞状态，而民間右翼团体中的急进派却站到了行动的前列，相繼發动了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

血盟团事件

1932年2月9日，在犬养內閣下举行的普选中各派竞选活动正达高潮的时候，在野党民政党的选举对策委員長前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在其临时講演会場东京本乡区的小学校里，被茨城县的一个农村青年小沼正刺杀了。不久，在3月5日，三井財閥的总管、財界巨头、三井合股公司理事長团琢磨在三井銀行总行前被同样人物菱沼五郎所槍杀。經警視厅对上述两名凶手的审訊，眞相已經大白；在其背后存在着具有一系列暗杀計划的秘密团体“血盟团”，其首領井上日召及党徒十余人都被逮捕了。“血盟团”是以井上日召为首的十三人的恐怖組織，按照其一人杀一人的方針，除了井上、团以外，还企圖暗杀池田成彬、西园寺公望、若槻礼次郎、乡

誠之助等政界、財界的有势力人物，幷企图"打倒政党、財閥及特权阶級等旧势力"。"血盟团"的首領井上日召出生于农村医生的家庭，由專門学校中途退学后，曾到"滿洲"流浪，归国后成为日蓮宗①的热烈的信徒，在茨城县农村建立正护国堂幷隐居于此。这期間，他受到前宮內大臣田中光显的照顧；由于目睹农村的貧困而抱有强烈的革新思想；同时也和大川周明以及附近的土浦航空队的軍官接近；吸收了一些热心的追随者幷給予他們以个人的感化。他的出身經历表明，他的思想显然具有农民的色彩，反映了走向沒落的农村小資产阶級的不安情緒。他曾說："統治阶級只知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們不懂得仁爱，即使看到农民死在路上，也无动于衷"，"为使統治阶級醒悟过来，必須給他們当头一棒"，"我們最終必須坚决成为英勇的牺牲者"（公审时的供詞）。从他这种話里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行动是單純的、唯心的、而且是农村中心主义的。"血盟团"十三名团員都是受过他个人感化的农村出身者，例如，小沼在暗杀井上之后陈述理由时說："农村的貧困状况令人目不忍睹，这都是因为前任大藏相的方針不好而造成的"。

"血盟团事件"是右翼分子所干的第一次有組織的恐怖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与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比較起来，是一种规模小、缺乏理智和計划性的單純的凶杀行为，但是，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却給予了政界財界上層人物以巨大的震动，也使国民开始感到法西斯主义日益追近而深为不安。

五·一五事件

在"血盟团事件"还記忆犹新的同年5月15日，由于在上海实現了停战，人心剛剛要安定下来的时候，又爆發了一个震动社会的

① 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为日蓮法师（1222—1282）所創始。——譯者

事件。当天白晝，一队海陆軍軍人分为四部分，分别襲击了首相官邸、牧野內大臣官邸、警視厅、政友会本部、日本銀行、三菱銀行总行等地。在首相官邸，犬养首相被人用手槍击毙了，当时，他曾制止这些軍人說："你們有話尽可以說……"。在其他各处，或者开槍射击，或者向門前投擲手榴彈等等进行了示威，然后，到宪兵队去自首了。而在当天夜晚，又有几伙平民襲击了田端、鬼怒川、龟戶、鳩谷、目白、淀桥等变压所，但是未能进行任何破坏就全部被捕了。襲击首相官邸等处的是海軍中尉古賀淸志、中村义雄及三上卓等人和十二名陆軍士官学校的学生；襲击变压所的是十六名爱乡塾的学員。除了这些直接参加行动的以外，还有支援这次行动或参加策划的大川周明、头山秀三、本間宪一郎等右翼的重要人物也被捕了，爱乡塾的主持者橘孝三郎逃往"滿洲"以后，也被逮捕了。

犬养首相死后，內閣立即实行了总辞职。政友会的对策是：首先任命繼任总裁，以备組織后繼內閣。当时，政友会內部除了鈴木喜三郎、鳩山一郎、森恪等的一派以外还有床次竹二郎派、久原房之助派等等，以及岡崎邦輔、望月圭介、前田米藏等所謂老政友会派势力，他們之間忙于派系斗争，所以不难推想以后将出現混乱局面。至十七日，鈴木喜三郎接任总裁，准备組織繼任內閣。

在事件后的紧張空气中，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反对政党內閣的暗流。海軍方面因为是事件的犯人中有海軍人員，所以不便积極表示态度；陆軍方面、特别是中坚層强烈地排斥政党內閣，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內閣。在政友会內部，和軍部关系較深的森恪等人企圖以国本社的首脑平沼樞密院副議長为首相，并由在議会中占絕对多数的政友会予以支持，借此組成一个强有力的內閣，和軍部合作，积極解决"滿洲"問題。然而，民政党方面則一面标榜拥护議会政治，一面又反对政友会內閣，希望成立以在野党民政党为基

础的举国一致的內閣，并以屬于民政党的官僚伊澤多喜男为中心，为实現斋藤实組織內閣而进行了策动。

为了收拾政局，有必要以某种形式来解决政党和軍部之間的对立。然而，政友会鈴木总裁与荒木陆相举行了会晤，并似乎将要达成妥协一事，反而更加刺激了軍部的中坚層，使他們排斥政党內閣的主張越發加剧了。在此以后，元老西园寺公望为了向天皇推荐繼任首相的候补者，从兴津来到东京。他首先征求高桥临时首相、牧野內大臣、樞密院倉富議長、清浦、若槻前首相、陆海軍大臣及上原、东乡两元帅等的意見，表示了从来未有过的愼重态度，然后，推荐了海軍大将前朝鲜总督斋藤实为繼任首相。西园寺虽然不希望軍部以及接近軍部的右翼势力掌握政权；但同时，又考虑到不仅为軍部所反对，而在国民之間也失去了信任的政党的現状，因而推荐了这个稳健派的海軍軍人，企圖借此来緩和軍部和政府之間的磨擦，避免再發生五・一五之类的不幸事件，使局势能逐漸安定下来，以便渡过所謂"非常时期"。

斋藤內閣的农村对策

受命組閣的斋藤实，首先要求高桥大藏相留任并得到他的同意以后，又和政、民两党总裁会晤，要求予以支持，結果，政友会同意出閣員三名，民政党同意出閣員两名，組成了包括軍部、官僚、政党在內的举国一致的內閣。五・一五事件后經过十多天好容易才組成了后任內閣，可見統治阶級所受的震动是如何深刻。陆相一席，仍由五・一五事件的負責人荒木貞夫担任，这是为了在当时局势不稳的情况下控制青年軍官，以維持陆軍的統制。另外，屬于伊澤多喜男系的內务省官僚的代表后藤文夫就任了农相。但是內閣的主导者乃是斋藤首相、高桥藏相（政友）、山本达雄內相（民政）三長老，他們为了消弭"非常时期"而采取了妥协的、保守的政策。

由农民敢死队参加的五·一五事件一事反映出来的、严重的农业危机所引起的农村不安，其后依然繼續存在。在斋藤实內閣成立后仅仅一周的6月1日召开的第六十二次临时議会上，通过了以九·一八事变費为中心的追加預算，当时，农民也为了得到救济相繼涌到議会进行請願。这种請願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單純地要求救济农民的貧困；另一种則屬于想要借此来实現社会改革的法西斯运动，后者的核心組織就是自治农民协議会。該会是由長野朗等右翼分子組成的，是从农民本位主义的立場出發，主張共同自治、自給自足、共存共济的团体，这个組織在要求实現"农戶負債延期三年償还；每一反[1]土地补助肥料資金一元；补助移居'滿蒙'費五千万元"的口号下，在長野、新潟、茨城等十六县糾集了三万二千人的签名，然后进行了請願。从以上的口号即可看出，这一运动是与巩固耕种权、减免地租等佃戶的切身要求毫不相干的，它是为了实現中农及部分富农的要求的运动。而且根据長野朗所述，这个請願运动的目的是反击社会上对农民的輕視和争取三千万农民的团結，并沒有把重点放在請願的标語內容上（長野朗："农民請願运动的經过"，"改造"第十四卷第十期)。在此以后，又相繼發生了征得五千人签名的長野县北信不景气对策会等各县农民的請願运动，它們之間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从这些运动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战术，即："征集农民出身的士兵的签名盖章，使兵农打成一片，由各联队区加以匯总，然后再通过联队区司令官，以空前未有的隆重的方法上奏天皇"，对此，日本民族社会党給予了坚决的支持。这件事是急进法西斯主义者企圖依靠軍部来貫徹自己意圖的一种表現，同时也說明了日本急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特点。由于右翼运动的刺激，全国鎭村長会、农会長协議会也进行了

---

① 日本土地面积單位，每"反"約合九九一·七平方公尺。——譯者

請願运动。另外，全国农民协会也和全国劳农大众党結成統一战綫，到农林省提出了延期五年償付农民欠債、地租和禁止收回土地等要求。

在农民的压力下，各派农村出身的議員五十四名召开了有志議員会，对各党进行活动，并使政、民两党通过了匡救时局决議案，要求迅速召开临时議会，以便救济农村、漁村及中小工商业者的貧困。但是，这种措施只能暴露議会本身的狼狽，而問題的解决却被推到下届議会去了。对此，已經預見到农村問題难以解决的政府，在議会閉幕以后，首先主張以"自立更生"来克服不景气，并由首相亲自到街头进行宣傳。

救济农村措施在第六十三次議会上經过了討論，由这以前就主張"自力更生"的政府提出的这个方案，是以土木事业为中心的紧急对策，是一些被評为"略胜于无"的措施。方案的內容是从1932年到1934年三年間，撥出土木事业費八亿日圓（中央六亿、地方二亿），低利流通資金八亿日圓（共計十六亿），企圖以此来挽救社会的不安；其中，在用于救济农村方面的資金，1932年度是一亿三千万日圓，1933年度是一亿八千五百万日圓。在实行救济农村的同时，还使自力更生运动具体化了。这就是說，首先由內务、文部两省开展一个精神动員的运动，再由农林省实行农村經济的計划化。

这些救济农村措施的特点在于：只是对地方銀行、地主、中农等施行金融上的救济和为他們兴办土木事业，根本沒有考虑遭受危机打击最深的佃农的要求。尽管政府提出了这些措施，但仍借口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强調"自力更生"并極力压縮財政支出。配合着这种不徹底的救济措施，政府由于考虑到农民、特别是佃农和貧农因穷困可能掀起暴动的危險，而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压制。在8月举行的第六十三次議会以前，內务省警保局以在左右两翼中均

有發动群众运动的傾向为借口，除了表明它徹底“取締”請願运动的方針外，还在地方警察官会議上，也下达了徹底压制农民集体行动的命令。这个时期，除了到东京的請願运动以外，在枥木、秋田、及其他各地，还掀起了以乡公所或县政府为目标的群众运动。那就是被称为“要米会”或“口粮斗爭”之类的群众示威，这些示威运动都是和反地主斗爭結合在一起的。政府極端恐惧这种运动的發展而加强了鎭压，其中大部分都因为禁止报道而被埋沒了。

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

如上所述，以农村的不安为背景的急进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發展起来，但是到了 1932 年年底至 1933 年年初，这一运动却进入了停滞状态。其社会原因是：救济农村的工作虽然不充分但总算有些进展，以及由于这一时期米和茧都漲了价，因而使农村的不安暂时得到了緩和。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軍部首脑及中坚層的态度已趋于稳重。五・一五事件發生后，海軍方面立即發布了整飭軍紀和反对軍人干政的訓示；陆軍方面也訓戒了軍人彼此間的联系。这样一来，軍部和民間法西斯团体的关系显然趋于疏远；同时，依靠軍部發展起来的后者的势力也就很快地陷于停滞状态了。

軍部的气氛所以發生了这样变化，主要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局势下，軍部在对內对外政策上有了合法地加强自己發言权的可能性；而斋藤內閣也极力避免同軍部之間發生磨擦，从而容許了軍部的势力扩張。政党也通过了承認“滿洲国”的决議等来力求与軍部取得协調，这种傾向在右翼社会党方面更为显著。同时，財閥也采取了所謂“自肃”的方針。1932 年 4 月，三井、三菱以“滿洲国”成立后的首次对外貸款形式，以七年后归还和年利五分为条件，供給了二千万日圓的貸款；在五・一五事件后不久，

又以失业救济費及社会事业費的名义，三井、三菱各捐献三百万日圓，住友捐献一百万日圓；并朝着所謂"轉变財閥方向"的道路前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1933年7月神兵队事件，在企圖利用民間法西斯团体發动群众来改造国家这一点上，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表現；但是，發动群众的計划終于流产了。因五·一五事件和神兵队事件法西斯团体的干部被捕一事，使沒有强大的群众組織、專賴私人关系的法西斯运动，势力大为削弱；后来又暴露了神兵队的干部作为通風报信的代价由股票商取得了一笔資金，这就更加降低了它的名声。

在这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变动之中，由于龐大的軍事开支和公債政策，壟断資本漸漸有了發展；而取代政党势力的官僚势力也漸漸扩張起来，企圖以軍部为推运力对原来的統治体制进行合法改革的所謂"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傾向也逐漸表面化了。官僚势力利用軍部排击政党的机会，在"淨化政界"的口号下，乘机發展自己的势力；并且利用統制經济，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由于"文官分限令"的修改而产生的对官吏身分的保障，成了官僚扩充势力的一个基础。这样一来，在过去的政党內閣时代以"根据官厅事务上的需要，必要时"云云为理由，可以任意实行的对官吏的罢免，就要經过文官分限委員会的同意，并且这个委員会是由高級官吏和資格較老的官吏組成的，这就显著地巩固了官吏的地位。內务省，以往每年都要有三百人以上的更动，修改以后，仅更动三十人左右。这个修改，保証了取代政党的官僚在政治上得到發展。

內田的焦土外交

具有上述性格的斋藤內閣，在对外政策上几乎无条件地接受

了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軍部的对外方針，其結果，使日本的对外关系更加紧張起来，在国际上走向了孤立的方向。不言而喻，軍部所推行的对外侵略方針，是大体上符合壟断資本的利益的，所以壟断資本对此并沒表示强烈的反对。他們只是顧虑和列强引起直接冲突的危險，那样，会使日本陷于危險的境地。然而，他們認为这种冲突的危險旣然还不緊迫，便可以容許軍部的主張，以便避免加剧在国内与軍部之間的斗爭。

1932年7月，外交官出身的“南滿鉄路”总裁內田康哉被任命为專任外务相，內田外务相在8日召开的第六十三次議会上，在答复森恪关于积極承認“滿洲国”的主張时說：“所謂‘滿蒙’事件，对我帝国来說，是基于所謂自衛权的发动而引起的。……为了这个問題，必須举国一致，卽使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貫徹这种主張，在这一点上，应該說，我們具有一步不讓的决心”，主張了所謂焦土外交。这个焦土外交的第一个具体表現，是在1932年9月承認了“滿洲国”，次年1933年3月更进一步退出了国际联盟。

在此以前，1932年3月1日，在关东軍的“內面指导”之下成立了“滿洲国”，清朝的后裔溥仪就任执政，6月，众議院全体一致通过了政、民两党的共同提案——全場立卽承認“滿洲国”的决議。接着，作为承認“滿洲国”的前提，为了大致統一日本在“滿”机关，新設了駐“滿”大使，使其兼任关东軍司令官和关东州長官。8月，陆軍大将武藤信义被任命为关东軍司令官兼駐“滿”大使及关东州長官；小磯陆軍次官被任为关东軍参謀長及关东軍特务部長。关东軍特务部事实上是統制“滿洲”經济的最高机关。

同年9月15日，签訂了日“滿”議定書，正式承認了“滿洲国”。日“滿”議定書只有两条，一条是“滿洲国”确認日本及日本国民在“滿”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另一条規定，日“滿”共同防御和日本軍駐扎“滿洲”。这不过是以“国际条約”的名义确認了关东軍对“滿洲”

的統治而已。在此以前的 1932 年 3 月 10 日，溥仪在給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的信件中曾約定：(一)同意关东軍所需要的一切軍事設施由“滿洲国”提供，其經費由“滿洲国”負担；日本負責保衛新“国家”的国防和国內秩序；(二)由日本担任一切既有的鉄路及其他运輸設施的管理以及它認为必要的新鉄道的鋪設；(三)日本人可以充当“滿洲国”政府各部門的官吏，但关东軍司令官可以任意任用、罢免和更換(远东国际軍事法庭記录)。由軍部主張建設“王道乐土”的“滿洲国”就在軍部本身的重压之下，变成了人間地獄。

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国內的社会主义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够得到發展，是因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后退了一步。

社会民主主义陣营的右翼——社会民众党在 11 月召开的中央委員会上，通过了一項决議：“(一)为了确保日本国民大众的生存权，認为在条約上規定的我們在‘滿蒙’地方的利权遭到侵犯是不正当的；(二)排除以往錯誤的資产阶級的对‘滿蒙’管理，而改行社会主义的管理”，表明了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領导这次向右轉的是書記長赤松克麿，他已經甚至脫离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綫，公开地挂起民族社会主义的招牌来了。他和反对法西斯、共产主义、資本主义，即所謂三反綱領下，仍旧坚持社会民主主义路綫的松岡駒吉、片山哲等的主流派發生了对立，在次年 4 月的中央委員会上，赤松派因建議被否决，終于退党了。中間派的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情况是这样：它在 9 月發表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爭，要求政府立即撤兵和絕对不干涉中国內政。但是，尽管在决議和声明中罗列了一些动听的反战辞句，但是并沒有同时进行实际的斗爭，因此受到党內这样批評，即：“在‘滿蒙’危机最严重的今日，由于空喊口号，完全暴露了斗爭的无力。”

社会民主主义的处境困难了。因为在事变开始的同时，可以进行合法活动的一面急遽縮小，而从内部又出現了日本国民社会党筹备会（下中弥三郎、佐佐井一晁、滿川亀太郎、室伏高信、橘孝三郎、权藤成卿、長野朗）和日本民族社会党（赤松克麿、大矢省三、平野力三）等为了投机相繼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然而，下層群众又渴望开展坚决反战、反法西斯的斗爭。这样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左、右和中間的間隔已經縮小，"建立坚强的、單一的无产者政党"的时机成熟了，終于在1932年7月，全国劳农大众党和社会民众党合并，組成了社会大众党（主席安部磯雄、書記長麻生久）。这个政党的主張是："反对过左的盲动，擯弃法西斯反动的骯髒运动，高举解放无产阶級的旗帜"（成立宣言），也就是要成为所謂排斥左右傾而采取中間立場的統一体。

日本共产党早于事变發生的前两个月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备战展开斗爭"，事变發生后立即尽其全力組織反战斗爭。1932年7月，党中央成立軍事部，9月創刊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軍营和軍艦內进行了發展基層組織的活动。發展党員的工作已經就緒，机关报"赤旗"也改为鉛印，影响也扩大了。党的活动已經达到了如此群众化的程度，以致可以举行街头示威活动，并把过去一直保密的活动地点和时間，公开地注明在机关报上和傳單上了。促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阶級斗爭的激化。

1931年是在爆發了九·一八事变的暗淡情况下，工人、农民的斗爭达到了最高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工人斗爭事件有二千四百五十六起，参加人数达十五万四千五百二十八人；农民斗爭事件有二千六百八十九起，参加人数达五万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在农民斗爭中特別値得注意的是，除了有关地租問題以外，諸如要求延長租佃契約和确認佃耕权等有关土地問題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件增多了。

1932年綱領

九·一八事变反映了世界資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的深刻化和帝国主义列强对立的尖銳化，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綫。如何向这一战爭作斗爭，这是日本革命势力对世界人类和日本劳动人民所担負的重大任务。战爭必然会使国內的阶級对立更加尖銳起来，带来革命的机会。1932年3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常务委員会会議上，东方部負責人庫西宁就"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革命的性質"作了报告，指出以往日本共产党內部所存在的"左"的錯誤，这就是低估了天皇制的作用以及打倒封建制和进行农业革命的斗爭。同年5月，根据以上分析，以共产国际西欧局的名义發表了"日本的形势和关于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綱領"，就是所謂1932年綱領，其中，对于革命的战略战术作了明确的闡述。这个綱領的內容是这样：日本的統治体系的第一因素是天皇制，它是目前的剝削阶級專政的坚固的脊椎骨；第二个因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日本农村的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制度，才是促使农业衰退和广大农民群众日益貧困的原因；第三个因素是与由官僚支配的整个天皇制体系紧密結合着的壟断資本。与这三个因素所組成的統治势力作斗爭的現阶段的革命，是具有坚决轉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傾向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天皇制，廢除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实現每天七小时工作制这三大民主主义的任务。

这个1932年綱領的意义在于：提出了显然不同于逃避与天皇制作斗爭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劳农派）及取消派（三·一五、四·一六两次事件的被捕者中承認共产党战略錯誤，并容許天皇制存在的門屋博、淺野晃等人）的方針。这个綱領还指出了：必須向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挽救壟断資本危机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反动的执行者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天皇制軍部、官僚作毫不留情的

斗爭。从 1932 年 5 月起出版的“日本資本主义發展史講座”虽然是在 1932 年斗爭綱領發表以前(日本是在 7 月發表的)着手計划的,因为特别强調要糾正 1927 年綱領的方向,所以在事实上它为从理論論証新綱領准备了条件,它是在党員野呂荣太郎領导下,动員了包括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許多党外学者在內的优秀的理論家共同編写而成的;它給予了当时的知識分子以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所謂“講座派”的这些学者們和持有不同見解的猪俣津南雄、櫛田民藏、向板逸郎等劳农派的人們,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論战,这就是关于日本資本主义的論战。这場論战由前一年春季就已經在野呂和猪俣之間开始了。猪俣津認为:当前实际掌握政权的阶級只有一个資产阶級,封建的專制主义已經失去了物質基础;野呂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認为: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就是作为日本資本主义的一个基础而保持它的独立性,封建地主阶級与資产阶級結成了同盟。这一論战由于上述講座的出版而达到高潮,关于幕府末期和維新的問題、怎样分析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构的問題,等等,广泛地展开了爭論,形成了几乎所有当时被称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都参加了的一場大論战。当然,这場爭論战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官方的鎭压。有的論文不得不作了很多删削和用了許多隐語,有的甚至受到了禁止發行的处分,不得不加以修訂。为了尽量避免上述压迫,撰稿人不能不用列宁所說的“伊索寓言式的語言”。

1932 年綱領,通过提出革命战略,要求日本共产党克服落后于形势的缺点。然而鎭压的魔掌却接二連三地襲击了日本共产党的核心。从 1932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 月之間,进行了大檢举,先后逮捕了風間丈吉、紺野与次郎、岩田义道、宮川寅雄等領导干部,以及前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前商科大学教授大冢金之助、前九州大学教授風早八十二等有关人士一千五百人。这是由于同年 6 月

警視厅扩大了特高警察，加强了鎭压活动，并派遣特务警察混入党內，因而破坏了地下組織。

这样，趁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动搖、混乱，共产党受到鎭压和打击，使革命势力遭到削弱的机会，法西斯势力取得了絕对优势。

第四节　退出国际联盟和签訂塘沽协定

李頓报告

由于1932年5月签訂了停战协定，一·二八事件已告一段落，由此，国际联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李頓調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書的草拟和提出上面来了，对于日本承認“滿洲国”問題，它也沒有立即采取任何措施。李頓調查团于1932年2月到达东京，接着經过上海、南京、北平，在4月进入“滿洲”，6月回到北平着手起草报告書。报告書是在9月30日交給了中日两国政府，并于10月2日正式公布了。

报告書不承認9月18日夜里日本方面的軍事行动是一种正当防御，并且否認“滿洲国”是純粹自發的独立运动的产物；但同时却又承認“滿洲”的特殊情况，而認为仅仅恢复9月18日以前的原状并不能解决任何問題。报告書提出了如下的解决問題的一般性原則：(一)不抵触中日双方的利益；(二)考虑苏联的利益；(三)符合現有的多边条約；(四)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五)中日两国通过締結新的条約以建立新的关系；(六)对将来的糾紛采取有效的措施；(七)“滿洲”实行自治；(八)对于“滿洲”維持內部秩序和免遭外来侵略給予安全保障；(九)促进中日两国間發展經济关系；(十)关于改造中国問題实行国际合作(报告書第九章)。此外，报告書还提議：在东三省設立自治的特殊行政机构，并以該地区为非武装区，由宪兵队維持治安；聘任外国人为自治政府的顧

問、警政及財政监督官以及中央銀行总顧問(报告書第十章)。这里提出了有利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滿洲"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同时在很多方面对日本表示了迁就。

11月，国际联盟为了討論李頓报告書，在日內瓦召开了理事会，日本代表松岡洋右、中国代表顧維鈞出席了会議。松岡主張日本的行动是自衛行动，"滿洲国"的独立运动是自主地發展起来的，并以此来反对以李頓报告为解决問題的基础。顧維鈞对此提出了反駁。問題被提交大会上，大会是在12月召开的。在大会上，英、法、德、意等大国对日本采取了綏靖政策，然而瑞典、挪威、爱尔兰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小国則表示反对，他們坚持主張貫徹盟章的原則，强調否認日本在"滿洲"采取的行动的必要。全体討論結束后，中国代表指出中、日糾紛已經成为文明世界和日本之間的斗爭，对李頓报告書的原則表示贊同。日本代表發表演說对此表示反对，并主張"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綫"，接着又强調共产主义侵入中国的危險和不应該削弱日本来加速远东的崩潰，最后还威胁說，如果采納小国方面的意見，日本就要退出国际联盟。由于这种原故，大会未能作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結論，而把討論中日問題的任务提交給十九国委員会了。日本对这个委員会的决議案也表示了反对；但英国却繼續对日本采取綏靖政策，并試圖調处日本同国际联盟之間的关系。1933年1月初旬，英国大使会見了內田外务相，接着，联盟秘書長德拉門(英国)与副秘書長杉村阳太郎草拟了一項試案，并将其內容透露給日本。这一試案对采用李頓报告書大大地加以局限，同时，还删去了"否認滿洲国"的字样，这对国际联盟来說，已經是最大限度的讓步。对此，日本元老重臣方面也主張接受，但是政府却認为仍有討价的余地，因而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在这样情况下，日本軍队积極地向热河进攻了。日軍在占領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后，即将矛头轉向西方，1932年7月，

借口日本軍官在热河省北票附近失踪，而开始进攻热河。7、8月間，日軍的进攻遭到中国抗日义勇軍的阻击，但是它宣布"热河为滿洲国的領土"，而增强了兵力。1933年1月，日軍利用山海关爆炸事件的机会，占領該地，并要求以山海关作为緩冲地带，于是热河的局势吃紧了。2月20日，日軍以"滿洲国"的名义向中国軍队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軍队撤出热河，紧接着，就再一次向热河开始了进攻。

退出国际联盟

山海关事件和日軍开始进攻热河，使国际联盟的討論陷于僵局。在日本国內，为了避免退出国际联盟，虽然元老方面也表示了暫时推迟进攻热河的意見，但是这种意見絕对不可能为企圖退出国联以便随心所欲地侵略中国的軍部所接受。同时，中国方面对于德拉門和杉村的妥协性的試案提出了抗議，而在英国大使和內田外务相的会談中，日本政府又始終堅持强硬态度，于是国际联盟方面就認为再已无妥协余地，因而空气为之一变。另一方面，在德国，由于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不断叫囂要打破現状，国际联盟对此也有必要根据盟章采取强硬的态度。經过这样一段过程，国际联盟才从它一向謀求使中日两国妥协的立場前进一步，为了解决糾紛，起草了一项以李頓报告書的主張为要点的劝告案，并决定在2月24日召开的联盟大会上进行討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內，荒木陆相和內田外相等所提出的退出联盟的主張获得了优势，以往反对退出国联的元老重臣也同意了这种主張。在2月24日的大会上，报告書以四十二比一通过了，于是，日本代表松岡便声言："日本政府現在不能不認为就中日糾紛問题，与国际联盟进行合作的努力已經到达了極限"，然后退出了会場。

日本对大会所通过的报告書，發表了一项声明說："日本政府

認为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行动以及日'滿'議定書的签訂，对于国际联盟、九国条約、巴黎条約及其他一切国际条約均未違反"，又說:"赤化了的中国对欧美各国是个严重問題，与此相比，其他各种問題都将失去意义。然而，和中国完全脫离了关系的'滿洲'，是一个在远东方面防止共产主义危險的堡壘，对于它的眞正意义，各国当政者应該已經有了正确的了解"，这样，日本政府企圖用反共来为自己的立場辯护。

3月28日，日本向国联提出了退出的通告，同时發布了关于退出国际联盟的詔書。日本天皇命令在这个詔書中要强調这一点，即:"日本之所以退出国际联盟，只是由于它在'滿洲'問題上和国际联盟不幸而意見不能取得一致的結果，并非出于本意，因此，日本此举絲毫也不違背国际联盟的增进人类幸福的基本方針"，其后，他还屡次談到这种协調的意圖。(原田日記)

尽管天皇的詔書里面对于退出国联也有一些批評的片断字句，但是詔書的目的却在于禁止对于退出国联可能提出的一切政治性批判，这是显而易見的。

退出国际联盟，正是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决定性的步驟。然而在当时，虛張声势的"自主外交"的叫囂，籠罩了整个政界，"亞洲人的亞洲"和"回到东方来"等空洞口号統治了言論界。松岡全权归国时，受到了人們甚至还包括小学生在內的狂热的欢迎，他被捧成了英雄人物，与签訂朴次茅斯条約的小村寿太郎归国时那种冷冷淸淸的情景，恰恰成了鮮明的对比。他在出發的时候，国民會寄給他数以万計的鼓励信，其中希望"圓滿結束这次会議再回来"的信只有一、两封(淸澤洌:"生活在动蕩时期")。就在軍部和政府利用煽动一手制造出的这种完全有利于它們的"輿論"的浪潮中，他們自己断送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机会。

各国的态度

当时远东的国际局势，并沒有引起对日本进行任何积極的干涉。首先，国际联盟在通过了对中日两国的劝告案（这造成了日本退出的原因）以后，为了决定国联应該采取的措施，而設立了諮詢委員会，并邀請美、苏两国参加和給予协助。美国答应派观察員参加，而苏联則拒絕了这一邀請。諮詢委員会虽然討論了禁止对日輸出武器問題和不承認"滿洲国"的具体作法，但并未能对日本施加有效的制裁。关于在大会开会期中正在进行的热河問題，虽然由中国代表顧維鈞向大会提出了控訴，但是国联并沒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这样，联盟的威信就愈發扫地了。

和国联的情况相表里，英国由于在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采取的綏靖政策宣告失败的結果，丧失了它在中国的威信，当时的外交活动还是很呆滞的。美国也未能和英国建立統一战綫，实际上也沒有能够采取任何行动。1933 年 3 月，民主党的罗斯福取代共和党的胡佛就任了总統；赫尔繼史汀生做了国务卿。罗斯福的远东政策，从史汀生只是口头上提出强硬抗議而沒有收到任何效果的情况中汲取了教訓，一方面对日本侵占"滿洲"依然采取不承認的政策，另一方面却避免采用虛声恫吓而竭尽全力扩張海軍。这正是学習了西奥多·罗斯福所說的"在溫和交談中准备好大棒"的訓示（格雷斯福德："美国远东政策史"）。但是，采取这样的——至少表面上——緩和政策的原因之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重工业的發展給經济危机中的美国产业資本提供了新的市場。

这个时期苏联的远东政策是一貫地以避免反苏統一战綫的結成为重点，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也表現得極其愼重。在此以前，1931 年 12 月，李維諾夫外交人民委員曾向为就任犬养內閣的外相而在归国途中的芳澤謙吉提議苏日間签訂互不侵犯条約；至

1932年10月，又通过广田大使再次作了同样提議，并表示准备同意“滿洲国”派总領事駐在莫斯科或由日本駐苏大使兼任“滿洲国”总領事，以及以合理价格出售中东鉄路。然而，死抱着反共的招牌不放的日本政府，以尙非正式开始交涉的时期为借口而予以拒絕了。尽管这样，苏联方面仍然保留着談判的机会。对于国际联盟諮詢委員会的邀請，李維諾夫以半数以上的委員国都对苏联抱有敌对态度为理由，拒絕参加会議，避免使日本完全变成敌人。1933年4、5月間，“滿洲国”断絕了“中东鉄路”滿洲里和綏芬河两站与苏联鉄路之間的联系，就在此时苏联仍旧力圖避免和日本發生爭端；5月，苏联提議要出售中东鉄路。6月，有关出售的交涉开始了，苏联方面最初作价二亿五千万盧布(当时一盧布合一·〇四日圓)，后来到8月，讓至二亿盧布；而“滿洲国”方面却坚持主張給五千万日圓，双方僵持不下，至9月末，交涉陷入了停頓状态。此后，日苏之間的隔閡逐漸加深了。

和远东的这种局势遙遙相对，在德国建立了独裁制度的希特勒，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軍縮会議及国际联盟，使国际联盟的力量愈發削弱了。在这种国际协調主义失敗的同时，1933年3月的日内瓦裁軍会議及同年6月的倫敦經济会議也都以失敗而告終。特别是由于后者失敗的結果，促进了世界上形成集团經济的趋势，加强了关税壁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国际間的对立日益尖銳化了。

塘沽协定

日軍在3月初旬結束了对热河的侵占。国民政府表示要保衛热河不过是为了爭取时間，以便等待国联的空气对中国有所好轉；而热河省主席湯玉麟也并未进行抗战，而是携带着財产跑了。3月10日，日軍对長城綫开始了总攻击。在这样情况下，依然集中全力

进攻紅軍的蔣介石終于北上，召开了有張学良、宋子文、何应欽等人参加的会議。其結果，掌握华北統治权的張学良下野了，华北的政权、軍权移交給何应欽，張学良部下的东北軍被改編了。这样，国民党的势力，沒有經过流血就扩展到了長城綫。但是蔣介石、何应欽等絕不想冒与日軍作战的危險，从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对于日軍的攻击，中国二十九軍在喜峰口展开了反攻，并攻入了热河，但蔣介石、何应欽却命令主力撤退至灤河綫上，因此，二十九軍竟陷于孤立无援而被击敗了。接着，日軍越过灤河，迫近北平、天津两地；这时候，国民政府內部主張緩和抗日和設置华北緩冲地带，借以收拾时局的論調抬头了。

5月末，由于了解日本情况的黃郛等人的活动，日軍和中国軍队之間开始了停战交涉，31日签訂了塘沽协定。根据該协定，規定：中国軍队撤出長城以南的灤河东部地区，并将該地区作为非武装地区；該地区的治安由中国警察維持；一俟中国軍队撤退，日軍将自动撤到長城綫。如果只就塘沽协定本身来看，它只是一項軍事上的停战协定，但实际上，由于它的签訂，結束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两軍的敌对关系，使中国方面默認了"滿洲"的旣成事实。而且，这一协定是放弃了国际联盟的集体保障主义，經过两国間直接进行交涉而签訂的，还意味着对于国联的一个重大打击。

6月，作为緩冲性的政权机构，成立了以黃郛为委員長，統轄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綏远及北平、青島两市的行政院駐平政务委員会。日本方面，关东軍在8月間撤到了長城綫，但是原来以两个大队为主力的华北駐屯軍，增加到一个混成旅团，兵力大大增强了。

当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妥协政策的势力在中国各地起事了。在察哈尔，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人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开进了非武装地区；在福建，在淞沪战役中由于英勇抗日而著名的

十九路軍的領袖李济深、蔡廷楷等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主張武装抗日。但是，他們都在国民政府的武力鎮压下失敗了。此后，国民政府在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合作下，推行了消灭紅軍和統一国內的政策。国民党政府虽然表示不放弃对日抵抗，并且在口头上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实际上无法掩飾它对日本的妥协态度。

第四章 “非常时期”

第一节 軍需通貨膨脹和农业危机

高桥財政

日本資本主义为了摆脱严重的危机，發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逐步轉向战爭經济，日本資本主义暫时得到了恢复，当然，它的內部还孕育着更大的矛盾和危机。

起用“財政界老将”高桥是清做大藏相的犬养內閣，上台后第一个經济措施便是宣布再次禁止黃金出口，这就等于参加国际資本主义經济战的“宣战布告”。这是因为：第一，这样作就使得外匯率下跌，因而增强了傾銷能力，并表明要向英、美两国挑起激烈的商战；第二，这样作，就是把筹集軍費和挽回时局的經費，全部依靠发行公債和通貨膨脹，通过这样的道路逐步加强对外侵略的經济体制。

高桥大藏相首先取消了前內閣的緊縮財政、不發行公債方針和增稅計划等。1932 年度預算，比前一年增加了五亿日圓；公債的發行額在 1932 年已达十亿日圓，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直接軍事开支。为了靠發行赤字公債来筹集軍費，高桥大藏相把这一任务交給日本銀行来承担，并由它在市場上公开銷售。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那些由于产业界的不景气而集中在大銀行手里的龐大的剩余資金提供一个有利的投資对象；另一方面，可以使軍部筹措軍費的要求和苦于无处投資的金融資本要求都得到滿足，并且可以避免通貨膨脹。但是，这种策划者自夸为“一举三得”的“妙策”，并不能解决日本的財政困难，也未能制止通貨膨脹。

高桥大藏相还以救济农民的名义，編制了“时局匡救費”。当

时农业危机正在猛烈地發展，农民已逐渐趋向革命化，大大地动搖了地主所有制的基础。这种情况使統治阶級感到恐惧，他們特别感到无論如何必須“保护”其“忠誠的”軍队的“补充源泉”的农村。“时局匡救費”就是为此而支出的，而不是为了救济农民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这种“时局匡救費”，此后在軍費的压迫下，在1933年度和1934年度預算中逐渐减少，到1935年終于被完全取消了。

这样，高桥財政通过尽量不遭受抵抗的办法筹措了由于軍部侵占“滿洲”而遞增无已的軍費資金（1931年占岁出的30.8%，至1936年增至45%），切实保証了有关金融資本家的利益，并且还滿足了从軍費中获取利潤的“制造死亡的商人”的要求。至于由財政通貨膨脹带来的一切負担，則統統轉嫁到工人、农民和中小企业家的身上了。这就是被称为“非常时期財政”的高桥財政的內容和它的秘密。

軍事生产

这种以軍費开支为中心而引起的通貨膨脹，使接受大批軍事訂貨的重工业部門有了迅速的發展。由于这种关系，历来依靠国外市場、以纖維工业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义，由此完全改变了它的組織結构。这个变化表現在产值上的情况是：1931年在构成纖維工业的主体的紡織业的产值与軍需工业的中心——金屬机械工业的产值，不过是十九亿日圓比九亿日圓；至1935年則增至三十四亿比三十三亿，几乎相等。这意味着在通貨膨脹下，軍需工业有了显著的發展。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称这种膨脹为“軍需通貨膨脹”。

在这样“軍需通貨膨脹”的情况下，日本的經济迅速地轉入了战爭經济。使一个国家的經济走上战爭經济的軌道，就是对全部生产事业赋与以單純的战爭的方向，也就是不顧一切地扩張与一

般人們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大炮、坦克等軍需物資的生产。这样，把人民用血汗生产的物資用在战爭上，就等于将劳动的結晶投到大海里；軍事生产的增長，不但不能使国民富裕起来，反而要使国民日益貧困。由于軍需通貨膨脹而获得巨額利潤的，只有生产軍需品的資本家。

扩大的軍事生产的重点，首先是陆海軍的工厂。陆軍方面，对小倉工厂进行了大規模的改建，使其成为綜合性的大工厂；而且更要使其成为与附近的八幡制鉄所的鋼鉄、筑丰煤矿的煤以及中国大陆的原料市場相結合的軍事工业的集中地点。此外，大阪、名古屋的陆軍工厂、横須賀、吳港、舞鶴的海軍工厂也都进行了扩建，以这些工厂为中心，軍需生产有了很大的扩張。軍需产业的核心是冶金工业，特别是鋼鉄工业。日本的鋼鉄工业自創建以来，就一直在政府的保护下不断地得到發展，1934 年 1 月，政府制定了“日本鋼鉄公司法”，以国营八幡制鉄所为中心，把屬于三井、三菱、安田、澁澤等各財閥的鋼鉄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巨大的托拉斯——日本鋼鉄公司。由于这个公司的成立，只是它一家的生鉄和鋼塊的产量就占日本总产量的大半。在实行这次合并时，对屬于財閥系統的各鋼鉄公司的作价都远远超过了实际价值，因此財閥不仅在合并中获得了巨額的利潤，而且并沒有因此失去他們的支配权。这样一来，鉄的产量，由 1931 年的九十一万吨增加至 1935 年的二百十一万吨；鋼的生产量在同一时期内，由一百六十六万吨增加至三百八十六万吨。但是，随着产量的增長，矿石、廢鉄廢鋼的进口量也显著地有了增長，而廢鉄廢鋼的 70% 都要从日本当时的主要竞爭国——美国进口。这一点，說明了日本鋼鉄工业具有極大的弱点。另外，对于作为重要軍用物資的石油，于 1933 年制定了“石油业法”，石油的儲藏和精煉設备均被置于国家的統制之下；以日本石油株式会社为中心进行的对石油的壟断，是在与国家权力相

結合的情况下發展起来的。

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本来是落后的，但这个时期的發展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机械制造工业中，工作母机、电机、汽車、造船等工业部門以增产武器为目的，获得了巨大的發展；这种發展是在軍部的管轄下和国家的絕大保障下进行的。中島飞机制造公司的扩充，是利用兴业銀行所貸与的等于其資本数十倍的資金来进行的。化学工业是制造炸藥、毒瓦斯所必需的，它在軍部的特別管轄和扶植之下发展起来。在这方面，1935年的总产量增長到1931年的大約二倍以上。

傾　銷

由于再次禁止黃金輸出引起的外匯率的猛跌，有力地刺戟了日本的出口貿易。外匯行市在1932年以前不断下跌；至1933年落到平价（日圓本来的价值）的40%左右而大致稳定下来。由于幣値这样下跌了60%，尽管随着通貨膨脹国内物价有了上漲，然而日本商品还是可以在世界市場上廉价出售。这样，就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对外貿易陷于停滞不前的时候，日本的貿易却有了相当的發展。然而，日本商品所以能够利用这样外匯关系廉价出售，是因为进行了相应的不等价交換，也就是說，日本的資本家将工人生产的龐大价值拿到国外市場上进行"甩卖"了。由于"甩卖"而受到的損失，是靠强迫工人牺牲（减低工資和延長劳动时間）和在国內維持特高的壟断价格来弥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外貿易上的"甩卖"就是所謂"傾銷"。例如，1929年和1931年的生产成本相比，生絲降低了53.5%；棉制品降低了36.3%；化学制品降低了24.3%。这就是由于資本家在大危机中通过强制实行"产业合理化"，降低工人的工資和延長劳动时間的結果。在这样殘酷剝削工人的基础上，在1932年8月，日本紡織品的輸出額超过了一

向是主要竞争国的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其所以造成这种情况，除了上述的"傾銷"以外，还由于在世界危机中，殖民地人民进一步貧困了，他們不可能購买質量好而价格高的英国貨，只能購买質量次而价格低的日本貨。

采取这样"甩卖"的办法来增加出口，是为了爭取外匯以便从外国購进軍需生产的主要原料。但是，出口的增長比例并沒有赶上軍需产业所需要的原料輸入数量的增長比例。不但如此，至1934年，賴以进行"甩卖"的基础——外匯率的下跌宣告停止，出口逐漸陷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对于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达到繁荣的依靠出口的各产业部門，是一个重大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繼續到1935和1936年，它一方面越發加剧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对立，同时还构成了一向从事壟断对外貿易的产业部門的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而一心从事軍事工业的一个轉折点。

旧財閥和新兴財閥

从这种通貨膨脹政策所带来的軍事工业的發展和低外匯率傾銷政策的对外貿易中，得到利潤的，只是三井、三菱等大財閥。首先，三井財閥由于先前的"搶購美元"而大發横財；1932年，池田成彬繼团琢磨当上三井的总經理以后，改变了以往主要从事商业、金融、輕工业經营的方針，逐漸扩大了对軍事工业的投資，并进而加强了协助战爭的体制。在鋼鉄工业方面，除了在日本鋼鉄公司里有7.4％的投資以外，主要掌握着承担海軍訂貨的日本制鋼所。在煤炭工业方面，它的支配力特别强大，通过三井矿山、北海道煤矿、太平洋煤矿等三个公司，掌握着全国采煤量的25%。此外，它还运用它所屬的东京芝浦制造厂、东洋精密机械、昭和重工业、丰田紡織机械等公司，从事軍艦和机械化武器的制造，再加上东京电

灯、日本制粉等公司，其資本总額达十余亿日圓。特別是由于"軍需通貨膨脹"而获取的利潤更为巨大，只是日本煉鋼厂，从 1931 年至 1936 年之間，利潤率就增長了大約两倍。

三菱和三井一样，也从"軍需通貨膨脹"中得到了巨額利潤。在煤炭生产方面，它通过三菱矿业及其他两个公司，掌握了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15% 左右。另外，为了正式轉入軍事生产，把三菱造船与三菱飞机制造两个單位加以合并和扩充，成立了三菱重工业公司。此外，还拥有三菱电机、日本光学工业、日本电池等与軍事生产有关系的公司。所有这些屬于三菱財閥的企业全部資本总額，竟达十二亿日圓之多。只是三菱重工业这一个公司，在 1931 年至 1936 年之間，利潤率就增加了将近两倍。

住友財閥特別致力于發展直接和軍需有关的企业單位，除通过住友矿业从事煤炭、銅等的生产以外，还通过住友金屬、住友电綫、住友机械等公司，从事軍备材料及軍备的生产。另外，还以其住友制鋁和住友化学两公司，分別从事航空器材的生产和火藥的制造。其中，住友金屬公司在 1931 年至 1936 年期間利潤率增長了近四倍。

如上所述，从鋼鉄、煤炭等軍事工业的基础部門以至于机械化武器工业等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財閥手里，从侵占"滿洲"以前算起到其后的五年之間（1931—1936 年），利潤率激增了二倍至四倍的情况表明了：在"軍需通貨膨脹"所带来的軍事工业的发展中，財閥的利潤日益增長了。

但是，如上所述各大財閥虽然在軍事工业各部門中都有了显著的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一向掌握的是紡織业和煤炭业，而在化学工业及其他軍备制造业方面却沒有取得壟断地位，圍繞着这些工业部門并在这种"軍需通貨膨脹"中产生了新兴財閥。这是資本家彼此間进行了激烈斗爭的結果；旧

財閥对于新的事业，总是顧慮有危險，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愼重”，同时旧財閥和軍部之間在侵略中国的策略上也有矛盾，在巧妙地利用这种机会和軍部进行勾結的情况下，相繼出現了一批新兴資本家。他們往往被称为新兴財閥，其中包括：掌握着日本矿业、日立制造厂、日产汽車、日产化学等的日产康采恩(久原房之助、鮎川义介)，以日本氮肥为母体，于1936年發展到北朝鮮，在赴战江和長津江上建成了規模宏大的水力發电站，形成了巨大化学工业体系的日氮康采恩(野口遵)，以昭和电工为母体的森康采恩，日鈉康采恩(中野友礼)以及理研康采恩(大河內正敏)等。

这样，新兴康采恩是專門以軍事工业为母体而形成的，它們乘着“軍需通貨膨脹”的浪潮，有了飞速的發展。但是，这些新兴財閥都沒有自己的銀行資本作背景，在急剧發展中所需要的資金不能不仰賴于政府、兴业銀行以及旧財閥的銀行。因此，当三井、三菱特别对化学部門加强壟斷以后(例如：三井化学部門的独立、日本化成——三井系統——的大扩充)，这些新兴財閥的活动，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或者被迫到殖民地去另謀出路。尽管有了美好的开始，尽管能够和軍部比較直接地进行勾結，新兴財閥无論如何是无力动搖旧財閥的宝座的。因为在和軍部进行勾結方面，旧財閥也很高明，并且也更为实际。

不过，旧財閥并不是沒有憂慮的。因为生活的恶化使得人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反对財閥的情緒，再加上与軍部相勾結的新兴財閥利用了这种情緒，这就使得軍部和右翼攻击的矛头完全指向了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財閥。財閥搶購美元，特别刺戟了群众的这种感情。1932年2月井上准之助的被刺和同年3月団琢磨的被暗杀即其明証。三井財閥的池田成彬回忆当时的情景，談了下面一段話：“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發，和对于購买美元的非难，以及对三井銀行和我的非难，从1931年10月起越来越激烈了。11

月2日，自称屬于赤松克麿的社民青年同盟的分子二十余名闖入銀行的营业部，企圖逞凶。…… 12月21日，社会民众党員数十名拥至三井八郎右衛門和岩崎久弥两人的住宅，坚决要求将購买美元的利潤拿来救济發生了灾荒的奥羽地方的貧民，救济百万失业者，并穿着沾有泥土的鞋闖进了室內。但是，这不过是表面的騷扰，以社民青年同盟和社会民众党的名义进行的騷扰而已；在暗地里的活动要比这厉害得多。每天来电話，出来一接，只听大罵一声国贼！就挂上了。其次，还有相貌凶恶的暴力徒帮也常光临；信件也不知道来了多少。这从9月开始經10月，一直到12月一个整月里，簡直象急性肺炎那样地流行着；其后，便逐漸轉为慢性了。1932年2月，井上准之助被暗杀，3月，团琢磨也被暗杀了。此后，便进入了一种險恶的状态，終于發展为二·二六事件，其間沒有一日不受到威胁。”(財界回顧)

面对这样情况，旧財閥的指揮部赶紧給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捐款，改革人事制度，使財閥的家族成員从表面上退后，更換首脑部，还把以往保密的財閥股份的一部分，公开出来了。这就是所謂的“財閥的轉向”。但是，这种“轉向”，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攻击的一种烟幕而已，企圖获取最大限度利潤的壟断資本家的基本方針一点也沒有改变。不过，这种“轉向”也确实受到了它們的竞爭者——新兴財閥飞速發展的影响。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財閥为了謀取利潤，随心所欲地利用了国家权力。同时，为財閥保証尽可能多的利潤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傾向也漸漸加强了。天皇制的国家权力为了这些財閥的利益，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統制經济”。重要产业管理法、工业組合法、日本煉鉄法、外匯管理法等一系列法令都是在这个目的之下实行的；又

如通过日本銀行制度的改革、兴业銀行資金的积極投資、創办日鉄、帝国燃料等企业，等等国家直接参加到軍事經济的基础部門中，从而加强了壟断資本主义体制，并保証了它們的利潤。这样做，并不是国家取代了壟断資本的地位，而是更加巩固了壟断資本的地位。譬如，通过改革日銀制度及其他而实現的日銀統制力的加强，不仅保証了面临危机的財閥銀行的地位，而且日銀所發放的巨額資金，都集中到財閥銀行手里，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些銀行对于产业界的控制力量。

这样，以侵占“滿洲”为轉机，日本的全部經济都被推向軍事化的方向了，国家权力干涉到国民生活的任何一个細节，以滿足財閥等壟断資本的利益。大財閥不仅随心所欲地运用国家的权力，来尽量剝削日本国民，加深了国民的貧困，而且在侵占“滿洲”以后，为了从該地人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潤，还勾結軍部，努力协助了战爭政策的推行。

在軍需通貨膨脹的情况下，尽管产业有了某些好轉，但是工人的生活反而更加困苦了。誠然，产业的好轉使在大危机中产生的龐大的失业者群減少了几分。但是，工人的生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改善。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就业工人虽有所增加，但多半是以“临时工”的名义被雇用的，这些“临时工”并不一定是不熟練的工人被临时雇用，他們与普通熟練工并无区别，只是在名义上作为“临时工”被雇用而已。这是資本家用来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工資和更苛刻地使用工人的方法；是他們利用当时的龐大失业队伍并逃避“健康保險法”，以确保廉价劳动力的一种手段。

也是由于資本家利用这样的“临时工”制压低了工資，尽管物价已經显著地高漲了，而这一时期的工資水平反而降低了。实际工資已降到比危机期間还要低，1931年至1936年間，大約降低了15%。同时，这个时期的劳动时間也被延長了。据日銀的調查，在

情况特别好的机器制造工业里，劳动时間由 1931 年的 9.16 小时延長到 1935 年的 10.06 小时。这就表明了，軍需工业的發展是依靠加强劳动强度而取得的。

农业危机的严重化

資本家的这样的繁荣，并不仅仅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剝削。农民遭到了比工人更多的掠夺。如前所述，在大危机中，农村已陷入非常貧困的境地；尽管在侵占“滿洲”后，由于發展軍事工业，景气有所恢复，但是农村的危机却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农业危机，是在工业品价格上漲的基础上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換而产生的，因此，工业愈見恢复，农业危机反而愈益严重。1930 年的丰收危机，1931 年、1932 年的大歉收，1933 年实际收成超过七千万石的丰收危机，1934 年由于風水灾、旱灾、霜冻灾而引起的空前未有的歉收等，农村連年遭到不幸，因而失去了生气。

不錯，农产品的价格，有的年份也有过相当的上漲，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由漲价而产生的利益全被地主阶級所独占，占全体农戶 40% 的貧农連自家口粮都不够吃，須要买米来維持生活，因此他們反而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反之，由于丰收而米价下跌时，米价甚至不能弥补生产成本，这就更加严重地打击貧农，使农村里的貧富对立愈益尖銳了。当时，由于歉收而出卖兒女的事例屢見不鮮，仅东北五县每年就有五万人之多。在青森县的一个农村中，因歉收、缺乏食粮而疾病丛生，平均每戶有病人一人以上。由于歉收带来的飢餓，严重地影响了健康，以致被召集的士兵不堪勤务演習，关于这种情况，当时一家报紙曾作了如下报道：“在弘前步兵第三十二联队所召集的岩手县出身的士兵中，由于身体衰弱不堪勤务演習，因而在十二天內被遣返的竟达二十一名之多，使陆軍当局大吃一惊，其原因被認为是由于农业歉收所带来的营养不良

另外一家报紙还报道过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在农村和漁村里，由于貧困，'缺食'的兒童日益增多，文部省派遣有关人員到各处进行了詳細調查。据报告，'缺食'兒童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据当局的估計，現在全国'缺食'的兒童超过二十万人，呈現了空前未有的悲慘状况"。("日本經济年报")

农村如此貧穷的状态，在全国各地燃起了农民斗爭的火焰，斗爭非常尖銳，大大地动搖了天皇制的基础——地主制度。因此，統治阶級在搬出前述"时局匡救費"的同时，还不得不实行米价对策、农村更生运动、減輕負担对策、整理負債对策等多方面的"保护"农村的措施。米价对策是指 1931 年对"米谷法"的修改，和 1933 年"米谷統制法"的施行，其目的在于維持米价，但实际上只是維持了地主所出售的米的价格，并未給大部分农民带来任何利益。农村更生运动是和所謂产业合理化运动相呼应而被提出来的，这个运动强迫农民更多地劳动，把生活压得更低，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也就是不动用国費的原則下来强制加以推行。至于減輕負担、整理負債等等，几乎全是有名无实，无非是欺騙农民、企圖緩和革命而已。

第二节　法西斯主义的發展

五相会議

在承認"滿洲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所謂內田焦土外交的进行过程中，斋藤內閣对內避免与軍部摩擦，采取了妥协的方針，以便稳定局势。但是，在議会中沒有基础的斋藤內閣，每逢議会开会都要受到在众議院里拥有三百零四个絕对多数議席的政友会的攻击，虽然利用"非常时期"、"举国一致"的口号力圖混过这一关，但是政党之間的傾軋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政友会方面还不便同政

府进行坚决的斗爭。因为，以軍部为中心反对政党內閣的暗流仍然存在，而国民也不大信任政党內閣。所以，政党从本身的利益出發进行倒閣，必将受到严厉的指責；卽使是推翻了斋藤內閣，亦难以指望上台执政。在这样局势下，政府和政友会之間，进行了旨在"安定政局"和授受政权的政治工作。这是从退出国际联盟，政局告一段落以后才开始表面化的。但是政友会的步伐并不一致，关于是否和政府决裂的問題，主張强硬論的鈴木派和主張稳重論的床次派、久原派發生对立，每每引起內部糾紛。在这种情况下，当編制 1934 年度預算时，由于海軍提出了龐大的补充計划費的要求，增加了財政上的困难，使政府面临难局，迫切地要求在議会中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从此，政府与政党間的联系更加表面化了。七月下旬，斋藤首相宣称："在恢复財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必須制訂确定不移的对策"，并要求政、民两党总裁入閣。但是，政友会总裁对此态度十分干脆，拒絕入閣，結果总裁入閣的問題宣告流产了。接着，斋藤首相又訪問了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三党总裁，进行了国策协商。可是，政友会所提出的国策方案，并沒有任何新的內容，它只是强調国防、承認增加軍費等借以迎合軍部，至于如何处理軍备与財政的关系，在这个根本問題上，并沒有提出任何对策，暴露了政策的貧困。

正当政界上層的活动陷于停滞不前的时候，相繼举行了五·一五事件(陆軍方面、海軍方面及民間方面)的公审，引起了新的波瀾。在法庭上，被告对政党和財閥进行了攻击，并申訴了农村的貧困，报刊、广播把这些情况大力地加以宣傳，这就使得五·一五事件后陷于停滞的右翼团体的活动死灰复燃了。陆軍在 8 月进行公审时，对被告的犯罪动机是加以肯定的，而在九月間，海軍方面的山本檢察官則在起訴中严斥軍人干与政治，要求判处被告以死刑以下的重刑。对此，海軍的青年軍官在全国范圍內掀起了反对起訴

的运动。在横須賀水交社召开了有志軍官联合会，在从四十期（中校一級）到五十八期（少尉級）的少壮軍官的参加下，討論并指責了倫敦条約的不当，并通过了攻击政府干犯統帅权的决議。对此，若槻民政党总裁發表演說为倫敦条約进行了辯护，这立即引起了在东京的預备役将官發表了一篇反駁声明，而五·一五事件的海軍方面特别辯护人朝田中尉还訪問了若槻，向他提出了質問。就是这样地在国民中間煽起了沙文主义思想，大肆渲染并極力鼓吹即将到来的1936年（海軍裁軍条約有效期間的最后一年）将爆发世界危机。在这种声浪中，采取了一系列扩充海軍軍备的措施，修改了軍令部条例，把軍令部的职权提高和扩大到与参謀本部相同的程度。接着，大角海相又表明，要在下次会議上要求修改現行海軍条約的比率。日本侵占“滿洲”以后，不仅需要扩充陆軍，而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編制龐大的海軍造艦計划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样一来，就越發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

在这些事件的前后，9月，内田外相下台了。广田繼任外相以后，立即表明特别要改善对美、苏、中三国的关系。这就是代替内田焦土外交的所謂广田协和外交的开始。广田外相就任后，荒木陆相向首相建議，要求包括軍部在内，由政府内部来决定国策。这是針对政府与政党間成立的国策协定提出的，企圖排除政党参与决定国策的做法。同时，高桥藏相等为了对1934年度預算的討論作好准备工作，而使国防、外交、財政各方面取得协調，也对此表示贊成。于是，首相、大藏、外务、陆相、海相等五相会議就在10月3日至21日之間召开了五次。在五相会議上，主張国际协調及国防、外交、財政調和的高桥、广田与主張对外强硬論及革新国内的荒木形成了对立。結果，前者的方針获得通过，宣布了下列大綱：

一、扶植与日本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滿洲国”，使其健全發

展。

二、在安全不受威胁的限度內照顧財政状况，力求充实国防。

三、外交方面，根据国际协调的精神，特别是对邻国——中国、美国、苏联，采取增进亲善关系的各种对策。

四、鑒于目前的国际关系和国內状况，在改革政治的同时，鼓励国民精神的振作。

虽然在五相会議上，荒木陆相的强硬論未被通过，但是这却意味着官僚陣营的进一步得势，同时也可以看出軍部获得了对一般国政的强有力的發言权。

繼五相会議之后，为了討論內政，特别是急不容緩的农村問題，在軍部的倡議下，召开了首相、大藏、內务、农林等八相参加的內政会議。荒木陆相指出，农村的貧困妨害了农村出身者約占80%的国軍的士气，而强調了救济农村的必要性，并由后藤农相提出了以減輕农村負担为重点的具体方案。但是，忙于筹措龐大軍費并尽量防止通貨膨脹的高桥藏相等却反对增加农村救济费，仍然提倡自力更生，因而發生了对立。会議于12月决定了振作农民精神、徹底發展农村合作組織、減輕农戶負担、統制重要肥料、蚕絲对策方案等五項对策，但是关于其所需預算，高桥并沒有給予保証，所以实际上会議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后藤农相所代表的新官僚，却乘此机会与軍部合作，發展了自己的势力。一般說来，法西斯主义在其形成时期，总是提出反資本主义的口号，鼓动危机中苦悶掙扎的中間阶層，使其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在日本却把主要目标放在苦于农业危机的农村，荒木陆相和后藤农相的这一主張意味着，通过农村对策来阻止地主及自耕农阶層的沒落，并爭取这些阶層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但在內政会議上这种主張未被接受，而通过了高桥大藏相的自力更

生的路綫，这說明了一向以低米价、低工資作为有利条件的壟断資本，是不肯輕易地对农民的要求表示讓步。也可以說，沒有受到工人、农民强有力的抵抗就走上發展道路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甚至不肯付出籠絡人民的釣餌。1934年1月，荒木陆相辞职，林銑十郎繼任。这是由于五相会議和內政会議的結果引起陆軍內部对荒木陆相有了不滿的原故。

帝国人造絲公司事件

五相会議、內政会議不要政党参与决定国策的作法，自然要引起遭到排挤的政党之間进行合作的活动。他們提倡“回到政党政治的道路上来”，高呼“反对法西斯”，但实际上，这只是被排挤于政治舞台以外的政党企圖适应时局来恢复自己势力的一种尝試而已。他們抓住在1934年度預算中由于軍費的龐大造成了財政紧張，因而压縮了农村救济費这一点，攻击軍部，企圖将由于內政会議的失敗而引起的农民反政府气氛引向軍部。对此，軍部發表了所謂“关于軍民离間的声明”，进行反駁說：“最近就預算及其他問題，有不少人肆行离間軍民关系。例如：把1936年的危机說成是为了軍部的利益而制造的宣傳；或者說以往在战爭中陣亡的都是平民百姓，而高級指揮官中沒有陣亡的；或者說农村問題成了軍事預算的牺牲品，等等；对于这种挑撥軍民关系的活动，軍部絕不能置若罔聞”。看来，政党似乎抛弃了奉承迎合軍部的态度，而提出了独自的主張。实际上这些政党的政策，和走向战爭的政策并沒有不同之点，他們的野心很明显地只不过是为了爭权夺利而已，因此，政党的合作运动从一开始便孕育着分裂的因素。

在考察政友会和民政党这样大政党的动向上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党的有力的靠山壟断資本的态度有了变化。如前所述，財閥們通过軍事生产，加深了它們与国家財政的結合，同时也加强

了同軍部、官僚之間的关系。而且，对于社会輿論的非难，它們也有了"自肃"这样一个口实，这就使得它們与政党的关系逐漸疏远了。据三井的池田成彬說，繼1932年选举之后的1936年选举起便停止了对政党的捐款(財界回顧)，这种傾向在当时就已經产生了。因此，失去了經济背景的政党，力量不能不削弱了。但是，这种情况并沒有削弱財界对政治的發言权。財界放弃了單純利用政党的道路，它反而扩大了对政治的影响。以財界的头面人物乡誠之助为首，并有永野护、長崎英造、小林中等財經界人士参加的"番町会"，这个时期在幕后政治上起了很大作用，便是一个例子。

总之，以这种財界的动向为背景的政党合作运动存在着两条路綫，其一是政友会的鳩山一派与民政党的町田、賴母木等互相合作的旧有路綫；另一条是以新兴財閥为背景而抬头的政友会的久原与民政党的富田、俵合作的路綫；这两者的关系还是对立的，而后者代表着更为接近法西斯的路綫。这样，政党合作运动不仅沒能提出一个統一的强有力的主張，反而引起了政党內部的斗爭，导致了政党的分裂。政党合作运动，由于1933年12月以"番町会"为背景的中島久万吉商工相从中斡旋，有了某些进展，但政友会的久原派及右翼，在六十五次議会中对于政党合作运动，进行了不断的攻击，于是，倒閣运动也活跃起来了。头一个遭到攻击的是中島商工相，貴族院的菊池武夫(后备役陆軍中将)抓住中島的旧著"足利尊氏贊美論"而进行了攻击，中島終于辞职；接着，鳩山文相也因为久原派的議員岡本一已所揭發的紀律問題而辞职了。接着，帝国人造絲公司的事件也被揭發出来，被視为斋藤內閣的后台的"番町会"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这个帝国人造絲公司原是造成金融危机根源的鈴木商店的子公司。在危机發生后，台灣銀行作为鈴木的債权担保，持有二十二万帝国人造絲公司的股票，后来鈴木商店总

經理金子直吉等預料到股票的漲价，就想購进这批股票，而托“番町会”的成員們代为斡旋。这次購买股票是成功了，但在購买过程中，在購买价格問題上竞买者之間發生了紛歧，未买到手的人認为其中有行賄和受賄的行为而进行攻击，掀起了一个很大的貪污案。台灣銀行和帝国人造絲公司的首脑和“番町会”有关人員以及大藏次官黑田英雄等人，都陆續受到傳訊，并流傳着中島、鳩山、三土等前內閣和現內閣的閣員也与此案有关的說法。从这个事件后来被宣判无罪这一点来看，当时有人企圖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倒閣活动，把这一事件甚至宣称为司法界的法西斯主义。不难推想，在檢察官員的背后有夺取后任內閣的司法界元老平沼騏一郎位置的企圖。平沼派与斋藤內閣之間的斗爭是由来已久的。在此以前即 1934 年 5 月，樞密院議長倉富勇三郎辞职时，預料将由副議長平沼騏一郎升任，但是与这种預料相反，斋藤首相受到西园寺的指示，任命了前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为樞密院議長，加强了宮廷重臣的势力。随后，在六月間又把和伊东己代治、平沼等共同形成樞密院的中心势力的二上樞密院書記官長調任行政裁判所長官，从而瓦解了平沼的势力。

但是，如前所述，企圖打倒斋藤內閣的策謀，虽然在議会中受到政友会多数派力量的压制，暫告平息，但在議会中出現的相互漫罵和攻击，使得漸有起色的政党的威信重新扫地了。随着对帝国人造絲公司事件的調查工作的进展，势必追究到大藏相的責任問題，因此，斋藤內閣終于不得不在 7 月 3 日宣布辞职了。

斋藤內閣是在政党衰退时期，代替政党內閣而組成的第一个举国一致的內閣。从这个內閣成立的情况来看，它是糾合龐杂的政治势力——重臣、政党、官僚、軍部等——組織起来的大杂院式的內閣。因此，这个內閣总是不断由于內部对立而不断地發生动搖，始終未能提出其独自的政治方針，而且也沒有推行这种方針的

政治力量。結果，在各种势力牵制之下，未能前进一步，最后，一方面是迴避了五·一五事件后政局的突变、一方面則起了使政局逐漸轉向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消極作用。而且，它在形势面前所表現的这种被动态度，給予人們一个“过渡存在”的印象，它一面受到急进法西斯势力的非难和攻击，同时还被当作了發展法西斯势力的一个跳板。

軟弱无力的岡田內閣

斋藤內閣总辞职后，元老西园寺根据原定計划，召开了重臣会議，討論繼任首相的人选問題。在会議上，和西园寺交換过意見的斋藤首相推举了預备役海軍大将岡田啓介为首相候补，然后經西园寺的推荐，岡田就受命組閣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岡田內閣在很大程度上是斋藤內閣的延續。其所以选中了岡田，是为了准备应付 1935 年在倫敦举行的修改海軍裁軍条約会議，其次，前內閣的垮台是由于違法乱紀問題，所以这次必須选出一个与此无关的人物。西园寺对岡田在处理 1930 年的倫敦条約問題时所显示的政治手腕給予了很高的評价。

岡田以前任斋藤內閣的后藤农相和河田拓务次官为組閣参謀着手組閣工作。首先决定使前內閣的陆、海、外三相留任，随后决定任命后藤为內相，前內閣藤井大藏次官为大藏相，小原东京高等法院院長为法相，在这些重要职位上都安置了官僚以后，才向政民两党提示了大臣的职位和名單，邀請参加內閣給予协助。民政党接受了这个邀請，派町田忠治、松田源治参加內閣；而政友会則拒絕給予协助，不过，政友会中反鈴木派的床次竹二郎等三人却不顧政友会的开除处分强行参加了內閣。从組閣的經过来看，岡田內閣显然具有濃厚的官僚色彩。同时，这种官僚势力的扩張是在“澄淸政界、肃正官紀”的名义下实現的。斋藤內閣虽称为举国一

致的內閣，但沒有政治勢力为其基础，內閣的政策仍不免搖摆不定。这个进一步加深了官僚色彩的岡田內閣，由于官僚內部的不統一，因而这种缺陷更为突出，随着政局的糾紛，很快地就暴露了它的脆弱性。

岡田內閣在組閣期間，接受了陆、海軍对他提出的强硬要求。海軍的要求是对于裁軍会議采取强硬态度和廢除华盛頓条約；陆軍的要求是改革在"滿"机构。

曾經在日本引起統帅权問題的倫敦海軍裁軍条約到1936年滿期，規定在期滿的前一年再召开一次倫敦会議，以便协商修訂問題。海軍从組閣的一开始，便主張廢除华盛頓条約，并主張爭取在总吨数上与美国平等，为了貫徹这一主張，还玩弄了种种手段，例如通过軍令部总長伏見宮直接向天皇陈述意見，以及召开海軍首脑部会議等等。岡田內閣反对将对方显然不能接受的提議带到会議上去，为此曾一度考虑更換海軍大臣，但究竟抵抗不过少壮軍官的压力，而对海軍方面作了讓步。其結果，在同年十月召开的倫敦会議上，日本主張規定共同最大限額，而美国則主張按比例加以限制，于是双方發生了冲突，虽經英国居中調解，但未能使双方意見趋于一致，会議終于宣告休会。在裁軍会議的背后，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在加紧推行造艦計划，以期在裁軍会議上占据有利地位。日本政府向美、英、法、意四国提出照会，要求共同廢除华盛頓条約，但是遭到了一致拒絕，至十二月底，日本政府發出通告單独廢除华盛頓条約。

陆軍提出的改革在"滿"机构問題，归根結底，是要把所有在"滿洲"的日本政治和行政机构完全掌握在陆軍手里。到当时为止，日本在"滿"机构，实际上是采取了由一人兼任关东軍司令官、駐"滿"大使、关东州長官的过渡形式，改革机构問題一直是个悬案。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內閣会議終于通过了陆軍的方案。这次

改革的內容是把有关日本在“滿洲”的一切事务由外务和拓务两省分別移交給內閣直屬的对“滿”事务局，并撤消关东州長官，在駐“滿”大使的管轄下另設关东州厅長官，由关东軍司令官兼任駐“滿”大使。同时，一切警察权、包括南滿鉄路附屬地的警察权在內，也統归軍部掌握。从經济上来看，軍部获得了自从提出滿鉄改組問題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对南滿鉄路的监督权，这一点是有重大意义的。对“滿”事务局在 1934 年 12 月成立，总裁由林陆相兼任。这次在“滿”机构的改組，是在制度上肯定了由陆軍掌握对“滿洲国”的“指导”权和关东州、“南滿鉄路”附屬地等的行政权，也是容許軍部管理一般行政的开端。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曾遭到了拓务省官吏、特别是关东厅警察官的猛烈反对，这一点也表明了內閣政治力量的軟弱。

与此事大約同时的 10 月 1 日，陆軍省的新聞組發行了以“国防的意义及其强化”为题的所謂陆軍小册子。在小册子的一起首就說;“战爭是創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国防’是国家壮大、發展的基本动力”，主張国防的优越性和建設“国防”国家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說明，为了应付紧張的国际形势必須扩充軍备，必須采用統制經济和救济农村和漁村。这說明軍部巳經作为一个政治势力准备登上政治舞台，它主張在內政方面也要貫徹建立广义的国防和建設“国防”国家这一方針。但是，巳于年初召开的第六十五次議会上，由于軍部發表了关于离間軍民的声明，政党方面曾就扩大軍事开支和救济农村、漁村之間的关系进行了追究，結果陆海軍委員会与軍部的声明相反，不得不承認軍費开支完全流入重工业部門的壟断資本手中，不仅农村无分，就連中小企业資本家也很难均沾到一点。

由于軍部的得势和貫徹了它的要求，1936 年度的預算中軍費有了显著的增加，陆海軍省的經費达十亿零二千余万日圓，占岁出

总額的46.6%。因考虑到軍費的激增和通貨膨脹的危險，从这一年起，农村救济費被取消了，对于1934年的关西風水灾和东北的霜冻灾，也未能采取充分的对策。在这期間，藤井藏相代表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想尽量維持健全財政的方針，主張对战时产业征收临时利潤所得稅，結果遭到了閣員的激烈反对。藤井藏相就在編制这个困难的預算途中死去，由前任大藏相高桥接任。从这时期起，政民两党的合作又复活了，它們在1934年11月召开的第六十六次議会上，猛烈地攻击了軍費偏重的跛足預算和对于救农救灾对策的輕視。但是两党仍然不能一致对政府采取坚定的态度，政友会也沒有拚着解散議会也要斗爭到底的勇气。虽然如此，在議会閉会以后，岡田內閣的脆弱性更加暴露出来，斋藤內閣曾被評为"动作迟緩"，而岡田內閣則被評为"沒有动作"。这个內閣所以能够維持下去，不过是由于軍部想通过它来貫徹自己的要求而已。

天皇机关說問題

1935年，發生了天皇机关說問題，这一問題成了当时在逐渐尖銳化的政治上各种对立的焦点。所謂天皇机关說，就是美濃部达吉在明治末期，因反对当时社会所公認的天皇主权說而提出的宪法上的一种学說。明治宪法第四条規定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攬統治权并依据宪法之規定行使之"。在解釋这一条上面，天皇机关說否定了天皇为統治国家的主体(天皇主权)，主張統治权屬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統治权。因此，天皇机关說否定了国家統治权單独屬于天皇，虽然不够徹底，但却构成了政党內閣制的理論基础，同时还强調了天皇行使統治权并非毫无限制，而应受宪法的約束。在这一点上，天皇机关說是反对旨在巩固軍部和官僚在国家机关中的專制地位的天皇主权說，而承認以代表国民为出發点的議会应有自己的地位和权能，这个学說

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以后的宪法学界占据了統治地位。因此，对天皇机关說的攻击，原来是意味着軍部与官僚势力对于議会势力的攻击，但在实际上，由于这件事和当时的局势糾纏在一起，因而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內容。

这个問題，是由于陆軍中将菊池武夫在第六十七次議会开会期間在貴族院里攻击美濃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說，而美濃部达吉又对此进行了反駁而引起的。在最初，就連林陆相也曾說过："美濃部博士的学說，經过数載的傳播，沒有給予軍部以不良影响的事实"，这个学說并未成为問題。但是，这个問題被貴族院的国粹主义者和对岡田內閣抱有强烈反感的在野党政友会提出来以后，就形成了攻击政府的焦点，軍部也公开地对天皇机关說展开了攻击。在使这个問題發展成为社会問題上面，特别不能忽視的是，分發了十五万册攻击天皇机关說的小册子的全国在乡軍人会所起的作用。象上述这样一个脆弱的政府，当以軍部为中心的各种势力加强了攻击以后，一面附合着这种攻击，一面却又極力想把問題敷衍过去。天皇机关說問題的發展撼动了政局，其結果，引起了 4 月間的禁止發售美濃部博士的著作和对美濃部博士加以处分的問題，以及政府在 8 月和 10 月先后两次發表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的問題。問題所以这样越鬧越大，一則因为政友会和軍部中的急进派企圖借此問題进行倒閣活动，二則因为当时的一木樞密院議長、金森法制局長官被認为是天皇机关說的信徒，所以平沼一派就想利用这一問題来打击一木以及重臣們。这些企圖均未得到成功。不过，作为压迫言論自由和發展法西斯的手段，它們倒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天皇机关說問題，进一步又与陆軍內部的派系斗爭糾纏到一起，演变得更加复杂了。对于天皇机关說問題的扩大，在陆軍中起了积極推动作用的是和荒木同为皇道派巨头的眞崎甚三郎教育总

监，眞崎甚三郎向全軍發出了关于明确国体的訓示，因此受到了政府和重臣方面的嫉視。7月，眞崎与林陆相之間發生对立，林迫使眞崎辞职，其結果，林在閑院宫参謀总長的支持下获得胜利，更換了教育总监。这样一来，皇道派即認为林勾結重臣、官僚、財閥而撤換了眞崎，認为这是沾汚"皇軍"，侵犯統帅权，結果在8月發生了相澤中校刺杀統制派的智囊永田軍务局長的事件，林陆相因而辞职，由川島大将繼任。这种軍部內部的对立，后来發展成为二·二六事件。

与此同时，作为日本經济窘困的一种反映，在編制預算时發生了尖銳的对立。九·一八事变后，每当編制預算时，站在金融資本家的立場上想維护"合理"財政的大藏省的官僚与要求扩大軍事开支的軍部之間，就要發生尖銳的对立，而总是前者受到后者的威逼，同时这种傾向是愈演愈烈了。1935年11月，討論下年度預算的內閣会議由于爭执不得进展，第三天会議竟徹夜举行。陆軍在当晚發出威胁性的声明說："此次陆軍的預算是有关对完成目前我国全部国防責任和建立不可缺少的、永久性軍备的基础事項。对于陆軍眞正从国家和国民利益出發的以往和現在的預算要求，如果有人說軍部如再无理坚持下去的話，恐怕要惹起国民不滿云云，这应該說是在国民面前肆意誣蔑軍部"。从这一方面也使政治上的矛盾更加深刻了。其次，在1935年12月召开的倫敦裁軍会議上，日本代表坚持旣定的共同最大限額的原則而退出了会議，从而投入造艦竞賽，这也加深了內部的矛盾。

岡田內閣的加强

政局的糾紛表現在天皇机关說这一問題上，說明了当时的政局正处于攻守双方僵持不下的状态。对此，岡田內閣也未能提出任何积極的对策，只是設法加强內閣。1935年5月設置了內閣审

議会和內閣調查局一事，便是这种加强內閣的第一次尝試。然而，这不仅是加强內閣的措施，同时也是随着統制經济的进展和开始走向“国防”国家以后的必然要求。审議会是对重要政策进行調查和审議的諮詢机关，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包括重臣、貴族院、政党、財界的代表的一个純政略性的机关。岡田內閣在拉攏財閥的代表池田成彬(三井)和各务謙吉(三菱)参加內閣的工作上是成功了，但这时还沒能得到政友会的支持，只是望月圭介等人退出政友会参加了审議会而已。对以后的政局發生了影响的还是它的事务局，也就是以后發展为企划院的內閣調查局。

这个內閣調查局，是由各省的調查官組成的以官僚为中心的政策参謀本部性質的机构。長官是內閣書記官長吉田茂，担任調查官的是鈴木貞一(陆軍)、山田龙雄(大藏)、和田博雄(农林)、奥村喜和男(遞信)。在这里，中級官僚同校官一級的軍人在一起研究了国策，这对以后的統制經济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到了二·二六事件以后，在广田內閣制定战时体制政策上面，这些人异常地活跃了。

作为官僚內閣的岡田內閣，想單靠“澄清政界”这样的消極口号来表明它的存在意义。它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取締暴徒帮和整頓选举。取締暴徒帮是从1935年开始的，这个措施的特点是，不是單純地依靠警察，而是作为內閣的方針来执行的。这样做，一方面是要对趁着天皇机关說問題而开始猖獗起来的右翼团体加以統制，另一方面也企圖炫示官僚內閣的中立性。暴徒帮与政党之間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的，它們在选举时多半充当政党的工具，政党內閣对于它們是不可能徹底加以肃清的。因此，官僚內閣采取的这种措施固然也受到了社会上的贊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統治，向下层群众中間的滲透。其次，由后藤內相倡导的整頓选举运动，是在各府县設置选举整頓委

員会，举行恳談会、講習会等宣傳活动，以期整頓选举。但是，这个委員会的会長是县知事，中央的整頓选举联盟的首脑是前首相斋藤，委員由各府县厅的官吏、审判官、檢查官、市鎮村長和校長等担任，因而官僚色彩十分濃厚。官僚势力大約是想通过整頓选举来爭取群众和軍部的支持，并使政党在受到"澄淸"以后再度發展，然后再利用政党和軍部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政友会想在1936年1月召开的第六十八次議会中就明确国体問題对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但政府却在它还沒有提出以前就解散了議会。由于随着整頓选举而来的取締的加严和政、民两党感到組織政党內閣的不可能等原因，使得竞选斗爭并不尖銳，以致这次大选气氛低沉，2月20日举行选举的結果，各党派所得的議席："民政党二百零五席、政友会一百七十五席、昭和会(以政友会脫党者为中心組織的)二十席、社会大众党十八席、其他无产者各党派六席、国民同盟十五席、国家主义团体三席、中立派二十六席，民政党取得了胜利。其中，社会大众党的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尽管它受到整頓选举的影响，但并沒有遭到政府露骨的压迫——不仅沒有压迫，据說首相秘書官迫水还向麻生久提供了选举經費(岡田啓介：回忆录)。这是由于政府鑒于国民不滿法西斯势力的發展，因而对这个最大的合法的无产者政党有所期待，虽然这个政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領导干部在法西斯主义面前还表現着动搖和走向反动。

第三节 "非常时期"的体制和压制言論

工农运动的低潮

正如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所預料到的那样，日本資本主义体系中的各种矛盾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农村的危机，愈来愈尖

銳了。在工人阶級斗爭的同时，在农民运动方面，也展开了深刻的佃农的斗爭。特别应該注意的是，中小企业中沒有組織的工人也起来参加了罢工斗爭；而农村中的土地斗爭的浪潮不仅有貧农参加，而且还把中农阶層也卷进来了，他們高喊着“不得土地毋宁死”的口号，进行了斗爭。与此同时，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發，为实踐“变帝国主义战爭为国内战爭”的国际綱領而展开的反战斗爭当然也就迅速地加强了。

工資水平表

年次	名义工資指数	零售物价指数	实际工資指数
1930	100.00	100.0	100.0
1931	92.0	87.1	105.3
1932	89.4	88.0	101.5
1933	90.4	94.6	95.5
1934	92.9	95.7	97.0
1935	92.8	97.5	95.1
1936	93.0	102.6	90.6
1937	98.0	112.2	87.2

（根据楫西光速、大島清、加藤俊彥、大內力等著:《日本資本主义的發展》）

劳动斗爭件数及参加人数表

年次	件数	人数
1932	870	53,338
1933	598	46,787
1934	623	49,478
1935	584	37,650
1936	546	30,857
1937	628	123,730

（帝国統計年鑒）

然而，如前节所述，由于事变的进展發生了軍需通貨膨脹，資本家获得了龐大利潤而把殘羹分給了工人，这样，仿佛使工資稍微有所提高，使失业者有了就业的机会。不过，名义工資的提高，远远低于物价的上漲，反而劳动时間被延長，实际工資被降低；新就业的失业者多半是作临时工，工資也非常低，并且工作条件也是不安定的。虽然如此，这种情况在沒有組織的工人的脑子里，还是引起了景气恢复的幻想。再加上政府加强了鎮压和工会干部中改良主义者的动搖，因此在1932年以后，工运的攻势逐漸衰退了。这就是說，斗爭次数和参加人員，除了1937年以外，逐漸趋向減

少，而工会的組織率也从 1933 年以后急剧下降了。与此相反，由 1934 年东北地方的大灾荒所反映的农业不景气，虽在軍需通貨膨脹中仍然繼續着，并产生了严重的事态，佃农的斗爭和参加人数从 1932 年到 1935 年之間，逐年都有增加。在共产党領导下的全农全国会議，以發动索取政府存米的斗爭，把缺米的貧农組織起来，并与日本消費合作联盟在城市中發动的"要米斗爭"相結合，一时形成了很大的声势，通过这次斗爭，暴露了政府大量囤米和資本主义的对外傾銷的眞象。

然而，如前所述，工人运动的衰退进而阻碍了农民运动的發展，虽然佃农斗爭的件数逐漸有所增加，而每一次斗爭的参加人数却有减少的趋势，还逐漸地趋向于分散的、小規模的斗爭。这种情况，給利用农民的反資本主义情緒而标榜反动的农本主义的右翼运动，以及把佃农与地主在土地問題上的糾紛說成是"土地飢饉"問題而主張用对外扩張来求得解决的国家主义运动，提供了掌握地主以至中农阶層、把农村变成法西斯势力的地盘的机会。

工农运动如此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进步政治力量的动搖和分裂。1934 年，社会大众党在題为"国防的意义及其强化"的陆軍小册子事件中暴露了法西斯主义者的眞面目。麻生总書記宣称："日本的国情促使軍队和无产阶級在打倒資本主义的社会改革中，必然实行合理的結合"，公开地支持了陆軍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該党領导人物并說："工会应尽量避免罢工，为此必須含泪忍受削减工資，使三十人被解雇的止于二十人被解雇，"(西尾末广在議会上的演說)，他还强調在"非常时期"的"勤劳奉公"和"产业报国"。在他所屬下的总同盟，从阶級协調主义思想更后退一步，变成了御用工会，它和日本工会联合会、海軍劳动联盟、东电爱国同盟、邮遞員同盟等当时陆續产生的以日本主义为招牌的右翼国家主义的团体，共同支持了无产阶級政党的右傾。領导农民运动的主要組織

全日本农民协会，亦在 1931 年脱离了左派而向右轉(左派結成全农全国会議)，并且在 1934 年的第七次大会以后，几乎陷入了停止活动的状态。

政府的鎮压越来越凶，白色恐怖的猖獗达到了極点；以“非常时期”为借口，誣蔑和工农运动有关的人士为不奉行国策者、无爱国精神者，以国賊对待，予以非法逮捕，进行慘无人道的拷問，岩田义道、小林多喜二等人就是在这样迫害下牺牲的。在这以前，破坏了共产党領导机构的特务組織，后来又把魔爪伸向工农救援会、共产青年同盟等外圍团体和日本工会全国协議会、全农全国会議等的下級組織，以及日本无产者文化联盟等文化团体。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說，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佐野学和鍋山貞亲的变节。

佐野学和鍋山貞亲的变节

1933 年 6 月，拘押在獄中的佐野和鍋山二人，在上訴公审中發表了一个“告共同被告同志書”的声明書。这一声明的要点是：“日本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看来似乎革命而实际上有害的廢除君主制的口号，这是根本的錯誤”，并主張脫离共产国际。这种变节的理論，否認了革命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它在說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抹煞阶級斗爭，主張民族統一。这些主張必然导致放弃对天皇制的斗爭，正如佐野所說的“促使我改变主意的动力，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爭形势”(«与共产国际袂别»，“改造” 1933 年 8 月)，这意味着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佐野是知識分子出身，鍋山是工人出身，同是負有众望的共产党最高領导人之一，正因为如此，这个声明給了当时的人們以極大的聳动。接着，三田村四郎、高桥貞树、中尾和風間丈吉等也紛紛表明变节，这样，就开始了所謂变节时代。根据司法省行刑局的統計，从佐野、鍋山声明变节以后，到下个月的月底为止，和治安維持法有关的变

节及脱党分子，在未判决的一千三百七十名中有了四百十五名，在已判决的三百九十三名中有了一百三十三名之多。出現了这么多的变节分子，多半是以健康恶化，家庭观念和生活困苦等为理由，实际上是經不起慘酷的拷問和長期拘押生活的考驗，同时，也是在随着战爭而来的鼓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皇室的历史傳統等等“理論”的迷惑下开始变节的。司法当局根据变节与否作为量刑标准的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些变节分子不管是有意識的变节还是无意識的逃避斗爭，所有这一切匯集起来，形成了一个麻痹良心的風潮。如河上肇博士一边流露着出卖良心的苦恼，肯定自己是阶級斗爭的逃兵，一边却还是向当局表明脱离革命，这件事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同情，但是，他的內心即使是誠恳的，反而因此使人感到变节似乎是无法避免和迫不得已的，而容忍这种行为，因此他仍然是起了消極作用。在这个时期，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运动，不仅受到外来的打击，而且由于內部的涣散，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从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納普)到日本无产阶級文化联盟(克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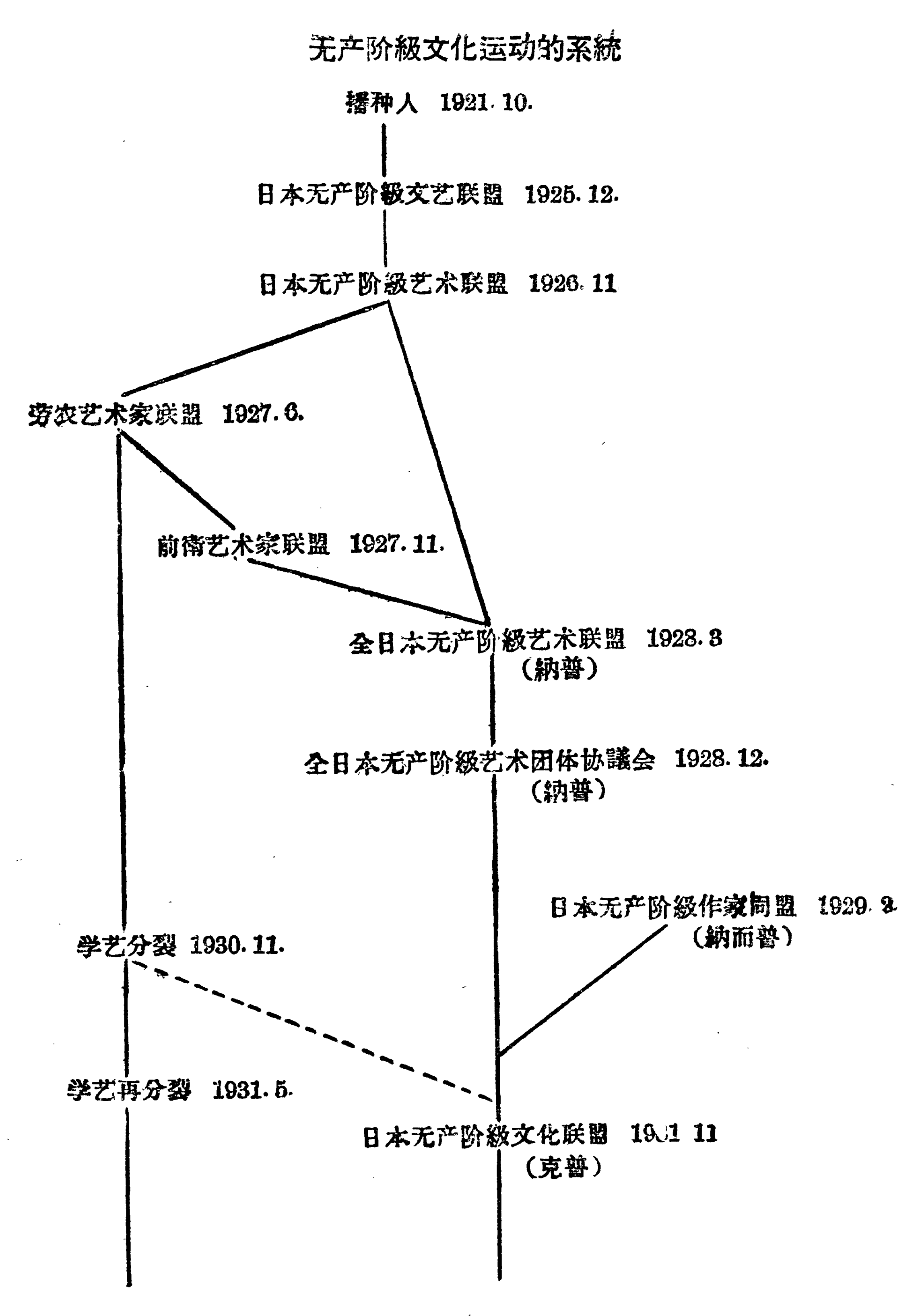
无产阶級文学界的变节情况，受到了报刊上大張旗鼓的宣揚，使人們感到知識分子失敗了。在介紹这个問題以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在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成立以来的无产阶級文化运动的經过情况。以“把无产阶級艺术带給全体无产者”为任务的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把“无产阶級艺术”和“前衛”加以合并而創刊了“战旗”，在这个刊物上陆續發表了在理論方面和創作方面的指导性的意見。这个机构分为文学部、演剧部、美术部、音乐部、电影部、出版部等六个部門，至同年12月实行改組，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協議会”。所屬各部門从次年年初起，分别改为日本无产阶級作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級剧

場同盟、日本无产阶級美术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級音乐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級电影同盟等，并开始了活动，它們以“艺术运动布尔什維克化”为目标，倡导唯物辯証的創作方法的理論，而与当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的工农艺术家联盟举办的“文艺战綫”相对立。1930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工会国际第五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級文化及教育組織的作用与任务的綱領”，出席此次大会的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团体协議会的領导人藏原惟人于1931年3月回国后，發表了“无产阶級艺术运动的組織問題”（彙入“艺术論”一書），在法西斯風暴的襲击下，批判了以往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活动方針的非政治性和文化主义傾向，以及它同法西斯进行斗爭的軟弱无力。这个理論被采納为此后无产阶級文化运动的基本方針。早在1930年4月發表的“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团体协議会的艺术家的新任务”一文中，藏原就要求加盟艺术家必須建立起与社会民主主义完全不同的、明确的“共产主义观点”；又在1931年9月發表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一文中，坚决主張不应該采取“与无产阶級及其政党需要毫不相干的題材”。这样，无产阶級文化运动就明确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了。接着，从1931年7月到8月，在屬于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团体协議会的各同盟外，又有无产阶級科学研究同盟和日本无产阶級世界語使用者同盟，作为科学团体参加进来，成立了“无产阶級文化联盟中央协議会組織發起人会”，在11月，解散了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团体协議会，重新成立“日本无产阶級文化联盟”，創刊了机关刊物“无产阶級文化”。这个联盟作为和无产阶級文化运动統一的协議机关而开始了活动，并制定了以下的章程：“(1)同資产阶級、法西斯主义者及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动文化作斗爭；(2)系統地啓發和教育工农及其他劳动者，使其認識到自己的政治任务和經济任务；(3)滿足工农及其他劳动者在文化生活上的需要；(4)建立以馬克思列宁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級文化。”日本无产阶級文化联盟还沒有来得及充分地实現他們的运动方針，便遭到了1932年3月的大鎭压，藏原、中野、洼川等属于中央組織的有四百多人被捕入獄。宫本显治、小林多喜二虽轉入地下繼續活动，但在接連不断的鎭压中，組織遭到破坏，更由于治安維持法的修改，开展运动越發困难了。自成立以来大約經过了三年，虽然沒有正式宣布解散，但被迫停止了活动。

反战作品

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和日本无产阶級文化联盟，在接連不断的鎭压的風暴中，坚持了反法西斯、反战的文化斗爭。他們发表了許多反战作品，有在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的成立中起了媒介作用的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盟所編輯了一部反对軍国主义的創作集“反对战爭的战爭”(1928年)，在那以后的1929年，黑島傳治又写了一篇“反战文学論”（收在“无产阶級艺术教程”第一輯），闡明了无产阶級反战文学的历史意义和阶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又陆續产生了一些反战反軍国主义的作品。在上述創作集“反对战爭的战爭”中，有一篇“一个士兵的震灾笔記”；想借此来暴露日本軍队的实况的越中谷利一，另外还写了“一个士兵多仲的死”、“等在后面的人”等反軍国主义的作品。写了“軍队病”(1928年5月“战旗”)的立野信之，另外还留下了“成了靶子的那个家伙”、“豪雨”、“紅色的天”等作品。1933年在筑地警察署被杀害的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1929年4月5日的“战旗”)一書中，一方面描写了殖民地漁业工人，同时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国领海进行强盜式侵略的野心。此外，黑島傳治在“列丽雅和馬露霞”(1929年)、“雪的西伯利亞”、“雪橇”、“盘旋着的鸦群”(1927年)、“冰河”(1928年)、和“栗本的負伤”等作品中，通过作者本人作为一个被



征兵士派到西伯利亞作战的亲身体驗，暴露了日本軍队的实况，这些作品与描写济南事件的長篇小説“武装的市街”一样，都是反对战爭和强烈憎恶軍队生活的、感人至深的作品。

黑島的"反战文学論"和小林多喜二的"战爭和文学"（1932年登載于"东京朝日"）显示了反战文学理論的出色成就。然而，当时的反战作品和許多的反战詩，同其指导理論之間有着相当的距离。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无产阶級文学在九·一八事变后陆續不断的大規模鎮压的面前，不得不从积極的反战言論轉向"同反动化的資产阶級文学作斗爭"。

文学以外的其他各个文化部門的反战活动，也是以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战綫为中心而展开的。1928年分裂为屬于劳农艺术家联盟的前衛座（后改名为前衛剧場）和屬于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的无产阶級剧团，在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統一战綫成立的同时，重新合并，作为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演剧部，組成左翼剧場，在筑地首次公演了村山知义的"依旧是奴隶"和鹿地亘的"暴風雨"。以后左翼剧場在1928年9月为了紀念无产阶級新文化运动三周年，在报知礼堂公演了"山"、"父"（久板荣二郎）等剧；为了紀念十月革命，准备在10月底公演"曙光号巡洋艦"（阿芙乐尔），但是遭到了禁止，于是改 以流动剧場的形式到各地展开了活动。1929年，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改組时，以左翼剧場为首的全国无产阶級剧团，成立了以参加剧場演剧的單位为成員的全国性組織，即日本无产阶級剧場同盟。而且在成立大会上，明确地提出了无論是公演、流动剧場还是朗讀等形式的群众性的演剧活动，都应以"拥护工农国家苏联"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爭"为准則。这样，在1929年左翼剧場作为"五一"公演，在上野公园演出了"怒濤"、"沒有脚的馬丁"，接着从6月到7月間，演出了村山知义的作品"战綫"（佐野碩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并奠定了运动的方針，于是，在10月間向当时的三个进步剧团：心座剧团、筑地小剧場和新筑地剧团倡議，成立新兴剧团协議会。由于实行互助的結果，当心座要上演"装甲列車"而遭到禁止时，左翼剧場全体动員起

来給以支持，再次上演了"前綫"。筑地和新筑地两个剧团，在左翼剧場的支援下，竞演雷馬克的"西綫无战事"，热烈地向观众进行了反战的呼吁。此后，日本无产阶級剧場同盟，采取流动剧場的形式，向全国范圍內展开了活动，演出了"暴徒帮"、"胜利的記录"（知义）、"沒有太阳的街"（德永直）、"不在地主"（小林多喜二）等，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反战的性質逐漸衰退下去，到了1934年左翼剧場解散以后，反战的演剧活动几乎絕迹了。在法西斯体制的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只有新协剧团上演了久保荣的"火山灰地"（1938年6月），这算是勉强地承繼了上述的革命傳統。

在电影方面，1929年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級电影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組織了流动放映队并进行了活动，可是并沒有进行过一次称得起划时代的反战电影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演剧的影响之下，电影界从1929年到1930年之間，攝制了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电影。（內田吐梦导演的"活的人偶"、沟口健二导演的"都会交响乐"、鈴木重吉导演的"是什么使她这样"等等。当然，这些影片是"改良的"資产阶級性質的东西，不可能具有反战的性質。）此外，在当时的严格檢查下，被允許公演的苏联电影"亞洲風云"、"前綫"、"土西鉄路"等，給予了日本人民以难忘的印象。

其次，在美术方面的情况是这样：1929年2月，以"克服反动的美术"和"以美术为武器进行无产阶級解放斗爭"作为綱領而成立的日本无产阶級美术家同盟，在全国各地組織流动性的美术展覽，以举办无名画家展覽会的形式进行反正統派的斗爭，举办无产阶級美术大型展覽会，在无产阶級报紙上和"战旗"杂志上开展漫画活动，編輯出版无产阶級漫画和小型插圖集，举办統計图表和宣傳画展等，积極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把大量的反战、反軍国主义的漫画送到群众的面前。例如，柳賴正梦在无产阶級报紙上發表了大量的漫画，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其中，有很多反战、反軍

国主义的优秀作品，反映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阶級斗爭，这些作品一直流傳至今。特别是以“入伍”(“劳动报”65期，1927年1月)、“伪装維持世界和平的裁軍会議”(“劳动报”71期，1927年2月)、“工农支援誰？日本帝国主义在覬覦什么？”(“劳动报”77期，1927年4月)、“呸！这个軍閥政治”(“劳动报”88期，1927年6月)、“怪物徘徊兮天地暗”(“劳动报”116期，1927年10月)、“反对压迫！”(“劳动报”142期，1928年3月)等为中心的反战漫画，都是以雄健的笔法暴露了日本軍閥的侵略野心，并强調向它作斗爭的优秀作品。此外，还有如下的反战宣傳画：“工人在劳动”、“他是甲种合格”、“工人士兵的肖像”、“演習(附有說明語：‘一天一角二分，两年！’)”、“退伍即失业”、“……农民在劳动”、“青年訓練所”、“老农妇在沉思”、“老太太在流泪”(附有‘兒子被抽走以后怎么办？’的字样)”、“軍費大袋吞进农民的捐稅(附有‘另外还得納稅’的字样)”、“农民士兵的肖像”、“……資产阶級用船滿載士兵送往战場(附有‘开战了！’的字样)”、“士兵成了炮灰(附有‘被迫去打中国兄弟和打工人农民的俄国’的字样)”、“后果就是无数的坟墓、坟墓、坟墓……(附有‘所以工人必須为反对帝国主义战爭而斗爭，不过，也必須与农民結成联盟’的字样)”、“互相携着手的工人和农民”、“塞住炮口”、“挺立着的工人与农民”等等。就这样地把各种場面按照一定的次序組織成一个系統来表达了反战的意志，同时，也反映了群众反战运动的方向。

在这些漫画中，一般說来，各个部分里都出了一些优秀的反战反軍国主义的作品，但是由于沒有建立起明确的現实主义的創作方法，所以不久便流于形式，走上說明画的傾向。

无产阶級文化运动的失敗

无产阶級文化运动尽管有了这样輝煌的成就，但也无法掩盖

它的弱点。这就是在理論指导上犯了急性病，勉强要求作家接受不成熟的政治任务。例如，創作的題材有局限于“党的当前的政治任务”的傾向；在組織工作上也有这样缺陷，即：“沒有使全体盟員經常把艺术的和技术的能力发揮在具体艺术活动上，而过多地消耗在許多集会和其他瑣碎事务中”(山田清三郎“战旗”)；此外，創作的具体方法不能与政治实踐結合起来，也是一个弱点。因此，一旦敌人向文化运动展开了“圍剿”，再加上某些作家的小資产阶級动搖性作怪，就紛紛地从机械的政治主义掉过头来，向着它的反面非政治主义逃跑，結果产生了所謂变节文学。很快就脫离了战綫的林房雄，在1933年發表了“青年”，在这篇文章里，表現出暧昧的阶級观点，这种观点后来有了發展，在1936年出版的“壮年”中竟然說：伊藤博文和他代表的絕对主义專制政府，实际上是在日本实現政治自由的力量，借此来迎合軍国主义。然而，多数变节文学的作者比起林房雄来，多少还有些良心。高見順在“应忘故旧”中，一面描写着自己陷于頽廢，另一面却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对于自己的憎恶，想从沒落中寻求摆脫的道路。又如島木健作的“盲目”、“癞瘋”(1934年)，描写了一个在許多人紛紛变节的时期，独自在獄中坚持不屈的坚强性格，在这些作品里，描写了主人公受着“失明”和“癞瘋”这种生理上的折磨，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最后却象悟道者一样从“开悟”中找到了生活的道路，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被視为无产阶級作家叙述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的代表作品之一的村山知义的“白夜”(1934年)，如实地描写了变了节的主人公的“人性”的空虛，引起了反应。中野重治在“村之家”(1935年)、“写不出小說的小說家”(1936年)中，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变节以后心緒不宁的苦悶。如在“村之家”中，主人公勉次回答他父亲的劝告“如果要保身，就必須丢下笔杆”时說：“我知道，不过我还是想写下去”，这句話，誠然是出于这样一种善意，即：想用后退了的

最低限度的活动来尽可能地医治由于变节所給予良心的創伤，并且試圖通过这样做来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但是，这种作法却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变节不仅不被看作可耻的背叛和堕落，反而輕易地俘虏了許多善良文化人的心。

瀧川事件

反法西斯的先鋒共产主义运动被鎮压下去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随之失敗。1933年京都帝国大学的瀧川事件，等于給自由主义敲了丧鐘。鼓吹荒謬玄虛学說的右翼分子蓑田胸喜、三井甲之等原理日本社的同人，从很早以前就攻击"帝大赤化敎授"。所謂"赤化敎授"，是指东京大学的美濃部达吉、牧野英一、末弘严太郎和京都大学的瀧川幸辰等教授而言，而头一个牺牲者就是瀧川幸辰。瀧川幸辰在刑法論里說：犯罪是由于国家組織不良而發生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制裁。右翼分子攻击他，說这是赤化思想。在第六十四次議会上，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問題提出了。当时的文相鳩山一郎要求瀧川辞职。对此，京都大学法学院敎授会認为文部省当局的这种措施，是蹂躪大学的自治和威胁学术自由，而起来反对，学生也高呼保衛大学而举行了反对运动。于是，政府通过文官高等分限令委員会，采取了非常手段，給予瀧川以停职处分。消息傳出后，法学院的敎授、副敎授、講师、助教等三十九名立即联名辞职，事实上使法学院陷于关門状态。后来，敎授团内部發生分裂，佐佐木惣一、宫本英雄、末川博、恒藤恭等八敎授离开了大学，由留下来的人們重建法学院，但是它已經不配称为学府，只不过是一个无自由的殘骸而已。瀧川事件作为侵犯大学的自治和思想自由的一个事件，广泛地喚起了社会上有識者的共鳴和同情。尽管如此，然而各大学的敎授們只是在口头上責难政府的压迫，而沒有采取共同行动来进行反对。学生們在全国范圍

內掀起了反对运动，可是沒有很好地和工人及市民保衛生活的斗爭結合起来。甚至在馬克思主义者之中，还有人只是从教条主义出發，站在旁观者的立場进行了批評，說什么資产阶級自由主义已經沒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好为維护学术自由而牺牲了。过了二年以后，發生了天皇机关說的問題，第二次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美濃部博士。法西斯的暴力无休止地猖獗起来，以至于毫无理性地汚蔑从事純粹学术研究的学者为"叛变者"、"学匪"，但是到了这时，知識界已經看不到象瀧川事件时的那种抗議，而只是在灰心和沉默中坐等失敗了。

教育界的右傾

在瀧川事件的同一年中發生的另一次聳人听聞的事件，就是小学教員的赤化事件。"非常时期"的压力，最凶狠地施加在教育界。三·一五事件以后，学生的科学研究会和学生联合会全部被解散，学生的自治运动受到了鎮压，同时在政府的肃清"左傾教授"的方針下，东京大学的大森义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九州大学的佐佐弘雄、石濱知行、向坂逸郎等教授均被迫辞职。而在同年10月，文部省在專門学务局里添設学生科，在它的統轄下，在各大学、高等学校和專門学校設置学生主事，从事調查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傾向，积極地开始了訓导工作。次年，又添設了社会局，对学校以外的在职青少年施行了严格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和訓練，企圖实現"教化总动員"。1931年7月，政府成立了学生思想問題調查委員会，次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开始徹底統制思想，1933年，設立了思想局。至1935年，成立了青年学校，每年对数十万青年男女积極地灌輸国家統一思想，施行軍事訓練。这是把原有的实业补習学校和青年訓練所合并而成的，无非是陆軍

对未来的士兵——青少年施行軍事預备教育的要求和文部省实行实业补習教育的方針互相結合起来而产生的东西。随后，又成立了教育刷新評議会，作为政府关于革新和發展教育施設以及整頓学校方針的諮詢机关。評議会在答复中首先叙述了革新教育的方針說："我們的教学，淵源于国体，以日本精神为指导思想，其根本精神在于：以此为基础适应世界潮流的演变，跟随人类文化的进步，力求蓬勃發展，以为皇道的發揚光大服务。"基于这个答复，政府于次年9月召开了"諸学振兴委員会"，11月举行第一次教育学会，为貫徹"皇国教学思想"采取了措施。

教师的抵抗

当然，有良心的教师們，也曾对于这种教育的法西斯化进行了反抗。这一反抗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大正时期以来的以教育生活化为目的的教育思想。这是把現有的教材与实际生活結合起来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因为当时只有写作課，沒有国定教科書的限制，所以能够开展通过兒童的作文使教学和他們的实际生活相結合的生活写作运动，并由此促进了昭和时期的生活教育运动的發展。初期的写作运动，是由鈴木三重吉所著"紅色的鳥"（1919年）的写生的影响和狄尔泰一派的"人生哲学"打下了基础的。后来因为受到田上新吉的"生命的写作教育"（1920年）的影响，便从以鑒賞为主的写作轉向重視对生活的表現和指导。然而，其"生活"的內容，只不过是些抽象的东西，把这个运动引向表現社会的現实生活上去的，乃是昭和初期的乡土主义教育思想。它教导学生从历史上、地理上来了解乡土的各种环境，写作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关于村庄的写作"、"关于土地的写作"逐漸盛行起来了。可是，这种写作具有强調爱乡观念和洋溢着怀乡情緒的牧歌式的地方生活的傾向，以致墮入复活乡土神聖权威的国粹主义中去了。

可是，以杂志"写作生活"(1929年出版)为据点的东北青年教师們，却走了与此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他們在农业危机最严重的地方，創立了北方教育社(1929年)，創刊了机关报"北方教育"(1930年)。然而，在危机逐漸加深和生活困苦之中，青年教师們对于如何通过封建色彩濃厚的东北农村来进行教导儿童的写作問題，开始感到苦悶。教师們的眼光逐漸接触到社会中的严酷的現实生活，开始注意到必須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科学的調查工作。其結果便是提倡"調查的写作"、"科学的写作"。这样一来，热爱教育的有良心的教师們就感到苦悶和焦虑，覚得再也不能停留在單純指导表現技术上面了。面对着这种严酷的現实，他們認識到，讓兒童們怎样生活下去的問題同时也是自己如何生活下去的迫切問題，这种認識喚起了他們的自觉和自我批判。青年教师們，通过"北方教育"杂志，推动了以地方为基础的教育并推动了以实事求是地观察事物、把它写成文章互相进行批評的生活写作运动。在生活写作运动中产生的兒童文集，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穿着劳动服的弟弟"(国分一太郎)、"小旗"(鈴木道太)、"藍天"(塞川道夫)、"向阳之家"(坂木良人)等。这个运动得到了秋田、山形、青森等地的青年教师的协助而發展起来。在1934年組成了拥有机关刊物"北日本教育"的"北日本国語教育联盟"，次年成立了"北海道写作教育联盟"，于是，連接着东北和北海道两地的生活教育运动發展起来了。不仅如此，通过"文集"的介紹使全国范圍內对生活教育有理解的青年教师們，对此給予了协助。他們好比在法西斯文化中閃閃發光的一顆"星星"。他們在鎮压的風暴不断襲来的时候，在校長和督学的不断监視之下，在同行教师的背叛和在乡軍人会等法西斯势力的走狗以及土豪劣紳的监視之下，絲毫也沒有放松对于兒童的自治和互助的活动，并頑强地坚持了"什么是可喜的，什么是可悲的"这一基本观念和"一人之喜卽全体之喜，一人之悲卽全体之

悲”的生活实踐的教育。

这个生活写作教育运动进一步同 1935 年創刊的兒童村庄小学校的机关刊物“生活学校”及 1937 年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会的活动互相結合起来了。这种結合也說明了这个运动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教育实踐。

在这样情况下，比較急进的教师組織也得到了發展。早在 1930 年 8 月間，以“作为国际无产阶級科学的一环，建設科学的新兴教育”为目标，成立了新兴教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創刊了“新兴教育”杂志，进行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次年，在日本无产阶級文化联盟成立时加入了联盟，但是在这一年里，杂志的同人被捕，因而完全停止了合法活动。教員工会运动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在 1927 年由青山师范出身的小学教师組織了一个称为“义足同人”的文艺团体，次年改組为以批判研究教育思想为目的的“青年教育家联盟”，1929 年又改組为“小学教員工会”。次年，成立了教育工会，加入了国际教联，同年改組为屬于日本工会全国协議会的一般佣工工会教育劳动部，以“改善教員待遇”、“反对帝国主义教育”、“实現校長公选制”、“职員会議民主化”、“反对督学”等为口号，开展了运动。当然，这样的激进运动是要遭到严厉鎮压的。特别是因为他們是担任培养天皇制思想基础的义务教育工作的小学教員，所以鎮压就更为广泛和严厉。1933 年，在長野县內大批逮捕了“赤化小学教員”，这是以組織非法社团为借口而把所有反对教育統制的教师全部加以清洗的事件。当局在公告中故意夸張了赤化的威胁，这在思想問題鬧得正凶的当时，对吸引世人支持教育的反动化起了充分作用。尽管如此，在奴才思想和封建主义气氛濃厚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农村小学教員之間，在那以后，仍然以生活写作运动为中心，扎实地、也比較頑强地保持了反抗法西斯的精神，这是值得注意的。

“非常时期”的社会風气

来自下面的抵抗力量大为减弱了。从上面强迫人們接受不合邏輯的国家主义思想，使人們感到处在一种与自己的意志毫不相干的、无形的力量在任意地摆布着自己命运的境地。就在这样的政治被凶猛地向前推行的时候，对此不能完全接受的民心，自然而然地沉淪到追求色情、反常以及无聊的低級趣味这种自暴自弃的气氛中。这种情况在城市小市民阶層中間表現得特别突出，不久通过广播、唱片、杂志等也傳播到了农村。1931年出的哥倫比亞唱片“酒是泪？还是嘆息？”和次年出的“慕影”，通过古賀政男的具有独特的哀怨腔調和充滿着頹廢气氛的旋律，風行于全国的每个角落。坂田山的殉情自杀，被視为“到天国結合的恋爱”，引起了青年男女的无限感伤；到大島三原山跳火山口情死一时极为流行，在三个月的时間里，一共自杀了六十名，还有自杀未遂的十六名；男女老幼热中于玩弄毫无意义的玩具；女学生們瘋狂地对“男装美人”水之江瀧子的欢呼；所有这些都表現出一般民众向頹廢中寻求刺激，企圖从这里發現生活意义的一种虚幻的願望。政府在引导学生思想的問題上，采取了所謂三S政策。認眞讀書的学生，有被視为赤化的危險，所以，到咖啡館、酒吧間、跳舞厅去寻求性（Sex）的安慰，用看电影（Screen）来消磨时間，或者热中于体育运动（Sport）就被認为是最安全的；而政府就是在暗中利用了这样的社会風气。1932年夏天在洛杉磯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大会，作为“發揚国威”的机会，被充分利用来进行了爱国思想的宣傳。

忠实地反映时代潮流的是文学。好坏姑且不論，在感到历史車輪沉重的这个时期中，島崎藤村的畢生的巨作“黎明之前”完成了（1929—1935）。作者在这部小說中，精心地描写了明治維新变革时期的浪潮，它是怎样把木曾地方一个寒村中的草莽之士青山半

藏卷进去的，結果他終于不得不悲憤而死。这部作品，确实达到了历史小說的高度成就，給予讀者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里，只描写了主人公作为尊王攘夷的志士的一面，而对于把他徹底粉碎了的明治維新的进展，有了共鳴，作者在內心里似乎有意把这段历史重新加以評价，这也可以說和他后来的作品“东方之門”表現出更加露骨的迎合时局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正在这个时候，在文学評論的領域中，主張“超越近代”的日本浪漫派，乘着无产阶級文学的低潮，抬起头来了。这就是保田与重郎、淺野晃、芳賀檀等一帮人。他們和小林秀雄、林房雄、武田麟太郎等“文学界”的同人們，提出了“文艺复兴”的口号。这在表面上虽然意味着使文艺摆脫政治的統治而走向“复兴”，然而实际上却是加强反馬克思主义的趋势，使文学家丧失同法西斯主义斗爭的意志，为从艺术角色来看相当出色的文学成为政权的奴婢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在不顧这样的时代潮流而一味追求个人天地的旧作家中間，产生了作品，永井荷風在“梅雨的前后”（1931）、“濹东綺譚”中，描写了陋巷生活的情景；谷崎潤一郎在“吉野葛”（1931年）、“盲目故事”（同年）、“割蘆”（1932）、“春琴抄”（1933年）中，把色情提高到幻想和抒情的境地；还有德田秋声的“假想人物”（1935年）是赤裸裸地描写了老丑和痴情的私生活小說。讀者从这种情欲和爱情的文学中，寻求了暂时的安息。在这以前的川端康成的“淺草紅团”（1930）、武田麟太郎的“銀座八丁”（1934）、石坂洋次郎的“年青人”（1937年出單行本）等作品，其所以拥有广大讀者，也是因为这种原故。

由于荒木陆相的演說而普及开来的“非常时期”的歇斯底里的叫喊、装模作样的“日本精神論”和玄虛誕妄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就是建筑在以上这种民众頹廢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节 經营"滿洲"和侵略华北

統治"滿洲国"的方式

日本对"滿洲"的經营，是以准备进攻苏联的軍事設施为唯一重点来进行的。从"滿洲国"成立到1936年之間，可以看做是在政治上、經济上奠定基础的阶段。

关于"日滿議定書"的內容，前面已經說过(第三章第三节)，对"滿洲国"的政治指导，"是在关东軍司令官兼帝国駐滿大使的不公开的統轄之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滿洲国"指导方針綱要，1933年8月决定)来进行的。"日系"官吏，在"滿洲国"政府各部中，不仅占有重要职位，即在人数上，也占中央政府全部人員的36%，在中央到省公署人員中平均占29%，特别是国务院、財政部及监察院等主要部門中，"日系"官吏的比重，更超过半数以上。

在国防方面，根据"日滿議定書"的規定，"滿洲国"的国防全部委托日本軍队承担，"滿洲国"的軍队，仅限于"維持国內治安"，只是担負着輔助性的任务，可是，日本駐"滿"的軍費，"滿洲国"則要分攤。与国防有关而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維持治安的問題，为此，在1934年12月采取了保甲制度。这与日本江戶时代的五人連坐制度相同，使大家負有互相监視、共同負責的义务，借以維持治安。这一制度規定，十戶为牌，牌以上設甲、保，牌內如發生严重犯罪时，各戶主連坐，罰款二元。

"滿洲国"旣不許可有政党組織，也不采取議会制度，而是采取了独裁制度。为了牢固地統治人民，从思想上准备对苏开战，設立了一国一党制的协和会。协和会是"滿洲国"成立时担当政治工作的自治指导部的一部分，是在1932年7月組成的，它与"政府"互为表里地展开了活动。关于协和会的活动，九·一八事变时任

关东軍参謀長的三宅光治中将曾这样叙述过："为此（指准备对苏开战），协和会广泛地展开宣傳，……对会員、特别是青年施行軍訓，积極發展滿洲的工业，特别是軍事工业，……并为着战时的活动，組織了名为'先鋒团'的特别战斗团。……在战爭中，先鋒团的主要任务是，在苏軍后方展开积極的恐怖和阴謀活动，炸毁鉄路、桥梁、軍事倉庫等，以及杀害苏联軍人，等等。"（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公审口供）

"滿州"經济建設是在关东軍特务部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其直接目的还是加强准备对苏开战。其主要內容是，整頓幣制財政，建設鉄路、公路、港灣和通訊机构，以及开發矿山等。在建成的單位中，兵工厂、水泥厂、鋼鉄厂等屬于軍事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占大多数，而紡織厂等和平工业却被弃置不顧，这是值得注意的。試以 1932 年到 1936 年五年間的对"滿"投資額为例，总額达到十一亿六千万日圓，但其中的 80% 主要是通过南滿鉄路投到与鉄路有关的企业方面。这表明了为了把"滿洲"建成进攻苏联和中国的軍事基地，并鎮压"滿洲"人民爭取民主和独立的斗爭，首先需要扩充交通網和通訊網。同时，这还給企圖安然的获取最大限度利潤的日本財閥直接向"滿洲"扩張势力，提供了准备条件。

这个时期的經济建設的进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談。从九·一八事变爆發到 1933 年年底这一段时間，关东軍的反資本主义和"王道乐土"的思想是很濃厚的。在 1933 年 3 月發表的"滿洲国經济建設綱要"，虽較"建国"时略微协調些，但仍然規定："有关国防和国計民生的重要企业，以国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經营为原則"，对此日本国內的資本家并沒有积極地进行投資。为了經济建設，筹集資金是一个紧急的任务，因此关东軍打算通过对南滿鉄路进行改組来达到其筹集資金的目的。南滿鉄路从来就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公司，在政府的保护下利潤也有保障，所以关东軍就想

利用南滿鉄路的信用来籌集資金。1933年10月，关东軍特务部沼田中佐提出一項改組滿鉄的方案，其內容大致可归納为以下四点：一，南滿鉄路改为特殊公司，脫离鉄道部并与傍系公司分开；二，南滿鉄路附屬地行政权归还給“滿洲国”，并廢除治外法权；三，将滿鉄經济調查会和关东軍特务部合并起来，成立經济参謀本部；四，关东軍司令官对南滿鉄路具有統一的經营权。据此，以南滿鉄路为中心的“滿洲”經济机构作为駐“滿”全权府为最高經济統制机关，以經济参謀本部为經济指导机关，南滿鉄路作为控股公司受这些机关的統制和监督，在它下面存在着独立的各个公司。这个方案的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徹底的国家統制机构。这个方案引起了南滿鉄路職員会和日本国內資本家的猛烈反对，南滿鉄路的股票暴跌到六十几日圓，滿鉄發行的五千万日圓的債券推銷成績也空前不佳。在政府內部，首相、大藏相、拓务相等站在各自的立場表示反对，結果，这一改革方案被撤回了。

在这种反对力量的推动下，从1934年以后，关东軍的反資本主义思想，逐漸被修正了。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1933年12月苏美恢复了邦交，从而使日本陷于不利的地位。1934年6月發表了“关于一般产业的声明”，表明：“对于国防上有重要意义的产业、公共事业及成为一般产业之基础的产业等，采取特别措施……，对于其他一般企业，大体上广泛地欢迎民間投資和經营。”次年1935年7月，为了促使日“滿”两国經济合作，設置了日“滿”經济共同委員会。而随着經济建設的进展，也發生了握有“滿洲国”政治实权的在滿机构的改革問題，到了1934年9月，大体上按照軍部的提案，进行了机构改革，这一点前面已經叙过。

在这样对“滿洲”进行經济統治的同时，对采取不承認“滿洲国”政策的英、美等国的平民，在通商上采取了差别待遇。“滿洲国”在“建国”之初，便声明了尊重国际条約和門戶开放主义，但在

1934年以后，对重要物資加以統制，同年夏天，又悍然不顧英、美两国的反对，实行了对石油的壟断。这种做法，明确地否認了在中国的門戶开放政策，加剧了英、美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滿洲"人民的生活

日本的这种軍事上的需要和随之而来的經济建設，究竟給了"滿洲"人民以什么样的影响呢？先从財政上进行考察。这里，暫且不提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以工人、貧农为主体的民族独立斗爭、即所謂"匪賊"扰乱、治安不宁而不得不因襲張学良时代的稅制这一个时期，讓我們先看一看自从公布了所謂"使人民群众的經济生活富裕安定，提高人民生活，充实国力，并对世界經济的發展作出貢献，提高文化，以实現偉大建国理想的模范国"作为"經济建設的最終目标"的"滿洲国經济建設綱要"一年后的1934年度的預算，岁入較上年度增加了39%。在岁入中，地主和資本家所負担的田賦和营业稅即利潤稅(直接稅)仅占10%，而农民和工人負担的消費稅(間接稅)达到89%。并且不只是国稅如此，在地方稅方面，佃农負担的地亩捐，比国稅的田賦还要苛重。其結果，賦稅、公費对現金收入的比例，地主仅为19.8%，而佃农和中农竟达到30—37%之多(如加上地租，将达50%左右)。而且，这里还不包括消費稅。据說，消費稅占农民購买商品价格的20—26%。

这样从农民群众中榨取来的稅款的用途是：軍事費用一項就占去岁出的30%，警察費占6%，司法費占4%，軍人、司法官、警察官的薪金占15%，只是以上这些軍事、治安方面的費用，就占岁出的55%。另一方面，荒歉儲备費，不論怎样高估，也不超过3%。同年度的"滿洲国預算总綱"中，还这样謳歌日本統治者对殖民地的"善政"："因为日滿两国根据議定書实行共同防衛，滿洲国不仅摆脫了以往过重的軍費負担，还巩固了国防的安全和維持了治

安”。可是，真象却是上述那样。

如前所述，事变前的“滿洲”农民，在很高的地租、稅款、大商人和高利貸的重重盘剝下，过着穷苦悲慘的生活。自从日本統治“滿洲”以后，“滿洲”农民的生活，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恶化了。这种情况，从1934年成立了金融合作社一事也可以看出。成立的宗旨，据說是为了建立把农民从高利貸的剝削下挽救出来的“公正的平民金融机关”，但实际上，能認两股出10圓成为社員的人，仅限于富农和地主，并且貸款中99.6%屬于抵押放款，結果，貸款几乎全部流入了有抵押能力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只是对富农起了救济补助作用。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鎭压和剝削“滿洲国”人民，不能不这样以地主、富农作为支柱。这样强加在农民头上的重重剝削，不久，便造成了动搖日本統治的經济基础的严重后果。

世界經济危机所引起的“滿洲”农业的危机，在战乱和随之而来的天灾(1934年的大歉收)的影响下，長期化和日益加深了。于是占“滿洲”出口額80%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其主要部分的大豆、豆餅、豆油的价格發生了暴跌(如在1934年年初出現了十几年来的低价)，随着，当地的工商业者，也陷入了严重的不景气中。这种农村的穷困給日本的經济工作带来了極大障碍。要挽救这种情况，首先必須降低农产品的鉄路运費，然而，当时的南滿鉄路，即使不減低运費，尙且难以吸引日本国內的投資，当然也就做不到这一点。并且，尽管大豆价格暴跌，而欧洲的需要却有所減少，日本的农村也因为不景气而失掉了購买豆餅作为肥料的能力，結果，使“滿洲”貿易一向出超的情况轉为入超。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进口較前增加了，主要是供应“滿洲”的基地建設和駐“滿”軍队的消費，因而把“滿洲”变成日本商品的正常市場的希望就落空了，并破坏着建立日“滿”經济集团的基础。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初对于占领“滿洲”所梦想的計划：日本的投資、滿洲經济發展、日本产业

界繁荣、日本投資扩大，这种循环关系，由于"滿洲"农业荒廢的結果而遭到了慘重的失敗。"滿洲"的魅力，已經开始消失了。

中日的接近与何梅协定

到了 1934 年，日本的对华外交有了急剧进展。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英国面对着由于希特勒取得政权而引起的欧洲的險恶形势，在远东方面繼續执行对日妥协政策，对华也依然采取消極政策。美国虽在执行扩充海軍計划，但在远东方面还沒有采取积極的行动，英、美之間也沒有实現合作。美国从 1933 年初期，开始采取收購白銀政策，致使采取銀本位的中国，往国外流出了大量白銀，經济瀕于破产。这件事造成了中国向英日接近的最大原因，严重阻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推行。苏联与"滿洲国"之間，进行了出售中东鉄路的談判，可是因为日"滿"方面采取强硬政策的結果，例如逮捕中东鉄路职員，在国境綫上頻繁制造冲突事件等等，同时苏联也揭露了日"滿"两国企圖夺取中东鉄路的計划等等，使交涉一时陷于停頓状态。然而，由于美、苏在 1933 年 11 月恢复了邦交，削弱了日本的势力，在此影响下，日苏交涉有了进展，至 1935 年 1 月，苏"滿"双方終以鉄路收买費一亿四千万日圓和鉄路員工退职金三千万日圓为条件，达成了协議。

这个时期的日本外交，是从斋藤內閣后半期上台到岡田內閣仍繼續担任外务大臣的广田所主持的协調主义外交。这种外交政策与"滿洲国"初建时期的状况是相适应的。同时，日本也想恢复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中断的同中国的貿易，在对中国的关系問題上，企圖以承認"滿洲国"为前提条件来調整中日关系，以便促成中日"滿"在政治上、經济上的"合作"。然而，与此同时，正如 1934 年 4 月天羽声明所說的那样，由于国际联盟和列强对华援助，使国民政府得以进行統一国內和經济建設，日本認为这是离間中日关

系，扰乱东亚和平，并将形成对中国的国际共管的局面，因而加以反对。据当时的外务次官重光葵所說，日本的方針是这样："第一，日本必須根据退出国际联盟时的方針，坚决避免对'滿洲'以外的中国本土采取积極行动，以表示毫无野心，并对美国所重視的門戶开放主义，加以特别注意；第二，不希望世界各国不負責任地煽动中国'排日'，給予中国武器或財政上的援助，促使中日間的斗爭趋于激烈；第三，中日两国，应該覚悟到面对着以扰乱为目的的共同敌人共产党。"（重光葵"昭和动乱"）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繼續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但从1934年的年中起，开始有了对日接近的活动。这个方針是在同年8月，由蔣介石、汪精衛召开的廬山会議上决定的，随后便付諸实行。在同年的夏天，恢复了同"滿洲"的通商关系，双方的海关也开放了。11月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偿还对日債务，到1935年还进一步同"滿洲国"开始通邮了。

1934年，可以說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几乎沒有进行武裝侵略的唯一的一年，能够出現这种情况，不外乎是广田外相的对华政策在各个方面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的結果。第一，关于建立中日"滿"的合作关系問題，除上述与"滿洲"恢复通商关系以外，日本同国民党政府之間的修改关税也得到成功，日本的出口逐步增加了。第二，对抗日运动的取締，主要在华北方面由北平政务委員会进行了。第三，关于防共問題，虽未結成共同战綫，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軍的进攻有了进展，以至于占領了苏区中央所在地瑞金。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广田外务相在1935年10月的議会上，又声明了不威胁、不侵略的原則，主張中日合作，中日两国的"亲善工作"由于同年5月双方互派大使而达到了頂点。

对于日本外务省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亲善方針"，以軍部为中心，仍有人加以反对。他們攻击說：国民政府的外交是"伪装亲

日",而在1935年春天,日本軍队重新开始了侵略。軍部采取这种方針,一方面是要借此給予国內"稳健派"一个打击;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受到了德国重整軍备和中东鉄路收买成功等有利的国际形势的鼓励。这一計划,首先是由日本的現地駐軍否定了华北政务整理委員会所采取的协調的态度,而付諸实行的。

1935年在天津的日本租界中,發生了暗杀亲日派新聞記者的事件,日本华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参謀,向北京軍事分会何应欽委員長提出了以下的要求:認为这个事件是中国方面对日本軍队的挑战行为;必須把第五十一軍撤出河北省;封鎖該省內的国民党机关并禁止一切党派活动;并要求禁止該省內的一切排日活动。6月10日,何应欽完全接受了这些要求。这就是梅津·何应欽协定。与此相前后,日本方面的特务机关長土肥原少将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純之間,又签訂了所謂土肥原、秦德純协定。协定中規定:从"滿洲国"国境附近,撤退宋哲元軍队和清除察哈尔省內的排日机关,这可以說是梅津·何应欽协定在察哈尔的翻版。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新的侵略的开始,国民政府还是不想进行抵抗。他們从河北、察哈尔两省撤出了国民党軍,集中全部力量来进攻当时正在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長征的紅軍。国民党政府鎮压一切抗日救国运动,公布敦睦邦交令,禁止組織抗日团体。就連林語堂也說:1935年的夏天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于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的呼声,不但在人民和士兵中,就是在国民党的一部分将領中,也逐漸出現了。这种动向最明显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在冲破第五次"圍剿"后,在北上抗日——長征途中,于1935年8月1日發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書"(八一宣言)。

中国的幣制改革

国民政府的这种对日讓步，使英国担心国民政府是否会变为日本的傀儡政权，而由于白銀問題引起的中国經济的削弱，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安。这种情况反映在英国的对华政策上，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美合作还是对日合作的問題。从1934年到1935年初的英国外交，虽然是采取了后一条路綫，但同时，它还大力参加中国的經济工作，企圖重新巩固其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这表現在，英国一方面在1934年10月到11月派遣英国产业联盟代表团，訪問了日本和"滿洲"，另一方面，用庚子賠款对中国进行了投資。随后在1935年初，它又接受国民政府的要求，向日、美、法三国提議共同对华提供財政援助。美国支持了这个提案，而日本則認为这将招致列强对中国的共管，疏远中日关系而加以反对。这个提案終于在日本反对之下被撤回了。因此，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內部逐漸扩大自己势力的英国，便不再热心同日本取得合作，从此以后，英国就不顧日本的反对，推行了它的对华政策。英国远东政策的这种轉变，是在1935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个轉变的开端，就是經济代表李滋·罗斯的被派来华。1935年6月，英国公布派遣李滋·罗斯到中国，并表示了根据他对中国經济、財政情况的考察报告，将要調整对华經济政策的意圖。同时，也曾邀請日、美、法参加，但未能实現。李滋·罗斯于8月从倫敦出發，繞过华盛頓經由加拿大，9月抵达东京，同广田外相、高桥藏相等举行了会談，然后到了中国。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滋·罗斯是希望英、日共同对华貸款的。可是，这个希望遭到了日本政府、特别是現地駐軍的反对而沒有实現。接着在11月1日發生了汪精衛被刺事件，銀行發生了挤兌，国民政府卽根据李滋·罗斯的提議，公布白銀国有令，进行幣制改革，实行管理貨幣

制，同时，使法幣和英鎊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措施的背后，有英国在財政上的支援。日本一貫的强硬态度，加强了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从此以后，英国的威信就要取决于这次幣制改革的成敗，英国的利害进一步与中国經济工作結合起来。接着，美国也表示支持幣制改革，使法幣也和美元联系起来。这样造成的法幣的稳定，一方面加强了国民党政府的依賴外力，但同时又大大地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对內統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經济建設。

分割华北的工作

李滋·罗斯代表团来华，引起了日本政府、特别是現地駐軍的反对，这种反对表現为同年9月24日由华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发布的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声明中除在华北肃清反"滿"抗日分子，防止赤化之外，还主張实行华北五省联合"自治"，脫离国民政府。接着，在日本政府內部，也召开了首相、外务相、海相、陆相、藏相的五相会議，关于在华北实行积極的經济合作和防共問題，决定了包括使华北地区特殊化在內的"諒解事項"。

担任策动华北"自治"的是1935年由关东軍派到华北的土肥原少将。他接受了关东軍和华北駐軍的意圖，担当这项工作，首先把旧軍閥的巨头吳佩孚拉了出来，想以吳为中心建立华北五省的政权，但結果是失敗了。接着，又想以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为主席，成立华北自治政府，也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絕。然而，在同年的年底，終于在以土肥原为首的关东軍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两个新的华北政权。同年10月，由于日方特务机关的阴謀策动，在河北省香河县發生了以自治运动为名的农民暴动。这个暴动虽然立刻被鎮压了下去，可是这个事件以后，在日本軍队的压力下，以殷汝耕为首的、包括塘沽协定中規定的非武装地区的保安队長和各县县長，于11月間宣布成立自治政权，但实际上它只是日軍的傀

儡政权。他們利用非武装地区国民党政府不便干涉的条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員会”，随后在12月，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声明脫离国民政府，实行防共和模范自治。

大約在“冀东政府”成立的同一时期，北平方面也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員会”。这是日軍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結果，不过，为了符合国民党政府的希望，这个組織表面上是由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可是，这个政权的統治区域只限于河北、察哈尔两省，而不包括山东、綏远及山西各省，并且这个政权虽标榜尊重地方民意、中日亲善、防共等口号，但仍然是在国民党政府监督之下，与日軍最初計划的华北自治政权相差很远。

至此，国民党政府已經不能再屈从于日方的压迫了。这是由于它一方面受到英国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国内日益高漲的抗日民族运动的压力。同年11月1日，亲日派的巨头、行政院長汪精衛遇刺以后，国民党政府內部的亲日派势力衰退了，抗日派抬头了。

这样，中日两国的紧張状态，日益加剧起来，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經济上的尖銳对立。在华北地区特殊化的条件下，日本进行了大規模的經济扩張。与“滿洲国”接壤的“冀东政权”，成了巨額的冀东貿易的根据地。該“政权”的关税率只是国民党政府的四分之一，因此，天津海关的收入，据說减少了一半。在1935年的12月，作为南滿鉄路的子公司創办了拥有一千万日圓資本的兴中公司。次年8月，在其控制下，成立了中日合营的天城电业公司。与此同时，以紡織資本为中心的各种企业，也向中国进行了扩張。这种經济侵略，同幣制改革后的中国經济建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正面冲突。

編后記

这是我們日本人亲身經历的世界战爭即“太平洋战爭”的历史。本書的叙述，在年代上，前后共有二三十年，在地域上，广泛地涉及到世界形势，而且內容也不限于軍事和外交問題，同时还包括政治、經济、文化各个方面。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們抱着如下的动机出發的。

我們可以說是生活在战爭的世紀里。在本世紀中發生了日俄战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爭的規模，无論是在战爭的地区范圍上，或者是在战爭給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牺牲上，都是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扩大了。但是，另一方面，亲身体驗到慘痛事实的全人类，發出了殷切要求和平的呼声，現在，絕大多数的群众，都在为保衛和平进行着殊死的斗爭。在今天，当然不允許历史学家單純从兴趣出發来叙述战爭的历史，即使是把战爭的灾禍展示出来，告訴人們和平的可貴，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是极其不够的。我們必須更进一步，从历史上穷究战禍的根源。而且，太平洋战爭的結果还直接地和我們日本人的今天的情况联結在一起，所以我們应該提供材料，来帮助日本人民了解太平洋战爭的历史并进而展望将来，以便共同考虑摆在面前的“战爭与和平”的問題。

因此，在这部太平洋战爭史中，序言部分是从昭和危机起談到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爭；展望部分是从太平洋战爭的战敗写到它的結果——旧金山和約为止。我們的意圖是要在国际的和世界史的范圍內来考察日本的軍事法西斯主义的成立、潰敗以至直到今天的經过情况。我們認为，为了从历史学的立場来回答怎样才能避免重复这种可怕的遭遇的問題，上述观点是絕对必要的。因

此，为了不仅仅从軍事史或外交史的观点出發，而是从政治、經济、文化各个方面来写出一部綜合的、統一的历史，邀集了各方面的許多專家共同进行了研究。

現在，有关太平洋战爭的著作、回忆录已出版了不少，这对于究明史实、丰富史料，有不少貢献。然而，另一方面，这些著作，有的只是片面的考察，有的流于自我辯护性質的夸張和追忆，甚至还难免出現一些專为迎合最近的反动潮流而写的东西。这些，如果不正确地科学地加以整理，也难保不發生重新鼓吹战爭的危險。历史学研究会針对这种傾向，本着精确而平易地叙述眞实的历史使其成为和平、自由与独立的一塊基石这样一种願望，开始了这項工作。

根据这种意圖，从 1952 年 9 月以来，在各方面的人員，不仅仅是專門研究历史的会員，还包括政治、經济、文化各个部門的有关人士共同参加下，前后召开了二十余次研究会。因为作为一項学問来說，无論在理論方面或是資料方面，还是一塊未开垦的处女地，加上編者和主編时間不够充裕，以致在研究和編写上都碰到了意外的困难。到了最后阶段，还有若干部分是完全重新組織和改写的。

今天，編写工作已經完成，将要出版。因为我們的准备期間不滿一年，当然不能期望尽美尽善。然而，以現阶段而論，我們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相信它可以成为对于这方面做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出發点。

当本書即将出版之际，特将参加共同研究和編写者的姓名开列如下，并感謝他們的劳动。

相田重夫、秋山穰、朝田輝彥、荒井信一、井上清、伊豆利彥、生山良夫、池边恭、石田雄、犬丸义一、今井清一、宇佐美誠次郎、江口朴郎、衛藤沈吉、大江一道、大田捷、大久保和子、岡部广治、川村善

二郎、草部典一、小島晋治、斎藤孝、島田福子、田代正夫、竹中清之助、高桥誠、土井正兴、远山茂树、中川信夫、中山立平、中村义、野澤丰、野原四郎、原田胜正、阪东宏、藤井松一、藤田省三、藤原彰、古島和男、松岡磐木、松島荣一、松本貞雄、山極晃、山極潔、山田胜男、山本弘文、吉田輝夫(按五十音順序)。

本書中的圖片(中譯本略去——編者)，除了共同通信社提供的两張以外，其余都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会提供的。

第一分册的执笔分工如下:

代序：井上清。

政治：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藤原彰、犬丸义一。

經济：宇佐美誠次郎、生山良夫、高桥誠。

文化：松島荣一、島田福子、草部典一、大久保和子、大田捷。

中国：野原四郎、小島晋治。

国际关系：江口朴郎、大江一道、山極晃、斎藤孝。

附录(一) 年表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17（大正6年）	1·	西原借款开始（至次年9月共七笔，一亿四千万日圓）。			11·7	俄国爆發十月革命，苏維埃政权成立。
	11·2	藍辛—石井协定签字。				
1918（大正7年）	8·2	声明出兵西伯利亞。	5·16	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字。	1·8	威尔逊發表十四条綱領。
	8·3	由于米价暴漲，富山县發生"米騷动"，波及到全国各地。			3·3	布列斯特和約签字。
	9·23	寺內內閣总辞职。			11·3	〔德国〕十一月革命爆發。
	9·29	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內閣成立。			1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
1919（大正8年）	3·1	朝鮮發生"万岁事件"。	5·4	五四运动开始，北京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声明归还山东。	1·5	〔德国〕斯巴达克团起义。
	5·17	日本声明归还山东。			1·18	巴黎和会召开。
	10·29	大日本国粹党成立。			3·2	共产国际成立。
	12·12	設立协調会。			3·23	〔意大利〕莫索里尼組織法西斯党。
					4·28	决定成立国际联盟。
					6·28	凡尔賽和約签字。
1920（大	2·10	为争取普选而举行示威游行。	3·12	庙街事件發生。	1·20	协約国解除对苏封鎖。
	2·26	众議院解散。	5·1	中国第一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	3·13	〔德国〕發生卡普騷动。
	3·15	战后危机开始。				

（大正9年）	5·1 日本第一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 5·10 举行第十四次大选，政友会获得压倒多数。 7·15 日本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 12·10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举行成立大会，当天被勒令解散。	8·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10·15 （对中国）新四国財团成立。	3·19 美国拒絕加入国际联盟。 8·10 （对土）塞維尔和約签字。 9·2 召开巴庫东方民族会議。 9·3 〔意大利〕工人占領工厂。
1921（大正10年）	10·3 友爱会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 10·4 首相原敬被刺杀。 11·12 發生曉民共产党事件。 11·13 以高桥是清为首的政友会內閣成立。 11·15 皇太子裕仁就任攝政。 12·13 廢除日英同盟。	5·5 广东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統。 7·1 中国共产党成立。 7·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3·16 苏英通商协定签字。 3·31 苏联开始实行新經济政策。 5·5 决定德国賠款总額。 11·6 〔意大利〕法西斯党正式成立。 11·12 召开华盛頓会議。
1922（大正11年）	6·6 加藤友三郎內閣成立。 7·15 日本共产党成立。 10·26 日軍完全撤出西伯利亞。 12·1 日本归还山东协定签字。	2·3 在华盛頓签訂中日魯案条約。 3·29 日軍撤出山东协定签字。 5·14 張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	2·6 华盛頓海軍条約签字。 2·6 对华九国条約签字。 4·10 召开热那亞会議。 4·16 苏德拉帕洛条約签字。 10·28 莫索里尼进入罗馬。 12·30 苏联成立。
1923（大	3·13 拒絕中国关于廢弃二十一条的要求。 4·14 廢弃藍辛—石井协定。	1·26 發表孙中山—越飞共同宣言。 3·10 中国通告日本廢弃二十一条。	1·11 法軍占領魯尔区。 8·13 〔德国〕斯特雷士曼大联合內閣成立。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正12年）	6・5	第一次逮捕共产党。	10・	国民党發表改組宣言，聘任鮑罗廷为顧問。	10・10	〔德国〕發生薩克森事件。 〔德国〕馬克暴跌。
	9・1	發生关东大地震。接着，發生殘杀朝鮮人、社会主义者的事件。			11・8	〔德国〕希特勒組織慕尼黑暴动。
	9・2	山本內閣成立。				
1924（大正13年）	1・7	清浦內閣成立。	1・20	中国国民党实行改組，并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1・21	列宁逝世。
	1・29	护宪三派同盟成立。			1・22	〔英国〕第一次工党內閣成立。
	5・10	在大选中，护宪三派获得大胜。			1・27	意大利吞幷阜姆。
	5・	国本社成立，由平沼騏一郎任会長。	5・31	中苏恢复邦交，并締結协定。	2・1	英国承認苏联。
	6・11	以加藤高明为首的护宪三派內閣成立。	7・9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2・7	意大利承認苏联。
	9・22	幣原外务相声明不干涉中国內政。	11・24	段祺瑞就任北京政府执政。	5・24	美国制訂移民法。
					8・30	对德国实行道威斯計划。
					10・28	法国承認苏联。
1925（大正14年）	1・20	苏日基本条約签字（苏日恢复邦交）。	3・12	孙中山逝世。	4・26	〔德国〕兴登堡当选总統。
	4・13	田中义一就任政友会总裁。	5・1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5	召开洛迦諾会議。
	4・22	公布治安維持法。	5・30	上海全市举行总罢工，此后工人运动蓬勃展开。	10・16	洛迦諾条約签字，法、捷互助条約签字。
	5・1	裁减陆軍四个师团。	7・1	在广州，成立反帝、联共的国民党左派政府。		
	5・5	公布普选法。				
	5・24	工会总同盟分裂，工会总評議会成立。				
	8・2	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宪政会內閣成立。				

	12·1 农民劳动党成立，当天即被勒令解散。		
1926 （大正15年 昭和元年）	1·26 發生学联事件。 1·30 以若槻为首的宪政会内閣成立。 2·11 赤尾敏等人組成建国会。 3·5 劳动农民党成立。 10·24 劳动农民党分裂。 12·4 日本共产党重建。 12·5 社会民众党成立。 12·9 日本劳农党成立。 12·25 大正天皇病歿，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元昭和。	3·20 蔣介石在广州阴謀策划中山艦事件，借端压制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 7·9 中国革命軍开始北伐，蔣介石任总司令。	4·24 苏德中立条約签字。 5·4 〔英国〕發生煤矿工人大罢工。 5·12 〔波兰〕畢尔苏斯基独裁政权成立。 7·15 奥地利工人起义。 9·8 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10· 〔苏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11·27 意大利同阿尔巴尼亞签訂地拉那条約。
1927 （昭和2）	3·14 發生金融恐慌。 3·17 樞密院否决救济台灣銀行紧急敕令案，若槻内閣总辞职。 4·20 以田中为首的政友会内閣成立。 4·22 公布延期支付令。 5·31 反对干涉中国同盟成立。 6·1 立宪民政党成立，浜口雄幸任总裁。 6·27 召开东方会議。 7·8 第一次出兵山东。 8· 制定1927年綱領。	1·4 中国各地爆發反英运动，英国出兵。 2·21 武汉政府成立。 3·24 革命軍占領南京，發生南京事件。 4·3 革命軍收回汉口租界。 4·11 英、美、日、法、意就南京事件对中国提出共同抗議。 4·12 蔣介石在上海發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18 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 8·1 中共举行南昌起义。	5·4 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經济会議。 5·27 英国与苏联絕交。 6·20 在日内瓦召开裁軍会議。 8·23 〔美国〕薩克和万蔡基被处死刑。 11·14 〔苏联〕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12·17 〔苏联〕拉狄克、皮达可夫、加米涅夫等被开除出党。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年）			8·7 9·16 12·11 12·14	陈独秀被撤銷中共总書記职务。 南京、武汉政府合流。 广州苏維埃政府成立。 南京政府与苏联絕交。		
1928（昭和3年）	2·10 3·15 3·25 4·10 4·19 5·8 6·24 7·3 8·4 10·6 10· 12·24	举行首次普选，政友会获得二一九席，民政党得二一七席，无产阶級党派得八席。 發生逮捕共产党的三·一五事件。 全日本无产阶級艺术联盟成立。 劳农党、工会总評議会被勒令解散。 第二次出兵山东。 第三次出兵山东。 以紧急敕令恶劣修改治安維持法。 設置特高警察。 日本劝告張学良放弃易帜。 日共总書記渡边政之輔被槍杀。 朝鲜元山工人举行罢工。 新劳农党被勒令解散。	4·9 5·3 5·11 6·4 6·11 7·2 8·5 10·3 12·20 12·29	南京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 中日两軍在济南交战（济南事件）。 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控告日本。 發生張作霖被炸死事件（“滿洲某重大事件”）。 国民党軍占領北京，北伐結束。 張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国际联盟正式承認国民党政府。 蔣介石就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英国正式承認国民党政府。 張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	8·7 8·27 10·1 12·8	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大会。 非战公約签字。 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計划。 意大利国会承認法西斯独裁。

1929 （昭和4年）	2·10 日本无产阶級作家同盟成立。 3·5 劳农党国会議員山本宣治被暗杀。 4·16 發生逮捕共产党的四·一六事件。 6·3 日本承認中国国民党政府。 7·1 处分“滿洲某重大事件”的責任者。 7·2 以浜口雄幸为首的民政党內閣成立。 10·8 犬养毅就任政友会总裁。 10·15 政府就减低官吏薪俸一成發表声明，但因遭到官吏的反对而作罢。 11·1 劳农党成立，大山郁夫担任委員長。	5·2 南京、汉口两事件解决。 6·3 日本承認南京政府。 7·21 中国收回中东鉄路，中苏开战。	3·4 〔美国〕胡佛就任总統。 5·30 〔英国〕麦克唐納內閣成立。 6·8 〔英国〕第二次工党內閣成立。 7·9 〔德国〕希特勒掀起反对楊格計划运动。 10·24 〔美国〕股票市場陷于停頓，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危机开始。 12·3 英、苏恢复邦交。中苏伯力議定書簽字（有关中东鉄路問題）。
1930 （昭和5	1·11 取消禁止黄金出口令。 2·20 举行第十七次大选，民政党成为第一大党。 2·24 逮捕共产党。 4·2 軍令部長就倫敦条約問題直接上奏。 6·2 設立临时产业合理局。 7·1 陆軍青年軍官組成“櫻会”。 7·20 全国大众党成立，麻生久任中央执行委員長。	3·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4·19 英国归还威海衛。 5·30 間島地区朝鮮人暴动。 6·11 中共采取李立三路綫。 7·27 長沙苏維埃政府成立，8月退出。 9·9 閻錫山在北平成立北平“国民政府”。 10·6 上述政府垮台。 10·9 張学良就任国民党政府海陆空軍副司令。	1·20 楊格計划通过。 1·21 倫敦海軍裁軍会議开幕。 1·28 〔西班牙〕里維拉独裁政权垮台。 2·10 越南爆發独立运动。 3·30 〔德国〕勃魯宁內閣成立。 4· 印度反英运动激化。 6·30 法軍从萊茵河非武装地带撤退完畢。 9·14 〔独〕經过大选，納粹党跃居第二大党。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年）	10·1 10·26 10·30 11·14	樞密院通过倫敦条約諮詢案。 台灣發生霧社暴动事件。 安岡正篤創办金鷄学院。 浜口首相被左乡屋留雄刺伤。	11·	蔣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一次"圍剿"，次年1月被徹底粉碎。		
1931（昭和	1· 1· 2·3 3· 4·13 4·14 4· 4· 5·27 6·28 6·	南滿鉄路理事木村就鉄路問題同張学良开始談判。 井上日召等人开始組織血盟团。 在众議院的会上，發生幣原外务相失言問題。 三月事件未实現即被揭露。 浜口內閣总辞职。 以若槻为首的民政党內閣成立。 日本共产党發表"政治綱領草案"。 橘孝三郎組成爱乡塾。 公布官吏减薪方案。 大日本生产党成立，內田良平任总裁。 第十六师团移駐南朝鮮。	2·25 2· 5·28 6·27 7·2 7·12 7· 9·18 9·20 9·21 9·23	中日两国就南京、汉口两事件进行换文。 蔣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圍剿"。 汪精衛等成立广州政府。 在中国东北發生日軍中村大尉被杀事件。 在中国东北發生万宝山事件。 上海各团体通过关于断絕对日經济关系的决議。 蔣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圍剿"。 九·一八事变爆發。 日本駐朝鮮部队开赴中国东北。 南京政府要求国际联盟調停中日糾紛。 蔣介石"劝告"各界停止反日运动。	3·19 3·28 4·14 5·11 6·5 6·20 7·13 8·25 9·1 9·13 9·21	德、奥签訂关税同盟。 德国發布紧急令，停止宪法中保障人权的一部分条款。 西班牙廢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奥地利信用公司倒閉。 〔德国〕發布紧急总統令。 美国总統胡佛發表允許德国緩期一年支付賠償的声明。 〔德国〕銀行停止营业，金融危机爆發。 英国成立国民內閣。 智利海軍發动叛乱。 〔奥地利〕法西斯分子掀起暴动。 英国停止金本位制。

<table>
<tr>
<td>6
年）</td>
<td>7・4 在日本帝国主义鼓动下，朝鲜各地發生襲击华侨事件。
8・4 南陆相有关"滿蒙"問題的訓話造成政治問題。
10・27 无产阶級文化联盟成立。
10・ 十月事件未实現即被揭露。
11・2 社会青年同盟組織譴責財閥搶購美元的示威游行。
11・21 安达內务相發表声明主張成立联合內閣。
12・11 若槻內閣总辞职。
12・13 以犬养毅为首的政友会內閣成立。安达、中野等人退出民政党。
12・14 停止兑現，再度禁止黃金出口。
12・23 閑院宮就任参謀总長。</td>
<td>9・28 沈阳地方治安維持会發表"独立宣言"，接着，东北各地相繼發表同类宣言。
10・1 南京、广州两政府妥协。</td>
<td>12・9 西班牙發布共和国宪法。
12・10 英国通过威斯敏斯特法。</td>
</tr>
<tr>
<td>1932
（昭</td>
<td>1・8 在櫻田門附近發生謀刺天皇事件。
1・ 安岡正篤等人組成国維会。
2・2 伏見宮就任軍令部長。
2・9 前大藏相井上准之助被暗杀。
2・11 大川周明等人組成神武会。</td>
<td>1・3 日軍占領錦州。
1・14 李頓任国际联盟調查委員会委員長，負責調查九・一八事变。
1・28 發生一・二八事件。
2・2 英、美、法三国大使提出关于調停一・二八事件的共同方案。</td>
<td>1・7 〔美国〕宣布史汀生主义。
1・9 德国宣布无力支付賠款。
2・5 在日內瓦召开裁軍会議。
4・10 〔德国〕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統。
5・5 〔法国〕总統杜麦尔被暗杀，鲁布兰繼</td>
</tr>
</table>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和7年）	2·20	举行第十八次大选，政友会获得压倒多数議席。	2·24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提出警告。		任。
	3·3	向派遣上海部队下达停战命令。	3·1	伪"满洲国"發表"建国宣言"。	5·27	〔奥地利〕陶尔斐斯内閣成立。
	3·5	三井公司常务董事团琢磨被血盟团員暗杀。	3·9	溥仪就任伪"滿洲国"执政。	6·1	〔德国〕巴本内閣成立。
	4·2	三井、三菱表示願为开發"满洲"提供二千万日圓貸款。	3·23	中日两国举行上海地区停战談判。	6·16	在洛桑召开关于德国賠款的会議。
	4·15	社会民众党分裂，以赤松克麿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派退出。	5·5	上海停战协定签字。	7·8	通过洛桑賠款协定。
	5·15	發生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刺死。	6·18	伪"滿"宣布关税自主。	7·20	从德国政府和普魯士政府中驅除社会民主党人。
	5·26	斋藤实内閣成立。	6·	蔣介石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圍剿"。	7·21	英联邦召开渥太华会議。
	6·13	众議院通过关于救济农村的决議。	7·18	日軍侵犯热河。	7·25	苏波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6·	日本共产党發表1932年綱領。	10·1	日本設置駐上海陆战队。	7·31	〔德国〕举行普选，納粹党成为第一大党。
	7·24	社会大众党成立。	10·1	李頓报告書被提交給中日两国政府。	8·27	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世界反战大会。
	8·13	苏日漁业条約签字。	10·	苏炳文开始抗日軍事行动。	11·6	在納粹保持第一大党的情况下共产党飞跃發展。
	8·	全国各地發生要求米粮的运动。	12·8	中日两軍在山海关發生冲突。	11·9	美国选举总統，罗斯福当选。
	9·15	日本承認伪"滿洲国",签訂日"滿"議定書。			11·29	苏法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9·21	樞密院通过保障官吏身份法案。			12·3	〔德国〕許萊赫内閣成立。
					12·31	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划結束。

	10·23 唯物論研究会成立。 10·30 發生逮捕共产党事件。 10·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立。 12·22 国民同盟成立，安达謙藏任总裁。		
1933 （昭和8）	2·2 長野县左翼教員被捕。 2·20 小林多喜二在筑地警察署被虐杀。 3·27 通告退出国际联盟，并發表詔書。 4·5 皇道会成立。 5·10 在京都大学發生瀧川事件。 5·16 明倫会成立。 6·7 佐野学、鍋山貞亲声明“轉向”(变节)。 7·11 神兵队事件被揭露。 9·12 海軍青年軍官通过反对对五·一五事件一案有关者的求刑的决議。 9·14 内田外务相辞职，广田弘毅繼任。 9·22 三井財閥声明改变方向。 9·27 海軍軍令部条例修訂。 10·3 召开五相会議。 10·15 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議会成立。 11·7 召开内政会議。	2·25 关东州声明进犯热河。 3·1 伪“滿州国”發表經济建設綱要。 3·10 日本向長城綫展开总攻击，張学良下野。 4·1 伪“滿洲国”对不承認国家实行“关門”。 4·12 英国通告廢弃日印通商条約。 5·6 苏联向伪“滿”提示出售中东鉄路。 5·26 馮玉祥組成抗日民众同盟軍。 5·31 塘沽停战协定签字。 6·7 国际联盟通过关于不承認“滿洲国”的报告書。 7·18 国际联盟决定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 8·8 日軍撤至長城綫。 8·13 蔣介石召开廬山会議，决定緩和抗日。 9·25 在西姆拉举行日印会談。	1·30 〔德国〕希特勒内閣成立。 2·24 国际联盟通过不承認“滿洲国”的决議。 2·27 〔德国〕發生放火燒毁国会事件。 2·28 〔德国〕总統發布关于鎭压共产党的紧急命令。 3·4 〔美国〕罗斯福就任总統，开始实行“新政”。 3·4 英意举行罗馬会談。 3·21 英法举行巴黎会談。 3·24 德国国会承認希特勒的独裁权。 美国發生金融危机。 6·12 在倫敦举行世界經济会議。 6·22 納粹勒令社会民主党解散。 6·27 〔德国〕国权党解散。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反战大会。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年）	11·16	举行政民两党志願者恳談会。	10·21	关东軍特务部公布"滿洲国"产业統制計划。	7·14	納粹一党独裁确立。
	12·9	陆海軍两省就"离間軍民运动"發出警告。	10·	蔣介石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圍剿"。	7·15	英法德意四国协定签字。
			11·20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	9·12	苏意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9·21	〔奥地利〕陶尔斐斯法西斯体制确立。
					10·14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1·16	苏美建立邦交。
					12·30	法国發生斯达維斯基事件。
1934（昭和	1·17	时事新报报道"番町会"問題。	2·19	蔣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	1·26	德波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1·23	荒木陆相辞职，林銑十郎繼任。	3·1	伪"滿"实行帝制，改元康德。	1·27	〔法国〕旭当内閣总辞职。
	1·25	鋼鉄业实行合并。	3·24	美国承認菲律宾独立。	1·30	达拉第内閣成立。
	2·8	中島商相因足利尊氏問題辞职。	4·6	蔣介石、汪精衛、黄郛举行南昌会議，决定采取亲日政策。	2·6	〔法国〕發生2月6日事件、反法西斯大罢工。
	3·12	无产阶級作家同盟解散。	5·19	薩尔瓦多承認伪"滿洲国"。	2·9	〔法国〕杜美格右翼内閣成立。
	4·17	关于对华援助問題發表天羽声明。	6·	伪"滿"發表声明欢迎民間資本。	2·16	苏英通商条約签字。
	5·19	黑田大藏次官因"帝国人造絲公司"事件被捕。	6·1	华北与伪滿通車問題解决。	6·15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举行会談。
	5·21	設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7·12	日印通商条約签字。	6·30	納粹清党。
	6·1	設置文部省思想局。	8·12	苏联和伪滿关于出售中东路問題的談判决裂。	7·9	英法举行倫敦会談。
	6·	日本工会全国协議会指导部成員被捕。			7·19	〔美国〕發生旧金山大罢工。
	7·3	斋藤内閣总辞职。			7·25	〔奥地利〕陶尔斐斯被暗杀。

9 年）	7・8 岡田啓介內閣成立，政友会拒絕合作。 9・12 关东厅职員就在"滿"机构改革問題通过总辞职的決議。 10・1 陆軍省新聞班印發《国防的根本精神及其加强》。 10・20 陆軍士官学校事件被揭露。 11・27 藤井大藏相辞职，高桥是清継任。 11・18 工会全国評議会成立。 12・11 改革在"滿"机构，設对"滿"事务局。 12・29 通告廢弃华盛頓条約。	8・30 国民党撤銷行政院駐平政务整理委員会。 10・ 中国紅軍开始長征。 11・ 国民党軍占領瑞金。	7・27 〔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决定采取联合行动。 8・2 德国总統兴登堡病歿，希特勒継任。 9・18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0・5 〔西班牙〕發生反法西斯起义。 10・9 法国外交部長巴都、南斯拉夫国王被暗杀。 11・9 〔法国〕弗兰丹內閣成立。 12・1 〔苏联〕發生基洛夫被暗杀事件。 12・5 埃塞俄比亞發生华尔华尔事件。
1935 （昭	1・28 町田忠治就任民政党总裁。 2・28 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說引起政治問題。 3・23 众議院通过关于明确国体的决議。 3・26 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开始生效。 4・1 在全国各地設立青年学校。 4・6 眞崎教育总监就明确国体問題向全陆軍致訓。 4・9 美濃部达吉著《宪法撮要《等書被禁	1・21 苏"滿"两国就出售中东路达成协議。 1・ 中共举行遵义会議，确立毛澤东的領导。 2・23 出售中东路协定正式签字。 5・2 天津發生亲日派报社社長被暗杀事件。 5・29 日本駐华北軍就中国方面"違反"停战协定問題發出警告。 6・5 宋哲元軍捕获日本特务机关人員（張	1・7 法意罗馬协定签字。 1・13 薩尔归屬德国。 2・3 英法两国發表倫敦宣言。 3・16 德国宣布重整軍备。 3・25 英德举行柏林会談。 3・28 英掌璽大臣艾登訪苏。 4・11 英法意举行斯特萊薩会談。 4・15 国际联盟召开临时理事会。 5・2 苏法互助条約签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和		止出售。		北事件)。		字。
10	5·2	警視厅开始拘捕暴徒帮。	6·9	南京政府全盘接受日方关于华北問題的要求（何梅协定）。	5·13	法国外長賴伐尔訪苏。
年)	5·11	設立內閣审議会及其調查局。	6·	国民党政府發布“敦睦邦交令”。	5·16	苏捷互助条約签字。
	5·17	中日两国宣布互派大使。	6·27	国民党政府全盘接受日方关于張北事件的要求（秦德純—土肥原协定）。	6·7	〔英国〕鮑尔溫內閣成立。
	5·22	民政党通告政友会取消合作。	8·1	中共發表“八一”宣言。		〔法国〕賴伐尔內閣成立。
	6·	成立肃正选举中央联盟。	9·22	李滋罗斯在上海發表談話。	6·18	英德海軍协定签字。
	7·16	眞崎教育总监被撤职。	9·24	日本駐华北軍司令官多田就“华北自治”問題發表談話。	6·28	〔法国〕人民战綫結成。召开保衛国际文化作家大会。
	8·2	散發关于肃軍的意見書的村中大尉等被撤职。	10·24	河北省香河县奸民掀起暴动要求“自治”。	7·5	〔美国〕制定瓦格訥全国劳动关系法。
	8·3	政府發表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	10·	紅軍完成長征，在陕北建立根据地。	7·13	美苏通商协定签字。
	8·12	永田陆軍軍务局長被相澤中校杀死。	11·1	南京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被刺。	7·25	（至8月20日）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采取人民战綫策略。
	8·27	在乡軍人会召开大会，發表宣言譴責天皇机关説。	11·3	南京政府实行幣制改革。	8·24	美国制定中立法。
	9·5	林陆相辞职，川島义之繼任。	11·25	殷汝耕發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員会”宣言。	10·3	意大利开始进攻埃塞俄比亞。
		中国英籍財政顧問李滋罗斯訪日。	12·6	蔣介石就任行政院長。	10·10	国际联盟决定制裁意大利。
	10·15	政府再次發表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	12·9	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一二·九运	11·9	〔美国〕产联成立。
	11·4	首相、外务、陆、海、大藏各相决定对华新政策。			12·9	召开第二次倫敦裁軍会議。
	11·29	圍繞編制預算問題，大藏同陆軍对				

	立激化。 12·23 望月逓信相、内田鉄道相等組成昭和会。 12·26 牧野内大臣辞职，斋藤实繼任。	动)。 12·18 冀察政务委員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員長。 12·26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 12·30 德王宣布內蒙"独立"。	
1936 (昭和11年)	1·15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成立。 1·21 广田外务相發表对华三原則。 1·24 暗杀渡边教育总监阴謀被揭發。 2·20 举行第十九次大选，民政党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大众党获得十八个議席。陆軍省决定将第一、第十二两师团派往"滿洲"，几天以后便發生"二·二六"事件。	1·22 南京政府声明不承認日本对华三原則。 2·14 苏联封閉駐沈阳总領事館。	1·16 〔西班牙〕人民战綫結成。 〔法国〕沙路內閣成立。 2·14 〔法国〕解散法西斯团体。 2·16 举行大选，屬于人民战綫的党派获胜。 2·19 〔西班牙〕人民战綫政府成立。

附录(二) 資料

田中义一大將的"奏議"

(1927年7月25日)

內閣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率領群臣誠惶誠恐謹以我帝国对"滿蒙"积極的根本政策奏聞。

对"滿蒙"的积極政策

所謂"滿蒙"就是指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內外蒙古而言。这里,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羨,而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因此,我国为了开发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特設"南滿洲鉄道株式会社"①,在假借中日共存共荣的美名下,对該地的鉄路、海运、森林、鉄矿、农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資达四亿四千万日圓,这个企业实在是我国企业中規模最龐大的一个。

回顧在华盛頓会議簽訂九国条約以来,我国向"滿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因此国內上下輿論为之譁然。九国条約本来是在美国的主持下簽訂的,附議各国对我国在"滿蒙"势力的增長并不反对,而認为国际貿易及投資利益借此可以得到保护。

东三省是亞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須使用鉄血,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困难局面。然而,如果采取鉄血主义来保全东三省,那么第三者的美国必将受到中国以夷制夷的煽动,起来制止我国。这样一来,我国就要被迫与美国进行角逐。

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須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

① 即"南滿鉄路公司"。——譯者。

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日本帝国存立上的必要大事。

考虑我国現狀和将来，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須采取积極夺取"滿蒙"利权的方針，并借利权發展貿易。这样，不仅能制止中国工业的發展，还能避免欧美势力的东漸，良策妙計莫过于此。

"滿蒙"利权果眞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滿蒙"作基地，假借貿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滿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并进而征服中小亞細亞以及欧洲。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亞洲大陸發展，第一个重大关鍵就在于掌握"滿蒙"利权。

为建立昭和新政并实現我帝国的恒久兴盛，采取积極夺取"滿蒙"利权的政策是惟一办法。

"滿蒙"并非中国領土

最不幸的是：日俄战争时，我国在宣战布告上明确承認"滿蒙"是中国領土，而在华盛頓会議上簽訂的九国条約也認为"滿蒙"是中国領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認中国的主权。由于以上二个錯誤，給我国在"滿蒙"权益遺留下禍患。

我国今后要利用一切机会，使全世界知曉有关"滿蒙"主权的"眞相"，并趁着机会以漸进方式向内外蒙古扩張以使大陆得到"新生"。

对于南北"滿洲"的利权，除应根据二十一条勇往直前外，应依下列附带利权，扩充我国旣得权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一、三十年商租期限滿期以后，自由地加以展期，并使对方确認經营商、工、农等业的土地商租权；

二、日本人在东部內蒙古可以自由居住往来和經营各种工商业，在出入"南北滿"时中国方面不得依中国法律进行征稅或檢查；

三、取得对奉天，吉林等地的十九处鉄矿、煤矿的开采权及森林采伐权；

四、在"滿洲"及东部蒙古的鉄路修筑权及鉄路借款的优先权；

五、政治、經济、軍事顧問和教官的增聘及聘佣的优先权；

六、为管理朝鮮人民的我国警察駐在权；

七、将吉長鉄路的經营管理权延長九十九年；

八、特产物的專卖权及对欧美貿易貨品运輸的优先权；

九、黑龙江(省)矿产的全部开采权；

十、吉会，長大鉄路的修筑权；
十一、收回中东鉄路时提供借款的特权；
十二、安东，营口的港权及运输联絡权；
十三、东三省中央銀行的設立及合办权；
十四、畜牧权。

对内外蒙古的积極政策

現在，圖什业圖王府內有我退伍軍人十九名，已从王府取得土地購买权、羊毛收購权、矿山开采权等，这些都已成为我国的先取权。此外，已将多数退伍軍人秘密派往該地，为了避免引起奉天政府的嫌疑，使其經常穿着中国服装分散在該王府轄区內从事开垦、畜牧和收購羊毛等工作。

这样，一旦时机到来，內外蒙古即将归于我国所有。为此对于蒙古，拟自本年度起，从陸軍机密費中撥出一百万圓左右，急速派遣軍人四百名，化装为教师或中国人，潜入內外蒙古，拉攏一切旧王公，攫取該地的畜牧、矿山等，以便为国家树立百年大計。

对朝鮮移民的奖励和保护政策

"滿蒙"各地資源丰富，适于朝鮮人移居，因此朝鮮人移居者日益增多，目前居住在东三省的朝鮮人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为能使移居"滿蒙"的朝鮮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一旦有事，即令朝鮮人进行軍事活动，同时还可以取締为名对他們的行动加以援助。

另外，还可以"东拓"①和"滿鉄"②作为后盾，在經济和金融方面对朝鮮人进行援助，借朝鮮人的力量来开發內外蒙古并掌握其商业权。

这就是說，朝鮮人侵入"滿蒙"显然对帝国的国防、經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今后要由政府大力加以援助俾其成功，以为帝国發展制造新机会。特別是根据石井—藍辛协定所取得的我国对滿蒙的特殊地位，在华盛頓会議上已經放弃，幸而朝鮮人移居者日益增多，其投資也日益增長，这样，石井—藍辛协定上規定的特权，就可以利用朝鮮移民的新問題而加以恢复；而对于这种情况，从法理上說，在国际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反对我国。

新大陆的开發和"滿蒙"的鉄路

交通就是国际交往的工具和战爭胜利的保証，又是經济上的堡壘。我国

---

①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簡称。——譯者
② "南滿洲鉄道株式会社"的簡称。——譯者

所修建的鉄路大部分在“南滿”，尙未进入物产丰富的北滿，这是特别遺憾的。

“南滿”地方居住着很多中国人，这对于我国的国防和經济是不利的。我国如欲开發其富源和巩固国防，必須大力建設“北滿”的鉄路。

已有的“滿鉄”路綫，主要是經济性的鉄路，而非循环綫路，極不适于战时动員和軍事运輸。

在中国自己建設的鉄路方面，以吉林省政府的財力而言，不久将来即可建設运輸能力强大的鉄路，如果再利用奉天（省）和黑龙江（省）的財力进行鉄路建設，中国方面鉄路的力量，不久将凌駕“滿鉄”之上，必然会产生激烈的竞爭。然而，奉天省目前經济紊乱，除非我国出力救济，否則无力恢复。

我国利用这一时机，勇往直前以完成我国的修建鉄路的目的，同时，如果再極力进行煽动，使“奉票”进一步暴跌，那么，奉天政府的財政必然重蹈赤俄財政的复轍，这是拭目可待的，到那时，他們也就沒有能力开發“滿蒙”了。

唯有中东鉄路的势力是很难打倒的，并且不幸的是这条鉄路綫和滿鉄成“丁”字形，丁字形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面，但对軍事的进展上却是十分不利的。

幸而赤俄的势力日衰，已无力向滿蒙扩張，毫无疑問，今后中国的鉄路建設必将听从日本的指示。

赤俄虽然国力日衰，但对滿蒙扩張的野心并未停止。其一举一动都是妨害我国的扩張和“滿鉄”的利益的。我国必須極力防止赤俄的扩張。

我国首先应該以防止赤俄南下为口实，逐漸向“北滿”强行扩張以便攫取其資源，南面，要制止中国势力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势力南下。为了对赤俄的政治和經济进行斗爭，应該使中国站在表面，我国在背后加以監督，以防御赤俄势力的扩張。同时，还要采取机密手段和赤俄合作，以防止中国势力的增長，和維护我国在“滿蒙”的旣得权益。

前几年，我国后藤新平主張恢复日俄邦交及邀請越飞来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俄国牵制中国。

我国对于“滿蒙”，不能單單依靠“滿鉄”而得到滿足。

鑒于我国扩張的現况和将来，必須独占南北滿鉄路。特別是拥有巨大富源的“北滿”及东蒙古方面，对我国說来，發展余地很大而且有利。因为在“南滿”，中国人日益增多，无論政治上或經济上我国都处于日趋不利的状态，所以必須迅速进入“北滿”的地盘，以謀国家的百年兴隆之計。

我国在最近将来，一定要在“北滿”和赤俄發生冲突，那时，可以按照日俄战爭的前例，如同当时获得“滿鉄”和大連那样，获得中东鉄路和吉林。为了

取得"北滿"的富源，我国再一次在"南滿"的曠野上与俄国展开斗爭，将是我国国运發展上势所难免的。

我国亟欲完成的"滿蒙"鉄路如下:

通辽—热河鉄路

这条鉄道一旦建成，对于我国开發內蒙古将有很大貢献，在"滿蒙"的所有鉄路中，它是在軍事上和經济上价値最大的一条。

要想同內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联系，非依靠这条鉄路不可。也就是說，我帝国主义在內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决于这条鉄路。

洮南—索倫鉄路

这条鉄路一旦建成，我駐"南滿"的軍队就可以通过这条鉄路綫插进赤俄的背后，同时还能阻止赤俄軍向北滿增援。

我們可以强迫蒙古王公制定一項防止中国人侵入的法律。只要能够使已侵入的中国人得不到安居乐业，他們也就自然离开。除此以外，我国如能积極采取其他防止办法，就可能使中国人无从进入蒙古。

長春—洮南鉄路

因为"滿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滿"，如果这条鉄路建成，那么北滿及蒙古的富源将全部归我所有，沿綫地区还可能容納我移民二、三十万人。

将来吉林、敦化和我朝鮮会宁綫的联运通車实現后，蒙古及"北滿"的富源即可直接运到东京和大阪，一朝有事，从我东京出兵經过日本海可以直达北滿和蒙古，中国陸軍一定无力突破北滿地区。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潜水艇将不可能威胁我朝鮮海峽。这样，在食粮和原料方面，将能得到自給自足，不論同任何国家作战都可以处于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会宁鉄路

以往到欧洲去的人，都要經由大連或海参崴，将来这条鉄路建成后，就可以由淸津港經过会宁，轉西伯利亞鉄道到达欧洲，这不仅是亞洲交通的大动脉，将来不論旅客或是貨物，都要通过我們控制的地区。

我方如果掌握了这条交通的大动脉，就可以无所忌惮地侵略滿蒙，实行明治大帝吞幷滿蒙的第三期計划，实現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

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鮮均已实現，然而第三期吞幷滿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亞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尙未实現，这都是臣等之罪过。

以吉会綫和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罗津是唯一无二的終点良港，可以成为世界貿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压倒赤俄的海参崴，另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北滿的丰富物产，把"滿蒙"的繁荣引进我們国內。假如在最近的将来战爭爆發，我国不得不从大連港口取得富源的話，敌艦就会把对馬海峽和千島海峽加以封鎖，最后将我国打敗。

要知道，世界大战期中，美国曾和英国暗中勾結，一举一动都想牵制我国对中国的行动。为了我国的独立，不得不与美国一战，以警誡中国和全世界。

美国有吕宋艦队，和我对馬島和千島之間只是一衣带水之隔，可以朝發夕至。如果再派潜水艇往来游弋于对馬和千島之間，就可以切断"滿蒙"食粮和原料对我国的供应。

如果建成吉会綫，将"南滿"、"北滿"和朝鮮形成一个大循环綫，不仅便于我軍队和粮食的运輸，同时还可以确保控制"北滿"的富源。如果"北滿"的富源能够輸送到敦賀和新潟，敌人的潜水艇不能侵入朝鮮和日本海峽，我国的战时交通經济就能够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只要能够确保战时的食粮和原料的充分供应，无論美国海軍如何强大；中国陸軍和赤俄軍队如何众多，最后也必然对我无可奈何，同时还可以鎮压朝鮮人在战时的反抗。

有必要改变南滿鉄路公司的經营方針

"滿鉄"由于使命旣重且大，所以和历届內閣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因之內閣的更迭往往禍及"滿鉄"，而"滿鉄"的一举一动也有时累及內閣。这是由于滿鉄組織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組織，而其实权則掌握在內閣的手中。由于这种原故，在国际間幷不認为滿鉄是一个营利公司，而看做是一个純粹的政治机关。九国公約所以要对我"滿鉄"的發展加以限制，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內部来看，"滿鉄"在推行"滿蒙"的事业上，实行着有关东軍司令官、大連長官、关东州長官和总領事参加的四头政治，在大連进行討論有关这方面的机密往往被东三省执政者所探知，从而極力阻碍"滿鉄"的發展。另外，在东京作最后解决时，也时常因为外务、鉄道、財政和陆軍等各方高級官員的意見分歧，而使計划的实行受到阻碍。

为了避免这种种不利情况，拟对"滿鉄"进行根本改革，将"滿鉄"附屬事业中职能和利益較大的單位分为独立的公司，暗中以"滿鉄"势力为背景，积極向"滿蒙"發展。另一方面，对于在"滿蒙"的全部事业，吸收中国人和欧美

人投資，使"滿鉄"單純担任鉄路运輸业务，由我国壟断其資本的半数以上，把握实权用以大力推行帝国的政策。"滿鉄"掌握的重要附屬事业如下：

(1)鋼鉄問題

煉鋼事业的盛衰对国家的强弱关系很大，"滿蒙"的鉄矿有十二亿吨，此外，还恰好有二十五亿吨的煤。用这二十五亿吨的煤可以精煉十二亿吨的鋼，可以保証七十年間鋼的自給自足，而不需要仰賴他国的供应。这样，我国就具备了作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的要素。

(2)石油問題

石油是我国最缺乏的重要产品之一，也是国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滿蒙"的鉄和重油一旦归我所有，我国的海陆軍便可一举而成为銅牆鉄壁，因此說"滿蒙"是日本的心臟，决非虛言，这是为我綿綿皇基不胜庆幸的。

(3)硫氨肥料及其他問題

肥料是国家食粮政策上最重要的大問題，化学肥料都是用由煤里抽出来的硫安当原料制造的。而撫順煤最适合提取硫氨。

这样不仅能促进我国农业的發展，而且借推銷豆餅的便利，还可能征服全中国和南洋。

(4)碱及純碱企业

碱和純碱是軍事上和化学工业上的至宝，其原料只是盐和煤，而盐和煤都是"滿蒙"产量最多并且价格低廉的产品，因此建立工厂进行生产，就可以壟断这一重要工业产品，并且还可以达到我国軍用化学工业原料的自給自足。

(5)菱鎂矿和鋁矿企业

菱鎂矿和鋁矿的开采，根据"滿鉄"和东北大学本多博士的調查，已經判明为非常有希望的企业。这两种矿物是飞机、軍用飯盒、医疗器具及其他工业的重要原料。因为这种珍貴的产品是国防工业上不可缺少的原料，所以应該把这項企业和滿鉄分开独立經营，并将矿石运回国内加以精煉和秘藏，以避免英美資本家的虎視眈眈。另外，若在鴨綠江流域建立水电企业，用来精煉金屬，鑒于将来航空事业的發展，可以断言，全世界在对于航空工业資源材料的需要上，必将仰我鼻息。

以上各种企业如能独立經营，我国大致可获得六百亿万日圓的巨利，同时南滿的工矿业，将給予我国国防及經济以巨大的帮助。

如使上述重要的有形事业独立經营，予以單独行动，并免受有关監督官厅的干涉，最后必然是符合帝国利益的。并且作为营利的公司来积極發展，既可以避免国际間的嫌疑，又可以緩和东三省民众的抗日。为了形成新大陸的局面，采取这样公然秘密的手段，将会感到輕便自如。

今后对“南滿”的扩張，应該完全以資本主义为前鋒，来压倒中国。

首先要向北滿移民，以便切断中俄的亲密联系，在攫取富源的同时，制止赤俄虎視眈眈地强制中国压迫我国的企圖。倘一朝有事，可令我“北滿”移民向“南滿”長驅直入与“南滿”駐軍和移民相配合，来共同完成“滿蒙”大业。万一須要坚守“滿蒙”时，即令我“北滿”移民攫取当地資源，来供应駐在“滿蒙”的軍队和国内以食粮和原料。

我国今后对“滿”策略，只有直入北滿的一个办法，只要在“南滿”采取資本主义，則不仅可以利用外国資本帮助我国开發，而且还可以緩和各国对我向北滿猛进的疑惑。

有必要設立拓殖省

我国对“滿蒙”經营复杂多端，因此主管官厅之間往往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于国家的事业也得不到迅速进展。并且有許多我国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买，專門从事偵察我国对滿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尙在审議中就被中国方面所探知，从而傳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地就引起各国輿論对我的掣肘，这样，不止一次地在对“滿蒙”措施上，尝到苦头。同时，反对党也經常把在“滿蒙”方面探知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以作为反对执政党的材料。

特别是在今后，我国对“滿蒙”应該改变方針，以便勇往迈进，所以，有必要把領导的中心集中到东京来。这样，第一、便于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国政府探听机密；第三、事前可以避免招致各国疑虑；第四、可以革除对“滿蒙”四头政治的流弊；第五、內閣和滿蒙的关系可以趋于紧密，以便集中全力对付中国。

拟設立拓殖省，使其專管侵略滿洲事項，特别要以掌管台湾、朝鮮、庫頁島为名，而实际上以对滿蒙扩張为目的，这样，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并防止暴露国内的不統一。

如果設立拓殖省，把对“滿蒙”事务的中心集中到东京，使在“滿蒙”的我国官員只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随地参預經营計划的話，也就自然能够严守秘密，使对方国家无从察知我拓殖秘密，国际輿論也就得不到对我进行先發制人的材料了。

对于从"满鉄"分离出去独立經营的各种企业，如劝业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营利公司的監督及經营的权限，也划归拓殖省統一掌握，以便实現帝国向满蒙扩張的根本政策，并完成建設新大陸的計划。

附　　件

关于田中义一請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积極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总理大臣　田中义一(署名)
外务大臣　　　田中义一(副署)
鉄道大臣　　　　　　　(副署)
大藏大臣　　　　　　　(副署)

宮內大臣　一木喜德郎台鑒

請代奏对滿蒙积極政策事

欧洲大战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經济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于我国未能發展在"滿蒙"之特权及旣得权益，以致上瀆圣虑，无所逃罪。况且当臣拜受大命之际，奉到上諭：特别对于中国及"滿蒙"之行动，必須确保我国利权，以研究进展之机会。聖旨所示，臣等不胜感泣之至。当臣在野时，即主張对"滿蒙"采取积極政策，并希望从速实現，玆为开辟东方之新局面，形成我国之新大陆，發揚昭和新政，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与"滿蒙"有关之文武百官举行东方会議，就对"滿蒙"之积極政策作出决議。

以上請代轉奏　　　　　　　　　　　　　　　　敬啓

樱会旨趣書

(1930年10月1日)

一、窃察帝国現状，万象墮于消極，进取的銳气扫地无余，明治維新以来蒸蒸日上的国运簡直要归于衰敗，实在令人悲痛憂伤不已。長此以往，不但我大和民族不能保持現有的国际地位和荣誉，其結果将使今日的强盛成为历史上的曇花一現，終于墮落到希腊、荷兰的行列，从而遺恨千載，这种趋势已經很明显了。

我国所以成为此种状态，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們不能不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为政者有重大責任。請看看他們的所作所为。他們作为国民的表率，执掌国政，理应上对陛下負有重責，但实际上，竟然忘却大本，沒有勇气奉行国

是，对于大和民族兴隆的因素——精神一面，絲毫不加以考虑，只知追求政权和物質利益，上則蒙蔽聖明，下則欺騙国民，政界的腐敗每况愈下，至此已达極点。

全体国民对此弊風虽然有所察觉，但被当下消極沉郁的社会風气所同化，已不能有所反应，不可能要求他們拿出勇气和决心来清扫政界的暗云，鏟除邦国的禍根，不独如此，在全体国民正自掘坟墓的时候，只有左傾团体显示出一种奇怪現象，这对我們来說，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且現在这种腐敗透頂的政党者之流的毒刃正指向軍部，这一点，从倫敦条約問題上面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然而被混濁的社会風气所麻痹了的軍部，对此腐敗政治竟然缺乏奋起的勇气和决心，仅仅通过由那些老朽过时的人物組成的樞密院来表达自己必須坚持的主張，这是多么可悲的現象！

軍部所以陷入这样状态，原因固然不一而足，其主要原因在于：泰平日久，士風漸衰，一般将校缺乏一定的主义方針和基于武士道精神的精誠团結。政党者之流不久以前向海軍使用的毒刃，不久即将以裁减陸軍問題强加到陆軍身上，这是很明显的。因此，我們作为軍部的中坚分子，必須充分加强团結，时刻本着这种精神坚持斗爭，不但要有决心防止类似海軍問題的錯誤發生，还要进一步發揚坚强的爱国热情，把腐敗透頂的为政者的头脑徹底加以洗刷。

二、看看今天社会各阶層的情况，尽是一些上層为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敗，不了解群众的資本家和貴族不顧国家的将来，言論机关專門誘导国民思想趋于頹廢，农村陷于荒廢、失业和不景气，各种思想团体的發展，糜烂文化的空前泛濫，学生缺乏爱国心，官吏的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等等，为国家着想，实在令人寒心。然而負有糾正这些現象的重大責任的执政当局，并沒有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連一点誠意也看不出来。因此，政府的威信愈益低落，无論在經济上、思想上或政治上，国民都是陷于不安状态，以致国民精神逐漸松懈，明治維新以来培养的元气消磨殆尽，国势日益削弱。再看外交方面，为政者已經忘掉国家百年大計，專汲汲于仰外国之鼻息，毫无对外發展的热忱，明治以来积極进取的气魄已經完全消失，在解决人口和食粮問題上束手无策，致使国民时时刻刻感受威胁。这种情况形成了横在帝国前进途上的一大暗礁，吾人大声疾呼改变这种情况，却被当政者付之一笑。这种現状，为国家前途着想，实在令人痛恨之至。

內政、外交所以陷入以上这样絕境，是由于政党者之流只知道私利私欲

以外，毫无为国为民的大計。国民和吾人都在企望着出現一种眞正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眞正以天皇为中心的活潑明朗的国政。吾人原屬軍人，按理說是不应該直接参与国政的，但一心报国的至誠不免随时随地要流露出来，这对于改革为政者的弊端和国力的增長可能有所裨益。吾人所以集会于此，在慨嘆国势衰微之余，惟恐違背武人的操守，实因不願有越軌行为之故也。

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声明

（1931年9月24日）

日本政府于9月24日关于九·一八事变發表声明如下:

一、帝国政府始終以敦睦日华两国的邦交，实現眞正的共存共荣为对华方針，并为貫徹这一方針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幸，近几年来，在中国官民中間一再發生了刺激我国国民感情的言动，特别是在和我国有着最密切关系的"滿蒙"地区，近来不断發生不愉快的事件，以致在我国国民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印象，認为中国方面对于我方友好公正的政策，并未报以同样精神，从而群情为之騷然。恰巧在这种情况下，于9月18日夜半，沈阳附近的一部分中国軍队破坏了南滿鉄路，襲击了我国守备队，以致双方發生了冲突。

二、当时守衛南滿鉄路全綫的日軍总兵力不过一万零四百名，而周圍的中国軍队竟达二十二万之多，情况异常紧急，同时，居住在該地区的一百万帝国臣民，也陷入了严重的恐慌不安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我軍認为有必要先發制人以便鏟除危險的根源。为此，立即开始行动，排除抵抗，解除了中国軍队的武装。至于地方治安，則在我軍督导下交由中国自治机关負責維持。

三、我軍在达到上述目的后，大部分已撤回并集結到鉄路附屬地內，目前在附屬地以外地区，只有沈阳城內及吉林駐有若干軍队，另外还有其他几个地点駐有少数兵員，然而这只是为了警备并非軍事占領。至于謠傳帝国官宪占領了营口海关和盐务局；又說日本接管了四平街、郑家屯間及沈阳、新民屯間的中国鉄路等等，全是誤傳。至于謠傳我軍开往長春以北和延边地区云云，也是毫无根据。

四、帝国政府在9月19日召开了紧急会議，决定了竭力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針，并由陆軍大臣将这一方針下达了在"滿洲"的駐軍司令官。9月21

日會由長春派出一个部队开到吉林，但这并非为了对該地方施行軍事占領，只是为了消除从側面对南滿鉄路的威胁。所以，一俟达到这一目的，我方出动的大部分队伍即将返回長春。另外，事态發展到9月21日，南滿鉄路沿綫已陷于不安，針对这种情况，由朝鮮駐屯軍开出一个混成旅团計四千名，撥归駐"滿洲"部队司令官指揮；即便这样，駐"滿洲"部队的兵員总数仍未超出条約規定限額，这当然談不到在对外关系方面扩大了事态。

五、帝国政府对于"滿洲"沒有任何領土野心，这一点已无需多說。我方所要求的，归根到底，就是帝国臣民能够在这一地区安心从事各項和平事业，以其資本和劳力参加到开發該地区的事业中。維护本国和本国臣民应該享有的权利，是政府应尽的职責，消除对于南滿鉄路的危害，也无非是为了这一目的。当然，帝国政府在尊重日华善邻友好方面仍将坚持旣定方針，因此，为使这次不幸事件不至破坏邦交，并且为了进一步求得可以杜絕以后再發生禍患的建設性办法，帝国有决心同中国政府进行眞誠合作。如能因此而打开目前两国間的困难局面，轉禍为福，帝国政府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声明

(1931年10月26日)

帝国政府于10月26日关于九·一八事变發表声明如下：

一、对于在10月20日提交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有关帝国軍队撤回滿鉄附屬地內問題以及日华开始直接交涉問題的决議案，日本理事提出了包括几点修正意見的修正案，經10月20日进行表决的結果，上述决議案和修正案均未取得全体会議一致同意，因而未获通过。

二、这次九·一八事变，完全是由于中国軍宪的挑衅行为而引起的，关于这一点，帝国政府已經一再作了闡明。目前尙有少数帝国軍队駐在滿鉄附屬地以外的几个地点，这是为了保护帝国臣民的生命財产，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这样当然不会成为迫使中国接受帝国关于解决爭执的条件的一种手段，而且帝国政府根本不想利用軍事压力来和中国进行交涉。

三、帝国政府在很久以前就对于日华两国关系全面地进行了研究，并曾利用各种机会一再表示决心，絕不允許对于构成两国間密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經济关系的各种因素中有关帝国国民生存的权益加以改变。不幸，近来中国的所謂收回利权运动逐漸趋于極端，并且在各种学校教科書中公然

鼓吹"排日"思想，并已發展到根深蒂固的程度。現在显然已經有了一种不顧条約和历史，甚至企圖破坏关系到帝国国民生存的权益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帝国政府單憑中国政府的保証，把軍队全部撤回滿鉄附屬地內的話，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使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瀕于危險，多年以來的历史和中国目前的情况充分証明确实存在这种危險。

四、因此，帝国政府認为，为了确保在"滿"的帝国臣民的安全，唯一办法在于：首先采取措施消除两国国民的反感和疑虑，并願就为达到以上目的所必要的基本大綱与中国政府进行談判。关于此意，已由外务大臣在10月9日致駐东京中国公使照会中加以申明，另外还通知了国际联盟理事会。帝国政府坚信，只有根据以上观点才能收拾局面，所以在理事会进行討論过程中，始終一貫坚持了这种主張。帝国政府所考虑的談判的大綱是：（一）不采取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領土完整；（三）、徹底取締妨害相互通商的自由和煽动仇視对方的有組織的运动；（四）、对于在"滿洲"各地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事业加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条約上規定的帝国在"滿洲"的权益。帝国政府相信以上各項，完全符合国际联盟的目的和精神，应該成为維持远东和平的基础的一些应有的原則，因而必然会得到世界輿論的支持。帝国代表所以沒有把它提到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是由于認为这个問題按其性質來說，是应該屬于日华两国直接交涉的問題。

五、为日华两国前途着想，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該是，双方共同努力設法迅速收拾局面，以便走上共存共荣的大道。帝国政府目前仍願同中国政府，就簽訂上述旨在确立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大綱問題以及日軍撤回南滿鉄路附屬地問題，举行談判。

日本政府关于一·二八事件的声明

（1932年1月29日）

帝国政府于1月29日（昭和7年即1932年）就一、二八事件發表声明如下：

一、帝国政府曾在去年10月9日的照会中，向国民政府指出：在中国各地进行的"瘋狂"的"排日"运动，是在組織上和实际上与国民政府职权很难划分的国民党党部直接或間接領导下，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來进行的一种不使用武力的敌对行为，同时要求国民政府不但对于党部及其領导下的各

种"排日"团体的策动加以制止，还要取締其他的排日运动，以及采取必要和有效措施以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利益。其后又曾迭次向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重申上述要求并提醒对方严重注意。

二、然而，国民政府对于接受帝国的上述要求不仅沒有誠意，甚至認为中国官民对于帝国及帝国臣民的"不法"行为是一种爱国的表現，并采取一种鼓励的态度，致使"排日"运动变本加厉，特别是近来，不仅在广州、青島、福州等地發生了杀害帝国臣民事件及侮辱帝国官吏事件，甚至还發生了中国許多报紙登載对我皇室"不敬"的消息这样事件。

三、特别是在上海，抗日会本部和其他各种排日团体的活动最为"猖狂"，尤其最近發生了国民日报刊登"不敬"消息的事件和杀伤日蓮宗僧侶的事件等以来，事态日趋恶化。为此，駐上海帝国总領事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了有关取締排日运动及其他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是公正合理的，但中国方面却迟迟不作答复，另一方面竟然向上海地区集結軍队，摆出一种威胁我方的姿态，使得我国侨民感到極大危險。

四、不过，至28日午后三时中国方面終于接受了我方的要求。尽管如此，因鑒于中国方面的一貫手法，在監督其履行諾言的同时并严加戒备，以防"不法"分子进行策动，另一方面，因为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鑒于駐在公共租界附近的中国軍队中有不稳行动，于是就在当日午后四时发布了戒严令。因此，各国駐軍也都根据共同防衛計划进入各自分担的警备区段。我陆战队也从27日午前零时起开往分担的防区——北四川路的两側。正在这时，突然遭到中国正規軍的开槍射击，不得已只好应战。現在，我方正繼續要求中国当局从我国侨民居住地附近把它的軍队撤走。

五、这次我国海軍在上海方面采取的行动，和以往列强曾多次地在該地采取的实力行动相同，完全是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并无其他用意。同时这次派兵，只是鑒于以往我方駐在上海的陆战队人数少于英、美、法等国的駐軍，为了适应事态發展而进行的一种增援。我方当然是堅持同列国合作的方針，在当地的帝国官宪正与有关各国的領事、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各国駐軍保持密切联系。毋須贅言，我方不仅对上海地区无任何政治野心，同时对于各国的权利和利益也毫无侵害的企圖。

日"滿"議定書

(1932年9月15日)

因为日本国已經确認"滿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的自由意志而成立的独立的国家这一事实;

因为"滿洲国"已經發表宣言表示中华民国所签訂的国际条約和协定凡是可能适用于"滿洲国"的,一概予以尊重;

日本国政府和"滿洲国"政府为了永远巩固日"滿"两国的善邻关系,互相尊重領土,确保东亞和平,签訂如下协定:

一、"滿洲国"除将来日"滿"两国另行签訂协定外,应确認尊重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滿洲国"境內,根据旣存的日中两国間的条約、协定及其他条款和公私契約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利益。

二、日本国和"滿洲国"确認对于締約国一方的安全和独立的威胁,同时构成对于另一方的威胁这一事实,两国約定共同担任国家的防衛,为此目的所需要的日本国軍队应駐在"滿洲国"內。

本議定書自签訂之日起生效。

本議定書用日文及汉文各作成两分。对于日文正文与汉文正文的解釋發生分歧时,以日文正文为准。

作为以上的証据,由下列人員各受本国政府的正式委任,在本議定書上签名盖章。

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即"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于"新京"。(全权姓名从略)。

关于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

(1933年3月27日)

关于帝国根据国际联盟規約第一条第三項退出国际联盟的下开通告文,已于昭和八年(1933年)3月27日由外务大臣电告国际联盟秘書長。(英文原文从略)

"帝国政府認为帝国关于力求确保东亞和平并进而对維护世界和平作出貢献的决心是与謀求各国間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联盟的使命精神相同,在过去十三年間,作为国联会員国及常任理事国,一貫为达成这一崇高目的而进行

了合作，这是引为欣快的。在此期間，帝国經常以不亞于任何国家的热誠参加了国联的事业，这是不可动搖的事实。同时，帝国政府鑒于目前国际社会的情势，确信为了維持世界各地区的和平，应該針对各該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国联規約，只有根据这样公正的方針，才能完成国联的使命，提高国联的威信。

昭和6年9月，当"日华事件"提交国联以后，帝国政府始終根据上述信念，在国联的历次会議上以及其他机会建議国联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应該采取公正妥当的方法，以便加强东亞和平，同时为了發揚国联的威信，必須正确地掌握該方面的实际情况，針对这种情况来运用規約，并一再强調必須考虑到以下情况：中国并非完全統一的国家，其国內情形及国际关系極为复杂紛繁，其中包含着許多反常和例外現象，从而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因此，作为一般国际关系准則的国际法的各項原則和慣例，在适用于中国的时候，就要加以很大的改变，其結果，已經在事实上形成了特殊的和异乎寻常的国际慣例。

然而，从国联在过去十七个月間的审議經过可以明显地看到，不仅多数会員国沒有掌握东亞的实际情况，或者沒有面对这种現实而加以应有的考虑，同时在适用、特别是解釋国联規約及其他各种条約及国际法的各項原則方面，帝国与这些会員国之間，也常常發生重大的意見分歧。其結果，在本年2月24日召开的临时大会上通过的报告書，不仅无視了除确保东亞和平以外别无任何企圖的帝国的精神，同时在对事实的認定上以及据此而下的結論上，都犯了严重的錯誤。尤其是对9月18日事件当时及以后日本軍的行动，臆断为不是出于自衛权，也沒有看到該事件以前的紧張局势和事件以后事态恶化的責任完全在于中国方面，这就給东亞政局造成了新的糾紛原因。另一方面，也无視"滿洲国"成立的眞相，否定帝国承認該"国"的立場，这是蓄意破坏稳定东亞局势的基础。特别是在报告書的劝告部分中提出的条件，对于确保东亞和平毫无补益，这在本年2月25日的帝国申述書中已經詳細提到了。

总之，多数会員国在处理日华事件上，只能被看成不是为了在实际上确保和平，而是把不能适用的方式看成比"現实地"确保和平更加重要了；把維护脱离实际的理論比鏟除将来紛爭的禍根更加宝貴。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会員国与帝国之間，在解釋規約及其他条約上面也存在着重大的意見分歧，根据以上情况，帝国政府已經确認，在維护和平的方式方法上，特别是在确立东亞和平的根本方針上，帝国政府与国联見解主張完全不同。因此，帝国

政府相信已經沒有与国联繼續合作的余地，这样，帝国只好根据国联規約第一条第三項規定退出国际联盟，特此通告。

〔以上根据外务省情报部編"'滿洲'事变及上海事件有关文件集"（昭和9年即1934年）〕

关于退出国际联盟的詔書

（1933年3月27日）

朕惟曩者世界和平恢复，国际联盟宣告成立，我皇考即表示欢迎，命我帝国参加。朕繼承遺緒不敢稍懈，前后十有三年，始終坚持同国联之合作。

此次"滿洲"国成立，帝国認为尊重該国独立，促使其健全發展，乃消除东亚禍根，保持世界和平之基础。然而不幸，国联意見与此背馳。朕乃命我政府愼重进行审議，終于不得不决定退出国联。

虽然如此，朕迫切祈求国际和平能以确立，是以对于有关和平之一切企圖，今后仍願提供合作。今虽与国联分手，实踐帝国之主張，固非偏重东亚而輕視友邦之誼；而应愈益立信于国际，显揚大义于宇內，此朕夙夜考虑者也。

方今，列国正处于稀有之变局，帝国亦遭遇非常之时艰，此正举国振奋之秋也。尔等臣民宜深体朕意，文武百官恪守职分，众庶人民勤务生业，履正执中，齐心向前，以应此时局，进而翼成皇祖考之聖猷，增进全体人类之福祉，欽此。

情报部長关于对中国的国际援助問題發表的非正式談話（天羽声明）

（1934年4月17日）

甲、4月17日情报部長在定期記者招待会上，就日本在东亚的立場向記者們作了大意如下的非正式談話。

日本为了"九·一八事变"及"滿洲国"問題，在去年三月，迫不得已發出了退出国联的通告。这是因为在維护东亚和平的根本意义上，日本与国际联盟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不用說，日本一貫致力于保持和增进与各国之間的友好关系，但是，对于东亚問題，它的立場和使命，可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对于維护东亚的和平及秩序，日本应該同东亚各国共同負責。日本有决心完成

維护东亚的和平及秩序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日本必須首先与友邦中国共同努力来維持和平及秩序。

因此，日本迫切希望中国保持独立、完成統一以及恢复秩序。然而从历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实現統一以及恢复秩序，只有依靠中国本身的覺醒和努力。所以，如果中国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采取違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等等，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了。另一方面，各国也应該考虑到由于"滿洲事变"、"一·二八事件"所产生的特殊状态，如果企圖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目上是财政性或者技术性援助，但是不可避免地将具有政治意义。如果这种趋势繼續發展下去，其結果，将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圍，或者造成国际共管或国际瓜分的开端，这样不仅会給中国带来莫大的不幸，而且还有可能給东亚的安全，以及給日本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日本在原則上不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如果其他各国个别地同中国进行經济通商貿易，只要不妨碍东亚的和平及秩序，也就沒有必要加以干涉。不过，如果这种活动具有扰乱东亚和平及秩序的性質，那就不能不加以反对。例如，向中国供应武器、軍用飞机、派遣軍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其結果显然是要离間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各国之間的关系，違反維护东亚和平及秩序的利益，所以对于这些，日本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以上所述是从日本一貫的方針所必然得出的結論。而最近有迹象表明某些国家假借共同援助的名义，积極向中国进行扩張。由于这种原故，相信現在来闡明一下日本的立場，并不是完全沒有意义的。

乙、4月20日情报部長在外国新聞記者定期招待会上答复問題时，关于上述談話，作了如下的說明。

我对于前些时候發表的談話在海外引起的反应，感到意外。那个談話不过是把今年1月外务大臣在議会里發表的演說的精神加以引伸罢了，而那次演說是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外务大臣在議会上說：

"帝国是維护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石，負有完全責任，因此我們一天也不应該忘記这一点"。又說：

"如果美国方面也能充分認識到东亚的复杂而特殊的情况，能够了解我国为什么是东亚和平的安定势力的話，确信日美間感情上的紧張状态就会自然緩和下去。"又說：

"帝国政府对于維护东亚和平感到有重大責任，并且具有坚定的决心。"

等等。

日本无意侵害中国独立和利益。日本希望中国能够保持独立，实現統一和繁荣。如果中国得到統一和繁荣，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和所处的位置，日本是可以分享到这种利益的。然而实現統一和繁荣，要靠中国自己的觉醒和努力，不能依賴别国的利己主义的开發。

日本无意侵害第三国的权利。日本欢迎第三国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和中国通商貿易。日本根本不想无視有关中国的門戶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以及現行有效的各項协定。但是日本反对各国采取任何形式的、足以危及东亞和平秩序的行动。日本对于維护东亞的和平秩序，是与东亞各国，特别是中国共同負責的。其他各国或国联对中国实行利己主义政策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丙、4月26日外务大臣对于英、美两国駐日大使的質問，答称4月20日主管官員的回答大体上説明了帝国政府的立場，提交了回答提綱的譯文如下：

(一)日本从未侵害过中国的独立和利益，同时也沒有这种意圖。不仅如此，日本还衷心希望中国能够保持独立，实現統一和繁荣。然而中国的保持独立，实現統一和繁荣，原则上要靠中国自己的觉醒和努力。

(二)日本无意侵害第三国在中国的任何利益。第三国从善意出發，通过通商貿易与中国来往，将給中国带来利益，这倒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从来就支持关于中国实行的門戶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并且遵守有关中国的現行有效的各种条約及协定。

(三)然而，日本对于任何国家采取任何形式的違反維护东亞和平及秩序的行动，都不能置之不理。日本考虑到它在东亞所处的地理上的地位，对于維护这一地区的和平秩序最为关切。因此，在中国問題上，对于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上述情况，而利用中国来推行利己主义的政策，都不能置若罔聞。

[根据"外务省公布文件集"第十三輯]

塘沽停战协定

(1933年5月31日)

5月31日下午四时在塘沽，关东軍司令部發表——关东軍司令官于5月25日在密云接受了何应欽通过其代表徐燕謀参謀提出的关于停战的正式提

議。根据这一决定，关东軍代表陆軍少将岡村和关东軍副参謀与华北地区中国陸軍代表陆軍中将熊斌于5月31日在塘沽签訂了如下的停战协定。

1. 所有中国陆軍应即速撤到連接延庆、昌平、高丽营、順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鎮、宁河、蘆台的一綫以西及以南地区，以后不再越过該綫前进，亦不进行任何挑衅扰乱行为。
2. 日本軍为了确認第一項的履行情况，将随时利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进行視察，中国方面应对此給予保护和各种便利。
3. 日本軍确認中国軍已經履行第一項規定后，将不越过上述中国軍的撤退綫繼續进攻，而自动地撤到長城綫一带。
4. 長城以南，屬于第一項中所規定的一綫以北及以东地区的治安維持工作，由中国方面警察担任。
5. 本协定签字后生效。

〔根据昭和8年(1933年)6月1日“东京朝日新聞”〕

政府关于明确国体的声明

(1935年8月3日)

伏惟我国国体，已經在天孙降临时所賜神敕中有了昭示：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国家，宝祚兴隆与天地同样長久。因此，在关于頒布宪法的上諭中說：“統治国家之大权，系朕繼承于祖宗而傳之子孙者也”，宪法第一条明确規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这就是說，大日本帝国的統治大权屬于天皇，这一点十分明确。如果認为統治权不屬于天皇，而天皇不过是行使这一权力的一个机关，那便是完全違反万邦无比的我国国体本义的。

近来在解釋宪法的学說方面，关于国体的本义，竟然發生了各种各样的議論，这是不胜遺憾的。政府抱定决心要作进一步努力来明确国体，并發揚其精华，兹将此意公布周知，希望各方面广泛予以协助。

〔根据昭和10年(1935年)8月4日“东京朝日新聞”〕

政府关于明确国体的第二次声明

(1935年10月15日)

不久以前，政府曾就国体的本义作了闡明，借以指明方向，以期愈益發揚国体的精华。天皇为我国統治权之主体，这是我国国体之本义，也是帝国臣民

坚定不移之信念。伏察有关帝国宪法的上諭及条章的精神亦在于此。然而，有人随便援引外国的事例、学說来与我国国体相比拟，竟然認为統治权的主体不是天皇而是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而主張所謂天皇机关說，这是与我国的神聖国体相悖謬，严重違反国体的本义，必須徹底加以鏟除。政教及其他百般事宜，必須以万邦无比的我国国体本义为基础，并發揚其眞髓。政府根据上述信念，再次闡明意圖所在，以使国体观念更加明确，并坚决竭尽一切努力来保証收到实效。

〔根据昭和10年(1935年)10月16日"东京朝日新聞"〕

統一書号: 11017·89
定　　价: 1.10 元